

康克清回忆录



康克清回忆录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117 号

康克清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9 插页 321 千字

1993 年 8 月 第 1 版 1993 年 8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065-2056-7/I·257

定价: 16.00 元



康克清

8647

1937 年康克
清在延安。



1939 年在晋东南，康克清与朱德和陈波儿（左一）等合影。



1949 年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女委员在怀仁堂前合影（后排右一为康克清）。



1951 年宋庆龄、陈云和康克清在酒会上。

1955年，
周总理举行招
待会。右起：
宋庆龄、康克
清、朱德、刘
少奇、王光美。



朱德与康克清在中南海。



1980
年，康克清
在哥本哈根
“联合国妇女
十年”中期会
议上讲话。

与布什
夫人在一起。





1982 年与拥军模范赵珍妮合影。



1982 年在四季青敬老院。



1982 年在日本东京与日本地妇会会长大友世富在一起。后排左起：黄甘英，葛翠林，黄量等。



1982 年邓颖超与康克清在儿少活动中心。



八十年代中期与雷洁琼（左一）、王琇瑛大姐在一起。



1983年，康克清与马海德一家。



1985年，康克清与解放军女英模在一起。



1986年，康克清和孩子们在一起欢度节日。



1986 年康克清与农民画家李凤兰一起欣赏她的剪纸（中坐者为戎冠秀）。



1987 年，康克清与朱学范在亲切交谈。



1987年夏，杨尚昆和康克清一家。



1987年康克清与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夫妇合影。



1988 年康克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左为钱伟长。



1988 年康克清为沈兹九大姐祝贺九十寿辰。



1989年3月8日，杨尚昆为康克清佩戴纪念章。



八十年代康克清与王定国（中）、曾志合影。



1988年在黄金海岸儿童夏令营开幕式上。左起：李铁映、康克清、方毅。



1990年，江泽民、李鹏、姚依林前往医院看望康克清。



1980年5月14日，与邓小平、卓琳、蔡畅、邓颖超等在一起。



1984年在北戴河与帅孟奇（中）、刘英（左）在一起。



1988年在党小组会上。左起：王云、曾宪植、黄甘英、罗琼、张洁珣、董边、康克清。



前排左起：罗琼、胡德华、康克清、黄甘英、郭力文等一起唱歌。



与解放军
英模许良握
手。左4张帼
英。

亲切会见
日本宋庆龄基
金会会长宇都
宫德马。左三
吴全衡。



祝贺康大
姐 80 寿辰。前
排：王云
(左)、胡德华
(右)；后排右
起：董边、田
秀涓、郭力文
等。

序

杨尚昆

我初识康克清同志，已是六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在中央苏区，她和朱德同志结婚不久，身姿飒爽，朝气蓬勃。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影响下，康克清同志从一个农村童养媳自觉参加革命，经过红军的培育和战争的锻炼，延安抗大和中央党校的系统学习，特别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工作实践，成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康克清同志的一生经历，具有时代的、鲜明的代表性；既是旧社会普通百姓反抗压迫、要求翻身解放的缩影；更是广大妇女追求革命、追随时代，不断前进的典型。在战场上，她临危不惧，勇挑重担，曾经是一名年轻的军事指挥员。在日常工作中，她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她循循善诱，又坚持原则，是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她实事求是，不盲从随流，是一个表里如一的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她事事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晚辈，是一位严肃慈祥的长者；她廉洁奉公，光明正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依然保持着革命战士的本色。几十年来，在妇女儿童工作领导岗位上，她视野开阔，

2093/3415

讲求实际，联系广大妇女群众，深切体贴她们的疾苦，关怀她们的合法权益。在历史新时期，她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为妇女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她热爱少年儿童，动员社会力量兴办各种儿童福利事业，时刻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是一位倍受爱戴的妇女儿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对祖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她时系心头，在病榻上仍念念不忘。康克清同志还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妇女之间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

康克清同志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以老战友的心情，时刻怀念着她。把她的一生经历诉诸文字，记载下来，这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康克清同志生前作了较详细的口授，撰写组的同志又查阅了大量档案，并访问了不少老同志。现在几经修改并经她审听过的回忆录，就要出版问世了。《康克清回忆录》记述了她从一个童养媳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历程。她的生活经历，她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必将激励广大群众和青少年，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解放思想，开拓进取。

康克清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目 录

第一章	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	(1)
	降生在破渔船上.....	(1)
	寻找出路	(11)
	万安游击队	(22)
第二章	走上井冈山	(32)
	初见朱军长	(32)
	毛委员同我谈话	(38)
	大柏地战斗	(47)
	和朱德结婚	(54)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63)
	无中生有的“AB团”	(63)
	会见万安乡亲	(72)
	频繁的工作变动	(76)
	去起义部队演讲	(82)
	女子义勇队和红军学校	(85)
	雪中慰问伤员	(92)
	在红军总部	(98)

	不迷信洋人·····	(101)
	第一次指挥战斗·····	(105)
	在重围中·····	(114)
第四章	踏上长征路·····	(118)
	消除隐患·····	(118)
	抢渡湘江·····	(124)
	行军途中的毛泽东·····	(129)
	紧张的遭遇战·····	(134)
	难忘遵义·····	(138)
	脚的故事·····	(144)
	通过彝区·····	(149)
	翻雪山·····	(156)
第五章	从南下到北上·····	(161)
	一、四方面军会合·····	(161)
	反对分裂·····	(167)
	张国焘的卑劣伎俩·····	(174)
	搭救廖承志·····	(183)
	连我也不放过·····	(187)
	战胜死亡·····	(192)
	迎接二、六军团·····	(197)
	到达陕北·····	(201)
第六章	凤凰山下·····	(207)
	从保安到延安·····	(207)

	会见斯诺夫人·····	(214)
	抗大生活点滴·····	(218)
第七章	在八路军总部 ·····	(224)
	去五台前线·····	(224)
	南移途中·····	(230)
	洪洞县·····	(233)
第八章	太行山上 ·····	(237)
	慰问石砣节煤矿工人·····	(237)
	杨尚昆帮我解决矛盾·····	(240)
	砖壁村和枣林村·····	(244)
	给朱老总祝寿·····	(250)
	两条毛毯·····	(256)
第九章	洛阳谈判 ·····	(263)
	去洛阳·····	(263)
	进入国民党控制区·····	(269)
	谈判见闻·····	(277)
	经西安返延安·····	(284)
第十章	延安岁月 ·····	(291)
	大生产运动·····	(291)
	党校生活片段·····	(299)
	抢救运动·····	(306)
	参加“七大”·····	(310)
	缅怀左权·····	(313)

朱老总的两件家事·····	(316)
撤离延安·····	(319)
河间访赵烽·····	(323)
北官庄土改·····	(326)
济南之行·····	(333)
第十一章 投身妇女儿童工作·····	(339)
苏区的妇女·····	(339)
晋东南妇救总会·····	(346)
军民鱼水情·····	(350)
战时保育工作·····	(353)
马背摇篮曲·····	(367)
第十二章 在新中国的舞台上·····	(373)
西柏坡·····	(373)
怀仁堂的两次盛会·····	(381)
移风易俗·····	(385)
计划生育·····	(392)
探索儿童保育工作·····	(394)
“多送些王昭君来”·····	(403)
教育失足少年·····	(408)
一个篱笆三个桩·····	(411)
参加国际会议·····	(414)
第十三章 对宋庆龄的怀念·····	(422)
保卫儿童委员会的由来·····	(422)

国际儿童文化交流·····	(425)
朝、越难童在中国·····	(428)
中国福利会·····	(430)
宋庆龄基金会·····	(435)
第十四章 风雨同舟·····	(440)
批错了几位同志·····	(440)
要实事求是·····	(443)
庐山会议前后·····	(445)
七千人大会·····	(453)
随朱老总返乡·····	(455)
两次回万安·····	(458)
第十五章 十年动乱·····	(465)
参加铅山社教·····	(465)
刮起打倒朱德的黑风·····	(468)
我也未能幸免·····	(472)
下放从化·····	(474)
陈毅来访·····	(477)
难以忘怀的事·····	(478)
痛苦的诀别·····	(482)
粉碎“四人帮”前后·····	(486)
第十六章 新时期的开始·····	(490)
拨乱反正·····	(490)
第四次妇代会·····	(497)

怀念戎冠秀.....	(501)
一次盛会.....	(503)
修改婚姻法.....	(508)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513)
关于儿童工作.....	(519)
家庭教育问题.....	(526)
五次妇代会前后.....	(530)
国际工作二三事.....	(534)
结束语.....	(554)
后 记.....	(557)

第一章

从童养媳到红军战士

降生在破渔船上

赣江从南往北不停地流淌。奶奶告诉我，一九一一年的秋天，我降生在赣江上的一条破渔船上。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所以给我取名叫桂秀。我生父叫康年苟，勤劳、善良。生母黄年姑是个贫农的女儿。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起先租种地主土地，受地主惨重剥削，一年到头辛勤耕种，打下的粮食，除了交租，所剩无几。碰上灾年外出逃荒，回来还是过不了地主这一关。在陆地上实在无法生活，父亲得到村里穷人的帮助，才租来了一条小渔船，一家人就在赣江上捕鱼为生。我有个姐姐叫康伍秀。我尚未出世前，一场狂风暴雨，引起山洪暴发，小渔船被打翻了，人在水里挣扎，东西在水上漂流。大水威胁着全家三口人的生命，多亏邻近的几条渔船相救，才把一家人救了上来。家里仅有的一点东西都被冲得一干二净。两年后，我出生

尚未满月，父亲就因缴不起渔税被抓去坐牢。他在牢房里，惦念着家里母女三人的生活，成天蹲在墙边，长吁短叹。同牢房的肖仲庆劝慰他说：“这年头穷人坐牢是家常便饭，要放宽心，不要把身子骨愁坏了。”父亲听到几句温暖话，十分感动，就如实对他说：家无隔宿粮，产妇吃不饱，哪有奶水喂孩子？担心刚出生的女儿活不成。

肖仲庆说：“孩子没奶吃，会饿死的。不如送人做童养媳，还可讨条生路。”肖仲庆快人快语，父亲却感到难过。他说：“我一不好吃懒做，二不缺胳膊少腿，一天累到晚，还养不起两个娃娃，怎么对得起孩子？”

我们家里，自父亲被抓走后，船被封了，人被赶上了岸。我母亲背着我，拉着两岁的姐姐，投奔像我家一样穷困的大伯。东借西凑，勉强凑了几元大洋，交清渔税，赎回了父亲和破渔船。一家人才又开始了在赣江上的捕鱼生活。

肖仲庆出狱后来到我家船上。父亲正为家庭生活发愁。肖仲庆看出父亲的心事，就凑在他耳边轻声说：“年苟老弟，上次谈到你女孩的事，现在有个机会。我的老姑父罗奇圭是大禾场村人，前不久一个男孩夭折了。老姑还有不少奶水，想领你这个孩子作望郎媳。他家也是穷苦人，为人厚道，喜爱孩子。你的孩子到他家不会吃亏。”

父亲听了，内心矛盾重重。过了半晌，才支支吾吾地说：“这事还得和她妈商量商量。”

深夜，江面上静悄悄，远处的渔火在游动的江风中忽明忽暗。船舱里，为了小生命的去留，父亲叹息，母亲抽泣。父亲说：“孩子留在我们身边，缺衣少食，难得养大。送给人家也许是条生路。”母亲紧紧抱住我，流着眼泪，把我亲了又亲。最后，忍住悲痛，下决心说：“送吧。”

几天后，罗家来抱孩子了，母亲紧紧抱着我喂了最后一顿奶，难舍难分。罗家叔叔前来抱我，母亲使劲抱住，不肯撒手。还是父亲狠了狠心，把我夺过来，交给罗家。骨肉分离的苦楚，当时我幼小的生命哪能懂得。等我长大，知道了这事，心灵深处留下一个难以抹去的伤痕。

我是作为望郎媳被罗家收养的，养母用她的奶水喂养我，希望我能给他家带来一个儿子做我的丈夫。遗憾的是她不久生下同我一样的女儿，而且不到满月就夭折了。打那以后，她再没有生育。于是，他们一家就把我当成了养女。而我一直喊养父罗奇圭叫叔叔，喊养母叫婶子。

我的童年虽然过的也是穷困苦难的生活，但比起同村的其他童养媳，我又是幸运者。因为养父母、罗家爷爷、奶奶都很疼我，使我在苦水中感到家庭的温暖。罗家爷爷去世早，在我的记忆中已没有什么印象了。

养父罗奇圭爱好采茶戏。这是一种江西地方戏，农村里又叫三脚班，就是三个人就能唱一台戏。农闲季节，他常常到外乡、外县去演戏，回家时常给我带点麻糖、米花一类的小吃。对于我们穷孩子来说，这样的食品也是十分

难得的。我总是留着慢慢吃，还经常分给穷苦的小伙伴童养媳，让大家尝个鲜。

养父粗通文化，满脑子里是戏文与故事。高兴的时候，就讲给我听。《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孟姜女寻夫》、《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等等，使我从小就知道许多故事，知道妇女当中也有不少能人，懂得了人世间有许多不公平。我虽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对未来也有许多美好的梦想。

当我六七岁时，就开始学着干活：拾柴、扯猪草、放牛、做鞋、推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很多干活的本领。我盼望自己快快长大，能和大人一起挑起生活的担子。

当时农村的女孩子都得裹小脚，大脚女孩要遭人耻笑。这是女孩子的一场灾难。好端端的天生两只脚，硬被长长的布条裹成尖尖小小的粽子形，那酸疼憋闷的滋味，令人难以忍受。当我长到十来岁时，奶奶就要给裹小脚，说：“大脚妹子丑得很，嫁不出去。”我不依，奶奶就像抓小鸡一样，把我夹在胳肢窝下，使劲地用粗布条把两只脚紧紧裹上。可是等她人一走，我就把裹脚布打开。奶奶为此发过好几次脾气。好在养母站在我一边，她自己有一双大脚，深感女孩子裹了小脚，上山砍柴、下地干活都困难，劝说奶奶不要给我裹小脚。三个人二比一，奶奶看我态度坚决，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说：“那就让人笑话吧！”这样，我

才免去了这场灾难，幸运地留下两只天足。它对我下地劳动，后来参加革命走南闯北，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每念及此，我对养母总是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

罗塘湾有上、下两条街，中间有一块河洲沙地，每年春夏之间，水清草肥，是个放牛的好牧场。上、下街的孩子们都把牛赶到那里吃草。有一次，下街的孩子突然不让我们上街的娃娃到那里放牛，双方发生争执，开始对着骂，后来就扔石头和土块，摩拳擦掌，互不相让。原来是下街地主“肖麻子”的儿子，想独占河洲地。我对上街小伙伴们说：“草是天生的，洲是公用的。谁不让我们放牛，我们就和他评评理。”

有的小伙伴嘀咕说：“下街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几个胆小的吓得溜走了。

我说：“有理走遍天下，什么也不怕。我们穷人的儿女不是为了打架争高低，只是要狠狠教训那个地主崽子。”我们一群上街的男女孩子就冲上前去，同他们讲理。我先对下街的穷孩子说：“肖麻子早就想霸占这块沙洲地，赶走我们，你们也得不到好处。”下街的穷孩子听了我的话，不再跟那个地主崽子跑了。他看到自己力量孤单，气得乱骂一阵，独自一个跑开了。看着他这副欺软怕硬的模样，我们拍手欢笑，小伙伴们都感到了团结的力量，大家一块高高兴兴在那沙洲地里放牛。

有年冬天，一连下了几天鹅毛大雪，穷人没吃没烧，日

子实在难过。养母连红薯皮、笋头皮都咽下去充饥。我想起前几天在罗塘街上看到“怡生和糕饼店”小老板，拿着麻饼和云片糕喂狗、逗狗玩，实在不平，就问养母：

“为什么你吃红薯、笋头皮，怡生和小老板竟拿着麻饼和云片糕喂狗呢？”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皱着眉头恼怒地对我说：“那你就到他家门口等着吃麻饼、云片糕吧。”

我赶紧说：“我才不稀罕他们的东西呢！那是我前几天走过他家门口看到的，觉得我们跟他们比，太不公平。婶婶，你不要生气。”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说：“这就是啦！人家有钱，我们穷，但人穷要穷得有志气。”

“为什么他家有？”我接着问。

“那些有钱的人心狠手辣，靠害人、骗人、喝穷人的血汗，才发的家，赚的都是黑心钱。”

“人穷志不能穷”，这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寒潮过去了，雪停了。山岗上、树枝上、屋顶上……铺上了厚厚的积雪。太阳从云层里露出了微笑，大地显得分外清新。

孩子们都从屋子里跑出来，聚集在场地上，抛雪块、打雪仗、堆雪人，热闹非凡。连平时娇生惯养的怡生和糕饼店的小老板，也忍不住跑出来了。他穿着厚厚的长棉袍，头戴瓜皮帽，脚穿新棉鞋，颈上还围条格子羊毛围巾。开始

他站着傻看，接着跃跃欲试，可谁也不理他。

突然有人在草堆里发现一只小麻雀，已经冻得半僵了。有人去捕捉它。它飞了起来，可是飞不了几步又落下了。孩子们好奇地围着它，小麻雀抖着翅膀东躲西窜，终于被几个孩子抓住，又用绳子拴住它的脚。小老板在旁拍手叫好，高声喊道：“把麻雀给我，我拿麻饼跟你们换。”

大家都很厌恶他。我对他说：“不换！谁稀罕你的麻饼，那是赚穷人的血汗做的。”我的话引起小伙伴的响应，都跟着说：“不换，就不换！谁稀罕你的麻饼！”

小老板换不成麻雀，便坐在地上撒赖大哭起来。我们一群孩子哈哈大笑着走开了，谁也不去理他。

我十二岁那年夏秋之际，同几个女孩子在江边放牛，因为天热，就下水洗澡。这时来了两个地主崽子，见我们女孩子在水里，用小石头砸我们，吓唬我们。别的孩子发现得早，一个个全跑了。我因为离得远，来不及上岸，就躲在水里，任他们怎么威吓、叫喊，也不理睬。弄得他们无可奈何，只好走了。

大概这次在水里呆的时间太久，我得了病，一发病就全身发冷、发抖，犹如进了冰窖。冷过了，就发热、出汗，一次比一次重。当时农村缺医少药，奶奶疼我，她用迷信的办法，用劈开的竹竿敲地、敲门；又趁我不注意，从我身后把一个瓦罐狠狠地往门外摔，吓得我直往外跑。据说这是为了吓跑缠人的病鬼，鬼被吓跑了，病也就好了。可

是这种迷信只会耽误病情。有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生命。后来家里还是东挪西借，凑钱给我买中药吃，才治好了病。

我渐渐长大，每当牵着牛或背着筐，经过村子里的小学堂时，琅琅的读书声，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我。一天，我终于大着胆对养母说：“我想上学。”养母听了摇摇头，心酸地说：“只有地主老财家的少爷小姐，才有福分上学，谁叫你是穷人家的妹子。”养母的话像一瓢凉水把我从头浇到脚跟。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进出学校，从此再不提这件事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留心养父怎样扶犁耕田、怎样锄草，留心养母怎么施肥播种、炒菜煮饭。我开始自己学着做。渐渐地，在农活和家务活上，我都可以搭上手，不断受到养父母和奶奶的夸赞。

这年夏天，我家南瓜地里南瓜叶子上长满了淡黄色的甲虫，叶子很快被蚕食得成了一张破网。养母看了又着急，又心疼。我跟养母一起去捉虫，刚一伸手去捉，虫就飞了。我想起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块玩耍时，用长竹竿在一端扎个圆圈，蒙上蜘蛛网，知了和别的虫子都能粘住。我马上动手做了一个，在南瓜叶子上一扣，许多甲虫都给密密麻麻地粘住了。一张网子粘满了，就换一张，这样很快南瓜地里就看不见害虫了。几天后，南瓜秧生出新叶子。不久，长得郁郁葱葱，结了许多大南瓜。为此，养母和奶奶都称赞我，我也觉得格外高兴。

有一次，我随养父下地，开始锄地不久，养父的锄头松动了，要我回家去换把结实的。我拿着锄头走了一会，觉得自己能把锄头修好，就在石头上使劲墩了几下，然后试了一试，手掰不动，晃也晃不动，在地上锄两下，满好使。我以为修好了，就高高兴兴往回走，把它交给养父。他以为是换了一个结实的锄头。谁知他举起锄头，刚锄了几下，锄头就飞了，幸亏没有伤着人。养父气得举起牛鞭就抽我，我用手去挡，手臂和手腕上立刻鼓起一道血痕。养父见此情况，心疼地住了手。他厉声问我，我才说了实话。他气得跺脚说：“你刚才不说实话，锄头万一砸到人，可就闯下大祸啦！”这件事给了我深深的教训，一辈子不忘：做任何事不能偷懒，不能做假。

事隔不久，我和同伴们一起挥着牛鞭，去江边放牛。牛在江边吃草，和煦的阳光下，枝头的小鸟在歌唱，远处的山鸡在呼唤，在这自然的景色中，我们捉迷藏，玩得十分欢快。

“桂秀，你的牛跑了。”听见远处传来的呼声，我拉下蒙住眼睛的手帕，四处张望，着急地呼喊：“大家帮我找牛啊！”

跑了好远，终于在邻居大伯的菜园里找着了牛。眼看园子里青嫩肥壮的青菜被吃了一大片，还有不少也被踩得东歪西倒。我很难过，懊悔自己没有把牛看好。

“快，把牛牵走吧！大伯见了会骂人的，也许还得赔钱。”

小伙伴七嘴八舌地说着。

“趁着他不知道，我们赶快跑吧。要不然，你叔叔知道了要生气的。”

小伙伴们帮我赶着牛，一起回家了。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想起了锄头的教训。小伙伴们都是好意，可是要照她们说的做，我不是又要做下错事了：“自己做错了事就得承认，我没有管好牛，牛吃了大伯的菜，骂是应该的，赔钱也应该，撒谎可不行。”

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就把自己贪玩，没看好牛，牛把邻居大伯的菜给吃了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养母。她对我使个眼色，摇摇头。我明白她是要我不要声张，能掩盖过去就算了。我急忙对她说：“菜是我家牛吃的，不能冤枉别人。我要不承认，大伯就会怀疑是别人的牛。哪怎么行？”

养母听我说得有理，就挑起一担尿肥，领着我一块去向大伯道歉。我上前说：“大伯，是我不小心，牛吃了你的菜，实在对不起。我婶子挑一担尿肥来给你浇地，我给你赔礼来了。”养母也对他说：“孩子不懂事，贪玩，没看好牛，吃了你家的菜，请你多原谅，我这就来给你的菜地浇尿肥。”大伯听了我们两人的话，满脸怒气顿时烟消云散，说：“既是这样，大伯就不怪你啦。桂秀，以后你可要管好你的牛哇。”这件事的顺利解决，使我又一次感到，只有说真话，才能把事情办好。

寻 找 出 路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人都把我称作“媳妇王”，认为我是全村最能干的童养媳。我无形中成了童养媳中的一个头头。我在家里，不挨打，不挨骂，生活比别的童养媳强。我同村里的童养媳们在一起劳动玩耍时，她们发生了争吵，或是打起架来，我就帮她们劝解。只要我一说话，她们都能听，我好像成了真的“媳妇王”了。

新屋下村的张庚秀是一家老财家的童养媳。老财有钱有势，小伙伴都不愿跟她玩，有时还对她说些风凉挖苦的话。我觉得这样不好，对大家说，她是同我们一样的童养媳，亲生父母也是生活困难的穷人，才送她到老财家里。老财的儿女们享福，把她当作丫头使唤。她虽在老财家，吃的是剩菜剩饭，穿的破衣烂袜，从早到晚，难得休息。我们可不能把她也看成地主老财。后来小伙伴们在我的带动下，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她为这事，感动得流下了泪。

我们一群童养媳渐渐成了亲密的小伙伴，经常结伴放牛、割草、打柴、捡蘑菇、挖野菜。高兴了在一起打闹一阵，累了就坐在水牛背上，说说不愿告诉别人的心里话，各人受的痛苦。这样一说，好像痛苦也就减轻了。有一天，夕阳照红了山岗树林，我们走到山腰歇脚。有个小伙伴突然提议：“我们去当尼姑吧！”我听了坚决反对。当时我还说

不出多少道理，只觉得尼姑整天关在庵堂里，不是念经，就是拜佛，孤孤单单，冷冷清清，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这么一说，大家都赞成。可是有人却说：“这样一天到晚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死，那怎么成？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难道我们这辈子就是为的死，就不能想办法找条活路吗？”我这么一说，小伙伴一个个点头赞成。可是到哪里找活路呢？

我忽然想到听人说过广东革命军，他们已经开始北伐，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北伐军里有女兵队，管吃、管穿，又能练武，还能念书学写字、学道理。要是我们都当上女兵，那不就是活路吗？这一下打动了大家的心，可是怎样才能当上女兵呢？不认识人又不认识路。有人说，听说北伐军前个时候从赣江向北去，大船还曾在罗塘湾靠岸停过。于是，我们七八个人悄悄来到赣江边上，等待北伐军的船。来来往往的船不少，却不见一只北伐军的船。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最后只好失望地回来。不过，从此当女兵的愿望在我的心里越来越强烈，成了不可动摇的决心。

罗塘湾大禾场村背村有个曾天宇，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寒假回到万安县，邀集了本县张世熙等十多名先进知识青年，组织“万安青年学会”，创办《青年》杂志，举办平民夜校，组织俱乐部，宣传讲演，开展社会调查，和农民谈天说地。后来，他们组织青年在罗塘湾至善小学演出文明戏《车夫的婚事》和一

些别的戏，宣传新思想，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反对封建旧礼教。我那时几乎每场都看，看一次，就觉得懂得了不少新东西，眼界也亮堂不少。后来我还跑去听他们演讲宣传、上夜校。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那里已经打倒了地主、资本家，没有剥削和压迫；懂得了穷人只有组织起来革命，才能翻身，才有出路。我那时十四岁，由于童年的痛苦经历，立即就被他们演讲的革命道理吸引了，向往着如何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去。

北伐军的胜利就像一阵春风，吹到赣南，吹到赣西，吹到万安。他们沿粤汉铁路指向长沙、武汉，同时沿赣江乘船北上指向南昌。万安县罗塘湾在共产党的推动下也活跃起来。曾天宇为发展革命力量，这个时期不停地在万安和省城南昌奔波。这一次，他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很多好消息，说湖南的农民起来了，把反动派打得落花流水。还说这次回来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才能跟地主老财斗，才能翻身得解放。许多农民被他动员起来，知道农民协会是给穷苦农民办事的。

在革命的洪流中，我积极组织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经过妇女训练班的学习，我被选为罗塘湾乡妇女协会的常任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妇联主任）。我一面开展本乡的妇女工作，一面参加县里组织的巡视团，到各处去演讲宣传。

一九二六年，我当了区妇协宣传委员，和男同志一样，不管酷暑寒冬，不问晴天雨天，戴着斗笠，率领妇女宣传

队在罗塘湾一带发动积极分子，动员妇女参加打土豪分田地，同时宣传禁止虐待妇女，禁止虐待童养媳，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平等，宣传禁烟（鸦片烟）、禁赌，动员妇女放脚、剪发。村背村刘春香把她家童养媳罗冬英打得满身是伤，奄奄一息，还不给饭吃。我领着妇女到村背村开会，严厉批评了刘春香这个恶婆婆。起先刘春香不服气，但是看见青年妇女发动起来的力量，不得不低头认错，保证不再打人。罗冬英后来参加了革命。

农民高兴，伪区长罗礼皇却愁眉苦脸，坐立不安。他把亲信、狗腿子统统找来说：“农民要成立农民协会了，要造反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对付？”他的亲信郭通定说：“孙悟空有七十二变，难道我们这些人一变也想不出来？”罗礼皇忙问：“你说怎么变？”郭通定阴险狡诈地说：“我们也拉些人，成立一个农民协会，选你当农会主席。这样，你又是区长又是农会主席。天还是你的天，地还是你的地，这些穷小子还攥在你手心里。这不是孙猴子的一变么？”罗礼皇喜出望外，于是建立假农会的把戏就敲锣打鼓开张了。

鬼头鬼脑的罗礼皇，由一只吃人的老虎变成了一只哈巴狗，外出不戴礼帽，不带随身跟班，碰上农民点头哈腰，装出一副十分谦恭的样子。还说：如今是革命当道，我也要跟上潮流，和大家一起革命。

狗腿子们拿着会员登记册，挨门逐户劝人入会。他们利用劝、吓、逼的手法，居然也纠集了一些不明真相、胆

小怕事的农民入了他们的假农会。

我的养父罗奇圭，是罗塘湾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起先，他们常常在我家开会，养父总叫我在门外看着，有生人来就咳嗽一声。我看见每次来的都是我喜欢的坏人，知道他们全是革命的，干的是好事。后来他们都成了农会积极分子。我看到那帮坏蛋也搞起农会，就问养父：“你说穷苦农民才能入农会，怎么地主、狗腿子也入农会？”养父说：“那帮欺压农民的地主老财，没怀好心，全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可不能上当。他们搞的是假农会。”这才使我恍然大悟。我同几个积极分子赶紧到处去宣传，被骗加入假农会的不少人，知道上了当，一个个退了会。

罗礼皇眼看假农会要垮台了，急急忙忙召开成立大会，但稀稀拉拉只来了不多的几个人。罗礼皇在几个狗腿子的叫嚷下，当上了罗塘湾农民协会主席，但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有名无实。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共产党员曾天宇、刘光万推动下筹备的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那天，农会会员排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会场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两相对比真假分明，当场戳穿了罗记农会的假面具，农民运动在罗塘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听说罗塘湾有了共青团，既然革命，当然就应当参加革命组织。我对姐姐康伍秀一说，她很赞成，两人一起去找共青团的负责人罗世通报名参加共青团。罗世通听我说

完，就笑起来说：“你参加妇训班时，已经参加共青团啦，怎么又来报名？”我十分奇怪，我这个团员自己怎么还不知道？他笑着说：“你做了那么多工作，又是妇协秘书，怎能不是团员？那是我替你填的表，忘了告诉你。”

为了动员妇女剪发，妇女协会编了个歌子：“剪了发，样样好，打柴割草不缠绕，随地都可跑。……”可是，真要改变一个旧习俗，也不是容易的事。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女人剪发，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真是人心不古。”有旧思想的人摇头叹气，说那是伤风败俗的事。地主老财还放风说：凡是剪了发的人都是革命党，不会有好结果，将来要杀头。吓得胆小的妇女不敢提剪发的事。

有一天下午，在罗塘湾上街德声堂开妇女会，坐满了一屋子人。有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有穿花衣服的小姑娘，有梳辫子的女青年，有盘发髻的媳妇。妇女主任欧阳秀站在堂屋中间，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一定要破除千年旧习，剪掉我们头上的累赘——发髻，这样干活方便，也省了好多梳洗绾结的时间，讲完又教大家唱《剪发歌》。几位前来帮助剪发的妇女拿着梳子、剪刀，在堂屋里走来走去，一边问：“哪个带头剪？”

堂屋里鸦雀无声，你看看我，我望着她，想剪又怕剪。封建势力的谣言，还像乌云一样压在大家的心头。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人敢当出头鸟。

欧阳秀一连问了几个人，都回答说：“等回家商量商量

再说。”

我看着这情景实在着急，心想现在到处都在革命，还怕些什么？这时机再不能错过，错过了，不知还要费多少唇舌，就鼓起勇气站起来说：“请先剪我的头发吧！”顿时全场吃惊，大家的眼睛都盯到我一个人身上。妇女主任笑着走过来对我说：“桂秀，你带了个好头，今后罗塘湾的妇女工作就要靠年轻人带头。”

“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了，然后用梳子一理，再用剪刀把短发整理一番，干净利索。她们看着我，都说：“剪了发，真是利索多啦！”于是一个个都挨着站起来，争着剪发。这天下午，剪发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戴着欧阳秀给我的八角帽，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里。谁知养母一见我变了样，把发辫剪了，勃然大怒，抓起烧火棍就来打我。我躲在墙角边，不反抗，也不哭。养母问我：“谁叫你剪头发？为什么剪头发？”我说：“凉快，做事干活都方便，已经剪了，再也安不上了。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我不反抗，引起养母心疼，举起的手臂无力再打下去，只好默认了面前的既成事实。

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传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起初人们还不肯相信，可是不久，靖卫团回来了。他们是地主老财的武装，团长罗章骑着高头大白马，后面跟着一群带枪的士兵。豪绅、地主立即活跃起来。他们反攻

倒算，到处抢劫衣物，捉鸡牵猪，绑人打人，把罗塘湾折腾得不成样子。他们对妇女也不放过，见到剪了头发的，就说是共产党。有些妇女赶紧把剪掉了的头发拿出来，扎起假发，有的用块花布包着头。

曾天宇、刘光万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革命力量在罗塘湾又逐渐发展起来。为了武装工农，组织起秘密的农民军，一面秘密地制造土枪、土炮、松树炮，收集零星枪支；同时布置收缴敌人散兵、逃兵的枪支。这方面，妇女协会做出了不少成绩，有些胆大的农协会员，冒着危险，把少数敌人引到农民埋伏的地点，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有一次，几个农妇正在田间劳动，发现三个国民党士兵在苇塘睡觉。她们先派人回去报告农协，然后请三个当兵的到村里吃饭。谈话中知道他们是敌军赖世璜部的逃兵。曾天宇给他们讲了革命的道理，告诉他们：农民协会不允许当兵的抢老百姓的东西，更不许他们把枪带走，否则就把他们送回部队。他们听了有点害怕，给了他们每人两块银元，他们老老实实把枪留下了。

后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刊《布尔什维克》曾报道说：“（江西万安）农妇极勇敢，每遇（白军）单身士兵，必停止耕作，前去抢枪。”讲的就是我们那一带的事。

国民党反动派深知万安农民军非常厉害，有次派了一百二十名军人护送官员过万安。可是不巧，到了万安，船坏了，他们只好住在罗塘湾附近的百嘉过夜，胆战心惊地

设岗放哨。中共万安县委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通知全县农民军在第二天早上去攻打夺枪。通知到达罗塘湾，农民军个个兴高采烈，检修枪支弹药。我十分渴望参加这次战斗。但按照分工，同志们说服我留在村里维持治安，监视未逃跑的土豪劣绅，防备他们搞破坏，还要做好家属工作，为农军准备好吃的。后方工作当然也重要，我只能服从决定，心里一直向往着前方。第二天，农民军打胜仗回来，只缴到四支步枪和一些弹药。因为缺少经验，组织不严密，多数敌人都逃掉了。

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万安县人民在曾天宇、张世熙领导下，连续四次参加攻打县城的暴动。我带领妇女也积极参加攻城的准备和后勤工作：熬硝、造火药、造松树炮。这种松树炮是把很粗的松树段掏空，外面箍上几道铁箍，再装上铁沙火药，用引信点着打出去。虽说打不远，威力却不小，是当时十分厉害的武器，只是每尊炮只能打一炮，就再不能用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万安农军第一次攻打县城，虽未成功，我们罗塘湾农军却活捉了土豪劣绅严子颢，把他押到罗塘湾万寿宫，罚了款。因为他作恶太多，最后还是按照群众要求，将他处决了。

十二月底一个星期里，两次攻打县城都未成功。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万安县农军得到井冈山上红四军毛泽东、朱德的帮助配合。他们先出兵攻占万安附近的遂

川县城，农军士气大振，一下集合起四万人，分四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县城。罗塘湾的农军坐船到王家村登岸，被敌军打沉一只渡船，许多农军泅水登岸，随即向县城进攻。敌军在众多农民威力面前，完全失去了斗志，丢下县城，狼狈乘船向赣州逃去。农军从四面八方进入万安县城。第二天，在县城东湖洲上，由曾天宇主持召开了万人庆祝大会。中共湘赣边特委委员何长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张维先也赶来参加。会上宣布万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光万任县苏维埃主席。全县人民欢欣鼓舞。

但是好景不长，只过了十二天，敌人调动八十团、八十一团两个团，以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向万安县城疯狂反扑。面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根据毛泽东委员的指示，万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撤离县城，转到农村打游击，坚持战斗。

这次革命失败，罗塘湾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土豪恶霸横行，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断遭到杀害。养父罗奇圭躲了起来，我也被送到王家村外婆家里。外婆为我在柴禾垛里掏了一个洞，一有危险，就把我推进去，外边用柴禾层层堵起来。我躲在外婆家一直未被敌人发现。

有一天，我忽然听到曾天宇壮烈牺牲的噩耗，犹如一个青天霹雳。我难过地想：今后有谁来领导万安人民的革命斗争？这对万安县的革命实在损失太大了。

后来听说曾天宇跑回本村躲在一间粮食仓库里，他的

婶母每天给他送饭。一天上午，她在送饭路上遇见儿子曾孝生，这是个游手好闲的赌徒，看见母亲行动有点反常，就拦路问她去干什么？老太太知道儿子为人不正，就假说：“我去赶集，只顾想心思，走岔了路。”赌徒耳闻曾天宇已经回来，官府正在悬赏捉拿，心中犯疑，故意凑上前说：“篮子里什么好吃的，我瞧瞧。”老太太躲闪不及，被他揭开，只好说：“这是我顺路带给三嫂子家的。”狡猾的坏蛋早已猜到了八九分，转身就向挨户团报告请赏。曾天宇的婶母等他走远，急忙跑去告诉曾天宇，叫他快逃。然而来不及了，曾孝生已经带人包围了这间仓库。曾天宇有一只驳壳枪，枪法又好，打得敌人无法靠近。敌人抓住一些乡亲和他的婶母，威胁说，他如不出来，就把这些人打死。曾天宇为了不使群众受害，扒开瓦片，从屋顶站了出来。他站在屋顶上，大义凛然地对群众和反动军队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背叛人民革命，一定失败，中国工农革命一定胜利，劳苦大众只要团结一心跟着共产党，一定能得到解放。几个敌人从屋前房后向他接近，企图抓住他，被他一枪一个，撂倒了好几个。当他发现枪里还剩下一颗子弹时，就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革命胜利万岁！”

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也深深地教育了我。

万安游击队

曾天宇的牺牲引起我极大的愤怒和悲痛。

万安暴动时，红旗漫天，梭标如林，人海如潮的动人场面不见了。到处是白匪军和挨户团，他们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简直杀红了眼。罗塘湾这个不大的地方被杀的就有二百多人，他们经常在罗塘湾的石灰桥上杀人。杀死的人被河水冲进赣江，有个时期河水全被染红了。敌人把那桥叫“杀人桥”。那桥记载着革命人民的深仇大恨，敌人欠下的累累血债。

在那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纷纷躲藏。也有少数人投靠了敌人，人心动荡，有些人从此脱离了革命。摆在我面前的境遇十分清楚：若不革命，就再没有第二条出路。可是怎样干革命，自己也没有主意。听说不少地方有了红军，特别是井冈山上红军更多。我想去当红军，可是井冈山离万安有好几百里。我是个女孩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红军呢？

养父罗奇圭虽说是共产党员，还当过罗塘乡农民协会主席，现在也在东躲西藏。他怕我被敌人捉去，改变了主意，不许我参加革命，打点着要把我嫁出去。这样既可免去危险，又可得到一笔彩礼。他同养母瞒着我，要给我订婚，叫我整天在家里捻棉线、纳鞋底、做衣裳，不准外出。

有一天媒人带来彩礼，被我发现。我把糕点、衣料扔了一地，赶走了媒人。养母忍住气劝我，我干脆说：“你们要是这样强逼我，只怕到时候，有人上轿，没人下轿。”养母拉着我的手，气得哭着说：“叔叔婶子都是为你好。如今你翅膀硬了，就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的心思已定，十头大水牛也休想拉得转。

我找到共青团的负责人罗世通。他家是地主，很有钱，已结了婚，老婆也是个中学生。因为他家在罗塘湾一带小有势力，敌人暂时还没有抓他，但他也东躲西藏，终日提心吊胆。他见我，显得有些紧张，等我说明来意，他才缓过来。我说：“养父逼我嫁人，我再也不愿呆在家里。”问他怎么办？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你嫁人嘛！嫁人也可以保存革命力量！”

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引起我很大的不满。“不成！一结婚，我就多一道锁在身上的链子，革命力量就保存不住了。”

我的回答也出乎他的意外，弄得他无话可说。我见他不说话，就问他作何打算。他说，在罗塘湾呆不下去了，敌人迟早会抓他，他打算出去躲一阵再说。

我劝他到国民党部队里去当兵：“这样不但可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把国民党的军队拉过来当红军。听有人回来说，八十一团里面就有共产党，你到那里当兵不是很好

吗？”

他拒绝了我的建议，说：“到那里，怎么可能那么巧，分到共产党员的手下？那样，进去了，想出也出不来，岂不更糟！”

我们两人怎么也说不到一块。争论一番，各持己见，然后没有结果地分了手。他跑了出去，过一段时间，又回到罗塘湾，还是被挨户团捉去杀掉了。

这个时候，外面到处抓人，家里又逼着我嫁人，真是内外夹攻，日子难熬。

农历七月底，养父接到刘光万和柴苟的通知：井冈山的红军要到罗塘湾来。这是万安县委和井冈山红军约定好，计划在农历八月初一，攻打万安县城的准备步骤。不料万安县委书记在暴动前一天被捕，原定计划被破坏，红军临时在罗塘湾待命。

养父怕我知道红军来到，对我封锁消息，叫养母把我关在房子里。这反而引起我的猜疑。我断定他们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瞒着我。我搬了一条板凳，扒着窗户往外看。当我看见灰军帽上绣着红五角星的士兵时，心里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这不是我日盼夜想的红军吗？原来他们是怕我知道红军来到罗塘湾的消息。这可由不得他们了。我故意把鸡轰出门外，自己乘机上了街。

我一出去就遇见柴苟，他说：“你这个妇女协会的秘书怎么藏起来，叫我到处找。”我说：“你没有事先通知，我

怎能知道你要找我呀！”他说：“赶快找妇协会员帮红军筹粮食做饭。”

我忙去找了罗恒秀、刘桂秀几个人。大家说：“筹粮食不如打土豪来得快！”我们一起找到游必安，跟他去打土豪。游必安这时正带人打捞沉到水塘里的枪和梭标，手里有了武器，又有红军作后盾，什么也不怕了。土豪们早已躲了起来，我们捉了挨户团长家的猪、鹅、鸡、鸭，我又带人打开德声堂的粮仓，取出了粮食。

有个好心人提醒我：“你胆子好大，等红军一走，挨户团回来，你吃得消吗？”我说：“不管这些！红军来了，就得吃饭。”我觉得，只要有红军，什么也不怕。我和几个青年妇女忙着用磨推谷子准备做饭，这时邻村张庚秀带人来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就一起做起饭来。

天过晌午，红军还没有吃上饭，我们心急火燎地忙着。等我们把饭菜送去，太阳已经偏西。红军战士整齐地坐在村前大树下唱歌。他们已经大半天未吃饭，看见我们远远挑着饭菜担子走来，立即有十来个红军战士前来帮忙。

“同志妹，辛苦了，谢谢你们！”

说着，一个个抢过我们的担子。我们几个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只听一阵哨声，歌声停止，各班带开，碗筷“丁当”响，红军开饭了。看着这些年轻威武的战士，我真羡慕极了。想对他们说请求参加红军的话，又不知该找谁讲，更怕错过

机会，一时憋得脸上发烧，幸亏没有人注意我。

“有水喝吗？”一声问话把我惊醒，想起忘了送汤，忙去把青菜鸡蛋汤挑来。

战士们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高兴。有人大叫：“鸡、鸭、鱼、肉、这可是几个月来头一回改善伙食。肚子里有了油水，打白匪就更有劲啦！”我们听了，十分高兴。

饭将吃完，一个红军出来宣布，要在罗塘湾住下来，并给各连、排划了住区。我松了口气，心想：参加红军的事还有时间讲。

罗塘湾又一次热闹起来。农、妇、共青团、儿童团、赤卫队都恢复了。养父托人捎口信叫我回家。想起我被关的情景，我再也不愿回去了。晚上就同罗恒秀几个人一块吃饭，住在妇协主任欧阳秀那里。

第二天，刘光万通知我和欧阳秀到小学校去参加红军召集的本地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何长工主持，陈毅讲话。他是四川人，怕我们听不懂他的话，讲得很慢，很清楚，我句句都能懂。他的话使我明白了全国和万安县的形势，要革命就必须有枪杆子，才能跟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们斗。当时全国好多地方的工农大众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他们就是井冈山的红四军，那里已经建立了工农革命根据地。陈毅讲完，当场发出号召：

“老表乡亲们！欢迎大家参加红军，扩大我们工农红军！打倒蒋介石和地主老财，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然后指指身

旁的刘光万和游必安说，谁要当红军都可以找他们两人报名。

我高兴得一颗心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拚命按住性子，不让别人看出来。这时二叔罗奇玉坐在我身旁，我小声问他：“参加红军吗？”他说：“去！”我说：“你先去吧！等明天我来找你。我还要给红军做饭，怕婶子听说我参加红军跑来哭闹。”

可是等他一走，我就坐不住了，马上找到刘光万：“我要报名当红军，你快帮我去说说。”

他却笑着说：“行，行。不过我还得问一声人家要不要女兵。女孩子报名你是头一个，我看他们这个部队里一个女兵也没有。”

这下我可急了：“不管他们要不要，我一定要当红军，他们不要我也跟着走。打仗、放枪、烧火、做饭、缝补拆洗我都干。若不让我当红军，我就偷偷跟在队伍后边，除非他们拿绳子把我拴住。”

我坚决认真的态度把刘光万逗笑了：

“好吧！好吧！我尽力给你帮忙就是。”

第三天下午，刘光万找到我说：

“红军今天晚上就要开拔了。”

我马上着急起来。问他：

“我参加红军的事，你给说了没有？行不行，今晚我都要跟着红军走。”

他笑着点着我的鼻子说：

“看你急成什么样子，也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告诉我：陈毅、何长工已经决定，罗塘一带愿意参加红军的，统由他和游必安两人带领，成立万安游击队，今晚跟着红军上井冈山，女的愿意去也要。

听他这么一说，我可高兴坏了，忙问：“还有几个姐妹也想去，怎么办？”

“那你就赶快通知，迟了红军可不能等。”

他说，敌人派出两个团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敌军八十一团中午已经到了蛤蟆渡，红军必须连夜转移。

我又高兴又着急，只怕姐妹们失去这个机会，立即跑出去找她们。找到曾华英（她是曾天宇的妹妹）、张良、罗恒秀、刘桂秀、朱挺兰，又去通知刚认识的张庚秀。我们几个人说好，当天晚上天黑以前到罗塘湾小学门前会齐。

我想去找姐姐康伍秀，可是她跟着我的生父母住在赣江边，那里离得远，已经来不及了。生父母身边只留下她一个女孩子，家务活都要靠她。想到这里，我就放弃了找她的打算。

天黑很久，还有五个人没有到，我跑去找刘光万，希望队伍等等再走。他说：“不能等了，你们到于田圩找我们吧！”

等七个人到齐，已是三更天，我们借着星光，急急忙忙赶路。到了于田圩，天已快亮了，对方问“口令”。姐妹

们顿时紧张起来，有的说：“怕是敌人，快跑吧！”我叫她们不准乱动，赶紧回答：“万安游击队。”这是刘光万事先交待的口令暗号。只听对方说：

“是康桂秀吧？可把你们等来了。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走了。你们来了几个？”

说这话的游必安，是万安游击队的队长，上过大学，也懂得一点军事。他听说我们来了七个人，高兴地立即叫我们快吃饭，准备随大队一起行动。

匆匆吃了早饭，部队出发时，太阳还没有出来。游必安说：“红军兵力很小，只有一个营，要争取尽快回到井冈山。”他叫万安游击队跟在红军的后面。天刚亮不久，前面响起连珠炮一样的枪声，红军和敌军在遂川城附近遭遇了。子弹带着尖利的啸叫从头上飞过。

不知什么东西落在我身边，沙土里冲起一条细细的烟柱。别人告诉我，这是飞来的流弹。好险啊，只差一点就要打到我身上了。万安游击队只有几条破枪、几十支梭标，大部分人包括我们七个人，全是赤手空拳，大家都紧跟在红军后面。我抬头看看，好多人都像我一样，头一回经受打仗，非常紧张，有的人还“掉了队”。头上子弹乱飞，前面枪声不停，我心里想，既要当红军，就要经住打仗这一关。就这样打打、跑跑、走走，直到天快黑了，才摆脱了敌人。停下做饭，吃了饭，不敢停留，连夜行军。

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走着走着，就发起困来，

我提醒自己：别睡，别睡！睡着了还怎么行军打仗，红军也不会等你。起初还能勉强撑得住，可是后来渐渐就糊涂起来。好像在山上同小伙伴放牛，牛跑了，我带着大家去追。追着，追着，牛跑进了山沟，看不见了。急得我猛追。忽然绊着一块石头，一跤摔倒，爬起来一看，四周一片夜色，静悄悄的，只有自己一个人。糟糕，只顾打瞌睡，竟然掉队了。想喊又不敢喊，四周除了秋虫鸣叫，听不出一声人马的动静，想看看队伍行军的脚印，虽然满天星斗，地面上却黑乎乎的，什么也辨认不清。没有办法，只好朝我摔倒的方向走，我想那可能就是大队前进的方向。心里一急，就不顾一切，高一脚浅一步地向前狂奔起来。跑了一阵，周身都出了汗，不免又有点担心，万一错了，岂不离开大队越来越远，不由得停住脚步。可是不能停，因为大队在行军，只会越离越远，追下去，也许还有希望，又急忙顺着路往前跑起来。忽然看见前面有个黑影在动，不由得一阵紧张，怕是野兽怪物。放慢脚步观察，像是个人，又怕坏人。光怕不行，管他好人坏人，问问总会有个眉目。我虽是女孩，但个子高，力气大，遇见坏人，也敢跟他拚一下。于是加快脚步追上那人。一问，他也是万安游击队掉队的，说是自己刚刚打了一个小盹掉了队，大队不远就在前边。遇上自己人真叫高兴。不过根据我的教训，立即对他说：

“别以为你只打了一个小盹，你听听，前边一点听不见

队伍的声音。要不赶紧追，这夜晚失去了联系，可就没法找啦！”

经我一提醒，他也着急了。两人一齐顺路猛追，一直追到堆子前，总算在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追上了大队。这里已是井冈山的外围前哨地区，离井冈山不远。红军在这里休息了一天，然后上山。

第二章

走上井冈山

初见朱军长

我当上了红军，心里实在高兴极了。我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摆脱了白匪军的恐怖和追捕，摆脱了无尽无休的苦难生活。从今以后，我要一心一意跟着红军干革命了。

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有一天，我们的队伍停在遂川附近，听到同志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传话：“朱军长来了。”以前，我还幼稚地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后来才知道是两个人，他们被传说得非常神奇，现在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内心充满了好奇和敬仰。我在队伍中，顺着别人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中等个头，体格健壮，忠厚长者模样的人，正向我们走来。走近了，才看清楚他身穿灰里透白的军服，脚穿草鞋，一身风尘，面带微笑，威武中透露着慈祥。朱军长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很平易，平易得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和威名远扬的军长之间

的距离，瞬间就缩短了。当时我并不理解，这正是他的特点，他的气质，他的伟大所在。更没有料到后来我会同他结成终身伴侣。

以后，在战争的岁月里，在行军途中，我常常听到战士们说：“我们红军战士的生活和战斗很艰苦，可是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每当部队一宿营，朱军长就去和老乡聊家常，帮他们扫地、干农活，就像是自家人。他的行动无形中影响了广大指战员，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在向赣南、闽西挺进，以及后来在苏区的那几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每次作战，朱老总总是先了解敌情，察看地形，研究兵力的部署，作战斗动员，认真细致地对待每项工作。碰到了挫折，他也镇定如常，告诉大家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人所共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是以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

上了井冈山，我们住在黄坳。十月三日，正式成立了万（安）太（和）游击队，队长仍是游必安。游击队从万安随红军出发时，有近一百多人，路上因为打仗失散、掉队，有些人半路跑回家。到了山上，还剩八十多人。我们女同志七人，一个不少。八十多人都算经受了初步的考验。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到的万安农军。

游必安在会上对我们说：“为什么要叫万、太游击队？是要我们做好准备，随时打回万安和太和县，解放那里的劳苦大众，恢复工农苏维埃政权。”

我们先在黄坳哨口警戒，半个月后又移住小井。这里是在井冈山的边上，靠近黄坳。警戒任务大部分由男同志担任。我们七个女同志只偶尔担任一点白天警戒的任务，主要做缝纫和一些炊事工作，间或也帮别人洗洗衣服。

过了几天，游必安开始给大家上课，讲革命理论：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有共产党和红军？以及革命一定要依靠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等等。一天讲一课，一次讲一个多钟头。他讲得很好，帮助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也给我们上军事课。刘光万帮助我们女同志认字，学文化。没有纸和笔，就把沙土当纸。树枝当笔。按他的要求，每人每天都要认五六个字。参加红军后，我在文化上有了一些提高，开头就多亏他的严格帮助。

游必安同当地区、乡苏维埃政府和农协联系后，决定派我们去参加群众工作，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我在罗塘湾也参加过，那不过是到土豪家里，把他的粮食、衣服、钱财、牲畜分给穷苦农民，分完也就完事，还谈不上分土地的事。黄坳、小井一带土地比较分散，找不出像样的土豪地主，就把一户仅有五十多亩地和一头水牛的富裕中农当作土豪打了，东西被分个精光，大人哭，孩子叫。因为他家已被定为“土豪”，谁也不敢表示同情。

然后就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这工作十分复杂，丈量土地，要一块块地计算，地有好坏远近，还要一户户平分。我们白天黑夜地忙，两条腿不停地奔跑，真是忙了个脚底朝天。

井冈山有一件事办得十分好。这一年秋田收成好，眼看着一块块庄稼地里沉甸甸的稻穗就要到手，叫人打心里高兴。可是群众中存在着一个十分尖锐的土籍、客籍的矛盾。客籍是一百多年前从广东方面过来的移民。这在江西的许多县里，包括我家万安县都有。当地土籍农民因为同客籍人有矛盾，在红军过来时，有许多人杀死客籍人随白军逃走了。红军在井冈山站住了脚，他们眼看稻子熟了，也不敢回来收割。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根据四军前委指示，决定争取这些土籍农民回来。我们先在客籍农民当中做工作，把他们说通了，然后大张旗鼓地争取土籍农民返乡，到处写了大标语：

“不杀反水农民！”

“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

这样很快就有人回来试探，看到真的没有事，回来的人渐渐多了。只是有罪行的不敢回来，个别人到乡苏维埃政府自首。我们抓住这个典型，宽大处理，回来的人更多了起来。不少有罪行的也敢回来了。我们不断做消除误解的工作，土籍、客籍农民的矛盾开始有了缓和。

井冈山田地不多，又经常处在敌军的包围封锁之中，生活比较艰苦，能吃上红米饭、南瓜汤就算很好的伙食了。平

时吃的最多的是红薯，没有菜，更缺少盐。能吃到一点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打仗时，发给每人两个用苇叶包着的红米饭团，冬天常常冻成冰疙瘩，啃不动，咬不动，只有一点点地慢慢吃。虽说这样，我还是觉得满意，比在家里好，家里经常连红薯都吃不上，而且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红军的服装一时无法解决，我们身上一直是自己穿来的衣服，直到下山前，每人才发了一套灰布军装。没有被子，睡觉时就穿着衣服往稻草里一钻。大家开玩笑，把那叫做“金丝被”。当时，身上、头上都长了虱子。听说朱军长管它叫“革命虫”。我们也说它是“革命虫”，那不过是没有办法中的一句笑话。

有两首歌谣，我至今还能记得：

红 米 饭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 稻 草

干稻草来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风雪天地寒，
暖暖和和入梦乡。

生活虽艰苦，但红军队伍仍在不断发展壮大。

十月中旬，毕占云带一百多人枪上山，编为独立营。

十月底，张威带一个连上山，编成特务营。

不久，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八百多人来到井冈山。红四军、红五军会师，热烈庆祝。万太游击队也派代表去祝贺。不断到来的好消息，使人觉得一片光明，仿佛胜利就在眼前。

这时，敌人正在调兵遣将，加紧对井冈山的包围，准备第三次“会剿”井冈山。为应付敌人的进攻，必须在山上储备足够的粮食。红军每天都要抽出一两个连队从山下挑粮上山。山路很远，往返几十里，每天紧紧张张能走上两趟。听说朱军长带头挑粮上山，大家都很有感动。我们万太游击队经过请求，得到批准，也参加了几次挑粮上山。他们照顾女同志，我还是抢着挑了两次。虽说这种活我在家里干过，可是走那么远，还是觉得很吃力。

养父罗奇圭知道我参加了红军，十二月里来到山上。他见我穿上了红军军装，不敢像在家里那样发凶，但仍然要我回去结婚，说是欠了人家二百块钱的彩礼没法子还，当着我的面流下了眼泪。我说：“订婚是你们背着我不干的，彩礼的钱是你们收下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参加了红军，再叫我回去嫁人，没有这个门，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又说：“我是宁死也不回头，回家就要遭国民党杀害。

对你和婶婶也不会有好处。对你们的养育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只要我活着，将来一定要报答你和婶婶的养育之恩。”

他住了一天，看没有什么指望了，只好回去。临走时，我把自己积攒的也是仅有的两块银洋给了他。

毛委员同我谈话

敌人进攻的风声越来越紧。山上山下备战的工作都在加紧进行。过了阳历年，红四军、红五军在柏路开会，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决定分兵作战。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下山到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山上山下共同配合，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万安游击队仍然配属红四军，一同下山作战。我们在黄坳的上、下烟过了一九二九年的阳历新年。一月十日，游击队奉命到茨坪集结待命。这时接到通知，调游击队的七个女同志到军部，成立妇女组。归军部的工农运动委员会领导。在这个妇女组里，我认识了贺子珍、伍若兰和吴仲廉。快要出发的前一天，把负责领导红军伤兵医院的曾志调来担任妇女组的组长。后来才知道，是毛委员根据伍若兰的提议作的决定。妇女组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和宣传工作，筹粮，筹款，有时还帮助毛泽东委员去做些调查研究工作。

一月十四日，我们随红军下山，路过遂川县的大汾、左

安和上犹县的营前。途中遇到鹅毛大雪。正是三九天气，战士们衣衫单薄，许多人的军装都破旧不堪，一停下来，就冻得簌簌发抖。本来半个月前，缴获了一大批布，因为守山的部队困难更大，全都留给了他们，下大雪，山路特别难走，路面打滑，上坡上不去，下坡要摔跤，幸好前面的部队在一些坡陡的地方开出一级一级台阶，但在全是石头的山路上就困难了。我们常常手脚并用，以防摔跤。晚上宿营，弄来很厚的稻草打地铺，厚厚的稻草既是褥子又是被子，穿着衣服钻进去，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暖暖和和一直睡到吹起床号。

妇女组一住下来，就找一些群众和妇女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然后由曾志把大家了解的情况综合起来向工农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谭震林汇报。我们还经常张贴朱军长、毛委员发布的布告，写大标语。我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从布告上和大标语中学认生字，同时领会一些革命道理。每天行军、工作都十分紧张，生活虽苦，却使我感到精神充实。

毛泽东第一次同我谈话，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都称他毛委员。

有一天行军路上，贺子珍对我说：

“你想见见毛委员吗？”

“有什么不想。可他是那么忙，我怎好意思去打搅？”

“这没有什么关系。他倒是很喜欢找人谈话的。”

当天晚上宿营后，刚吃过晚饭，贺子珍来找我，说毛委员现在有空。

虽说她事先打了招呼，我还是不免有些紧张。

毛委员住在这个村庄的祠堂里，贺子珍带我进去时，他正在摞起来的两只公文箱上办公。

贺子珍对他说：

“这就是康桂秀，是万安来的七个女同志中最小的，也是最能干的一个。”

毛委员站起来，放下手中的笔，招呼我坐在旁边的一张木椅上。

“听你们万安的人说，你是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你能说说你的理由吗？”

毛委员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我全能听懂，开始的紧张情绪很快消除了。我向他讲了自己的想法，要是不参加红军，就没有我的活路了。他一面听，一面轻轻地点头。接着，又问我的家庭情况。当我说到生父母生活困难，我生下四十天就被送到养父母家之后，他带着几分玩笑说：

“你好嘛！你有两个父亲，两个母亲，我只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一点，我还比不上你哩！”逗得我也跟着他笑起来。他马上又说：“你说说，你的生父母、养父母对你有什么不同？”

“生父母生下我四十天就送人，他们不要我；养父母把

我养育大，虽然有时骂我，偶尔也要打我，但他们还是疼爱我的。”

他听我说完，笑着说：“你想没有想过，你的生父母为什么生下你才四十天，就把你送人？是他们愿意这样做的吗？”

我摇摇头：“是他们太穷了，没有办法养活我。”

毛委员大笑起来，掏出火柴，点着手里的香烟，用力地吸了一口：

“你这就明白了。不是你的生父母不要你。他们为什么穷？是被官府、豪绅、地主剥削压榨穷的。他们迫不得已才把你送给你的养父母。这不能怪他们。你的生父母、养父母都是一样的穷苦人，是旧社会造成的。所以我们要革命，要推翻万恶的旧社会，建立工农政权，使劳苦大众得到解放。”

毛委员短短的一席话，帮我开了窍，把过去不明白的事情和道理点明了，认清了自己的两个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坚定了要革命的志向。

我们红四军下山不久，就被敌人发觉紧跟追击。等到雪停天晴，敌人已经追了上来。他们兵力超过我们好几倍。为了摆脱敌人，部队连夜出发，紧急行军，几天中经过崇义的长潭、铅厂，到达大余附近。侦察得知大余城里敌人不多，朱军长直接指挥，一个冷不防，打垮守城的敌军，占领了大余城。

打下大余，虽说没有什么俘获，总是一次胜利，我们妇女组兴高采烈地在街上宣传。忽然城外响起了枪炮声。老百姓惊慌地往家里跑，家家插门闭户，一眨眼街上变得冷冷清清，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赶忙回到驻地。人都走了，只剩炊事房的人。他们说：“敌人已经追上来了。听说红军二十八团不知什么原故撤了，敌人到了城边，是军部特务营在那里挡住了敌人，朱军长带人上去掩护，叫我们在这里等你们一到，就撤出去。”我们同炊事班一起匆匆忙忙出了东城，城东北小山上枪炮声震天价响。天黑以后到指定的地方休息，才知道红二十八团同敌人接触后，团长林彪发现敌人力量超过我们好几倍，就要撤退。团政委何挺颖反对，说：“必须先请示军部，在接到军部命令之前，一定要挡住敌人。”林彪不听，自己带着队伍撤了。何挺颖坚持抗击敌人，因为人少，负了重伤，被几个战士抬下来，特务营长张威也在城东北高地阻击敌人时英勇牺牲。对林彪的行为大家都很气愤，议论纷纷。

吃过晚饭，又连夜行军几十里，到一个山沟里休息。我靠在山边岩石上打了一个盹，浑身冷得睡不着。睁开眼，天已经亮了，不等太阳出来又走。为了摆脱追击的敌人，这一天行军九十里，到了广东省南雄县的乌迳。为了不被人发觉，在野外宿营做饭。后来听说本地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敌人打算连夜把我们包围消灭。因为在野外，部队动作迅速，只几分钟，队伍就集合起来上路了。下半夜过了桃江，

才算脱离了险境。后来我们来到信丰县的大塘圩，敌人又追了上来。拂晓时出发，留下部队阻击掩护，且战且走。这样，到了龙南、全南、定南三县境内，这里又叫“三南”地区。我们在这里仍和比我们强大几倍的敌军不停地打圈子，捉迷藏。为避开敌军的追击，每天都要走八九十里、上百里，大家都十分疲劳。

我已经锻炼出来，听到枪弹声和子弹呼啸，炮弹在身边爆炸，也不再紧张。不但胆子大了，腿脚也更硬实了，我还经常帮助别人背东西，搀扶摔跤的同志。到了宿营地，别人累了，我就去帮助老表乡亲挑水、劈柴，同他们谈话，做些调查。有时也配合侦察兵作调查工作。我们同毛委员一起开过几次调查会。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当地社会阶级斗争的情况，也了解沿途交通、地形、河流、森林和风土人情。毛委员亲自制订一个调查表，我们走一路，问一路，晚上照着调查表写下来。根据工农运动委员会的要求，我们一路上还建立了一些秘密革命组织——雇农工会和农民协会，那时只要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就可以建立起一个秘密小组，播下革命种子；有条件时，就帮助他们同当地党组织建立联系，慢慢生根发展。我们七个女同志还常常帮助同志们缝补，缝补米袋子次数最多，因为米袋子破了，就会弄得吃不上饭。

在安远县的鹤子圩，红军同地方党曾计划趁敌人不备，里应外合拿下安远县城。谁料敌军刘士毅又追上来。我们

急忙转移到寻邬县的吉潭、项山、圳下。

圳下是一块狭长的盆地，中间一条小河，沿山是一些水稻田。为防敌人袭击，二十八团在山口外边的村子里，担任前卫警戒。我们妇女组起初住在河边人家，后来通知我们搬家，过河住到军部附近老百姓的屋檐下。一路上，我们都是天不亮就开饭，准备行军打仗。这一天黎明，我们因为睡得晚，还没有起来，突然被一阵鞭炮声惊醒。爬起来一看，院子里正在吃饭的人都慌忙丢下饭碗找自己的东西，有人喊“敌人来了！”我们急忙抓起自己的东西冲到外面，山口那边枪声大作，有人在喊：“二十八团给打散了！”队伍一片混乱，村子外面响起了枪声。我们急忙冲过冰冷的小河。敌人眼看要追上我们，忽然那边响起了枪声。有人说，是朱军长带队伍顶住了敌人。敌人遭到阻击，停下来向阻击的队伍进攻，我们趁机突围，冲上了山，然后向东北方向转移。身后圳下一带枪声打得十分激烈，过了很久，枪声才渐渐稀疏了。

我们接连翻过几座大山，来到罗福嶂，队伍渐渐集拢了。毛委员带着三十一团突围出来。听说朱军长因为阻击敌人被敌人包围，身边只剩下一个排，他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撤退，后来子弹打完，才把枪扔到河里。这时，跟随他的部队全都打散了，他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好不容易翻山越岭，绕道突围出来。

这次战斗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就是伍若兰负重伤后被

敌人抓住。

战斗开始时，她一直同朱军长在一起，她能双手打枪，经常带着两支短枪。她和朱军长一起掩护部队突围，因为他们走在最后，遭到敌人的包围，在冲杀途中，被敌人机枪打中。等敌军撤走，红军再派人到那里寻找。经过打听，才知道她当时身负重伤，后被敌人发现。敌人上来抓她。被她一枪一个连着打死好几个。但因伤重，只能趴在地上打，被敌人从背后上来按住，夺下她的枪。她躺在地上同敌人拚死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

过了几天，敌人从俘虏中查出了他是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叫她供出红军内部情况和行动计划，供出当地共产党的情况。她一字不露，反把敌人痛骂一顿。敌人对她动了多种酷刑，但她坚贞不屈。敌人看到无法使她屈服，就在二月十二日，将遍体鳞伤的伍若兰绑赴赣州卫府里刑场处决。她在临刑前还忍住疼痛，高呼革命口号，使围观的群众流下眼泪。敌人为了发泄愤怒，扩大宣传，行刑后，又把她的头割下，吊在一个架子上面，用大字写上“共匪首领朱德妻子伍若兰”，放在一个竹筏上，顺赣江漂下，“沿江示众”。中途被革命群众趁夜色悄悄掩埋了。

伍若兰的牺牲给我的震动很大，因为她是参加红军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同志，又是我们妇女组的骨干。她虽说不是组长，却带着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也给过我不少帮助。有时曾志不在，她就把工作抓起来，埋头苦干，不露声色。

她为人实在，有许多优良的好品德。这次她英勇牺牲，使我认识到干革命就会有牺牲，自己随时都要有牺牲的准备，才能临危不惧，从容地干革命。伍若兰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她身材稍高，显得精悍，皮肤棕色带红，齐耳短发全藏在军帽里。从远处看，人们常常误把她当作男的。她是湖南耒阳人，父亲是个穷教师，她勤奋好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衡阳湖南省立女子第三师范学校。这个学校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她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校时带头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上海工人大罢工，她还组织宣传队支持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耒阳县负责女界联合会的工作，领导打土豪，斗劣绅。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到处搜捕她，每次她都在群众的掩护下脱险。一九二八年二月，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来到湖南。她参加中共耒阳县委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后，她担负苏维埃妇女部的宣传工作。随后她响应县委的号召，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工农革命军。不久，她同朱德结了婚。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耒市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伍若兰做发动井冈山群众的工作。她负责的宁冈县塘南村土地革命，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湘赣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表扬。她还写得一手好字，我们妇女组写大标语差不多都是她动手。有一次，她带着两个女同志外出写标语，十几个敌人向她们袭击，被她打死四个，其余的落荒而逃。她带领宣传队跟随朱军长参加七溪

岭战斗，她的两支枪，同红军部队一起，打出了威风，取得胜利。这次下井冈山成立妇女组，本来要她担任组长，她却想到曾志的爱人蔡协民已经带领三十一团提前出发走了，曾志还留在山上负责伤兵医院工作，就同贺子珍商量，建议毛委员调曾志担任妇女组组长。在临行前一天，得到毛委员的同意，把曾志调来，她自己甘作组员。

妇女组的同志对她的牺牲都感到很难过。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大家都吃不下饭，含泪追悼这位坚贞不屈的战友，决心学习她的优良品质，继承她的革命事业。

大 柏 地 战 斗

在罗福嶂住下没有几天，又接到敌军追来的报告。我们立即冒着大风雪和严寒，沿着会昌、武定间崎岖的山路，折向瑞金。二月九日，我们到了瑞金的黄柏圩、隘前一带。红军部队因为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又总是避开敌人，弄得缺吃少穿，士气大受影响。有些人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有点茫然。这时旧历新年眼看到来，敌军仍在紧追不舍，红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部队继续向北，来到大柏地。这里在瑞金以北六十里，有个南北几十里的峡谷，是个理想的歼敌地方。

到大柏地，毛委员就作战斗动员。他说：“自下井冈山以来，我们被刘士毅、李文彬几支国民党军队追得好苦。一

来红军力量弱小，二来我们不摸敌人的虚实，一路上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我们这一路跑，一路打的目的，就是要给敌人一个错觉，似乎红军不堪一击。现在大柏地这个地方，地形对我们有利。我和朱军长都已看过，等刘士毅这个坏蛋追过来，我们就堵住他的退路，把他消灭在这里，过个快快活活的年。”

毛委员的话讲得生动有力，把红军战士们的情绪全都鼓动起来。我们妇女组跟大家一起高呼口号：

“消灭刘士毅！杀敌过新年！”

朱军长、毛委员布置好一个口袋阵。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这一夜大家几乎都没有睡，半夜开饭，饭后就冒着严寒出发，凌晨以前进入阵地。妇女组也全部上阵。少数红军在山谷口引诱敌人进入埋伏圈，大部分都埋伏在两边山上。

等了整整一个上午，敌人没有来。下午两点钟，谷口外面响起激烈的枪声，表明敌人已经来了。但是狡猾的敌人不肯轻易进来，半天才进来一部分，占领了大柏地，却又留一部分在外面。这样担任阻击的部队腹背受敌，朱军长不得不连夜调整战斗部署。

初二早晨，红军开始反击，没能完成对敌人的包围。阻击部队承受敌人很大的压力。他们向朱军长报告：“子弹打光了，敌人还在不断增援。”

朱军长命令：“子弹光了，等敌人靠拢，用刺刀捅，用

枪托砸，用拳头拚！绝对不准敌人过来！”他又带着一个排，亲自到第一线支援，和红军战士一起作战，终于挡住了敌人的冲击。

到了下午两点钟，完成了对大柏地敌人的包围。只听一声嘹亮的冲锋号，吹得山鸣谷应，好像无数支军号从四面八方吹响应和。红军战士很久没有听到冲锋号音了，这震天的号声吹得个个热血沸腾。只见四面山头上红旗招展，一片山摇地动的喊杀声，战士们有如勇猛的老虎、狮子，飞快地扑下山去，我们妇女组也同大家一起向下冲。我们居高临下，阻击队早已断了敌军的退路，敌人左冲右突，企图夺路逃走，可是红军的口袋阵有如铁桶一般，几次突围都撞得头破血流。这时，他们才知道红军依然是猛虎雄狮。等我们妇女组冲到大柏地时，只见许多敌军正在向红军缴枪，红军战士个个扬眉吐气。

这一仗活捉敌人正副团长以下八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还有一部分军用物资，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刘士毅在后面没有进来，如果他到了大柏地，也会尝到被俘的滋味。

红军在大柏地杀猪宰羊，过了一个喜气洋洋的新年。

大柏地一仗，形势改观，我们乘胜前进，向北占领宁都，敌人一个团弃城而逃。我们经黄陂、龙冈来到东固。

东固在吉安县东南，五县交界处，四周高山峻岭，树木繁茂，地势险要，是红二团、红四团的根据地。红二团

派人前来迎接，进入他们控制的地区后，一路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给我们送给养，帮助运伤兵，使我们感到有如回到家里一样温暖。红二团团长江文林带着一个连到南龙迎接我们，还没有住下，老百姓就争着往家里拉。后来再三向他们解释，还是按部队建制单位划分住了下来。第二天，在南龙开了军民大会。下午移住东固。红二团、红四团把他们的老家让给我们住。

过了三天，朱军长、毛委员来到螺坑。群众放鞭炮、杀猪宰鸡慰劳我们，真像过年一样。我们妇女组放下背包上街宣传，写大标语。“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翻身！”“拥护苏维埃！”“打倒蒋介石！”红军战士纷纷帮助老表担水、劈柴、打扫卫生。

下午，红二、四团部队来到，随即在石古丘河坝举行红四军和红二、四团会师大会，到会军民五千多人。我们整队入场时，红二、四团早已到了。他们集中了十几个司号员，组成一个小军乐队，一齐吹起了欢迎号。红二、四团的部队在团长、政委带领下，一齐举枪敬礼。欢迎仪式隆重动人。二团团长和四团政委讲话后，毛委员讲话：

“红四军是‘铁军’，红二团、红四团是‘钢军’。我们现在虽比敌人弱小，但革命正在发展，东固山和井冈山迟早会连成一片的。”

朱军长讲话中有一段说：

“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消灭‘朱毛’，打来打去，‘朱

毛’不但没有消灭，你们不是也成了‘朱毛’啦？……”引起全场大笑。

会师之后，我们就在东固一带休整。二十五日我们离开东固。临行前，将在大柏地缴获的两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送给红二、四团。我们向东南转向瑞金。

紧靠瑞金的福建省长汀驻军郭凤鸣是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群众极端痛恨。朱军长和毛委员研究以后，决定再打一仗，消灭郭凤鸣旅。

毛委员作战前动员，指出郭凤鸣一个旅有三千多人，装备好，弹药足。红军虽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二千来人，装备弹药不如敌人。但是工农革命军个个是自觉的革命战士，得到人民支援，还有地下党帮助。敌人内部腐败，矛盾重重，兵无斗志。我们用红军的三条长处攻敌人的两条短处，一定能以少胜多，以两千打败敌人三千人马。

经他这么一讲，红军战士个个信心百倍。三月十三日早晨发起攻击，打下渔溪山头，消灭敌人半个团。追击到长岭寨的山脚下。这里离长汀十五里，山高林密，是长汀南面的屏障，郭凤鸣亲自上阵指挥。十四日一早，我军从两面发起进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攻下长岭寨，把敌人全部消灭。郭凤鸣负伤后带着一个马弁，仓惶逃跑，在一个厕所里被我军堵住。问他是什么人，他慌称是副官，马弁是他外甥。战士们看见国民党当官的就有气，又见他吃得肥头胖脑，料定不是好东西，一枪把他打死。马弁才说

出他就是旅长郭凤鸣。敌人留守长汀的一个团，听到消息，逃往上杭。这一仗消灭敌军二千多，缴枪五百多支，机枪四挺，迫击炮三门，是比大柏地更大的胜利。当天下午押着俘虏一千多人，用一架梯子抬着郭凤鸣肥胖的尸体，浩浩荡荡进入了号称闽西“小上海”的长汀。群众听说打死了大土匪郭凤鸣，街道两边人山人海，争相观看，纷纷说：

“谢天谢地！红军帮我们除了一个大祸害！”

第二天，在南寨河坝广场开群众庆祝大会，郭凤鸣的尸体交给群众处理，群众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三天，政治部、工农运动委员会带着妇女组把缴获的大批粮食、衣物分发给到会的工农贫民，群众欣喜若狂，高呼：

“红军万岁！”

“共产党万岁！”

妇女组进城后就住在军部附近，军部在辛耕别墅。这是资本家的房子，前后二进院子，面对汀江的一条支流。资本家带着全家在厦门、福州做生意。这所空房子正好给我们住。

汀州在汀江边上，是福建西部一个经济、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方，许多东西都叫我感到新鲜。我们跟着政治部的同志在城里筹款，打土豪，共得到三万多元，向大、中商人资本家筹款二万元，一共五万多元。四军前委决定拿出三万元给上海的党中央；拿出三千元去赔偿大柏地的群众损失；给每人发四元钱零用；剩下的钱用来给全军每人

做两套军服。这个决定一宣布，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拿到四块银洋，也是我生来头一次有了这么多的钱。我到街上买了毛巾、牙刷、袜子、皮底布鞋……，花了一元多，剩下的放在背包里。我把鞋袜穿上，那双鞋有一只总不合脚，换来换去都是右脚别扭。贺子珍跑来一看，笑起来说：

“你怎么把两只鞋买成一顺的，全是左脚的鞋，难怪你右脚穿着不合适。”说得大家全笑起来。我连忙跑到那家商店换了一只。

军装很快做好了。缴获敌人一个被服厂，限定他们几天内做好四千套军装，还有用红布做的红五星、红领章。几天后，每人领到两套新军装，一双新布鞋，部队立即焕然一新，走起来挺胸阔步，特别神气。那几天真叫人兴奋不已。

军装全部发下以后，军部决定，在南寨河坝广场阅兵。朱军长、毛委员和军部的几位领导站在检阅台上，各团、各连、特务营跑步集合。然后一个团、一个团，一个连、一个连地从检阅台前通过，从各连抽来的号手组成临时军乐队。部队到检阅台前走起整齐的正步，只听见“刷、刷、刷”的脚步声。这崭新而又整齐的部队，令人精神振奋。接着部队在长汀城游城一周，群众像人墙一样，挤满街道两边，争相观看红军的游行。对妇女组特别优待，让我们上了卡车。我第一次站在车上，向群众招手、欢呼、喊口号，

兴奋极了。

部队经过整顿，这次打胜仗，群众纪律好。供给处长杨立三想起一件事。在白石镇，部队长期吃不到一点油水，又要马上打仗，他们把一个猪贩子的十几头猪赶来给部队吃了。当时没有钱，给猪贩子打了一张欠条，现在有了钱，就赶紧贴出布告，请那猪贩子凭欠条前来领钱。可是一直等到我们离开长汀，也没见那猪贩子来。

和 朱 德 结 婚

这时发生了决定我一生的一件事情。

打下长汀后，朱军长一有空就到妇女组来同我们谈话。妇女组里万安的女同志还有五个人，我的年龄最小，不满十七岁。朱军长平易近人，知识丰富，又善谈笑，没有半点军长的架子。他只要一来，屋子里就变得非常活跃，十分热闹。大家都很喜欢他。有几天不见他来，有人就会问：“朱军长这两天是不是外出啦？”

一天早饭后，曾志对大家说：“你们先去工作，我同康桂秀有点事要办！”大家走后，曾志问了我几句工作上的情况，又问：

“你对朱军长的印象如何？”

我说：“军长就是军长。再说，这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议论的。”

她说：“红军官兵一致，民主平等，对谁都可以讲。你只管说说，没有什么关系。”

她一定要我讲，我只好说：

“他这军长很少有，不像白军那些当官的。虽是个大官，没有官架子，能跟战士打成一片，能打仗，又有学问。”

曾志听得很有兴趣，不断地鼓励我：

“再想想，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她见我说不出什么，就帮助补充了几点，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心中却不住地打鼓：她为什么要同我说这些？

曾志终于带着笑，问我：“如果要你嫁他，你愿意吗？”

我心里一惊，说：“别开玩笑，这怎么可能！”

“不开玩笑，是真的。”她立刻一本正经地说：“朱军长十分喜欢你，组织上希望你能同他结合。打从伍若兰壮烈牺牲，他精神上很痛苦。你和他结婚后，可以从生活上帮助他，给他最大的安慰。”

他是个好军长，好领导；但当我的丈夫可不行。伍若兰牺牲了，你们来找我，找错了人。我同朱军长差得太远。论年龄，我还不满十七周岁，他已是四十三岁的中年人。论水平，我思想幼稚，理论、文化知识都很差，现在也才粗通文字，他早已是个成熟的军事家、政治家。论地位，他是军长，我不过是个红军女战士。差距实在太大了。

曾志再劝我，我只好拿出缓兵之计，对她说：“我已经

有了人。”她不免有些吃惊，这大概是她不曾想到的。但她马上沉住气，问：

“他是谁？”

这下反倒弄得我难以启口。我心中确实有一个人。从上山井冈山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好印象。我曾暗自希望，将来能有像他那样的人终生作伴。有时，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些意思。我是个女孩子，同他相处时间不长，两个人谁也没有明白地表示过，这种关系怎能乱说呢？经她一问，我的脸不由得涨红起来。

“别不好意思啦，既然有，你就说吧！”

没有办法，我只好推托说：“他留在井冈山上。”

这一下，她反倒高兴起来，立即说：

“现在是战争年代，两个人既然不在一块，你再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吧！”

当时，我想找几个知心朋友商量商量，请她们帮我出点主意。我跑到那天预定工作的地方找她们。人家说，她们来过，已经走了。我又找到几处她们可能去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回到辛耕别墅，等她们回来吃中饭时再说。吃中饭时，依然不见她们回来，问事务长才知道，她们都不回来吃了。

下午，朱军长又像平常一样来了。以前大家随随便便，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觉得特别不自然，我借口有事站起来要走。他说：

“你今天先不要去吧！我有话同你谈谈。”

他要谈什么，我已知道，既然走不脱，我只好低下头，离他远远的。他和蔼地来到我身边，叫我坐下。我勉强坐下，把半个背脊朝着他。他毫不介意地说：

“我们现在都是革命同志，再不讲那封建的老一套。红军里人人平等，不论当官的，当兵的，军长还是战士，都是一个样。靠这个，我们才能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不断地取得胜利。”停了一下，他十分真诚地对我说：

“我们干革命反封建，有话就直说。我很喜欢你，觉得你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有许多优点，是很有前途的同志。希望你能同我结婚。虽说我们彼此有些差距，但这不会妨碍我们。结了婚，我会帮助你，你也可以给我许多帮助。我们会成为很好的革命伴侣，你能答应我吗？”

他是个大军长，这样诚恳地向我求婚，使我难以回绝。但是我思想上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需要有时间来仔细想一想。我要找几个知心朋友，好好商量一下再说。

朱军长明白我的意思，赞成我再想一想，他表示热切地希望我能早点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他一走，我就火烧眉毛地急着找人。屋里、院外、街上都跑遍了，朱挺兰、张良……一个都见不到，贺子珍、吴仲廉也不知哪里去了，把我急得团团转。

好不容易等到吃晚饭，一见她们回来，我急忙把朱挺兰、张良喊到一边。没等我开口，俩人几乎同时说：

“什么事这么着急呀？不能等吃过饭再说吗？”

“哎哟！这对我可是天大要紧的事，火烧眉毛呀！”

我催着她们快走，伸手去拽她们。

“天大的事也得吃完饭再说，着的那门子急哟！”

两个人不但不肯走，反而用力向回蹭，好像已经知道点什么，全没有了平日相处的热乎劲儿。没有办法，只好同她们去吃晚饭，我几乎一点也吃不下，她们两人也显得心事重重，吃饭像在数米粒。我凑到两人近前，打算低声告诉她们。她们抬头看看四周，示意我等等再说。好不容易吃完饭，两人勉勉强强跟我来到旁边无人的地方。

“朱军长向我求婚。我跟他年龄、水平、地位相差那么远，怎么能行？你们快帮我出个主意吧！……”

没等我说完，两人都抢先回答：

“这可是个好事，你别再犹豫啦！我们都有事，等有空慢慢说吧！。

两人说完就走，拦也拦不住，眼睁睁看着她们不肯帮助。又一想，她们不肯帮忙，还有别人嘛，就跑去找贺子珍。警卫员告诉我。她正在房子里同毛委员谈事。毛委员的房子离朱军长的房子很近，我只好不去了。想找吴仲廉，又没找到。直到晚上九点钟，她们回来了，却一个个躲着我。妇女组的床是通铺，我同张良靠在一起。等她睡下，我想小声同她商量，谁知还没有说上几句，她竟然睡着了，推也不醒，弄不清她是有意装的，还是真困了。

整整一天，找不到一个说说心事的人，真把我憋坏了。我很苦恼，为什么没有人肯帮我一把呢？

第二天，曾志又来问我。我说：“还没有想好。”她说：“还有什么不好想的。朱军长那么好，他亲自来求你，你答应不就完啦！”说着，她拉着我，来到朱军长的房里。正在房里看书的朱军长见我们进来，笑着起身迎接，请我们坐下。这是间不大的房子，四周全是经过油漆的木板墙，古铜颜色，陈设简单，一张桌子，两把藤椅，一条长凳，用板凳支起的木板床，上面铺着灰色的军毯。一床叠得整整齐齐同战士一样的军被，一个布包上盖着一块白毛巾当作枕头。床头放着两个公文箱和扁担、绳。墙上挂着一盏马灯。朴素的陈设把我紧张的心情消除了一大半。我一边观看，一边留心听曾志同军长说话。

“军长！我把她送到你这里来，你们接着谈吧。看来我的任务快要完成啦！”

朱军长已经详细地问过我的家庭和身世。今天他开始讲他自己的家庭和参加革命的经历。起先，我不想听，但是他那缓慢沉着的话语，他那动人的经历渐渐吸引了我。我像听故事一样对他的经历感到兴趣，不知不觉产生了想了解他的愿望。我像在无路可走的山坳里，渐渐走出了峡谷，对他产生了新的感觉，认识到他的许多长处。他虽是个军长，却又和蔼可亲；他担负革命的重任，却又像个士兵。同他在一起，自己有种平等的感觉，虽说他比自己要大二十

多岁，却是个难得的好人！自从伍若兰牺牲以后，他确实需要有人和他共同生活，互相照料。

接着军长问：

“听说你已经有人了，他是谁呀？”

一句话，问得我脸上发烧，怎么好回答他。

“听说他留在井冈山上啦？”

我只好满脸通红地点点头。

“你们都说明白啦？还是怎么讲的？”

我不能对他说谎，就摇摇头。

他高兴地走到我跟前。“你是说，你们并没有彼此确定关系，只是在心里有过一些想法？”

见我又点点头，他高兴极了。

我的思想开始松动，防线渐渐消失。但是我有少女的自尊，就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大概很快看出了这一点，就说：

“看来你是不好意思回答。能不能这样，只要你不表示反对，就是同意，可以吗？”

我依然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

“那么，我再说一遍：你能答应同我结婚吗？”

房子里十分寂静，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因为这已到了决定我终生命运的时刻。他的诚意感动了我。我无法再向他表示拒绝。

又过了几分钟。

“那么，你答应了？”

打那以后，我和军长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不久，我们就在辛耕别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那天供给处送来打汀州缴获的一些罐头，请政治部和前委的十几个同志吃饭，毛委员、陈毅、谭震林……都到了。妇女组的姐妹只有贺子珍、吴仲廉和曾志参加，和我一同上井冈山的几个人，一个也没有来。后来问她们，都说：“怪不好意思的。”那顿晚饭吃得十分热闹，毛委员、陈毅主任和朱军长都谈笑风生，大家向军长和我祝贺，不停地同我们开玩笑。我虽受到欢乐的感染，却感到不自然。因为事情发展得太快了。

现在看来，这怕是战争环境中军人婚姻的特点吧。我同朱老总在结婚前，没有谈情说爱。我们相互间的真正了解、相互体贴和爱情是在结婚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他在思想、政治、理论、文化和工作上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我以后的许多进步，都同他的帮助和熏陶分不开。我能够给予他的却很有限，多半也只是生活上的照料帮助。在结婚的当天晚上我对他说：

“我有自己的工作，还要抓紧时间学习，希望你在生活上不要指望我很多。”

他不但支持我，还说：

“干革命就不能当官太太，当官太太的人就不能革命。我有警卫员照顾，许多事我自己都能干，生活上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努力工作、学习吧！”

婚后，我们之间很少发生争吵，有点小的矛盾，很快就过去了。对许多大事情的看法，两人总是不谋而合；稍有不一致，也能很快沟通思想。我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看到他日夜为革命操劳，我平时自己抓紧时间学习，尽量减少对他的打扰。两人间的感情逐步发展，几十年后回顾，可算是俗话说的“美满姻缘”了。

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无中生有的“AB团”

一九二九年四月底，红军攻下宁都县城，活捉敌军团长赖世琮，这是个作恶多端的坏蛋，按当地人民要求，公审大会后把他枪毙了，群众拍手称快。后来我们又转到福建，三次打下龙岩，消灭敌军陈国辉旅，陈国辉只身一人化装逃走了。

这时毛委员和贺子珍去蛟洋休养，曾志随蔡协民调往中共闽西特委工作，接着调我到红四军直属队任指导员，妇女组的工作就结束了。如何做指导员的工作，我没有经验，朱老总给我一些指点和帮助，我很快熟悉了这个工作。

不久红军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打下敌人“闽西金汤”的上杭，后来部队奉命去开辟东江，因情报不实，判断错误，仗未打好，部队受到损失。回到长汀，经过整训，到古田开中共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有名的古田会

议。这时毛委员回来了，陈毅也从上海回来。会议开得很成功，解决了许多问题，也给我一次十分深刻的教育。

经过这一段的工作和学习，我已经能够阅读一般的书报。工作也不再感到十分困难。

古田会议后，红军向赣西、赣南出击，粉碎敌人对闽西的第二次“会剿”。后来，我们打下永丰，同红五军、红六军联合，在施家山一带消灭敌人一个旅。

我这时一边做司令部机关工作，随时又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占领长汀，并在那里休整。按照党中央命令把部队扩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下面辖有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共一万多人。六月十九日在长汀南寨坝广场阅兵，宣布红一军团正式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两人在盛大的阅兵后，都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我站在广场上，看着阳光下满场的鲜艳夺目的红旗，心情激动，想起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特别是永远难忘的伍若兰，更增强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一军团刚成立，就接到党中央李立三发来的命令，要红军进攻敌人重兵据守的南昌和长沙。按当时红军的力量，这分明是用鸡蛋碰石头，但命令不能不执行。毛委员和朱老总把部队开到南昌城隔江相对的牛行车站，在那里用枪炮向南昌鸣放示威，给敌人造成一场大乱，红军却悄悄撤

走了。这样，既不违抗命令，又避免了无谓损失。随后红军在文家市消灭敌人一个旅。后来在李立三一再催促下，才被迫同三军团一起去攻打长沙。虽然取得一些小战果，终因敌军兵力强大，旷日持久，不得不将部队撤了下来。

我同贺子珍这次未能随军行动，留在陂头筹建妇女团，这也是党中央的要求。为了培养妇女团的干部，我们先筹建妇女学兵队，贺子珍任指导员，我任副指导员。刚搭起学兵队的架子，李立三“左”的路线受到批判，部队从长沙撤回，妇女团的工作也结束了。

这时，党中央又作出决定：将一、三军团联合起来，成立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不久调我到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任指导员。

部队从长沙回来，就准备攻打吉安。吉安在江西省西部，赣江中游，地势险要，是联结江西省西北一带的交通枢纽，战略要地。从一九三〇年二月起，赣西地方武装、赤卫队和少数红军部队，先后组织八次大规模攻打吉安的战斗，都未成功。吉安四周已普遍建立了苏区，它已成了红色区域中的一个白色孤岛。

十月三日，我们到达吉安外围，四日拂晓，配合地方武装、赤卫队十几万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攻击。敌守军四个团抵抗到晚上，利用黑暗掩护，弃城乘船顺赣江逃跑了。

特务团三连实际上就是方面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连，跟随总司令部行动。头一天驻在吉安中山广场北边的一个大

祠堂里。刚住下不久，三架敌机飞来轰炸，它们好像知道了总部住的地方，在中山广场附近来回盘旋。为了不暴露目标，我命令战士全在屋里不准出来。敌机扔下几颗炸弹就飞走了。敌机一走，我就组织战士到受炸的几户群众家灭火、抢救，一间房屋被炸塌了，炸死一个青年妇女和两个小孩，请地方上帮助安排料理。

总司令部没有遭到损失，但目标已经暴露。第二天天不亮就搬到沿河街一家旅馆里。这家旅店老板在红军攻打吉安时，带着一家人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晚上正赶上过中秋节，特务团三连和司令部机关联合召开庆祝胜利又过节的联欢会，每人发了两块月饼，还摆上芝麻糖、冬瓜条、瓜子。朱老总听说我们开会，也跑来参加。大家一见老总进来，热烈鼓掌欢迎。等他一坐下，就有人提议请他讲话。老总高兴地站起来，先讲几百年前吃月饼杀鞑子的故事。又讲到红军的发展壮大。他说：“这次打下吉安，胜利不大。主要是我们疏于防范，被敌人利用黑夜逃掉了。相信红军一定会更加强大，打更多的胜仗，下一次我们要打到南昌去，活捉鲁涤平（当时的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他的话引起阵阵欢笑。晚会上不断有人讲故事、唱歌、说笑话。直到月亮西斜，才散会休息。

十月七日，在吉安召开了十几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庆祝胜利，并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我对家里给我起的康桂秀这个名字，总感到太女孩子

气，一直想改，总找不到合适的人商量。在吉安遇到刘光万，他听了我的想法，表示赞成，想了一下说：“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一边说，一边掏出一张纸写在上面，递给我看，我觉得他起的这个名字不错，也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比较费事，又觉得一个人光是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就说：

“把勤字改作清字，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表示我要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

刘光万连连点头说：“太好了。你就改名叫康克清吧！”

我征得老总的同意，然后按照规定的手续，向组织打报告把名字改了。从此，我再不叫康桂秀，而叫康克清了。

在特务三连当指导员不同于在司令部机关，对我是个全新的工作。这里的战士都经过一番挑选，不少是粗通文化的高小学生。当时红军里把高小学生也看作知识分子。比起他们，我是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农民干部。战士的年龄都同我差不多，工作中的困难自然更多。我分析自己的有利条件：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他们长，革命道理比他们懂得多，政治觉悟比他们高，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我已有了做指导员工作的初步经验，懂得了管理教育的基本方法，也已经能看懂一般的书报了；而且特务连的战士都很热情，人人要求上进。所以我有足够的信心做好工作。我给自己规定了四条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给战士们做出好榜样；严格要求战士，不论政治思想、

军事训练，都要严格要求；关心每个战士，针对每个人的思想实际，帮助他们；搞好全连的生活，一定把伙食搞好。

到特务连的头一天，战士们见我是女的，都在一边窃窃私语，连长也对我投来疑问的目光，我不多说话，只是按自己订的四条原则行事。经过我认真地工作，严格要求，大家同我很快地亲密起来，我成了连队大家庭里的一员。没有人对我另眼相看了，我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忙起来。“眼睛一睁，忙到熄灯”。常常是熄灯号吹了很久。我才能忙完一天的工作，然后睡觉。工作越忙，我越感到愉快。为了做好工作，我住在连队里，虽说总司令部近在咫尺，我也要等到星期六才回到老总那里。老总每次听我说了连队的一些情况，都十分高兴。

在特务连，遇到行军，我同连长做过动员后，就一个人走在部队后边，防止有人掉队。有走不动的，就帮他们扛枪，背背包。我年轻时力气大，许多战士都比不过我。有人甚至在我面前竖起大拇指，夸我是“女大力士”。有一次连长刚调走，部队行军到峡江过河。我一个人顾头又顾尾，有点照顾不过来，就叫传令兵通讯员走在最前边，在峡江浮桥头点查全连人数，等全连一个不少地过了河，再来向我报告。这样，每次行军到宿营，我们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万分痛心而又无能为力。

一九三〇年底，红一方面军来到黄陂、小布一带休整。

这时，突然刮起一阵打“AB团”的风，说是“赣西南党、团和各级苏维埃政府里都有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地镇压‘AB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只听说他们是一伙“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这风先从地方上刮起。很快刮到部队里来。上级传达说，他们“已打进红军进行破坏活动”。

特务三连正在进行军政训练，保卫局来说，某某战士是“AB团”。我作为连队的负责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他的问题弄明白，问他们有什么证据说他是“AB团”。回答说：

“‘AB团’的事，你们无权过问。我们有口供为证。”就把人带走了。

没过两天，又来逮人，被逮的两个战士哭叫喊冤：

“我们连什么是‘AB团’都不懂，怎么会成了‘AB团’？指导员！你帮我们说说话吧！”

我同这些战士虽说相处时间不长，彼此已很了解，我打心里百分之百地肯定，他们绝不会是“AB团”反革命。就上前为他们解释，保证他们不会是“AB团”，请求不要抓走他们。

来人一瞪眼睛：

“你少管闲事！”随后又补充一句：“你保证什么？就怕你自己也保不住！”

我知道后面这句话的分量，就是说，连我也有可能随

时被当作“AB团”给抓走。只好闭口不再说话。

打“AB团”的工作，由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久负责。他用逼供信办法使人招供。有的人按审讯的需要瞎编乱造，不但自己承认，还把好朋友、同乡都说成“AB团”。这样一来，就像滚雪球一样，“AB团”越来越多。坚强的同志，至死也不承认是“AB团”，却被当作“死硬的反革命”，同那些被迫承认的人一起被处决。被处决的人越来越多。人人痛恨李韶久，可是谁也不敢说。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对于应该去做的事无能为力。我感到迷惑。难道这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事吗？

终于，抓“AB团”，抓到了总司令的身边。

保卫局来说，总司令的一个勤务员是“AB团”，要把他带走。

这个勤务员叫李少清，才十五岁，是农村来的，已有一年。他走路有点跛，工作积极，吃苦耐劳，追求上进，为人忠厚老实。如果连他都成了“AB团”反革命。我们还有谁可以相信呢？我不顾一切地站出来替他担保，请求不要带他走。

“如果日后发现他有问题，你们找我好了。”

那几个人脸孔板得像块铁：

“我们执行的是李秘书长和保卫局的命令。你有话向他们当面说吧”！

不容分说，非要立即逮人不可。小李吓得呜呜地哭。我

一面安慰他，一面立即去报告总司令。朱老总正在批阅文件，听我一说，放下毛笔走出来，对那几个人严肃地说：

“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跟我一年了，怎么可能是‘AB团’？如果你们要从我这里抓他，必须拿出证据来。我不能允许你们随便到我这里抓人。”

他们当然拿不出什么证据，只是强调说：

“某某说他也是‘AB团’”。

“我要的是可靠的证据、事实，不是不负责任的口供。没有证据，谁也不准带他走！”

面对总司令泰山般坚定的严正态度，那几个家伙只好说：

“那我们回去，向李秘书长请示！”

“不用请示！就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说给他听。没有证据，谁也不准从我这里逮人！”

他们灰溜溜地走了。年轻的勤务员李少清得救了。他后来成了红军的一名干部。

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从一些资料中才知道，“AB团”是在一九二五年北伐军到达江西后，蒋价石为了反共，派人到南昌建立的反革命秘密组织，专门从事反共活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被南昌的革命人民冲垮。八月一日南昌起义后，这个反革命组织完全瓦解，后来再没有起什么作用。苏区和红军中的所谓“AB团”，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个教训，实在太沉痛了。这一无中生

有的冤案，现在已得到了平反。

会见万安乡亲

刚过一九三一年元旦，总部副官处长杨立三对我说：

“你早该转党了。我们因为工作忙，忽略了你的事，你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呢？”

他的提醒，使我不由得一阵脸红，忙向他解释说：

“一九二六年，我报名参加共青团，他们对我说，我早已是共青团员了。所以，我以为转党大概也同那次参加共青团一样，到时候，组织上会替我办，用不着自己去操心……”

杨立三不等我说完，就批评说：

“参加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一生中的大事，怎能让别人来替你操心？再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当指导员，你没有感到不方便吗？”

我不再说别的。回来后，立即写了转党申请。很快，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上级批准，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杨立三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标志我已从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开始肩负起一定的领导责任。它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时红军取得了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胜利。一

方面军总部住在东固。听人说，万安县受到敌人进攻，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三区赤卫队和区乡干部，还有一部分革命群众撤到太和县桃花洞和黄山一带。我的养父母也随他们撤过来了。黄山、桃花洞离东固几十里路。老总对我说：“既是离得这么近，你不妨回去看看，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这事，当天就得到特务团领导的批准，第二天提前吃早饭，我带着老总的警卫员来到黄山。

乡亲们听到我来，都热情地跑来看望。两年多不见，好像都有说不完的话。

县苏维埃主席和县委书记也跑来欢迎。这两年万安县的敌我斗争十分激烈，经历了好几次反复。去年夏天，受我们几次攻打吉安的影响，万安县的地主、豪绅、恶霸被杀的杀，逃的逃。全县各区又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恢复了农民协会、妇女协会，革命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最近敌人调集兵力“围剿”，重占万安县城和许多地方。苏维埃控制的地盘只剩下窑头、塘上和陂头三处，因此才转移到这一带暂避。现在形势有了缓和，正在准备打回去。县委书记希望我给大家讲讲前方的形势，鼓舞鼓舞士气。

村前的广场上，刮着刺耳的西北风，隆冬的阳光下集合了万安县的乡亲 and 当地群众二千多人。我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讲话，开始不免有点紧张。想到这是自己应当尽的责任，紧张渐渐消除了。我讲的第一点是朱总司令、毛委员指挥红军打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仗。会场上笑声、

掌声、欢呼声不断。几个年轻人带头喊口号：“庆祝红军的伟大胜利！”“枪毙张辉瓒，给烈士们报仇！”

我讲的第二点是鼓励乡亲们，不要怕失败，不要怕挫折，不要灰心，加强武装力量，搞好土地革命，保卫红色政权，再接再厉，同封建势力、豪绅恶霸、白匪军斗争到底。打回万安去，争取最后胜利。

这天晚上，我同养父母住在一起。他们把我看了又看。我也激动得好半天才说出话来。这次敌人过来，养父罗圭因为他是农协会会长，又是共产党员，不敢留在家里。他们两人一起跑过河来，家里只留下奶奶一个人。我同朱德结婚，他们已经知道，关心地问老总多大年纪，身体怎样，又问他脾气好不好，待我如何，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凡是他们想到的无不问到。听我说完。高兴地说：

“听你一说。我们也就放心了。照这样看，还是我家桂桂走的路对。走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出息得成了大人。共青团的头头罗世通，跑出去又回到罗塘湾，还是被挨户团抓去杀掉，可惜了。”

我又告诉他们，我不再叫桂秀，改名叫康克清了

养父蹲在一边，只顾抽他那用废报纸自卷的土烟，一支抽完，又卷一支，半天不说话，我看出他的心思，问他：

“有什么难处，只管说吧！”

他踌躇再三，才吞吞吐吐地说：

“你这婚事很好，我们全都赞成。叔叔以前逼你跟那家

成亲，也是不该。不过那也是怕你给白狗子抓去啊，可是……可就是……当时拿了人家二百块大洋的彩礼，已经二年多了，至今也没还！”

养母在旁边生气地插话：

“那二百块大洋，是你卖女儿的钱，又不是个小数，你把它弄到哪里去啦？还好意思跟你女儿开口。”

这是我早已猜着的事，现在听养母一说，也有点生气，我问养母：

“赌钱的毛病，他改了没有？”

没等养母说话，他抢先对我说：

“打从前年年底从井冈山回去，听了你的话，再没有赌过一次。”

我看他这次态度比较诚恳，就从小包袱里拿出朱老总在结婚时给我的两枚金戒指，给了他。

“你若不赌钱，这两百块大洋当时就能还人家。赌钱的毛病你一定要改掉。红军里生活很苦，每人每月只能分到几角钱的伙食尾子作零花，这两个戒指是结婚的时候，朱老总送我的，你拿去卖了还帐，够不够就是这些。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可要记住：再也不要赌钱啦。”

养父被我说得泪流不止，用颤抖的手接过戒指，十分激动。

“我知道，我知道。以后到死，再也不赌钱啦。”

养母也拉起衣襟，擦去满眼泪水。

我在黄山住了十来天，早晚同养父母一起生活，白天同乡亲们谈话，或是到集市上去作宣传、演讲，还帮助他们上了几次政治、军事课。每天都有许多乡亲来找我，告诉我许多事情和消息，我也尽力多向他们作调查，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都尽自己所能地给予回答和帮助。这几天生活过得热烈而愉快，紧张又充实，使我几乎忘了回程的日期，直到朱老总派人来催，才想到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我怕老表们知道来送别，同警卫员不吃早饭就动身了。结果还是有好几十人赶来送行，有的送了十几里，再三催促，才依依而别。

我回去时，总部已经迁到富田。我把在黄山的所见所闻和有关万安县对敌斗争的情况向老总作了汇报。朱老总立即决定，派一〇四团协助万安游击队，护送万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革命群众打回万安县。不久，他们又打下了万安县城，那里的革命斗争又开展起来。

频繁的工作变动

回到总部，杨立三通知我去搞电台，这是红军的最新工作。第一次反“围剿”，我们首次缴获到敌人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俘虏了敌人的电台报务人员。经过教育和争取，他们愿意参加红军。总部抽调一批高小程度以上的青年战士，来跟他们学习无线电收发技术，办起无线电训练队。我的

工作是翻译电报，参谋刘伟彦负责教我，把四个阿拉伯数字一组的电码，对照电码本，译成一个个的汉字。我很快就学会了，做起来也不觉困难。后来，我又努力用加强记忆的办法，尽量不去查对电码本而直接翻译，加快了译电报的速度。

两个多月后，又调我去总部交通大队当政治委员。交通大队也因为打“AB团”给搞得七零八落，干部战士情绪动荡，问题成堆。我去后同队长欧致富同心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充实人员机构，使它又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成为团结战斗的集体。

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召开庆祝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到会好几千人，大多是各地妇女协会和妇女赤卫队的队员。她们个个戴着斗笠，腰间别着毛巾，学着红军的样子，整整齐齐地聚集在会场上。一部分妇女赤卫队还拿着梭标。她们也像红军一样，彼此拉唱革命歌曲和江西山歌。这次还请朱老总到会给大家讲话。他号召更广泛地开展妇女工作，组织妇女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和生产劳动，支援红军，准备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会上听到了许多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当红军，妇女支援前方的动人故事。使我认识到妇女工作的重要。

这时，交通大队奉命从白区那边，经过闽粤赣军区接来几位从上海来的人。他们有的头戴礼帽，身着西装，脚穿皮鞋；有的长袍马褂，还戴着眼镜；有的穿一身笔挺的

中山装。这在红军中还极少见，战士们都觉得稀奇，管他们叫“洋房子先生”，免不了有几分怀疑和看不惯。听说也是来干革命的，先就有几分瞧不起，他们能吃苦耐劳吗？能跟红军一样去打仗吗？只怕他们受不了这份“罪”，还得回“洋房子”去。可是过不多久，发现他们一个个脱去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穿上红军的军装，处处跟红军一样行动，这才渐渐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原来他们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同志。为避免沿途敌人的怀疑，有意化装成有钱的阔老。这时，已经开过了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他们是被派来贯彻王明的“左倾”路线，纠正苏区的“右倾错误”的。可是经过他们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反而认为只有朱德和毛泽东的做法是合乎实际的，是战胜敌人的有效办法。

这个时期，红军配合地方武装、赤卫队，拔除了残留在苏区中的白色据点——地主、恶霸的土围子。苏区更加巩固，我们交通大队往来执行任务也比较放心了。邓小平同志率领红六军、七军从广西来到中央苏区，大家都很高兴。

接着，红军在毛委员和朱总司令的正确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攻其薄弱环节的打法，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交通大队总是随总部行动，跟在方面军总部的后尾。行军时，为防止战士掉队和走错路，我总是在队尾检查和收容掉队的人员。

有一回，行军途中，一个老表跑来报告：前面一间破房子里藏着三个带枪的白匪军。我立即带一个班上去包围了那所房子，然后喊话，喝令他们缴枪投降。他们开始打了几枪，后来见我们的人多，只好出来举枪投降。经过审问，全是国民党的逃兵，就把他们送交司令部。

还有一次，在龙冈附近一个靠山的村子，一个老表正在场上干活，见我带人过来，朝我使了个眼色，然后把嘴向旁边一努。这是说那边有情况。我急令队伍停止前进，带一个人过去，利用屋角掩护一看，远处有好几百敌人，正在休息。我们人少、枪少，还带有机要文件的一部分物资，急忙派人在那里监视掩护，然后命令部队向后迅速隐蔽地撤退，摆脱了这场危险。到达驻地，我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司令部。

在交通队工作近半年，又调我去军火库工作。那里只有两个人，由我负责。另一个姓金的同志是朝鲜族。当时我们都缺少军火保管的知识，两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两个月，总算没有出差错，也未发生事故。经过上级批准，我们还搞了射击训练，参加了两次步枪、手枪的实弹射击。我的射击技术就是在这时得到明显的提高。每天早晚，我都要挤时间看书、写字。

这年十一月上旬，接到通知要我到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去工作。

参加大会工作的女同志一共六人；贺子珍、曾碧漪、周

月林、钱希钧、彭儒和我。大会期间，有人给我们参加大会工作的六位女同志拍了一张照片。我们都很高兴。当时彭儒和曾碧漪两人正在怀孕，怕照出来，就一起坐在我们前面的草地上，贺子珍、周月林、钱希钧和我四人站着，这样反倒觉得自然。

这时中央苏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已联成一片，共有二十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全国共有九块革命根据地，各个苏区总人口在一千万人以上。红军已有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第六军团，总兵力十几万人。

叶坪南边的广场上早已搭起了一个阅兵台，用松枝、纸花扎起了雄伟壮观的彩门。红一方面军参加阅兵的部队半夜开饭，整队到达，集合在广场的东侧。叶坪的老表们听说要阅兵，半夜起来，冒着嗖嗖的冷风赶到广场的两边来看热闹。派来配合维持秩序的一连红军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老表们带到指定的地方。六百名代表分别站在阅兵台两边临时搭起的看台上。东方吐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项英……许多人一起登上阅兵台，鸣放礼枪后，先由朱老总带头徒步检阅部队，然后开始部队分列式的行进阅兵。这规模虽比不上全国解放后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但同在长汀的红一军团成立时的阅兵相比，规模和气势都要大多了。

大会下午开始。毛委员代表中央苏区中央局作政治报告，朱老总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

报告。经过几天大小会讨论，然后通过《告全中国工人和劳动民众书》，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六十三人。又举行授旗授章典礼。在鼓乐声中，鲜红的锦旗授给了红一、二、三、四、六、七、十、十二、十六等九个军和红三军团，表彰他们对革命战争的贡献和功绩。接着授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八人五星奖章，会场上爆发出一阵又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是爱戴和拥护红军的掌声，也是对他们的热烈庆贺，其中也有我的一分情意，更增加了我对老总的敬爱。

晚上举行提灯庆祝游行。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彩灯把叶坪广场照得满天红光。最后举行提灯游行，一条巨大的金色长龙在叶坪一带的夜空下欢腾跳跃，摇摆飞舞，景色雄伟壮丽。

大会结束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主席，项英和张国焘为副主席。从此，对毛泽东我们不再喊毛委员，开始喊毛主席了。

当时我还看不出这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斗争。以后才知道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党中央，为了反对和阻止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红军中贯彻，采取了这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他排挤出红军，以便他们的“左”倾路线能在红

军中得到贯彻。朱老总和周恩来虽曾多次提意见，请求把毛泽东继续留在红军里，都无济于事。

去起义部队演讲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参加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多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

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北伐时，曾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工作。后来冯玉祥反蒋失败，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改编为二十六路军，派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围剿”。这支军队保留着共产党的影响，有党的秘密组织。开到江西后，红军总部秘密派去工作的袁血卒（又叫袁汉澄），同那里的党组织接上关系，迅速恢复了党的工作，党员又发展到二十多人，准备在适当时机组织武装起义。十一月底，一名党员奉调回上海路过南昌，不慎将二十六路军特别党支部名单和准备起义的材料落入敌人手中。说来也巧，敌人发给二十六路军的秘密逮捕令又落入特别党支部领导人手中。特别支部决定乘二十六路军司令去上海治病的机会，由秘密党员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出面，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提前宣布起义，不同意的即予看押或当场处置。

袁血卒回来汇报后，朱老总立即召开中央军委，决

定给起义部队“第五军团”的番号，并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带部队到宁都附近配合起义行动。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军二个师六个旅，除一个团逃走外，其余全部参加起义。十五日部队开进苏区。受到热烈欢迎。

以前，我曾不止一次在老总那里碰到袁血卒，只知他是做敌军工作的，没想到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这天，朱老总高兴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全部起义参加了红军。”

真是少有的大好消息，我高兴地说：

“实在太好了，可该好好地欢迎和慰劳他们一下。”

朱老总笑着说：

“准备开大会欢迎他们，还要派人到他们那里去工作。”

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召集我们开会，宣布派我和贺子珍随同总部的宣传队到红五军团去做宣传工作。在总政治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宣传队的负责人李伯钊、胡底和钱壮飞，宣传队一共十七人。我们的任务是：欢迎红五军团的同志参加革命，稳定部队官兵的情绪，帮助巩固部队，使他们感到苏区和红军的温暖，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懂得为谁而战，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宣传队主要是演戏，教唱红军歌曲，开展文娱活动。我和贺子珍两人的任务是去讲演，同他们谈话，使他们感受到红军上下一致、官兵平等；看到红军总司令的夫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

席的夫人都一样地做革命工作；生活上也同大家一样，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红军，了解革命。

我们来到红五军团，他们的接待十分隆重，弄得我和贺子珍很不好意思，一再对他们说，红军里大家全是一样的平等，没有这些讲究。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渐渐的又如一家人一样地随便了。通知我准备在大会上讲话，我有些紧张，怕讲不好，李伯钊帮助我准备，一直搞到大半夜。我把讲稿反复熟悉几遍，她和贺子珍都认为可以了，我才安心入睡。

第二天开大会，讲话前，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把我和贺子珍作了介绍，立即引起雷鸣般的掌声。事后听到不少人说：“你们的讲话太好了，真叫人想不到，红军里女同志都这样能干，难怪人说红军将士天下无敌。”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瑞金县叶坪广场上召开“庆祝红五军团成立，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附近县区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工会、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儿童团共两万多人，手执红旗，高呼口号，前来参加。毛主席、朱老总和许多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红五军团的领导人和军官、士兵的代表。大会上，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用生动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把苏区和白区、红军和白军作了鲜明形象的对比，说明他们起义的原因和决心。他最后十分激动地说：

“今后，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会后举行会餐，晚上宣传队慰劳演出。其中有个话剧《为谁牺牲》，描写一对白军士兵夫妻的悲惨遭遇。他们原以卖菜为生，男的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开到江西“剿匪”，被红军俘虏。妻子流落街头乞讨卖唱。他因惦念妻子，要求遣送回家。不料夫妻刚刚见面团聚，丈夫又被如狼似虎的挨户团抓去当兵。不久，他又在战场上被红军俘虏。这次他下决心当红军，同白匪军战斗；正巧妻子为寻找他来到瑞金，夫妻相逢，悲喜交加。这个戏是按毛主席出的题目编的，由胡底和李伯钊主演。不少人感动得流泪。还没有闭幕，广场上就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也被这个戏深深感动了。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和两个月的训练，很快成了真正的红军部队。

女子义勇队和红军学校

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红军攻打敌军设防坚固的赣州，先后四次都未攻下，敌军援军赶到，红军腹背受敌，遭到重大损失，只好撤出战斗。这是又一次沉痛的教训。

攻打赣州时，许多青年妇女踊跃参加红军，担任支前

工作。攻打赣州失利后，许多人都不愿回去，坚决要求留在红军里。经过中央军委和地方党委协商，决定把她们编入女子义勇队，培养她们成为能做地方工作又能打仗的妇女干部。这时，调我和吴仲廉到女子义勇队工作。女子义勇队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我担任队长，吴仲廉任指导员。训练课程主要有政治、军事、队列和文化课。我负责军事和队列操练，吴仲廉负责政治课和文化课。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同志讲军事课，课后由我给学员们作辅导。女子义勇队隶属于红军学校，作为学校的一个队，先在于都，后来红军总部从于都迁往瑞金，红军学校也跟了过去。课程增加了战地救护、急救包扎、普通医药卫生知识和伤病员护理。政治课增加了如何做农村妇女工作。

烈火炼真金，严格出精兵。朱老总常常对我说：只有严格治军，才能带出好兵。我就按这个精神严格要求她们。不论队列训练、内务卫生、日常作息和值勤放哨，还是夜间查岗查铺，我都严格要求，不容许有任何违反规定的行为。经过一个多月，女子义勇队成了一支引人注目的队伍。队员们一律齐耳短发，头带红五星灰色军帽，身穿灰色军上衣，腰扎皮带，打着整齐划一的绑腿，脚登用旧布和麻混打的草鞋，鞋上各缀着一个大红绒球。排队走在大街上，老表们见了竖起大拇指称赞；红军学校的男学员，都投来羡慕的眼光。学校里组织各种活动，分派下来的任务，女子义勇队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经常受到校方领导的表扬。

大家高兴，我也感到光彩。

第一次实弹射击，我们取得总评良好的成绩。虽未达到总评优秀，对这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姑娘来说，已是十分难得了。所以又一次受到校方表扬，女子义勇队里扬起一片欢乐的歌声。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个队员在擦拭武器时，把枪机上的撞针搞断了。女子义勇队四个人才有一支枪。这次实弹射击用的全是临时从总部特务团借来的好枪。撞针断了，就不能击发，枪打不响，连根烧火棍都不如。这起事故将会使女子义勇队在全校丢脸。一听说这事，我就有点按捺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

班长把弄坏枪机的队员带来，那个队员手捧着放在红布上的残缺枪机和断成两截的撞针，抽咽着说：

“队长，你处分我吧！”

我本想批评她一顿，但心中却仿佛被针刺了一下。霎时想到，作为女子义勇队的队长，难道我对这事没有责任吗？如果在擦拭武器前就想到这一点，告诉每个队员应当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操作，作些预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她，一个普通的队员，又该负多大责任呢？于是我大声命令班长：

“带她回去认真检查，然后在全班会上检讨！你们必须记住，一个红军战士的枪，就是她的生命。”

她们走后，我主动去向红军学校领导汇报，承担这件

事的全部责任，请求处分。

当天下午，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找我谈话，他严厉而又恳切地批评我，指出：你和女子义勇队的骄傲情绪，是产生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他说：

“只有先严以律己，然后才能严格对人。一个好的红军指挥员，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半点自满和松懈的情绪。有了这种情绪，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为帮助你接受这次教训，我赞成你请求处分的意见。”

愧疚之心，使我激动得流下眼泪。

过了两天，学校为这事发出通报，给我在全校通报的处分。这天，我又从修械所长那里得知，因为我们自制的撞针质量差，那支好枪配上新撞针以后，也只能当作次等枪使用了。

这件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刘校长对我的帮助，更使我由衷地感激。

女子义勇队快要结束时，通知我到红军学校第三期上干班学习。上干班是训练营、团和师干部的，也是当时红军学校训练队中级别最高的。还在女子义勇队时，我就争取到普通班旁听学习的资格，还参加过一些考试。不过我的试卷，教员从不打分。现在我成了上干班的正式学员，多年渴望的系统学习的机会，终于来到了。我是多么高兴啊！吴仲廉十分羡慕我，她不想放我走。因为我一走，队长、指导员的担子全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她上过学，文化比我高，

女子义勇队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们两人经过一番恳谈，她终于表示了对我的支持。我也对她说，只要有可能，我随时过来帮助她。这样，我虽参加上干班的学习，经过领导同意，还是利用空隙时间，把女子义勇队的工作做到结束。

女子义勇队学习期限半年，经过毕业考试，军、政、文各项成绩都达到了合格的要求，每人发给毕业证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她们中除一部分分配到红军医院从事护理工作外，大部分都由江西省苏维埃分配到各县、区、乡从事地方工作，很多人不久便成了那里的工作骨干。

我在上干班政治科学习。上干班班长兼政委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我们的班长，大家都感到光荣和高兴。他已经五十岁，身体很好，事事以身作则，出操、集合、站队、行军、演习等各种集体活动，不但同我们年轻人完全一样，还处处走在前面。他的模范行动，给我们很大的鼓舞。那是无声的命令，比大喊大叫更能促人自觉，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最好的带兵方法。

红军学校有许多很好的教员：张如心、吴亮平……甚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项英、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也都给我们讲过课。校长上半年是刘伯承，后来他到红军总部担任参谋长，校长就由叶剑英担任。学校设在瑞金南门外的大庙里，只要不下雨，就在村外大树下或是村头广场上课。坐在背包上，膝盖当桌子，教员在树上挂一块黑板，就讲起课来。

军事课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营、团的进攻，防御和遭遇战。讲后就到山地、密林、峡谷演练。紧急集合、行军常常选在黑夜和阴雨天，走山间坡道、羊肠小路。叶剑英校长常说：

“艰难的环境才能锤炼钢铁般的军队，锻炼人的坚强意志。它是军事作战的需要，更是精练武艺、提高技能的好时机。”

我从学习《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中回顾过去的工作。《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中有：

“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的情绪、能力、质量等，因此政治指导员必须了解全连人员……”

“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

这些规定，帮助我提高了对工作的认识。

我这时听课记笔记还感到困难，我不想加重别人的负担，自己想出了抄书的办法。有书抄书，没有书抄别人的笔记。上课时，集中精力听课，下课就抄。钢笔没有水，就用铅笔抄，尽力把每天教员讲的全部抄下来。越抄，越觉得这个办法好，不但可以加深理解，又可帮助记忆。上课忽略的地方，抄的时候就得到补救。遇到不认识的字、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记笔记的同学。后来我也开始记笔记，记

不下来的地方，就空下一块地方，下课后再去对别人的笔记。

上干班政治科女生连我共有两人。还有一位叫梁英，是个初中学生，广东人。两人住一个房间。她在学习上给我不少帮助，我也以实际工作和战斗中的经验帮助她。因为女生少，男同学经常照顾我们，我们不愿示弱，遇到公差勤务抢着干；夜间不让站岗，就在白天抢着补上。

野外演练连排进攻，我和梁英提着枪同大家一起冲锋。她没有经过锻炼，感到吃不消，我就不断鼓励她。

可是梁英没能学到毕业，学校里有个男生犯错误，说是“反革命”，没有人敢为他说话。她同那人是同乡，肯定他决不是“反革命”，跑去对男生队队长说：“不应把他的错误夸大为反革命。”并表示愿替他担保。队长向她发出警告，她又跑到校部为那人申诉。后来国家保卫局还是把那人抓走了。不久，她被学校开除，一句话未说，就同我分手了。我们从此失去联系，她那时已经结婚，不知她是否回到丈夫那里去。

半年的学习，使我得到了很多收获，思想、政治、军事、文化都有明显的提高，考试取得全班第二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叶剑英在上干班的毕业典礼上，亲手发给我毕业证书。

雪中慰问伤员

还在红军学校学习时，为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军委决定派军校学员到后方医院动员痊愈的伤病员尽快归队。我也被派前去慰问。红军医院在兴国县莲塘一带，有伤病员七千多人，分散在莲塘附近的高山密林中。每个分院下面又设若干医务所，每所一般有伤病员二三百个。

我去的几个医务所；有近半数的伤病员已经痊愈或基本痊愈。因住地分散，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未能及时跟上，除少数伤病员自行回去寻找部队外，多数人都还在等待上级的决定。我用前方胜利的消息和战斗故事打动了他们的心。许多人急着马上要动身去前方。我向他们说明，要统一行动，等办好手续，有组织地回前方。但许多战士等不及了，他们要自己先走，只好一个医务所、一个医务所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派人送他们去红军前方指挥部，也有的由伤病员中的干部率领他们去前方。

不到半个月，我们完成了任务，给前方红军送去几千名康复出院的红军战士。

我离开红军学校，又回到总部。这时，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开始了。红军总部也到了前方。攻打浒湾的战斗快要打响时，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传来红军在黄狮渡消灭敌军一个旅，收复金溪县城的好消息。夜里下了大雪，我

睡在两面通风的通道里，把棉衣棉裤都压在薄薄的军毯上，依然感到冷。我选择这个地方是为了便于查铺查哨，也便于听见外面的动静。凌晨，我踏雪查铺查哨回来，刚睡下不久，听见有人问：

“总部直属队康指导员在这里吗？”

我急忙披衣起来，天已经亮了，雪还在下。原来是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派人来找我。我穿好衣服随人来到王主任的住处。他见我来，推开正在看的东西，站起来对我说：

“找你来执行一件临时任务。黄狮渡和金溪两次战斗，部队有不少伤亡。现在马上要攻打浒湾，估计又要有些伤亡。你立即带总政治部的一部分干部到浒湾附近，慰劳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给他们一些精神上的鼓舞和安慰。遇到问题，能解决的就地解决，不好解决的迅速上报。”

这是紧急任务，我马上集合总政治部的十几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共同研究慰问宣传的内容和要求，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拟定了几个宣传口号，指定两个宣传干事编写慰劳宣传快报。我们匆匆地吃过早饭，每人带上一个草袋装的饭团，就整队冒雪出发了。

路上遇到从前方下来的担架，一问，才知道是前几天战斗负伤不肯下火线的伤员，因伤重，不便跟随部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而送下来的。我们对这几个伤员作过一番慰问后，抓紧时间向浒湾赶路。翻过几座山，可以看见远处抚江边上的浒湾镇了。这时突然在镇的附近出现团团烟雾，

接着传来连续不断的炮声和枪声，攻击浒湾的战斗开始了。枪声对于红军就是召唤，就是命令。宣传队立即乱了阵，几个身强力壮的队员带头向传来枪炮声的方向跑去，急着要去参加战斗，仿佛忘了我们是个有组织的宣传队。我立即大喊一声：

“站住！”

纷乱的情况消失了，十几个人都像木桩一样原地站住等待我的号令。

“听到枪声就想打仗，这是好现象。可是我们负有专门任务，要去慰劳伤员。像刚才这样，谁来执行这个重要任务？革命军人要坚决执行命令，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任务。现在谁也不准离开宣传队。我们要赶快查明前方伤员后运路线，然后确定在哪里慰劳最合适。”

找到离火线不远处的一个包扎所，我问明了运送伤员的路线，立即选定几条通道交叉点，在那里进行慰问。

雪小了，天还是一片阴沉。浒湾镇上不断的枪炮声表明战况的激烈。很快有伤员抬下来。红军打仗历来是轻伤不下火线，所以抬下来的全是重伤员。宣传队立即对他们进行慰问，留下两人在路边高坡上唱慰劳伤员的快板。

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挣扎吵闹，要上前线杀敌，不愿到后方去：

“送我上前线！送我上前线！我的伤不重，为什么把我往后方抬？我要下来自己走……”他喊叫着，挣扎着要从

担架上下来。我急忙过去，问过抬他的担架队员，知道他两腿负伤，已无法行走，就对他说：

“你的伤只做了简单包扎，还不能走路，怎能去打伏？你要听话，到了野战医院，把伤治好，能走路了，再上前线。那时你还可以多杀几个白匪军！”

我整理好被他弄乱的被子，对他说：“天这么冷，千万不能受凉，要是感冒了，就麻烦啦！”

那个伤员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

从前方下来的伤员担架渐渐多了，我们的工作紧张起来。一个伤员在担架上流眼泪，担架队员说，他一条腿被炸断了。我忙俯下身子安慰他：“为革命打白匪负伤，全苏区人民和红军都感谢你。”鼓励他相信伤一定能治好，一条腿虽说不方便，还是可以做事情的。”

他含泪微微点头，露出了笑意。

这时，一个宣传队员跑来报告：

“不知什么原因，前面的担架不走了，后来的担架都被堵住，怎么办？”

我急忙跑到前面去。那里是一处上山的高坡，大约二十多米，下雪后路面打滑，单身人往上走都十分困难，担架更难上去。我叫一副担架上去试试，没走几步就滑了下来，差点把担架上的伤员摔出去。四周看看，再也找不出别的通路。我就弯腰连手带脚向上爬，手指透过冰冷的积雪，抠住下面的冻土，总算一步一步爬了上去。到了上面

有石头的地方，坡度平缓，比较好走了。看着坡下那一条长龙般的担架队，心里如火燎一样急。这些重伤员不能在冰天雪地里久停，浒湾战斗正在激烈进行，还要防备发生意外情况。正在这时，几发炮弹在不远处的土岗上爆炸，引起一阵骚乱，我急忙连滑带跌地走到坡下，叫队伍适当疏散一下，然后通知宣传队集合。经过商量，决定迅速在坡道上开出一条台阶式的通路。这是紧急任务，要求每人找一件工具，立即动手。我从一个伤员那里借来一把铁铲，带头开挖。队员们很快也都借到工具，乒乒乓乓地干起来。

雪下面是冻土，还夹着石块、草根，挖起来十分吃力，不大工夫，个个都累出了汗。有人脱下棉衣，我立即提醒：

“要当心受凉，还是解开棉衣，不脱为好。”

进展实在太慢，眼看着面前的担架队越来越长，十几个人忙了好半天，挖出的台阶路还不到三分之一。我们在坡上着急，担架队在下面着急。他们看见我们在拼命开路，听说我们是总部派来的宣传队，每副担架就自动抽出一人上来帮忙，还带来两把镐，这是一支生力军。队员们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有人高兴地喊：“嗨！这才是雪里送炭哪！”人一多，就必须加强组织工作，不然，人越多就越乱。我要大家暂时停下，清点一下工具和人数。然后挑出六个力气大的人，轮流用镐刨土开路。其余的按四人一组开一个台阶。跟在后面用铲子平整好，弄结实后，再跟上去开另一个台阶。这样，有了得力的工具，又有了组织分工，做

起来有条不紊，效率大大提高了。我特别注意检查每个台阶的坚实程度。那么多担架，台阶不结实，前面的走过去，后边的就没法走了。凡是不够结实的，就叫他们重新加工，直到结实为止。这样，不大工夫，一条二十多米长的上山台阶路就修出来了。我带着一帮人查看一遍，又作了一些修补，然后宣布“路修好了。”

大家满头汗水地从坡上下来，担架队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动了。临动身前，我们检查每个担架上伤员的情况，帮他们掖好被子，告诉他们：“路已经修好了。”

宣传队继续在寒风中慰劳宣传。不久，有负重伤的师、团干部抬下来。十一师师长陈光、十师师长李锡凡，我都不熟识，听说他们是师长，忙到担架前慰问，他们好像都认出了我。李锡凡头部受伤，不能说话，用目光表示感谢。陈光点点头，低声说：

“谢谢你和总司令！请转告总司令放心。”

听陈光的警卫员讲，在黄狮渡战斗中，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赵博生不幸牺牲了。

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宣传队员忘了寒冷，忘了饥饿，也忘了时间，迎接慰问，然后送走一副副从前方下来的担架。天渐渐黑下来，听说浒湾已经打下，担架暂时停止后送，我们才跟随开往前方的部队进了浒湾。

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又到老地方继续工作了一天。第三天伤员全部送完了，接到通知，我们回到红军总部。

黄狮渡和浒湾两仗共俘敌四千多人，缴枪四千多支，消灭敌人一个旅，击溃敌人三个师。我们宣传队员也都为能给这次战斗出了力而格外高兴。

在红军总部

总司令部和过去的四军军部、一方面军司令部大不相同，机关本身就有一百多人，工作较为复杂。它是红军的首脑机关，关系着千军万马的行动，关系着每次战斗的胜败。它下面的部门很多，和总参谋部平行的还有总政治部、动员武装部。总参谋部有六个局。还有电台机要人员、内外收发、医务所、警卫班、通讯排、饲养班、炊事班。这里不但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干部，而且机关干部比战士多。许多干部的革命经历都比我长。政治、思想、文化水平也比我高，青年人大部分是共青团员，整个机关里党员比团员多。所有这些对我都是新情况。我只有一边熟悉情况，一边摸索着去做好工作。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因犯“左”倾错误，在上海无法立足，一月底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来。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博古。他们一来就成立了中共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并把“左”倾路线贯彻到红军和苏区工作的各个方面。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军委会和红军总部从前

方迁回瑞金，住在乌石垅。

针对机关工作的特点，除了保证日常工作进行外，我着重抓伙食和文娱活动。红军的伙食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就日益下降。回到乌石垅，伙食更差。由于供应不足，把一日三餐改作两餐。每餐每人半斤米，用稻草袋包好，写上名字，煮熟后，大家按名取食，以免有人多吃，或有人吃不到。菜很少，冬天若能吃到竹笋就算不错了。吃多了就不想再吃，偶然吃点空心菜，就觉得好吃得很。肉减到一月吃一次，后来也难以做到了。天气渐暖之后，我同事务长商量，每天跑到远处采买便宜的蔬菜，一个月省下的钱，可以保证吃一次肉，还可以给大家分点伙食尾子作零花。伙食改善了，大家工作也起劲了。不少兄弟单位都派人向我们学习经验。

我们还整顿加强了列宁室（学习、阅览书报的地方）、俱乐部，组织篮球、乒乓球等比赛，活跃丰富了司令部的文化生活。

春天，听红军学校的人说，博古到那里作报告，动员大家反对“罗明路线”，要求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并说：“这样的党员，才算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博古还号召：“集中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罗明和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罗明究竟有什么问题？照博古所说，他是“动摇懦弱

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敌人面前，充分暴露动摇逃跑、悲观失望的情绪，形成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对党的进攻路线”。我只知道罗明当时是闽粤赣（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他一直是按毛泽东的主张行事的。

很快，江西也出了“罗明路线”的代表，是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邓小平当时是赣南三县（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底，红军主力在北线进攻敌人，南方敌军趁机向三县进攻，邓小平领导群众以灵活的游击战打败了敌人，竟被说成“纯粹的防御路线”，“会（昌）、寻（邬）、安（远）”的罗明路线”。而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这时并不同邓小平在一起。毛泽覃是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是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把四人联在一起，只是因为他们都是按毛泽东和朱老总的主张和做法行事的原故。四人一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不肯承认“左”倾路线对他们的指责。结果全部被撤销领导职务，调到基层担任巡视员和工作队员。随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又把斗争扩大到江西全省和红军里面。凡是同邓、毛、谢、古四人有关连的，都受到批判和处理。

我对这些问题，渐渐看得比较清楚了。但那时，王明、博古被说成是非常布尔什维克化的人，他们有共产国际作后盾，反对他们的人都遭到打击迫害。我有点忍不住了，把自己的看法说给朱老总听。老总点了点头，停了一会才说：

“这些话不要讲。我觉得毛泽东我们过去的那些做法没有什么不对，把它说成纯粹的防御、退却逃跑，是不符合实际的。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我们应当尊重。他们掌握的情况比我们多，有些事要慢慢来，要多看一看，等一等。是非曲直，迟早是会清楚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敌人又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左”倾路线使苏区情况更加严重，苏区人民生活越来越苦。红军伙食标准规定的每人每天三钱盐、五钱油也无法保证了。

这时，上级布置给“中国革命互济会”捐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革命群众组织，也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敌人逮捕的革命者，救济和援助被捕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左”倾错误造成大批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被捕被杀。许多“赤色革命互济会”也遭到破坏。她们迫切需要得到苏区的支援和帮助。

白区同志的遭遇，引起同志们的万分同情，战士和干部们纷纷打开背包，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作了捐献。

不迷信洋人

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九月也到中央苏区来了。他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先在上海党中央军事顾问委员会工作。在博古来苏区不久，他化装成传教士来到苏区。

红军里第一次有了外国人，大家都在远处观察他，议论他。他身材高大，头上一块白毛巾，上面一顶斗笠，白毛巾在两边摆来摆去，叫人难以看清他的面孔。据说这是为了保密，叫人看不出他是个外国人。但他的神态走相，加上这奇形怪状的打扮，却更加引人注目了。他来后不久，在离军委会二里路外的稻田边，修了一个独立房子，供他和翻译、警卫居住和办公。伍修权、王智涛两人担任他的翻译。他的伙食特别优待，虽说红军生活很苦，他却能经常得到鸡鸭鱼肉和牛奶（炼乳罐头）的供应。因为他把自己搞得很神秘，他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引起大家的反感。

李德一来，博古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全交给他。李德在军事上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只知冒险进攻，缺少从实际出发的战略思想。遵义会议上，老总说他在军事上懂得的很有限，确是如此。

李德喜欢蛮横地整人。九月，敌人趁红军主力转移的机会，以四个师的强大兵力进攻黎川。当时闽赣军区司令肖劲光身边只有百十人的教导队在黎川驻防。他按红军历来的作战原则，将教导队撤到城外同敌人打游击。李德竟为此事大发雷霆，说肖劲光惧怕敌人，临阵脱逃，叫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判他五年徒刑。肖劲光一九二〇年参加革命，是个有功劳的好同志，我们都觉得李德无理。他好像要拿肖劲光开刀，要自己的下马威。

朱老总去为肖劲光说情，李德满脸冰霜地拒绝了。老

总只好去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他运用主席的职权不执行判刑的决定。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也不在判决书上签字。最后由总政治部把肖劲光调到红军学校临时担任军事教员，把他保护下来。李德终究是个外国人，被糊里糊涂地瞒了过去。

有一次我带几个战士走在路上，遇到敌机空袭，我们刚要去隐蔽，忽然听见叫骂声，原来碰上了李德。翻译王智涛说：“他问你们，有枪为什么不朝敌机射击？”几个战士全是徒手，只有我一个人背着驳壳枪。我回答：

“敌人飞机飞得那么高，我用枪打它，只会浪费子弹。没有高射炮、高射机枪，短枪有什么用？”看他张牙舞爪的样子，我也生气了。

“凡是有枪的人见了敌人飞机不射击的，就枪毙……”

没有听完翻译我就火了。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在我们这里命令枪毙人。我指着离他不远处的两个警卫员说：

“你的警卫员也有驳壳枪，要不要枪毙？”

他听了翻译的话，涨红了脸，转身对警卫员大吼：

“射击！射击”

两个警卫员被他吼得莫名其妙，等弄明白才不得不掏出驳壳枪，胡乱地朝天上放了一阵。趁这机会，我说了声：“走！”就带着战士们走开了。走了很远还听见他的吼声。正在这时，敌机到了头上。我回头看，只见他带着王智涛和两个警卫员迅速跳进了我们刚才准备隐蔽的小沟，再也听

不见他的叫骂声。跟着我的几个战士，都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把这件事告诉老总。老总听完，笑着说：

“他是军委会的顾问，三人领导小组（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你对他的话还是要尊重才好。”

我说：

“他要是对我还是那种态度，我就无法尊重他。”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李德结婚了。

先是李德向博古提出，几年来他一个人，生活太枯燥。到中国一年多了，他想找个中国老婆作伴。博古把这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中央组织部。当时女同志都不愿意嫁给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德碰上了肖月华。肖月华是个大个子，长得不错，又是单身。李德叫翻译了解她的情况后，便指名要她做老婆。

肖月华是广东大埔人，原也是个贫苦的童养媳。参加革命后，几经磨难。不久前调来瑞金少共中央当干事。当组织上动员她给李德做老婆时，她起先表示坚决不干。过了几天，通知她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给她做老婆，是革命工作的需要，组织已决定你同她结婚。”她勉强服从了这个“组织决定”。婚后，两人关系一直不好。李德从延安回苏联，她坚决不走。两人就彻底分手了。

第一次指挥战斗

李德、博古在军事上“左”倾的错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遭失败。部队伤亡惨重，节节败退。他们对毛泽东、朱老总的正确意见，一点也听不进，苏区形势日益严重。

这时，周恩来总政委派我和一些同志到即将成为前方的地方检查前沿工事。过去，红军按机动作战原则，除临时在需要的地段构筑工事外，从不构筑长期固守的工事。“左”倾领导同敌人打阵地战，拚消耗，步步失败又步步设防，到处修起碉堡、工事。对这种做法，大家都没有信心。

我一去就见到王耀南，他是我在红军学校里同学。我们一见面就开玩笑，我说：

“你上次叫我喊你同志哥，这回你该喊我大姐啦！”

过去，他总要同我争个没完，这次他竟有点不大好意思地说：

“我打听了，你是比我大一点！”

“这么说，你承认我是大姐罗！这也证明我这个大姐从来是不骗人的！”

说得周围的人都跟着我们一起笑起来，周恩来也高兴地笑着说：

“这么说，把你们分到一个组还是分对罗！”

我们去的地方是兴国县，兴国县是中央苏区的模范县，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当时有这样的山歌：

英国、美国比不上兴国！

南京、北京比不上瑞金！

歌里面包含着苏区人民的自豪和信念。到了兴国境内，果然名不虚传。当时正是春耕、春播、春种的季节，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村庄里看不见一个闲人。田野里传来阵阵歌声。

兴国县原来是中央苏区的腹地，现在也一天天接近前线。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夜晚人静，还可听见机枪声。人们没有惊慌的神色，都相信红军一定会赶走敌人，又怎能想到“左倾”领导将要给他们带来祸患！

我们来到红二军团的二线阵地，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亲自接见，给我们讲了作战意图。希望我们认真检查，发现问题，就地解决。我们听说，彭德怀为广昌失守，指责李德“主观主义”，是在“地图上作业的战术家”。骂他“崽卖爷田心不疼”。翻译没有翻译后面那句话，李德已经气得暴跳如雷了。我们很佩服彭老总的大胆直言，赞成他的看法，所以特别注意观察他。他讲话十分慎重，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但可以感觉出他内心的痛苦。

我们一组三个人沿高兴圩、老营盘一带查看，发现构筑工事的赤卫队、少先队和少量的地方部队情绪都很高。因为缺少经验，工事不合军事作战的要求。有些交通壕挖得

宽大笔直，从山下通到山上。也是一条直线。敌人在山下就可用直射火器对着交通壕射击。有的碉堡还刷上白石灰的大标语，被完全暴露出来。

看完几处工事，指出问题。几个地方干部高兴得直摇头，要求帮助他们解决。王耀南当场告诉他们：在笔直的交通壕两边挖散兵坑，在过于暴露的交通壕上用圆木盖住，有条件的另挖隐蔽的交通沟，还要涂去标语，加上伪装……，他们听了立即动起手来。等我们一路检查回去，看到群众正在热火朝天地改筑工事，有不少已按要求改好了。

为了防备特务，我们处处细心谨慎，不在敌特活跃的地方过夜，每天半夜和拂晓轮流起来观察动静。半个多月里，圆满安全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回到总部，汇报了检查结果。总参谋长刘伯承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并根据汇报给各地发出文件，要求纠正类似的问题。

刚回到司令部，四局局长叶剑英对我说：

“给总司令从前方调来一个警卫员，叫潘开文，他作战勇敢，各方面条件都好，就是不愿当警卫员。你找他谈谈吧！”

潘开文个头不大，却精悍有神，是个聪明能干的小伙子。一见面，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给老总当警卫员，是再合适不过了，就下决心一定要说服他。先问了他家庭和本人的情况。然后说明警卫工作的重要性和一般要求，介绍朱

老总的为人和特点，又讲了在首长身边的优越学习条件，希望和他共同做好工作。过去调来的人像这样一谈，都很高兴，我想他也不会例外。可是他停了一会，开口就说：

“指导员！请求你还是让我上前方打仗去吧！我喜欢在前方打仗。在后方大机关工作，我实在过不惯，我不是干这种工作的料。”

他的固执使我恼火，立即又想，要说服他，首先自己一定要冷静。我思索一会，问他：

“你是个共青团员，当初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既然把自己一切都献给革命事业，在工作上还要挑挑拣拣吗？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只挑自己乐意的干，还怎么革命？你才十几岁，就不服从分配，能干好革命吗？……”

我把他说得低下了头。思想转变需要过程，我叫他仔细想想，再回答我。

潘开文是个性情直爽的人，我还没有转身，他就开了口：

“指导员！照你这么说，我就先干着试试，看我行不行。”

“革命工作要就不干，干就一定尽力干好。除非组织上要调你走。看来，你还没有想好，等你想好再回答我。”我耐心地对他说。

他看我要走，急忙站起，说：

“好吧！我干就是。”

我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

“你是不是真正想通了？我可不勉强你做不愿做的事。”

他抬起头来，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我：

“真通了，你以后看吧！”随后又低低地说了一句：

“我还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厉害的指导员！”

后来事实证明，潘开文确实是个能干的优秀警卫人员。等到彼此进一步熟悉起来，他对我说：

“指导员！你第一次同我谈话，真够厉害的。当时，我真有几分怕你哩！”

过端午节不久，周恩来又把我叫去。

“你们上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发现的问题，对各地很有指导作用。现在又有报告说，赣江边上修的碉堡工事，枪眼不是朝着敌人来的方向，而是朝着自己这边。王耀南他们都到前方去了。还是派你带两个人去看看，若真是那样，要立即纠正过来，还要查明原因。”

我们一行三人，骑马来到杨殷县。这是一九三三年把赣州北部和万安县南部合并建立的新县。杨殷是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军事部长。一九二九年三月，在上海被捕后牺牲。为了纪念他，设立了这个县。

我们来到接近赣江的地方，检查了一些工事和碉堡，发现有些碉堡枪眼开得过大，内外一样，大概因此被说成朝着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到了武索区，准备到赣江边上的良境一带去。那里同敌人只是一江之隔。区里同志劝我们

说：

“良境对面赣江以西已被敌军占领，不断有敌军过江骚扰，你们最好不要去。”

那里正是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怎能不去？我坚定地回答说：

“我们来执行任务，哪能被一点情况吓住，只要那边还是苏区，有赤卫队，就一定要去！”

于是，区里给我们派了一个人带路。傍晚，我们从涧田来到棠梓。这是个不大的集镇，街上萧条冷落，群众流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处处使人感到战争的气氛。在棠梓乡政府，见到乡苏维埃主席和武索区黄武游击队长游联煜。他们说，前天敌人过江抢劫，烧了两家红军家属的房子。临走时扬言过两天还要再来。所以弄得群众惶惶不安。

“你们看着白匪烧杀抢劫，为什么不打？”我对他们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有些吃惊，忍不住严厉地质问。

“白匪有两支队伍一百多条枪，我们游击队才五十多人，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游联煜被我问得涨红了脸，带着难为情的神色回答我。马上又说：

“康同志，你是总部派来的，见过世面，打过仗，请你指挥我们打一仗，可以吗？”

他的话对我有些突然。我虽说经历过不少大小战斗，可是还从未指挥过战斗。转念一想，没有谁天生就会打仗，还不都是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眼前这场战斗又非打不可，随

即答应下来。

“好吧！我们大家共同打好这一仗。你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指挥行动。”

我们先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敌人常来骚扰的部队是武索靖卫团团长沙延龄部，有八九十人。还有武索守望队七十来人。他们是一帮惯于打家劫舍的活土匪，战斗力不强，但因从未吃过亏，根本不把当地赤卫队、少先队放在眼里。他们频繁过江的目的，一是抢掠财物，一是为进占江东创造条件。

我们只有一支五十来人的游击队，相比之下，力量确实单薄。我忽然想起在附近曾遇到几个红军，乡苏维埃主席说：“军分区执行巡逻任务路过这里的一个排，就住在附近。”我立刻派人把排长请来，他一听说要打仗，一捋袖子说：

“这一仗早就该打，我带一个排参加战斗。”

有了他们，力量依然不足。我想到赤卫队和少先队。乡苏主席说：

“一共有一百二十多人，除了十几支点火的土铳子，全是一色的梭标。”

“通知他们全部参加战斗”

这样，我方可达到二百人，比敌人稍多一点。

随后我们一起去看地形，边看边研究作战方案。决定连夜集中全部人员。晚饭后，召集班长以上人员开会，把

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分左中右三路埋伏在三个地方，军分区一个排由我掌握作机动力量。要求全体带上干粮，在天亮前进入指定的埋伏地点。又规定了联络和出击的信号。最后我作战斗动员，分析了这次战斗一定能打赢的有利条件，提出战斗和保密的要求。

我刚说完，那位排长突然冒出一句：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我们有红军总司令部康克清同志亲自指挥，所以一定能打胜。”

他的话引起热烈的掌声，我立即用眼神制止他，又提醒他注意保密。他后来对我说，他去过红军总部，所以一见面就认出我来。

会后，我又作了一些部署，把各方面执行的情况检查一遍。已经过了半夜，我和衣躺下睡了一会，准备天快亮时通知各部队迅速集合进入指定位置。

天刚蒙蒙亮，良境那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我急忙派人去查明情况。原来敌人在夜间从对岸偷渡过来，天刚一亮，就开始在那一带抢劫。我和游击队长几个人研究，分析敌人目前还不可能知道我们的打算，现在正是进攻的有利时机。决定改变伏击办法，依然分兵三路，从三个方面向良境的敌人包围进攻。

部队在运动中被一部分敌人发觉，响起零乱不齐的射击声。我立即命令游击队跟随军分区的一个排向敌人冲锋。排长带着部队冲上去后，少先队、赤卫队和游击队立即从

三面形成包围队形向敌人逼近。敌人在我们的猛冲下，顿时乱作一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一带有谁竟能这么勇猛地攻击他们。有人看见冲在前面的分区部队就喊：

“红军来啦！快跑！”“别打啦！你没见那是红军吗？”等我们冲进村庄，只剩下他们丢掉的五具尸体。

由于我们攻得迅猛，敌人仓惶逃到村边的一座小山上，企图据险抵抗。我带着部队冲到山前，命令从三面把小山围起来。因为游击队武器差，多数人缺少战斗经验，若发起攻击，山前全是暴露的开阔地，敌人又是居高临下，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一定会遭受大的伤亡。我命令部队暂时不要出击，自己带着那个排长和游击队长去观察周围的地形，选择进攻道路，然后决定断敌退路，截击敌人。当左右两路人马将要合围时，才发现敌人大部分已经逃跑。我带领部队追到江边，敌人最后一条船已离岸几十米，打了一个排枪，只好看着敌人逃走。来不及逃走的零星敌人，几乎全被游击队打死了。

这场战斗打到接近中午时结束，游击队牺牲一人，轻伤五人，缴枪五支，敌人死伤二十多人。他们在仓惶逃窜时，把抢到手的牲畜、财物、粮食……全部丢下来。游击队和群众欢呼庆祝这次胜利。他们说：

“打了这个胜仗，管教白狗子两个月不敢过赣江！”后来，有人因此把我称作“红军女司令”，是名不符实的。

下午，我召集大家作战斗总结，大家都说这一仗打得

老百姓扬眉吐气，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同时检讨这次指挥上的缺点：情况突然变化，临时改变作战部署，忽略了迅速插向江边，夺取敌人的船只

武索区游击队、少先队、赤卫队受到战争的锻炼，在这次战斗胜利的鼓舞下，不再惧怕敌人。他们不但在赣江以东打游击，还不时到赣江以西打击敌人。

在 重 围 中

广昌失守后不久，朱老总随着博古、李德的野战司令部回到瑞金。他表面虽说还同过去一样有说有笑，但我感觉出他内心的苦楚和不安，他在尽力不使周围的人看出来。他的话比过去大大减少了。我不说话，他不吭声。我总找些话题引他说话。有一次，我拿着《红色中华报》对他说：

“你看，报上登载红军在前方又打了胜仗。”

“像这样打下去，只能把苏区根据地丢个一千二净。”

我明白他的意思，故意装作糊涂说：

“那不是‘诱敌深入’吗？”

“他们根本不懂‘诱敌深入’，只懂得‘向虎口送食’！”过了一会又说：“怕打破自家的坛坛罐罐，只怕要弄得什么也没有了。这两个人不懂打仗，一意孤行，又主观又顽固，谁的话也听不进。”

一九三四年七月，蒋介石用三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三

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博古、李德依然执迷不悟，用死打硬拚的办法，把红军分作六个方面，在六个方向同敌人打阵地战。在兵力强大、武器装备精良的敌人面前，红军虽然英勇顽强，但总归寡不敌众，遭到重大伤亡之后，节节败退。许多人都愤愤地说：“苏区、红军这点家底快被糟蹋光了。”

苏区一天天缩小，人民生活一天天困难，红军的供应也越来越艰难了。过去，红军有了困难，军火武器可以从敌军手里缴获，粮秣给养经费可以到敌占区打土豪和向城市里资本家筹粮筹款。现在博古、李德不准红军转移到外线进攻敌人；根据地的地主土豪有的逃了；未逃的经过土地革命，钱财也早已没有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紧急动员夏粮二十四万担，秋季借谷六十万担”支援红军作战，这对当时生活十分贫困的苏区人民来说，几乎是无法完成的。然而具有高度觉悟的苏区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还是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从自己的口里省下粮食完成了夏粮任务。不久，又以不到一个月时间完成预借秋粮的任务。

军火方面因为长期打阵地消耗战，红军的弹药越来越少，一些小型兵工厂，因敌人封锁，原料无来源，也无法满足前方需要。于是发动群众收集废钢铁，发动红军收集炮弹壳、子弹壳。红军第二师青年战士两个月中就收集炮弹壳一万多个，散装子弹八千多发。不久前，发现我在一九

三四年的《红星报》上写的一条消息：

藏有军用品的同志快送政府供应红军

五洋区有个农民陈貽珠，自动送来司令部山炮弹六枚。此炮弹是从没有爆发革命以前，缴获反动派的，保存了多年，这次他自动送给公家，帮助战争，粉碎敌人“围剿”，是值得苏区的农民学习的。

这件事已过去五十多年。这条消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战士把一个姓陈的老表带到我面前，他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每头三发山炮弹，说是捐献给红军的。我同他谈话后，知道这六发炮弹是一九二六年反动派有个炮兵部队打他那里路过，遭到农民协会袭击，仓惶逃跑时丢下来的。当地农民把炮弹箱子取走，觉得炮弹危险又没有用，就丢下了。他见没有人要，悄悄把这六发炮弹搬回家，放在一个草屋的顶棚上。现在听到苏维埃政府号召，就赶快把它送来了。他的话使我很受感动，立即请军械部门的同志照收，打了收条。又经有关方面批准，奖给陈老表十块大洋，我还留他吃了一顿饭。

军需供应日益困难，军委号召红军节衣缩食。为使有限的物资分配得切合实际，规定每月登记一次服装，新衣服只能发给没有衣服穿的人。可是战士们终日行军、战斗，执行各种临时任务，军装不到换发期，早已破烂不堪。单

衣，到了夏收才能勉强发下；秋季，要准备冬衣，更加困难，把许多破旧棉衣拆洗缝补，连旧加新，总算在红军长征开始时，基本上做到每人有一身棉衣。当时给战士铺盖用的军毯规定两人一条，有的战士为图方便，从中剪开一分为二，一人一床。这样天冷了，两人都难以御寒。红军供给部发现后，制止了这种做法。

生活困苦，我们更加注意密切军民关系。不断给群众以必要的帮助，还规定星期六这一天普遍地帮助群众做事，叫做“义务星期六”，不吃群众的饭，不要群众的任何酬劳。以前我们住在叶坪时，我也常常帮老表干活，朱老总也经常参加。

九月初，中央军委发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令》，要求迅速扩大三万名新战士补充到前方。这是全党全民的紧急任务，许多地方同志凡能出来的都做扩大红军的工作。女同志能下去的也都下去。邓颖超、刘英、贺子珍、贺怡、钱希钧、金维映、曾碧漪……都一直下到乡里“扩红”。邓颖超身体不好，也坚持对妇女们进行宣传动员工作。

为了尽快扩大红军，我也带领司令部的几个同志下去了。具有革命传统的苏区人民，经过宣传动员，又一次积极响应号召，迅速掀起一个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许多少先队员、赤卫队员、工农群众带着梭标、被褥、草鞋、斗笠……参加红军，那情景真叫人感动。

第四章

踏上长征路

消除隐患

秋雨霏霏，天气阴沉，像铅块压在人们心头。远处的炮声如阵阵闷雷传来。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失守后，高虎垅一仗打得十分激烈艰苦，虽给敌人很大杀伤，但红军也遭到了重大伤亡，最后还是寡不敌众退了下来。等到驿前失守，中央苏区已缩小一大半，只剩下瑞金、石城、兴国、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和几块零星地方。北线、东线都被兵力强大的敌人突破，西线靠陈毅率领的江西军区地方武装和红三军团的一个师在抗击敌人。南线广东军阀陈济棠突破我方阵地占领筠门岭后，因同蒋介石有矛盾，再未前进一步。局势严重，一般人都能感觉出来。“再这样下去怎么办？”是大家共同担心的话题。

八月下旬，陈毅在高兴圩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老总和

我都很挂心，却抽不出时间去看他。

一天，一副担架来到银坑，直接进入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那是朱老总每天必去的地方。我一听说，急忙追去察看，躺在担架上的竟是陈毅。只听陈毅对老总说：

“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因为已经到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块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老总等他讲完，问他的伤情。他是被炮弹炸伤的，伤在屁股和大腿上，流了不少血。经过手术，取出几块碎片，打上石膏绷带，医生说，不久就能恢复行走。见我站在旁边，他微笑着对我招招手，说：

“总司令，我怕作了决定再说，就晚了，所以叫担架抬到你这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

朱老总看他一眼，背转身半天没说话。

我了解老总的心情。五次反“围剿”一开始，他就提出避开敌军锋芒，转到敌军侧后，选择有利时机，粉碎敌人的“围剿”。后来又多次提议：将红军主力尽早突围，转入外线作战，以挽救中央苏区。但是博古、李德非但半点听不进，反批评他有“右倾逃跑思想”。现在局势已经到了严重关头，再不突围，红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陈毅面容消瘦，说话的声音依然宏亮如前，表明他的伤会很快好的。

经过一番思索总司令说：

“突围已势在必行。可是中央迟迟不作决定，也不知博古和李德是怎么想的。你的请求，我无法回答，但我可转告他们，并表示我个人赞同你的意见。”停了一下又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安心养伤，争取更快一点恢复健康。”他在“更快一点”几个字上说得沉稳有力，充满着战友的情谊和亲切的期待。

当陈毅伸出手来同朱老总和我握别的时候，他的眼睛有些红润了。担架将要抬出门口时，他再一次招手大声说：

“放心吧！总司令，用不了几天，我就能站起来，照样指挥打仗。”

我跟着担架走出去，一直把他送出大门。尽管陈毅跟我有说有笑，问长问短，我却感到心情沉重。陈毅的请求是正当的，我同情他，却无能为力。我更感到一个统率十几万红军的总司令，竟然成了一个有力使不上的人，多么叫人难受啊！

过了几天，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要求红军部队和总部机关做好轻装，必须带的东西，要捆扎妥当，便于携带；非必要的东西，一律就地处理，机密文件一律销毁。

虽没有明说突围，但已十分明显，总算要摆脱坐以待毙的局面了，我的心情也好了起来，对老总说：

“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

老总苦笑了一下说：

“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他在屋子里踱步，走到我身边低声说：

“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我问起陈毅的事。他摇摇头：

“已经决定他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毛泽东虽然暂时离开了红军，敌人依然把朱德、毛泽东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悬赏捉拿朱德、毛泽东。悬赏的价格一再提高，从五千元提高到五万元，又提到十万元，现在提高到每人二十五万元。有人把这事告诉老总，他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嘛！我在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已经有二十五万元了。”

在敌人面前，他是从来不知道忧愁的。

红军总部经过简短的动员，紧张地准备了三天，傍晚就要出发了。忽然潘开文跑来对我说，特务队前任队长杨世坤请假外出，已经过了两天，仍不见踪影。警卫队长潘开文刚接替工作没有几天，同时仍是朱老总的警卫员。

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特务队负责中革军委领导同志贴身警卫员的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就是中革军委的警卫队。杨世坤因工作消极被免职，呆在特务队未走。他熟悉

特务队和首长们的情况，又知道红军这次行动的消息。他如果失踪，将会对中革军委首脑机关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我立即去检查，发现他带走了全部换洗衣物，还带走两支驳壳枪和几梭子弹，这显然是有计划的逃跑。我立即报告了保卫局的部长李克农。

必须尽快找到杨世坤。我叫潘开文先跟着老总出发，另外两个特务队员和我一起留下。这时，李克农带人来了，他看过杨世坤留下的物品，立即开会研究，有人提出线索：杨世坤同一个富农媳妇相好，找到她，就会知道他的下落。

我们找到那个女人。她长得相当漂亮，打扮得干干净净。起先，她一口咬定什么都不知道，连她平时同他的来往也全都否认。对于她那恶劣的态度，依靠劝说已不可能，我严厉地对她说：

“你同杨世坤来往不止一天，现在好话不听，当面撒谎。你不老实，只好把你带走，等你什么时候说实话，什么时候再放你回来。”

割断同杨世坤的联系，是她的要害。看到两个人要来逮她，她发了慌，一边后退，一边说：“别，别，别这样……”

“那你就少罗嗦，快讲实话，你把杨世坤藏在什么地方？”李克农大声地命令她。

她一屁股坐在床边，如同散了架似的哭了起来，吞吞

吐吐地说：

“不是我藏的，是，是他自己……”

“不管是你还是他，你说，他现在藏在什么地方？”

她迟疑地小声说：“他藏在那边山上的亭子里，我每天给他送一次吃喝。说好，等红军大队一走，我们两人就到白区去。”接着双手捂着脸哀求：“你们千万别打死他啊！”放声大哭起来。

想叫她给我们带路、喊话，她不干，说今天她已去送过菜饭。再去就会引起怀疑，而且他说过，只要她泄露一点，就把她打死。李克农派人把她送走看起来，然后带人包围那座小山，堵住每条通路。

天亮以后，上山搜索。在接近亭子时，向杨世坤喊话。他果然躲在亭子里，听见喊话就开枪，打伤了一个警卫队员。李克农叫队伍停下，再次向他喊话，劝他回来，保证对他宽大处理。他不回答，发现目标就开枪。警卫队员只好发起攻击。他居高临下，又利用亭子作掩护，使警卫队员难以接近。又有两人受了伤，双方成了相持局面。

时间不能再拖延。李克农召集大家研究。警卫队员想出办法用假目标引他开枪。等他发现上当了，再给他来个真假不分，从几个方面同时冲上去，把他逮住。

警卫队员取下几顶帽子，用树枝顶着，故意露出引诱他。果然，他只要一见就开枪，有时几顶帽子一齐伸出去，他连着转身一个一枪。那家伙枪法不坏，不大工夫，几顶

帽子全是窟窿了。后来他不再打枪了，估计已经发觉上当。李克农立即组织大家举着假目标，从四个方向冲了上去。十多人冲到亭子上，他已倒在血泊里。他是自杀的。

事情解决了，我却感到沉痛。杨世坤在我的领导下工作已有一年多。我虽然发现他近来表现不好，经过组织手续免了他的职，却未能防止这次事件的发生，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我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李克农，他说：

“怎么能把责任都怪在你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本来品质就不好，怪我们保卫局开始挑选时审查不严，用人不当，让他当上特务队长。如果我们把好关，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情。要说责任，首先还在我们。”

抢 渡 湘 江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但我总觉得空落落的，好像悬浮在空中。

处理完杨世坤的事，三天后我们在于都县境内追上了大队。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军，人数之多，前所未见。为防敌人空袭，行军全在傍晚和夜间。那天到达于都河边，天已经黑了。于都河离于都城外不远，接近中央苏区西南部边界，是多路突围大军必经之道。沿河用木船搭起几座浮桥，被两岸无数的灯笼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

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

每座桥都有几路红军队伍拥来，在这里形成一个喇叭口。每个队伍来到桥边都要停下，按照过桥指挥部的命令过河。浮桥两头的河堤上，给红军送行的老表乡亲们山人海。有的想看上自家亲人一眼，有的表示慰劳，送茶水，送鸡蛋，送花生，瓜子，还有自家做的粗点心。

浮桥指挥部的人认出我们是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的，立即命令正在过桥的红军停下，让我们先过。这时，老表乡亲们拥了上来。他们动作迅速，等发现兜里塞了东西，赶紧掏出来，却再也找不到塞东西的人了。一批人退下，一批人拥上来，许多人大声叫着说：

“红军同志，狠狠打白狗子，替我们报仇！”

有的深情地叮咛：

“红军同志哥，多多保重，早日打胜仗回来啊！”

有的战士边走边回答：

“放心吧！老表乡亲，我们一定会消灭白狗子，胜利回来的。”

过于都河的那晚，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心里充满了留恋和不安。

连续不断地行军，道路弯弯曲曲，左转右拐，像穿梭阵一样，不知道部队要到哪里去。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一直朝着太阳和月亮落下的地方前进，那就是说，我们在

向西走。不断听到炮声和机枪声。前面传来的是红军先头部队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后面是红军殿后部队在同追击的敌人战斗。我们前面、后面和左右两边都有红军部队掩护，我们在红军为我们开辟的不断向西移动的甬道中行进。庞大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浩浩荡荡。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行军速度越来越慢，一天走不了二三十里就要停下来休息。四周的枪炮声告诉我们，行军速度越慢，可能遭到的危险就越大。有一次我们同后勤运输队走到一块，发现他们竟然带了那么多的笨重东西。除了作战需要的军械军需外，还有许多印刷机、缝纫机、车床，各种医疗器械……。

我们野战纵队一万多人，光挑担就有一千多副。还有那些卸不开的笨重家伙，需要二个人、四个人，甚至八个人抬。几百斤的重担压得他们气喘吁吁，一个个汗流浹背，走不远就要停步换肩，前面一停，后面就要停下一大串。前面的换过肩起身走了，后面的半天还动不了窝。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焦。

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部队走得更慢了。这时得到消息，最前面的红军已经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在湘江西岸控制了六十多里长的渡江地段，急等中央、军委野战纵队赶到那里渡江，这是一个十分有利而又急迫的时机。因为在十一月中旬，蒋介石已察觉红军大规模突围，调动大批军队追击和堵截红军。但是中央、军委野战纵队

离湘江前线还有整整一百六十里。一个多月长途行军跋涉，部队走得十分疲劳，那些笨重的运输队拚命赶路，也要四天。几十万敌军正在疯狂地朝湘江渡口扑来。人人心急如火，而首脑机关只能蹒跚而行。湘江两岸炮声连天，持续了好几个昼夜。

到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里，军委野战纵队好不容易来到湘江边上，已是两岸红军同敌人血战的第三天。为了迅速过江，一部分人员和物资乘船，其余人马在查明的地段涉水。红军拦击着两岸逼近来的敌人，我们就在那剩下的不多的通道中渡过了湘江——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四周枪炮声不绝，曳光弹不时照亮江水。因为是在夜间，敌人未能发觉。但是在我们身后还有一大串拖拖拽拽的笨重运输队，真不知他们该怎么办？

后来听说，运输队在两军厮杀中，许多人被冲散了，许多东西被丢掉了，器材、衣物、图书、资料……到处可见，“标”出了一条红军行军的路线。有些笨重的东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抬到了湘江边上，但却无法过江。在战况紧急时，有的丢弃在岸边，有的沉没到湘江的波涛中。

到了十二月一日上午，中央、军委的野战纵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渡过了湘江。但是担任掩护的红军有好几个师、团被敌军包围在湘江南岸，全部壮烈牺牲。刚由新兵组建起来的第八军团，也不复存在了。过了江的红军，也在惨烈的拼杀中遭到重大伤亡。从苏区出发时，红军八万

六千人，经过这场恶战，只剩下了三万多人。

渡过湘江，进入老山界，地图上叫越城岭。这里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敌军被甩在后面，敌机难以侦察，可以稍事休息。一个多月的紧张奔波，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红军的严重失利，使大家认识到“左”倾领导者一意孤行造成的损失，到处议论纷纷。他们这时不得不同意朱老总提出的“丢掉坛坛罐罐”。朱老总召集各部队领导干部，作了轻装行军的动员和布置。我们司令部迅速行动，我清出一大包东西，有蚊帐、鸭绒被和非急需的衣物，叫潘开文拿去送给当地老乡。他说：

“这些都是有用的东西，你和老总都有牲口，又不是带不了，眼看天冷了，我看还是留下来带着，免得到时没处找。”

他是一片好心，我说：

“老总讲的是轻装，只带最急需的东西，我必须执行，你不去，我自己去。”说着，就抱起东西往外走，潘开文飞快地抢了过去。

“那还是我去吧！”他一面走，一面嘀咕：“都送走，等天一冷，准得后悔！”

经过这次轻装，我们行军轻快多了。

这里是苗族和瑶族的聚居区，他们大部分都能听懂汉语，不少人还能讲几句。他们对红军热情友好，收到送给他们的东西，又不要钱，都高兴万分，把家里最好吃的东

西纷纷拿出来招待我们。

老山界全是羊肠小道，一会向左，一会向右，一会上坡，一会下坡。左转右转，有时走着走着，又像走回去了。山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山虽不高，却十分陡峭，爬上去很吃力，往下走更加困难。夜里行军，上半夜有火把照明还好些；下半夜火把点完了，摸黑行军，谁也不敢快走。阴天夜间，伸手不见五指，行军尤其困难。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夜只能走十几里。遇到狂风暴雨，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十分危险，有人就是这样掉下了深谷。有一处地方叫“雷公岩”，是在悬崖上开凿出几乎垂直的石级道路，只有一尺多宽，要十分小心才能爬过去；担架到了这里，只能由躺在担架上的人自己挣扎着爬过去；骡马走过，更要格外留神，前有人拉，后有人推。就是这样，仍有几匹牲口掉下深渊，有的把人也带了下去。爬过“雷公岩”，大家都说：

“真像过了一道鬼门关！”

行军途中的毛泽东

我们在龙胜县龙平镇宿营时，半夜里突然起火，我被惊醒后，急忙披衣跑出，只见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房子被大火包围，几个人正在泼水救火。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顶着一床泼上水的军毯冲进大火，看见正在寻找出路的周

恩来，立即把军毯蒙在他头上，拉着他从火海里冲了出来。取下军毯，大家看见他安然无恙，这才放了心。

天亮以前，把火扑灭了，周恩来的两个公文箱总算抢了出来，其余的东西全被烧光，那家老乡的房子也被烧去一半。为照顾群众的困难，司令部赔偿房东二百块银元。

下午，接到总卫生部的消息，他们住在广南寨，村子里几处房屋同时起火，总卫生部长贺诚命令警卫连包围村子进行搜查。在村民帮助下，抓住七个穿红军衣服的广西人。经过审问，都是广西地方军阀派来的特务。每人每天赏银二元，冒充红军放火抢劫，挑拨当地人民反对红军。龙平镇上也是他们放的火。

老总立即向红军发出命令，要求提高警惕，严防敌特放火。后来又抓到几个放火犯，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就地把他们处决了。

过了老山界，经常下雨，有时大雨倾盆，有时细雨濛濛。好在都有斗笠和挡雨的油布，阴雨天可以放心地在白天行军，只是山路泥泞难走。新打的草鞋，走不了两天就坏了。许多人索性打赤脚。一路上经常有人摔跤。

每次行军总有人掉队。为做这些人的工作，每天走完一半路程后，我就留在最后，收容掉队的人。帮他们背枪，背背包。起先，他们不肯让我背，但经不住长途行军的劳累，当我再一次从他们一瘸一拐咬牙走路的身上拿下枪和背包时，已无人再同我争了。我的身体壮实，从小受过磨

练，这样做也不觉困难。同志们看着我这个女同志还能吃苦耐劳，都受到鼓舞，打起了精神。

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这里正好在湖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早晨，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博古和李德也没有反对。从此，红军危急的处境有了转机。这次会议，为以后的遵义会议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这一情况，我是后来得知的。

因为红军人员大大减少，部队开始合并。到了贵州省黎平县，把中央军委机关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成一个“军委纵队”。后来在行军中，我为收容掉队的人，常常遇到随中央机关行动的一些领导同志。

遇到比较多的是毛泽东。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

“现在无官一身轻，好不自在哟！”

他的话使我感到别有一种滋味。心中想着：

“只要有毛泽东，我们总会有希望的。”

他的头发很长，留着大背头，人显得清瘦，穿的战士

服装，只在早晚天冷时，才穿上军大衣。他的马总是由马夫牵着远远地跟在后面。很少见他骑马，更没见他睡过担架，总是同几个战士有说有笑地一块步行。他看见我，有时就问：

“这两天部队的情绪怎样？指导员同志能谈点情况吗？”

他最关心战士的思想情绪、体力状况，干部们有什么想法和议论。我就尽我所知，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十分认真，不时地提问题，问个究竟。我常常答不上来，他就帮我打圆场说：

“哦，哦！这不怪你，只怪我想要知道的太多啦！你看，要是方便，下回等你知道了，再告诉我吧！”

接着，他又有说有笑地谈起古今来。我们进入贵州省，他讲了许多有关贵州省的掌故，“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啦，“黔驴技穷”啦，“夜郎自大”啦，……。他说夜郎是古代的一个小国，国王不知天下之大，竟然问汉朝派去的使臣：“汉朝大，还是夜郎大？”说完，他用手指着西北对我说：“那个夜郎国就在贵州省的西部，离这里不远了。”我很喜欢同他走在一起，在他的说笑当中，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每天总能听到隆隆的炮声，那是红军在同敌人战斗。有一天近处传来枪炮声，我催他骑马快走。

“怕什么？这是小股敌军骚扰，不会那么快追上来。指导员同志，我知道，你要赶快去照看队伍。我这里，你放

心，决不会有问题。”

他胸有成竹，语气肯定，使周围的人也增添了信心。我不放心，叫几个警卫员陪着他，自己到后面去了解情况，果然是小股窜扰的敌人，已经被后卫的红军部队赶走了。

宿营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找当地的祠堂住，他有两只盛书和文件的铁皮箱，一个挑夫挑着，总跟他紧随不离。没有桌子，把两只箱子擦起来，就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

他同张闻天、王稼祥常常结伴，三个人行军、宿营都常在一起。王稼祥在五次反“围剿”中，敌机轰炸时负伤，一直未好，至今还躺在担架上。不知何时起，大家把他们三人称作“中央队”。一提“中央队”，都知道指的是他们三人。

张闻天和邓小平、李富春也常走在一起。邓小平这时是党中央的秘书长，也是红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有一次，我见他们同博古走在一起。听人说，博古在渡湘江后，曾举起手枪要自杀，被人拦住了。他现在同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失去了那种专横的神气。

路上比较热闹的是同女同志们走到一起。蔡畅、刘英、李伯钊……总是说说笑笑，她们说，这样可以减轻行军中的疲劳。

蔡畅在总政治部负责民运工作，我从未见她躺过担架，偶尔见她骑过马。她大部分时间同大家一起步行，她到哪里总是笑声不断。她唱《马赛曲》这首法国革命歌曲，大

家听了都很受鼓舞。刘英热情能干，惹人喜爱。后来组织上要她担任中央队的秘书长，听说她干得不错。我随老总跟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她分开了。

长征路上，很少见到贺子珍和邓颖超。贺子珍在长征开始时就怀了孕，离不开担架队。她生个男孩，那是在四渡赤水后向云南前进的途中，情况十分紧急，不能停留。婴儿无法带，只好给当地的一家农民收养。她在这次生育后不久，行军路上被敌机炸伤，伤势很重，身上多处弹片一直未能取出。邓颖超当时得了肺结核病，长征开始时痰中带血，身体很虚弱。我很难得同他们见面。

紧张的遭遇战

中央机关的担架队长生了病。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命令我临时负责带领担架队，担架队抬的都是作战负伤或生病而无法行走的中央、军委的高级干部，总政主任王稼祥也在其中。有些领导同志像毛泽东、张闻天，不睡担架，也跟随担架队行动。为保证他们的安全，担架队走在红军大队的中间。行军作战中，意外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我感到担子沉重，不敢有半点马虎。抬担架的一半是红军战士，一半是临时雇来的民夫。民夫每天每人一块银洋，很不好管理，而且都是事先说定只抬一段路，就要换人，放他们回去。一路上要不断做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

我带领担架队平安地走了两天。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在岔路上碰上周恩来打头的中央机关队伍，我忙叫担架队停下，让中央机关先走。周恩来把手一摆说：

“用不着客气啦！担架队全是伤员病号，应当走在前边，我们跟着你们走，也省得再去找向导问路。”

听他一说，我只好听命，急忙带队走过去。身后又多了个中央军委机关，使我更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为了稳妥，我把随带的一个步兵班抽出二人到最前面去作尖兵，又派人同前面的司令部机关取得联系。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尖兵报告，前面不远处山上有一股敌人向我们射击。

在我身后不远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焦急地问：

“怎么回事？谁在这里？如果是敌人，还不赶快派部队去打！”

我急忙过去向他报告了情况：

“有我在这里，你只管放心吧！。

我随即命令担架队退到安全的地方，通知中央机关停止前进，带上步兵班到前面观察。我的眼力很好，没有望远镜，也能清晰地看见前面山头上露出来的一个个小黑点。敌人正在射击，至少有几十人，是从侧面袭击我们的。有些小黑点蠕动着像是要冲下山来。必须当机立断阻击敌人，争取时间请司令部和前边的红军尽快派人前来支援。

我立即命令负责后面掩护的特务排，调两个班上来支

援，又派人飞速报告前边的司令部，请尽快派红军击退这股敌人。我自己带领步兵班冲向前面山边的一片坟地，占据几个高大坟包。我大声对大家说：

“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就在我们身后，为了他们的安全，我们拚了性命，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这里袭击担架队。只要我们坚持个把钟头，红军主力很快就会过来消灭敌人。”

“放心吧！指导员！有我们在，白狗子休想过来！”

我们人数虽少，但士气旺盛，这是使我感到宽慰的。我命令：节省子弹，不瞄准目标不开枪；注意隐蔽，打两枪就要换一个位置，减少伤亡。这是我们对付占优势敌人的有效方法。

有一股约二三十个敌人开始从山上向下冲，我一枪打倒跑在最前面的敌人，战士们也都跟着叩动了扳机，又有几个敌人倒下。剩下的敌人掉转屁股，纷纷爬了回去。

这时，特务排的两个班上来了，步兵班的同志十分高兴。我觉得必须尽快赶走这伙敌人，解除对中央首脑机关的威胁，需要有部队从侧后打击，使他们无法立足。我命令这两个班从右边向敌人的侧后迂回，然后发起进攻，赶走敌人。同时提醒他们不要同司令部派出的部队发生误会。

他们刚走，我又赶快派人把这一决定向司令部通报。

过了不大一会，山上的敌人组织了第二次攻击。他们先是集中火力对坟地一阵猛射，子弹吱吱地打在坟头上，四周的小树上，钻进泥土里，冲起阵阵尘土。我要大家暂不

还击，注意观察敌人，等敌人冲下来，瞄准一个打一个。不久，敌人从山上的乱石草丛后面冲了下来。我命令先打最前面的敌人，一阵枪响，敌人倒下好几个，有两个跑在最前面的，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米。我对身边的班长说：“我打左边的，你打右边的。”话音刚落，周围的战士都举起了枪。一阵枪响，两个家伙先后摔倒，后边的敌人立即返身向山上跑，跑得慢的躲在乱石和草丛后边，他们虽说只有一二十人，但离我们都在百米之内，是个很大的威胁，必须尽快除掉或是赶走他们。

正当我思考对付他们的办法时，又传来枪声，在离山头不远的右边，有二十多人的身影，向敌人冲击。这无疑是特务排的两个班上去了，向敌人的侧背发起了攻击。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接着山上的左后方也传来密集的枪声。听见远处敌人喊：

“红军从后边上来啦！”

那些藏在乱石草丛后边的敌人，全都爬出来向山上逃跑。我们立即瞄准射击。又打倒好几个敌人。看看山上的敌人，早已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阵激烈的枪响过后，枪声逐渐稀疏，转向远方去了。

我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担架队和中央机关转危为安了，等特务排回来清点人数，只有两人轻伤。整理了一下队伍，继续前进。

后来知道，军委纵队司令刘伯承、副司令叶剑英接到

我的报告后，立即命令司令部通讯连从敌人的左侧后包抄。战斗中他们打死一些敌人，缴到几支步枪，还抓住几个受伤的俘虏。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是贵州黄平一带的民团一百多人，正在调防。他们从山上看到下边有不少骡马、担架，又看到有穿军大衣的人，想下来发点洋财，没想到吃了亏。

难 忘 遵 义

一九三四年除夕，我们到达贵州中部的乌江南岸。红军甩开了敌人，在这里可以稍事休整，过个年了。

总司令部住在瓮安县城里。我们没收了当地土豪准备过年的鸡鸭鱼肉和糕点，一部分分给穷苦的“干人”（当地把最穷苦的称作“干人”），一部分留下自己过年。在新年元旦这天，每个伙食单位都吃到了猪肉，还有羊肉、鸡肉和鱼、蛋。总政治部号召每人送给干人一件礼物。我们把干人请来，吃罢饭，又举行同乐晚会，军民一起过了个十分欢乐的新年。干人们特别高兴。他们有的拉着朱老总的手，有的拉着我和潘开文的手说：

“红军先生，你们可救了我们的命哟。若不是你们来，我们休想吃上过年饭，你们分给我们那么多东西，又送礼，又请我们过年，你们红军是干人的大救星啊！”

他们说着说着，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离开瓮安时，当地不少千人汉民、苗民纷纷参加红军，同我们一起走上长征的道路。

强渡乌江成功后，红军飞速前进，智取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机关进驻遵义城。城里人山人海夹道欢迎，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天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博古、张闻天来到拜东桥，同当地“红军之友”社的代表和群众代表握手，然后到旧府衙门前，开了简短的群众大会。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发表即席讲话。我离得远，没有听清楚，从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群众的情绪中，感到讲话十分受欢迎。

敌军主力离得比较远，红军在遵义又有了短期休整的时间。一月十二日召开万人群众大会。这时我又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

一天晚上，我带着潘开文几个人去征收资本家的款项。走进一家大商店，点亮了两盏煤油灯，店内空无一人。我们想，这么大一个店铺，至少也要留一两个看守的人呀。可是跑遍前后，不见一个人影。忽然听见前面有人一声叫喊：

“有人，还带一支枪！”

听说有人带枪，几个人紧张地跑过去。可是什么也没看见。问那人，他说看见一个人，在玻璃隔扇那一边，同自己身材差不多，手里拿着一支步枪。等他跑过去，就什么也不见了。我同潘开文过去察看，那里地方不大，没有可躲藏的地方。但这是不可马虎的，我叫两个战士埋伏在

暗处，其余的人一处一处地搜寻。越是搜寻不到，越感到紧张，因为躲在暗处的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从背后给你一枪。

“听说有钱人家常常在夹壁墙和地窖里安有机关，不小心就会吃亏。”

有人这么一说，几个人就更觉忐忑不安。大家把墙壁和地板一阵敲打，也未发现哪里有夹壁墙。

前后搜寻了几个来回，大家都感到累了。紧张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放松。忽然又传来轻声的叫喊：

“在这里，快，快来人！”

我们急忙跑过去，又是什么也没看见。这次还是最早发现有人的那个人。我叫他详细说说前前后后的情况，他边说边表演。忽然，他愣住了，立刻靠在我身边，用手指着说：

“又来了，你快看！”

我照他手指的方向看，依然什么也没有。他着急起来，叫我原地监视，他一个人过去看看。我要查个究竟，同他保持一定距离，悄悄退了过去。。忽然他急匆匆地转过身来，叫我“快看！”

在微弱的灯光下，那个大玻璃窗隔扇后面果然有人影，不是一个，竟是两个人。我立即推开驳壳枪的保险，觉出其中一个人在同我一样动作。再仔细一看，那竟是从玻璃隔扇上反射出的我们两个的影子。我叫他上前几步看看那

人的动静，他十分紧张地端起步枪，那人也跟着端起枪，我急忙大喊：

“不许开枪！那是你自己的影子！”

听见我的喊声，潘开文他们几个人都跑过来。又听说他把自己的影子当作敌人，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潘开文开玩笑地说：

“今天晚上收获不小，活捉了一个镜子里的敌人。”

找不到这家店铺的人，就留个条子，通知他第二天上午到红军司令部找我们，并警告他，再也不许躲藏。第三天上午，那家商店一个老头来到司令部，自称是管帐的。他说店里原来留了两个伙计看管，那天听见敲门声，又看见是带枪的人。他们没来得及插门，就吓得翻墙逃走了。不知道是红军兄弟，再三表示道歉，然后按照规定缴足了应缴的款项。

在遵义动员老百姓参加红军，不像瓮安县那么容易。经过我们在集市上动员宣传，随后有八九个青年人跟我们来到司令部，他们全是衣衫褴褛的穷人，大冷天里好几个人还打着赤脚。潘开文招呼他们吃午饭。他们很少说话，问他们一句，只答半句。吃过饭，一个说要解手，几个人都要去，潘开文叫他们快点回来等着谈话分配。半天不见回来，就到厕所去看，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

我同潘开文几个人研究这件事的教训，认为还是对他们了解不够，没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后来我们改进

了工作方法，不但对本人做工作，还到他们的家里去做宣传动员，帮助解决一些困难。这样，终于动员一些人参加了红军。

在遵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就在当时红军司令部住的楼上召开。这是国民党师长柏辉章的家，一幢二层楼房。老总我们和周恩来两家都住在楼上。会议室正对我和总司令的房子。

党中央要开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我已有了一些预感。会前，我特别要求特务队，嘱咐潘开文，一定要保证这次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这几天，朱老总容光焕发，从他那眼神和一举一动之中，使我预感到一件大事就要发生了。

会议结束后，老总高兴地对我说：

“这次会议开得好，你等着听传达吧！”

一月十八日，在遵义天主教堂召开了中央、军委直属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会，凡是应该参加的党员骨干都早早地到了，把那个不很大的天主教堂挤得满满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几百人聚精会神地听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情况。他讲到博古、李德两人在军事上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给红军和苏区造成重大损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次长征。因此，中央决定取消他二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指挥，而周恩来又是党中

央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指挥者。会议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仿佛是阴沉的天空响起了惊雷，跟着是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一阵阵经久不息。狂热的难以抑制的高兴，简直要把小小的天主教堂给掀翻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到头了，大家爱戴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这是用多么大的惨重代价才换来的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传达结束，会场上爆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伟大的党中央万岁！”

……

那心情，那情景真是令人感动。长期压在人们心头上的阴云散开了，重重迷雾遮挡的太阳重新出现在面前。欢腾的情景，真比接连打十个大胜仗更要大快人心。这个无比宝贵时刻，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在遵义停留了十二天。敌人也在这期间向红军包围过来。十九日我们撤离遵义，向北突围，二十八日到达赤水河边。

不久，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击溃敌军两个师又一个团，俘虏三千，缴枪三千多支，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脚 的 故 事

三月的贵州高原，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难行。红军二渡赤水河后，总部经过桐梓，进驻石巷子。潘开文在行军路上不小心跌了一跤。阴雨天行军跌跤本来是家常便饭，当时我没有十分在意，只是问他：“摔得怎样，还能走吗？”

他满身烂泥站起来，疼得皱眉头。听我一问，瘸瘸跳跳地走了几步。

“没问题，照样行军，不碍事！”

我忙着行军路上的前后照应，听了他这么说，就走开了。

第二天，我照例到队伍后面收容掉队的同志。这天走的全是山路。上午小雨一直下个不停，掉队的却不多。下午的路程虽比上午近了将近一半，队伍却拉开了距离，掉队的逐渐增多，我要跟着他们一块走，渐渐地离开了大队。我把前面掉队的两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指定一个组长，要他们互相帮助，彼此照料前进。我再去帮助后来掉队的，这样不知不觉同大队的距离越拉越远。等到后来再不见有司令部掉队的人时，才发现已经同后面的担架队走在一起。这时天已快要黑了，离担架队的宿营地已经不远。他们劝我同他们一起宿营。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一个人急急忙忙向前追赶司令部的队伍。

雨已经不下了，天还阴沉沉的，大约是阴天天黑得快，四周的山头很快都隐没到灰暗之中，只有那条不宽的山路像条发光的带子，还能依稀辨认出来。我一面拿出驳壳枪，打开保险，准备随时应付意外情况；一面急速地向前赶路。跑了一阵，浑身发热，额头上沁出了汗水，走着走着，看见前面苍茫灰暗的山影下，路边出现一棵大树的黑影，枝杈上影影绰绰挂着一些东西。凭着经验知道，那是行军途中战士们穿破的草鞋。树下一片黑暗，我只顾急匆匆赶路，忽然听见啜泣声，急忙收住脚步闪身在一棵小树后边观察。昏暗中，隐约可见有一个人，靠在大树根边坐着，像在垂头哭泣，又像在呻吟。一定是个掉队的红军战士，我迅速走过去。

“是谁，天黑了还一个人坐在这里？”

他好像没有听见。我不顾一切，上前摇晃他的肩头，又一再询问，他才抬起头来。

“指导员，是我……”

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激动得话也说不清了——竟是潘开文！原来他的脚在昨天跌了一跤后，肿得像个馒头，今天早晨出发，一路上多亏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帮忙，才算没有掉队。下午下山后，他怕周副主席有事，催促范金标先走，自己保证拄着棍子一定准时赶到宿营地。不料自己越走越困难，越走越慢，走到这里再也走不动了。看看天又黑了，半天也不见人来。他想：在

这深山野岭万一遇到猛兽，只有死拚了。

“怪我一时粗心，没有想到你竟会摔得这么重。好啦！你不用难过啦！有我帮你，两个人一定能走到宿营地。”

我叫他把背包给我，他不肯给，我就一把夺了过来。他的驳壳枪仍让他拿着，以防万一。

我用力扶他起来，大概是坐的时间久了，两人一齐使劲，他才艰难地站了起来，但是迈不开步，挪不动腿。半晌，他赌气使劲向前迈步，猛地一冲。“哎哟”一声，差点跌倒。我急忙把他扶住。他推开我的手，想不到他这一冲，竟然迈开了步子，拄着他的拐棍，慢慢地一步两步走了起来。他高兴得叫道：

“指导员，你看我不是还能走么！”

他高兴，我更感到高兴。我拿着一根枯枝火把照亮了我们前进的山路。我用一只手扶着他，一只手举着火把。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话。

“指导员，我走得太慢，这样，怕走到天亮也到不了宿营地。你还有很多事，还是你先走吧！”

听他一说，我劝慰他说：

“你一人走，能走到吗？再说在这黢黑的小路上，万一遇到野兽，两个人好对付，一个人怎么办？”

他不说话了。我进一步鼓起他的勇气：

“红军战士天下无敌，这一点小困难，我们两人还克服不了？”

潘开文忽然像是变了一个人，甩开我的手：

“指导员！我能自己走，你不用扶我。”

看着他踉跄的步履，我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能自己走，不过脚肿得厉害，我还得给你搭一把劲。既是这样，我们就快走吧！”

我们改变了像蜗牛般的挪步，两个人一起迈开了步子。潘开文说，好像脚疼减轻了。我想这是因走路而活动了伤脚的血脉经络。

“好啦！照现在的行军速度，一个钟头走五里路不成问题。我估摸到宿营地不过十来里，最多走两个钟头就到了。你要是累了，我们就歇一会，误不了赶路。”

在火把快要烧完的时候，我让他坐到一个树桩上休息，又去换点了一根。等他稍稍喘过气，我们继续上路。这次走得十分顺利。当转出一个山坳，看见远处的灯光时，不由得都高兴起来，估计那里就是宿营地，步子也就加快了。

朱老总因为不见我们两人回来，有点焦急，打发接我们的人在门口遇见我们，高兴得大叫：

“哎呀，两个钟头不见你们回来，总司令都要急坏了。我们还以为你们遇见老虎。回不来啦！”

听我们讲着情况，朱老总叫人打来热水，用手按按潘开文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脚说：

“先用热水烫一烫，用热毛巾轻轻地敷，再抹上火酒，就会好多了。”

吃过晚饭，我同老总去看他，他说：“总司令的办法真灵，大馒头快要变成小烧饼了。”

“听说你曾悲观失望过。我们参加革命，随时都可能流血牺牲，性命都不顾，怎能向一时的困难低头啊！”……

潘开文两眼含着泪水听老总说话，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住地点头。过了好久，才说：

“我这次多亏了指导员！”

我立即纠正他：“还是靠了你的坚强毅力一直走到宿营地，我只不过扶了你一把。”

第二天，潘开文的脚有些消肿了，走路依然不便，我让他骑上我的马行军。过了两天，他的脚完全消肿了。

敌人发现红军北上川黔边的意图，又在北方布下了重兵。北上既不可能，中央、军委决定前往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佯攻昆明，然后向金沙江前进。一路上打了几个胜仗，有一次缴获了敌人几辆卡车，其中一辆装了十几大捆图纸。打开一看，全是五万分之一的川滇黔一带的军用地图。这原是蒋介石为了“追剿”红军，把库存的地图兜底运来送给他的“追剿”部队的，没有想到会全部落入红军手中。

朱老总和周恩来看到这些军用地图，高兴得笑起来。老总说：

“正发愁这一带地形不熟，我们带的地图又老，又简单，只能作参考。现在不用发愁了。”

周恩来笑着说：“真是鬼使神差！这个蒋介石就像是知道我们需要它，派人连他的老底都给我们送来了。这叫‘雪中送炭’啊！”

说完，两人禁不住大笑起来。

我在旁边听着看着，也觉得高兴。

他们立即叫参谋整理那些军用地图，除给总部留下一部分外，其余的全部发给各个部队。

通 过 彝 区

渡过金沙江，来到冕宁一带，这里已是彝族地区。山峦起伏，林木葱笼，许多地方都有原始森林，葛藤缠绕，枝杈纵横，峭壁深谷，山石嶙峋，抬头不见天日，几乎无路可走，全靠工兵部队在前面砍藤伐树，架桥开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压、剥削，使彝人仇恨汉人，遇见汉人的少数军队，就发起进攻。听说有一次国民党的冕宁县长带着一个连打从彝区经过，枪支全被缴了械，同行的老少男女都被扒了个精光，连裤衩也不留，弄得县太爷和他的太太、少爷、小姐一个个只好披着破麻袋片回到县城。

在前面开路的红军工兵部队起初把这些当作笑话传说，想不到自己也遭到同样的待遇。走进彝区不久，只见彝民呼啸着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和长枪冲下山来。按红

军总政治部规定：不准向彝民开枪；他们想进行劝说，彝民一窝蜂上来抢了他们的工具和枪，然后把他们一个个按倒，扒光衣服。他们看看再没有可抢的了，一声呼啸，跑得无影无踪。工兵连个个都给弄得赤条条，进不得，退不能。等到先头部队过来，他们都难为情地背身躲在路边。先头部队一见他们那副模样，赶快打开背包，拿出衣裤，分给他们穿上。

进入彝区前，我按照上级布置，给总部机关勤杂人员、战士讲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介绍彝族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要求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因为语言不通，怕引起无谓的纠纷，规定不经领导允许，任何人都不准随便同当地人接触。这时，刘伯承总参谋长已经同彝人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达成了红军安全通过彝区的协议。彝人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一到，纷纷腾出房子。红军战士对彝人感到好奇，有空就在一边观察他们的生活。他们分白彝、黑彝，黑彝是奴隶主，白彝是娃子奴隶。男人披着黑色粗布或毛毡斗篷，女的下身围着一块布作裙子，他们都不穿裤子，睡觉时，裹着斗篷或衣裙，在地板上或地铺上一滚，就算铺的盖的全有了。

第二天出发，翻过几座山，在一座大山前面，一个十三四岁的彝族小姑娘站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她全身上下没有一件衣服，赤身露体地站在那里，两只大黑眼珠忽闪忽闪地看着红军队伍。队伍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我

急忙跑到前面想问她站在这里干什么。可是语言不通。我想了想，立即脱下上衣给她披上；潘开文递过来一条军裤和一条布带子，我帮她穿上系好。小姑娘现出高兴的样子，不解地看着我，笑了笑，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我猜她大概是说感谢一类的话，便也笑着对她点点头。

我们静静地看着她翻过前面的山坳。这时有人指着远处叫我看，原来在前方不远的山头上还有许多拿着刀矛和枪的人，正在注视着小姑娘和我们的一举一动。

小姑娘走后，我们边行军，边议论。猜想小姑娘是彝人对红军的一个试探。但是既然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而且我们一路走来，和他们相处很好，为什么还要再来试探呢？

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个地区彝人有两个部落，一个叫法基家部落，一个叫罗洪家部落，两个部落有世仇，经常打冤家。和红军结盟的小叶丹是法基家部落，罗洪家部落对红军很不放心，又怕红军人多，所以在红军接近他们的地方，派人监视我们，让那个小姑娘前来试探。

出了彝区，我们又一次把国民党追兵甩在后面。前面是四川军阀的地盘，又有大渡河阻拦，必须在敌人追兵到达前渡过河去。红军先头部队巧妙地夺取了大渡河上的安顺场渡口，但是这里只有四条渡船，水深流急无法架桥，每天只能渡过一个多团。为了甩掉强大的敌军追兵，中央、军委决定：迅速夺取三百二十里外的泸定桥。军委纵队紧跟

红军第四团的后面，要求三天赶到。这是一场同敌人争夺时间的战斗。

大渡河两岸全是陡峭险峻的高山，羊肠小道，崎岖难行，中间被急流、深涧隔断的地方，全亏工兵部队就地取材，架桥修路，才得以过去。沿着悬崖陡坡行走，稍有不慎，随时有坠入深渊的危险。途中除了吃饭、休息，就是急行军，经常小跑赶路，晚上点起火把行军，有如一条在大渡河边蜿蜒游动的火龙。几次遇到倾盆大雨，部队仍不停歇地疾进。

三天里，我们经过蚂蝗坪、猛虎岗、桂花坪、半山树、磨西面、上河坝、抱索坝、沙坝和其他记不清的许多艰险地段，以每天一百里以上的行军速度，终于在第三天傍晚到达泸定桥边。泸定桥已被红军的先头部队攻占下来，在过河前停下休息时，清点人数，三天紧急行军，竟然没有一个人掉队。

通过铁索桥时，摇摇晃晃，一看见下面湍急咆哮的河水，心情紧张，人也觉得矮了。有人不断提醒：“眼睛朝前看，不要朝下看，也不要朝两边看。”大家沉着气，心不二用，顺利地过了桥，宿营在泸定城。

听说，敌人为了阻挡红军过桥，把铺在铁索上面的木板拆去，拆到最后十来米时，红军已赶到对岸，他们慌忙放火，打算烧掉剩下的桥板。二十二名红军英雄，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在上下不停地摇摆之中，紧紧抱住光溜溜的

铁索，手攀脚钩，匍匐前进，最后他们爬上了正在燃烧的桥板，从浓烟大火中冲向敌人。敌人看见一个个红彤彤从火海中冲出来的红军，吓得丢下碉堡、弹药逃跑了。

红军占领泸定城，但是桥已破坏，必须尽快铺上桥板，才能通过大队人马。工兵连发动大家千方百计搜寻木板，又砍伐了附近仅有的一点树木，总算弄来一些长短不一的木板、木头。因为时间紧迫，一时弄不到那么多铁钉、铁铆，就把木板钻眼、凿洞，用粗麻绳紧紧捆扎在铁索上，铺成人马能够通过的桥面。在执行这项紧急任务时，有块旧木板突然折断，三名工兵战士坠入急流，英勇牺牲了。工兵部队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铺成了长征路上的铁索桥啊！

出了泸定城又遇到大雨。走了一天，傍晚雨小了，天黑以后，到一个山谷的大庙里休息时，发现后勤运输和牲口队远远掉在后面，估计最快也得一个钟头才能赶到。炊事员没有粮食做饭，许多人没有行李打铺，大家又饿又累又困，有人不住地埋怨，有人发牢骚。我过去解释说明，劝他们耐心等待，大殿里渐渐安静下来。

这座庙很大，虽说大门外面派了岗，我还是不放心，提着一盏马灯到殿外巡视。外面还在下着濛濛细雨，我和潘开文踩着石砌路面来到大殿后面。后院紧靠山脚，山边岩缝中长着许多青草，被雨水冲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鲜嫩喜人。那些青草叶子又宽又厚，一定是喂牲口的上等饲料。我这样想着，顺手拽过一把，放到嘴里一嚼，竟是满

口鲜嫩的韭菜香味。已有半年没有吃到韭菜了，再细细嚼嚼，果然是野韭菜。哪里来的这些韭菜？提起马灯一照，附近岩石缝里长的都是清一色的韭菜，再向高处看，上面岩石缝里也满是野韭菜，一丛丛，一簇簇，十分茂盛。潘开义高举马灯前后看了一遍，光是近处用手能够得着的地方，他估计也能割上几十斤韭菜，够大家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我回到大殿喊醒警卫班的几个人，叫他们每人带上一把刀，带他们到大殿后面，用马灯照着那些野韭菜给他们看。我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一簇簇的都是不用花钱买的野韭菜。”

“好啊！指导员，今晚上可有好菜吃了。”

不等我命令，七把刀子同时开割了。我把马灯挂在一棵小树上，也割了起来。

当我们每人抱着满满一斗笠鲜韭菜走进伙房时，浓烈韭菜香味引得炊事员们围了上来，抓起韭菜看看，高兴地说：

“你们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又鲜又嫩的韭菜？警卫班这下子可立下功劳啦！”

这时后勤牲口队也到了。有了粮食，有了野韭菜，却没有柴禾。时间已到半夜，许多人已经睡了，只好决定不吃饭。第二天早晨雨停了，部队要出发，我们来不及做饭，只得饿着肚子上路。炊事班把韭菜捆扎起来，挑了满满一担，剩下的留给了庙里的和尚。

中午走到色子地休息做饭，大家都饿坏了。吃起饭来狼吞虎咽，一吃到这鲜嫩的韭菜都赞不绝口，夸奖伙房大师傅有本事，把一夜挨饿的怨气都消除了。

午饭后，天气转晴，继续行军。出发不久，来到一处山坡上，前面吹起防空号。这一带林木稀少，朱老总和周恩来副主席带人跑到附近洼地的一个坟场里。我急忙招呼战士和炊事班就地卧倒。敌机飞得低，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不停地俯冲、轰炸、扫射，好一阵才走。

敌机一走，连忙检查，发现好几个人负伤，朱老总的裤腿被弹片撕破一块，一个炸弹在他俯卧的坟头侧面爆炸，把坟头上的草都削平了，幸喜没有伤着他。这时卫生员拿来纱布、药棉给伤员包扎。我想起经过云南时，红军缴到敌人的一批云南白药，总卫生部分给老总一些，这药对止血治伤有特效。我跟老总一说，两人立即打开公文箱，把十几小瓶云南白药全拿出来，同卫生员把红药丸给伤员口服，白药面敷在伤口上，再帮助他们包扎好。伤员们知道是总司令拿出的云南白药，纷纷表示感谢，有的刚包扎好就大声说：

“总司令的云南白药真灵，连吃带敷，很快就觉得不疼了。”

包扎好伤员，部队又出发了。我同潘开文、范金标几个人安排不能走路的伤员，每人骑一匹牲口。朱老总、周

副主席腾出牲口，同大家一起步行。几个伤员看见他们步行，要从马上下来，叫首长骑。周恩来和老总忙去制止他们：

“你们不能走路，不骑马，难道让我们大家背着你们走吗？再说，我同总司令又不是不能走路。我们已经骑了大半天，现在正需要走走路活动一下。”

说着就同朱老总带着几个警卫员走到前面去了。看着他们，有的伤员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翻 雪 山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红军总部跟随先头部队从宝兴县出发，来到夹金山下。这是个有二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夹金山海拔四千多公尺，上面终年积雪。山上白云缭绕，有时露出山顶，像个披着白色斗篷的巨人。这边山脚下却是树木葱笼，青草繁茂，片片翠绿。雄踞在四周翠绿和灰色岩石上的雪山，并不叫人觉得可怕。

大家知道翻过夹金山，就可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都非常高兴，急着赶快翻过山去，却不知雪山的厉害。这时，总部根据先头部队第一天爬雪山的经验，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并严格规定人人应当遵守的事项：脚要用布包好，穿上草鞋，鞋带要系得不紧不松；上山不准猛跑，要稳住劲一步一步上去；非十分必要，不准大声说话、喊叫，以减

少体力消耗；不准因为疲劳在山顶坐下休息，要争取在上午十二点以前翻过山去，因为午后山上常有暴风雪。我按规定给总部人员作了动员布置，又作了一番检查。

第二天，提前吃早饭，部队就出发了。从山脚往上走，一个多钟头里好像经历从夏到冬的季节变化。越往上走，树木越少，后来只见一块块草皮，最后完全是岩石和积雪了。一眼望去，除了黑青色的山石，就是一片白雪，炫目刺眼，使人不敢久看，常常要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才觉得舒服一点。

不知什么缘故，到磬碛村我就感到有点气短。问别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医生说，这叫高山反应，爬山时要特别当心。早晨，我一点饭也吃不下，在别人劝说下，勉强吃下半碗饭。开始爬山时，只觉得浑身无力，头晕。这时，李伯钊走到我身旁，见我的样子说：

“你高山反应这么重，为什么不骑马？不然，你就过不去夹金山。”

有规定，为防冻坏腿脚，爬山时，所有的人一律不准骑马。

她帮我背起粮袋，准备扶着我走。事先已经有人给我找了一根拐棍，我不肯让她扶，自己拄着拐棍走，她还是寸步不离我的左右。遇见陡坡的地方，她就过来扶一把，防我跌倒。有她在身旁，我觉得心里踏实不少。但是越往上走，越感到气短，有点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有雪的地方，两条腿再也抬不起来，浑身软绵绵的，只想坐下来歇歇再

走。李伯钊死命拽我往前走，说：

“千万不能坐下，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果然，走到前面，看到两个人，身上盖上一层雪。我有点奇怪，过去推一推，竟是两个早已冻僵的红军战士。我惊出一身冷汗。他们大概是昨天过山，在这里一休息，再没有起来。

我俩默默地再没有说话。面前是一场艰巨的考验。我咬紧牙关，在她的帮助下重新迈开了步子。但是走了不大工夫，在急促的喘息下，渐渐又感到难以支持了。李伯钊因为帮助我，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想自己过不了夹金山，可不能把她也连累了。就站住脚，叫她别再管我。可她哪里肯听。我这时累得连眼皮都难以睁开了。

“指导员！你怎么啦？”

耳旁一声轻轻的呼唤，把我惊醒，原来是老总的马夫。他正赶着老总那头驮东西的骡子走到我的身边，看见我这副模样，把骡子赶到我面前说：

“指导员！你拽住骡子尾巴，要拽紧，千万不能撒手，这样跟着就行啦！”

我听了他的话，心头一亮，抬头看准了，猛使劲一把拽住骡子的尾巴，又在手臂上绕了一圈，然后指指李伯钊，想叫她也来。李伯钊闪到一边，摆摆手，意思是只要我有办法，她能自己翻过山去。

骡子力气大，它一走，我不用费劲，就跟着走了。这

骡子十分老实，仿佛知道我在后面，总是一步一步，不快不慢，稳扎稳打地前进；遇到沟坎陡坡或向下走时，总要停一下好像使我有所准备。

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又觉得不行了。不但气喘乏力，更感到两手被骡子尾巴缠得发酸发麻发疼，几次想松开歇一歇。可是我必须经住这个考验。我咬紧牙关，眼前除了骡子尾巴，它那圆而肥大的屁股，骡子背上的被囊，和骡子头上的两只耳朵，全是一片白雪，脑子里仿佛什么全都消失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眼前出现湛蓝的天空，阳光刺眼，冷风扑面吹来。

“啊！我们终于到山顶了！”

李伯钊沙哑着喊了一句，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艰难地前行几步，来到顶峰的另一边，朝下一看，脚下雪山一片，远处是碧绿葱笼的世界。这时，我看见许多人坐下来，顺着前面的人滑出的许多条雪道往下滑。马夫对我说，从这里下山再不用拽骡子尾巴了，他要带骡子走另外一条路。我的两只手已不听使唤，张不开了，揉搓一会，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山顶风大，不能停留，我们立即坐下，顺着别人滑出的雪道，向下滑去。耳边风声呼呼，巨石积雪飞掠而过，身不由己地向下降落，心里一片茫然，不知要落到什么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们很快滑到了雪线的边上，从这里站起来往下走，已

不用再费多大力气。回头看看那些雪道上，许许多多小黑点正在向下滑；另一边不远的地方，马夫正牵着骡子和运输队一起，沿着一条陡峭的山路一步一步向下走。

第五章

从南下到北上

一、四方面军会合

翻过夹金山后，我的体力渐渐恢复了。路上遇到几个服装整齐，头带红五星军帽的四方面军同志，他们非常热情地向我们行举手礼，指给我们行军宿营的路线。

过雪山以前，总政治部有通知，为准备同四方面军的会合，要求每人理发，男同志刮胡子，尽量穿得整齐一点，人人准备一份礼物送给四方面军的同志。我们的军服，经过九个月的长途跋涉，全都破烂不堪，说整齐也只是尽量洗干净，把破烂的地方缝补一下。尽管如此，比起四方面军的服装就差多了。他们倒没有人注意这些，见了面个个都像一家人一样亲热。

第二天，我们到了达维镇，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韩东山看见了陈赓，敬了一个礼就喊：

“老首长，还记得我吗？”

“哎呀！原来是小韩啊！”

陈赓大叫一声，伸开双臂紧紧把他抱住。陈赓在鄂豫皖苏区任红军十二师师长时，韩东山曾是他的下属三十六团副团长。陈赓马上把他介绍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我们到达懋功，这里是红四方面军控制区的中心。总政治部在一座漂亮的天主教堂里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会。会上，四方面军代表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对一方面军表示欢迎。毛泽东、朱德讲话，会场不断爆出震天的口号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一方面军战士纷纷把珍藏的苏维埃银行钞票、红军印的课本、小画片……拿出来送给四方面军的同志；还有的送手帕、小刀……等等。接着是总政治部组织会餐，八个人一桌，每桌四盆热气腾腾的菜，还有烧酒。然后是战士剧团的文艺演出。他们先唱陆定一和李伯钊在宝兴共同创作的《两大主力会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师了，
欢迎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
团结中华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喂！
坚决赤化全四川！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来伟大的会合！

为着要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噢！

高举红旗向前进！

从宝兴出发，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学唱这首歌。听到台上的歌声，台下的人不约而同地都唱起来。四方面军的同志虽然不会唱，在热烈气氛的感染下，也都跟着点头或是挥手按着节拍鼓掌。许多人热泪盈眶，热烈生动的团结气氛充满了全场。接着，李伯钊表演舞蹈，大家不断地为她鼓掌，要她“再来一个”！

战士剧社演出话剧《一只烂草鞋》，这是黄镇创作的，表现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长征的红军队伍尾追堵截，最后追到金沙江边；他们满怀希望要把红军消灭在这里，红军却早已机智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他们追到江边，只拣到一只红军扔掉的破草鞋。这个戏充满喜剧情节，不断引起阵阵笑声。

联欢会开得很好，可我心里有点纳闷：毛主席、朱老总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为什么不见张国焘、陈昌浩这些四方面军的领导人，而只派个师长作代表？我把这个感觉告诉朱老总。老总笑笑说：

“他们现在还在杂谷垭，离这里有一百里路哪！”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我们到了这里？”

“不会的，也许有什么事耽搁了。”过了一会，又自言

自语地说：“难哪！”

在懋功住了两天，经过抚边，在六月二十四日到达两河口。第二天，听说张国焘要来，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布置了欢迎会场。我们都去参加，很想见识这位四方面军领导人。

天空浓云密布，空气潮湿发闷，是大雨前的征兆。我们带上斗笠和雨布，几千人和中央领导同志聚集在会场上。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大家全都一动不动地等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张闻天、博古也都在滂沱大雨中静候。

忽然一匹快马溅着泥水跑进会场，直奔主席台。会场入口处响起了鞭炮锣鼓声。只见三十几匹马小跑进入会场，那带头的无疑就是张国焘。他身体高大，四方脸，很有几分威严。他们到主席台边下马，随着他有四五个人走上主席台。这时全场唱起《庆祝两大主力会合歌》。

歌声一停，欢迎大会开始。朱老总先讲话，庆祝两大主力会合，热烈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指出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空前胜利，使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可靠的基础。

张国焘讲话声音宏亮，有几处讲得十分生动，引起一些笑声。有一句话他讲了两遍，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创造川康的新局面”。他这样讲，岂不是同党中央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有矛盾吗？

雨渐渐下小了，大会在歌声和口号声中结束。

七月初，红军为了执行北上任务，从两河口出发，经过大板村、黄竹坪到达木城，来到又一座雪山脚下。这座山叫梦笔山，上下山要走九十里。有了过夹金山的经验，我们都早早做好准备。上山时，我一直紧跟老总的那匹骡子，累了就拽住骡子的尾巴。有马夫在旁边照料，顺利地同大家一起翻过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雪山。

这时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藏民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逃跑时把粮食带走藏起来，还不断袭击我们的掉队人员和单独外出的人员。一军团直属队几天里，就有二十多人被杀。红二师参谋长在行军路上被藏民放冷枪打中牺牲了。红军先头部队一路上不断遇到藏族反动头人的阻拦。到达卓克基时，反动土司索观赢据守土司宫阻拦红军前进。为了执行团结藏民的政策，红军放枪威吓他们让路，他们据险顽抗，不予理会。派人去同他们谈判，竟被他们杀害。无奈，只好硬攻了。傍晚，红军进攻前，先打两发照明弹，土司头人从未见过，被那红的、绿的火球吓得东躲西藏，急忙丢下给养、弹药，逃进了深山。这样，红军就顺利地占领了卓克基。我们住在土司宫里。这个土司宫有九栋楼房，最高的一栋有七层，十几丈高。楼梯是一根斜放的圆木，两边砍出能放下脚的阶梯，下楼时不小心就会摔下去。土司住在上面几层，布置得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许多汉人的古玩字画，还有海味山珍。据说这个土司在四川上过大学，母亲是个汉人，七层楼上设有佛堂。卓克基是个比较大的镇

子，藏民大多住在石头砌的房子里。

我们在卓克基住了几天，逃跑的藏民有不少陆续回来了。经过通司翻译，我们对他们进行宣传，筹集到一批粮食，然后继续行军。经过梭磨河、马塘、刷金寺，又翻过一座叫长坂山的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这时缺少粮食又成了主要问题。芦花在那一带算是产粮区。藏民种的青稞麦已经快成熟了，有的已经开始见黄，要完全成熟还要十天半月。我们不能再等，同藏民商议，按当地的青稞价付给他们现款，家里没有人的，也付钱请他们代转。麦子全由我们自己动手割。

早晨，喝了稀薄的饭汤，大家再集合下地割麦。很久没有干这个活了，大家都特别高兴，许多人一边割一边唱歌。虚岁已经五十的朱老总，也跟我们一块下地，他割得快，割得好，跑到许多人的前头。割完麦子，他又打头挑，挑的两捆又大又沉。

在芦花住了一周多，又到了瓦布梁子。这里有十几个村庄，几百户藏民，产大麦、小麦、荞麦，还有洋芋、萝卜，许多人家喂有猪、牛、羊；还产盐，是藏区的富庶地方。我们刚到时，藏民全部逃走，经过工作，又陆续回来了。我们在这里筹集许多粮食，还熬了一些盐。我们到藏民中发动群众，召开藏民大会，组织了六个乡的人民政府。然后开人民政府代表会，成立了瓦布梁子区人民革命政府。我们离开以前，又把当地区乡衙门的粮食发给藏民群众。

离开瓦布梁子，又翻过两座雪山，一座叫仓德山，比前几座山都高，也最难爬，从山下到山顶就有六十里路。我还是爬过去了。后一座叫打鼓山，山下有三个村子，因为地势高，麦子还不能收割。粮食不够吃，只好摘野菜、吃嫩豌豆荚。朱老总大概是四川人的原故，对于这一带的野菜十分熟悉，带着潘开文几个人去挖野菜。他叫我们把挖到的野菜都交给他，由他经过选择分类，组织部队轮流来看，讲解每种野菜的名称、特点和吃法。在那一带我们找到了七八十种可吃的野菜，帮助我们渡过了缺粮的难关。后来过草地时，许多人就是靠吃野菜得以活命的。

反 对 分 裂

翻过打鼓山，到了毛儿盖。毛儿盖是松潘县西部藏民聚集区，有三四百户人家，也是藏区富庶地方，据说收一年，就够吃三年。这里的青稞已全部黄熟，藏民们都逃跑了。为解决吃粮，我们就动手割麦子，把钱交给附近回来的藏民。

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开会，部队在这里休整。原定攻打松潘消灭胡宗南军队的计划，因为张国焘行动迟缓，失去战机，中央决定改行“夏洮战役计划”，分兵两路北上，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彭德怀率三军和四军一部分

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方针确定，任务明确，但部队迟迟不能行动。

一天，朱老总回来对我说：

“还是毛泽东的眼力看人看得准。”

我一时弄不清他指的是谁。

“除了这位总政治委员还有谁。”

老总指的是张国焘对许多事避不出面。毛主席、朱老总有事找他，他不来，只派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或是参谋长应付一下。让他办的事，当面答应，可是什么也不办，许多紧要的事都被他耽误了。

我们总司令部大部分人员随朱老总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到了左路军。朱老总和刘伯承一再催促张国焘北上。他找不到别的借口，只好在八月下旬同朱老总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到了阿坝，他提出向西去青海，而不愿向东北过草地北上。经中央一再催促，朱老总、刘伯承不断地劝说，才进入草地。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竟然也像过雪山一样难以通过。四野水气弥漫，不见飞鸟，没有树木，一脚踩下去软绵绵，水和草一起往下陷，冒出枯草烂叶的气味。茫茫一片，看不出路在那里，若没有藏民带路，真不知该往哪里走。有些地方看着同别处一样，却是很深的泥潭，人马走在上面，就逐渐陷下去，眼看着也无法相救，直到被泥沼吞没。草原的夏天，一会阴，一会晴，一会暴雨夹着冰雹，一会又是

细雨霏霏，不久又露出蓝天和骄阳。草地中间不时出现一小块或一小长条干硬土地。我们就在这上面休息、宿营。

过了几天，来到噶曲河边。董振堂带着红五军正准备涉水渡河，张国焘却说河水看涨，谁也不准过河。老总问带路的藏民，藏民说：这河虽宽，但是不深，只要不涨大水，可以徒步过去。河面有近百米宽，水流不急，不像涨水的样子。但张国焘一口咬定河水正在上涨，不能过。老总说：

“空谈无益，还是派人下去试试。”

张国焘不肯派人，潘开文站出来说：“我去！”老总叫他骑上自己的马。他问明了藏民过河的路线，拿了一根棍子，同红五军的一个战士一起骑马下到河里，不大工夫，到了河中心，用棍子试了试河水深度。到了对岸，听见他高声地说：

“水不深，最深的地方才到马肚子。大家快过来吧！”

部队立即准备下水，张国焘吼叫：

“谁也不准过！叫他们两人给我回来。”然后又对老总说：

“河水分明在上涨，我不能拿几万人的生命当儿戏。”

老总说河水并没有涨，即使涨，也涨得很慢，现在正是大队人马过河的好时机。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

“总司令，我们前卫队先过去吧！”

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叫：

“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

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噶曲河边宿营。

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按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记耳光。他说：

“我当兵打仗这么多年，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北上同右路军会合。”

我听了只觉得气往上涌，心里同情他，赞成他的意见。老总却摇摇头，说：

“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办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董振堂被老总的一番话说服了。

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朱老总和刘伯承率领红五军和红九军一起赶回阿坝。这时张国焘竟以总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谎称因噶曲河水暴涨，无法过河，决定返

回阿坝；同时要求右路军也改变北上计划，南下回击松潘敌人。

回到阿坝时，得到消息说，中央、军委几位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只带着一、三军团北上了。因为张国焘严密封锁消息，一时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我问朱老总，他说：

“情况一时弄不清楚，我们只有一条，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不是出于必要，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时，张国焘活跃起来，迫不及待地在阿坝召开了“四川省委扩大会议”，把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说成退却逃跑，公然提出南下建立川康革命根据地。朱老总开会回来，说：

“会议开得一团糟，糟透了。”

原来，张国焘在会上要求朱老总明确表态，老总严正地回答：

“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

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在会上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要朱老总同毛泽东划清界线。

朱老总说：“国内外都知道朱毛，朱毛是不可分的。你们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不能把朱毛分开，更可能要朱来反毛。”

“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

老总一字一句地回答他们：

“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有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有些疯狂追随张国焘的人，故意歪曲老总的话，哄闹起来：

“你说北上，又要南下，是个两面派！”

“你既然要跟毛泽东退却逃跑，趁早滚蛋！”

“撤掉他的总司令！”

坐在一边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再也看不下去了，气愤地站起来说：

“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

这些人的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随即又把矛头指向刘伯承，要他表明态度。刘伯承明确表示：拥护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赞成北上。他以红军面临的形势说明，北上的必要和有利，指出南下不会有出路，最后还得北上。

老总忧心忡忡地对我说：

“张国焘把中央、军委北上说成是‘制造分裂’，看来他是要搞分裂了。”

老总又对刘伯承和我说：

“不管他们怎么做，怎么斗我们，我们还是要跟毛泽东干革命、北上抗日，是非总有一天会清楚的。”

张国焘从此加强了对朱老总和刘伯承的打击迫害，并封锁消息。

这个时期，朱老总和刘伯承，因为无事可做，常在一起。听说张国焘派他的亲信黄超到红五军任政治委员，又派李特到九军团煽动大家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朱老总和刘伯承不放心，叫我到这两个部队去看看，了解一下干部的思想情况。

我先到红五军找到吴仲廉，她是我的好朋友，从井冈山上下来长期在一起，先在宣传队，后来又共同领导女子义勇队。她说，还在阿坝时，张国焘就鼓动大家南下。红五军从军长董振堂起，都不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最初许多人都宁愿在左路军受张国焘的气，要求脱离左路军，跟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后来听董振堂传达了朱老总的意见，又听说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都留下了，情绪才慢慢稳住。自从黄超来担任政治委员，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我按照老总的意见，对她说：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和困难，都要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要讲团结，按组织原则办事。要坚信，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特别说，这是总司令对红五军的最大希望。她把这几句话重述了一遍，然后说：

“我一定把总司令的希望转告大家。请你告诉总司令和刘总长放心。”

我又找了几个干部谈话，他们都同吴仲廉说的差不多，没有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

第二天，我又到九军，九军团这时已改为红三十二军。我遇到一个在长征路上认识的姜团长，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热情，把我让到屋里坐，十分关切地问朱总司令的情况。听我说了，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说：

“这我就放心啦！”

然后又愁容满面地告诉我，这几天李特一伙人不断到红九军煽动和拉拢一些人。他十分担心有的领导干部可能要上当。我又把总司令的希望对他讲了一遍。他表示一定把总司令的话告诉大家。

随后我又找了几个干部，他们的态度也很明确，表示和姜团长一样的担心。

回来后，我把这些情况向老总和刘伯承总长作了汇报。两人听了相对笑笑，说今后要继续稳定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多做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工作。

张国焘的卑劣伎俩

张国焘经常披着一件雨衣，走到哪里都是神气十足地把头抬得老高。他身材高大，总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态

看人。我一见他来，就躲开。有一回他把我喊住，问我对红军干部的婚姻有什么看法。没有等我回答，他就讲出他的见解：

“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意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怪论，同旧社会的包办婚姻一样。我不赞成他的办法，又不想同他争论，就捺了捺性子说：

“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部队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捆绑不成夫妻’。”

他坚持那套谬论，还举了两个不伦不类的例子，我转身走开了。

有一天，我从外边回来。朱老总正在同刘伯承说话。刘伯承见我进来就问：

“你这个指导员还当不当？”

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到头，忙问什么意思。

“有人向张国焘告你啦！”

原来，前不久从四方面军给老总派来个公务员。他看不惯供给部奉承张国焘，冷淡总司令，遇到总司令和总政委生活待遇不一样时，他就去争，好几次同张国焘的公务

员闹矛盾。这天上午为一件事，两人几乎打起来，告状的人说：“这都是康指导员不负责任。”

刘总长好心地劝我：

“最好去向张国焘声明一下，免除不必要的误会。”

我一听就有点火，说：“没有必要去声明，矛盾不是我引起的，事情也不是我叫他们干的，没有我这个指导员的事。”

“你不去，万一出了事，就怕你这个指导员下不了台。”他带着开玩笑的语气，却又十分认真地劝我。

“那就由他。反正我不去声明。”

张国焘这个人蛮不讲理，仗势压人，想叫我向他低头，没有门。

他把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司令部合并，把不赞成他的人一个一个调离。刘伯承自然是他的眼中钉，他不同老总商量，更不请示党中央，就擅自宣布撤销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到红军大学任校长。刘伯承征求老总的意见，我才知道。当时两位老总都有点激动。刘伯承说：

“他这样做，一点组织原则也不讲。如果同他闹，反而给他找到借口，看来我只好去了。今天特来向你二位告别。”

朱老总点点头，紧紧握住他的手：

“顾全大局，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想。不论到哪里，都坚持原则，坚持北上抗日的路线，坚持党的统一，坚持做宣传、争取工作，直到把四方面军带到北方，同

党中央汇合。”

刘伯承深情地看着朱老总和我，然后激动地说：

“我们彼此都多加保重吧！”

两人激动得久久地握着双手。

刘伯承走后，跟随朱总司令的人，包括参谋、警卫、公务、运输、饲养人员，连我还有十儿人。张国焘一时不好再对我们采取组织手段，就在伙食上来卡我们。——

一天，我们跟着红三十军的部队过大金川上的一座铁索桥，不知哪个单位的一头骡子，失蹄掉在铁索链子的孔隙里，上不来下不去。骡子四蹄悬空，在嘶叫中挣扎。潘开文带两个人过去帮它，它体躯重大，铁索不住摇晃，几个人差一点掉下去，我连忙制止他们。大家小心翼翼地从小骡子身边过去，那骡子仿佛通点人性，一动不动，看着我们过。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忍痛丢下那可怜的牲口。

过大金川时，已是饥肠辘辘。到了驻地，就准备碗筷，等着通知打饭。可是左等右等，无人通知。小公务员说，他看见许多人到伙房那边去了，他想去看看。我想每次开饭都有通知，没有叫他去。老总坐在靠窗的桌子边看书。这时，小公务员气冲冲地回来说：

“他们吃过饭，一个个都从伙房溜走了，好像怕我们知道似的。伙房里饭菜全吃完了，什么也没有剩下。大师傅说，他们只管按规定做饭，谁吃，他们不管。”

我忙问他：“总政委那边呢？”

他生气地把脚一跺，

“总政委根本没有来，我们上当了。”

听了他的话，大家都沉不住气了，有人发牢骚：

“革命革得连饭都没得吃了！”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凭什么他们自己吃饭，不给总司令吃饭？”贾宋仁说着就往外走。

老总连忙把他拉住：

“大家暂且忍耐一下，我们一顿半顿吃不上饭，还不是常事吗？饿一顿怕什么？”

没有吃上饭，心里又憋气，看看老总，想到他也一样挨饿，大家都不说什么了。

到了晚上，他们搞得更加神秘，等公务员去看时，伙房里不但锅干瓢净，连人也不见一个。老总只好叫潘开文拿出纸笔，给九军团长罗炳辉（他现在是三十二军军长）写了一封信，叫他骑马送去。很快，他带回罗炳辉给的一袋白面。没有锅灶，支起几块石头，用洗脸盆当锅，分几次煮面疙瘩，总算填饱了十几个人的肚子。

老总对我说：

“今后我们要自己起伙。还是你去九军团想想办法，以后就请他们解决我们的粮食吧！”

我到九军团去找姜团长。他听说总司令跟前的人吃不上饭，马上说：

“他们不给总司令饭吃，我们给。宁肯我们不吃，也不

能让总司令挨饿。你们十几个人粮食我们包了。从今天起，你只管到我们团来领粮食吧！”

从此，我隔几天就带着饲养员和骡子从他那里驮回粮食来。虽说我们缺油少盐，总算不再挨饿。

张国焘为了对老总实行封锁，不准机要员给他送电报。一连十来天不看电报，老总是无法忍受的。他天一亮就到张国焘那里要电报看。机要员要去请示张国焘。

“不必了，我自己去找他。”

老总说着，就去推张国焘的房门。

“请你告诉机要员，我来看电报。”

张国焘急忙爬起来，装作惊讶地说：

“怎么？总司令看电报，还要来问我？”随即假惺惺地斥责跟在老总身后的机要员：“你们干什么吃的？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凡是给我看的电报，总司令一样看。真岂有此理！”

机要员委屈地想要辩解，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只答应了声“是！”朱老总就势坐在张国焘办公桌旁边看起来。电报没看完，早饭摆上来，张国焘只好皱着眉头说：“总司令一块吃饭吧！”老总毫不客气地吃起来。

以后，老总每天一早到张国焘那里看电报，遇到电报多，一时看不完，就同张国焘一起吃他那单开的小灶。没有几天，张国焘的随从看着张国焘不愉快的神色，就对朱老总冷言冷语地讥讽起来，甚至说他是“吃白食的司

令”。老总为人宽厚，对于这些只是笑笑，当作没有听见，照常去看电报，碰上开饭就吃。

有一天，小公务员跑来告诉我，有个伤兵要牵走我骑的骡子。我急忙跑去，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伤员，头上缠着绷带，一只膀子用纱布吊着，另一只手抓住骡子缰绳，正在同潘开文、贾守仁几个人争吵。

“老子为革命打仗负伤，你们总司令老婆的骡子，还不能让我骑骑？”

说着就要牵走骡子，贾守仁迎头拦住了他。潘开文看见我：

“好啦！指导员来啦！看指导员怎么说。”

见我三步两步跑过来，那个伤员问：

“你是哪个？”

“我就是你说的总司令的老婆康克清。”

他看着我的装束，听我一说就愣住了。

“你为革命负伤是光荣的。这骡子是组织上分配给我的。你负了伤，我可以让你骑，但是你要把它牵走可不行，因为别的伤员和生病的同志还要骑它。”

他把我又上下打量了一番，知道我说的句句是实，才慢慢地松开手，把缰绳递到我的手里，带着几分歉意地小声说：

“对不起，是我不了解实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老总的马和张国焘的马同拴在一个马厩里。张国焘为自己行动方便，总叫把他的马拴在马厩靠近门口的地方，把朱老总的马拴在里面。这几天，他们放出风声，说“粮食不够吃，要杀马吃”，还说“总部首长的马多，要首先杀首长的马。办法是不管谁的，先从外往里杀，一匹一匹来”。老总的马夫怕他们杀老总的马，天天轮流看着。这天他们发现朱老总的马和骡子全给调换到门口，张国焘的马都拴到里面去了。他们立即回来喊人，潘开文、贾守仁闻声跑去，牵马的人正在同总司令的马夫争吵。

“那是总司令的马，你们怎么能随便拉去杀！”潘开文过去斥责他们。

那几个人根本不买帐。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供给部通知，粮食不够吃，就得先杀首长的马。已经报告过总政委，管你总司令还是总政委的马都得杀。先杀外面的，后杀里面的，遇到哪匹杀哪匹！”

“这样的事你们报告总政委，为什么不报告总司令？杀总司令的马怎能不让总司令知道？”

潘开文严正的质问，使他们答不上话来。潘开文立即回来向老总报告，老总平静地说：

“马最好不要杀，因为行军打仗离不开骑马。他们一定要杀我的马，也只好由他。今天不让他杀，明天还会杀的。没有马，我还可以自己走路嘛。不过，那匹骡子是从井冈山上下来的，到现在一直跟着我的，请他们不要杀。”

“要杀，就得公平合理，张国焘的马比你的多，怎能光杀你的马？”

“这分明是张国焘的主意，就是真的缺粮，也不至于杀首长的马。他们把你的马全换到外面，分明是想把你的马全部杀掉，我去找他讲理！”我忍不住地说。

老总一把拉住我：

“不能去！我们还是要顾全大局。”

老总最好的一匹马，终于被牵走了。

第二天，他们仍然牵总司令的马。第三天他们又来牵马，警卫员贾守仁闻讯跑去制止，他们根本不听。贾守仁一气，冲进张国焘的房里。

“他们前天昨天一连杀了总司令的两匹马，今天又要杀。总政委管不管？”

张国焘装作不知情的样子，哼哼哈哈地说：

“嗯？真有这样的事吗？杀总司令的马，那怎么行？”

他盘算一阵，转身对身边的人说：

“去！告诉他们，不准再胡闹了。要杀总司令的马，我的马也得杀！”

那人跟着贾守仁出来，站在离马厩远远的地方，把手一摆，来牵马的人再不说什么，一个个乖乖地溜走了。

不久，他们又不声不语地撤走了总司令门前的卫兵，而张国焘门前的岗位却未动。我去找他们，回答说：“村口有岗哨警戒，总司令和总政委这边有一处卫兵就够了。”可是

我们同张国焘的住处相距百米开外，还要拐几个弯。

我向老总汇报了这个情况，他不以为然地说：

“没有卫兵不会影响我们干革命。我们刚参加革命那会，不是也没有卫兵吗？还是毛泽东说的对，依靠群众，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他们撤去卫兵，我的行动岂不更自由了吗？”

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我说：

“那我们就要自己加强警戒。我看张国焘还会使出别的坏点子来。”

老总没再说话。

搭救廖承志

张国焘把凡是同他意见不一致的知识分子，都看作靠不住的人。他说，知识分子比工农分子危险，因为他们知识多、办法多。平时，他见谁上衣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或者戴着眼镜，就会皱起眉头，认为这是不可靠的标志。凡是感到不顺眼的知识分子，总要找借口整你。

红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拥护北上，反对南下，张国焘就怀恨在心，借故免去了他的职务，调到总部任作战局长。有一次他把中央红军攻占腊子口，过了六盘山，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告诉了张宗逊、郭天民：“你们放心，我们迟早要北上同党中央、毛泽东会合的。”张国焘得知后，

马上把他关押起来，要严加惩办。在这危急关头，朱老总得知，忙对张国焘说：“曹里怀从井冈山就跟我们在一起，只说了那么几句话，你就要杀了他，以后谁还敢讲话？”张国焘无言以对。曹里怀虽免遭毒手，但张国焘还是开除了他的党籍。直到四方面军北上，才恢复了曹里怀的党籍。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随总司令部一起到了左路军。他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被张国焘视为眼中钉。张国焘派人搜查他的住处，未能抓到什么把柄，又骗他说：“朱老总有病，要你赶快去。”所幸贺诚对他一直抱有警惕，坚持要有朱老总的亲笔信，才能行动，没有上当。

张国焘对工农出身的干部同样残暴。彭绍辉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他拥护北上，反对南下，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总司令。信在半路给张国焘的亲信截去。张国焘通知他来谈话，刚一进门就挨了一个耳光，接着张的亲信用驳壳枪顶住他的胸口，大声呵斥：

“你为什么反对南下？……”朱老总正在那里开会，见此情景，气愤地上前夺过驳壳枪，严厉地说：

“这是党的会议，是说理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打人？用枪口逼人还叫什么谈话？”

然后转身对彭绍辉说：

“你回去吧！”

彭绍辉转身就走，张国焘和他的亲信们在总司令面前，无话可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彭绍辉离去。

解放后，见到彭绍辉同志和他的家属，谈起长征途中与张国焘的斗争，他还念念不忘朱老总救了他一命。

朱老总听说，廖承志到四方面军后，被张国焘扣押，同他在一起的还有几个知识分子党员。朱老总叫我设法打听打听，最好能找到他们。他说：

“这些人都是党和红军需要的人材。廖承志将来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一定要设法保护他们。”

我考虑，不能公开去打听，还是用过去收容掉队人员的办法，放慢脚步，从队头到队尾慢慢察看。被扣押的人一般总是随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后边。

我走得很慢，一直落到部队的最后面。一天当中，也没有看见被扣押的人员。廖承志他们我都不认识，只能从迹象上判断。第二天我继续观察。不料第三天就引起张国焘亲信的怀疑，厉声问我：

“为什么老是向后面跑？”

“走不动，还不许走慢一点？”

“看你每天晚上向前面赶队，可一点不像走不动的样子。”

因为一时粗心，我被他们怀疑了。这天刚到宿营地，他们就通知我到四方面军保卫局听讯。老总不放心，叫潘开文远远地跟着，看清楚地方，准备我万一回不来，好向张国焘去交涉。他们带我走进一座喇嘛庙，叫我坐在那里等着。这晚月光分外明亮，屋里屋外都能看清楚。只见有个

戴眼镜的人在那边踱步，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可能就是老总叫我找的人。可是我无法接近他。正当这时，听见楼梯响，我急忙跑回原处坐好。带我来的那个人对我说：

“保卫局现在正忙，没有时间同你谈话，你先回去，随时等候传讯！”

路上潘开文接着我，问我怎样了，我说：“没有事，他们说以后还要找我。”

后来，在行军途中，听到有人在悄悄议论，软禁的人员中有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等。我赶紧将这一情况向朱老总汇报。没有多久，朱老总就正式向张国焘提出这一问题，开始张国焘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事。经朱老总再三追问，他才说：

“有些事下面不报告，我就常常不知道，待我查了再说。”

“这是有根有据的事。廖承志等人确实扣押在你那个保卫局，有人亲眼见到的。这几个人的安全你一定得负责。”

朱老总斩钉截铁的话，使他无法推卸责任。最后只能表示：一定认真去查，若有此事，一定保证这几个人的安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确定北上陕甘后，廖承志等人才被陆续释放出来。我第一次见到廖承志是在道孚，那次张琴秋组织文娱晚会，李伯钊、廖承志、朱光等都参加了演出。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丝毫没有陌生感。特别是廖承志开朗、

幽默的性格，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连我也不放过

我的几次行动，虽然没有被他们抓住，但是张国焘对我产生了怀疑。他开始对我下手了。

我为了弄粮食，每隔三五天就要到九军团去找姜团长。每一次他都热情接待帮助。可是这一次我到那里情况就不同了。见到的人都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问姜团长在哪里？都说不知道。最后，团部通讯员对我说：

“团长不知道哪里去了，已经有两天见不到他。”

我担心他被张国焘抓起来。他不在，粮食找谁去弄？团里的副团长，我不认识，我每次来，他从不露面，现在去找他，恐怕也无用。

我只好空着手回来。老总听了我的述说，劝慰说：

“这才是斗争哪！看来我们得另找地方打食了。”

这时传出了一股风，说康克清是朱德的情报员，她同朱德在一起起不了好作用，应当趁早把他们二人分开……等等。

不几天下来调令，调我到四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去工作，还派一个女同志“陪伴”，实际是为了监视我的行动，幸好我和那位同志团结得很好。四方面军党校离总司令相距二十来里。

我拿着调令，气愤地对老总说：

“我打算一个人北上，向党中央报告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

“这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

“顺着咱们走过的路，往回走，一路打听，没有找不到的。”

我想到了路上的种种困难，但也充满信心。因为当时听说，九军团无线电台的刘排长留在贵州养病，病好后，顺着红军走过的路，单身一人化装成老百姓，沿途给人打零工，艰苦跋涉二千多里，闯过敌人无数道岗哨盘查，终于在川西天全县追上红军，回到原部队。

老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现在情况和那时的中央红军大不相同，你在这里有群众在一起，有我在，他们不能对你如何。你若单独一人行动，正好给他们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你头上。这些你还没有想到吧？”

他的话使我认识到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简单。到四方面军妇委后，虽说同老总分开了，却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了解更多的情况，向他们进行工作，使更多的人认识北上的正确，认识张国焘的错误。我接受了老总的意见，把解决粮食问题的责任交给了潘开文。总部指导员的工作，他们早已不让我干了，也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就单身一人到四方面军妇委报到了。

我到了四方面军妇委首先见到张琴秋，她很热情，使我感到温暖。北上、南下之争，大家都避而不谈。我除了行军、做群众工作，就是看书学习。同大家渐渐熟悉了，彼此犹如一家人，无话不谈。专来“陪伴”我的肖朝英，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她悄悄对我说，她是上级派来专门监视我的；还叫她见机行事，缴下我的短枪。她听人说我带过兵，打过仗，枪法又好，一直不敢动手。经过这一段接触，感到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更不该缴我的枪，她决心不那么做了。她问我：

“假如当初我动手缴你的枪，你会怎么办？”

我立即严肃地说：

“我是个革命军人，枪是上级交给我防身自卫，同敌人作战用的，是我的第二生命。没有上级的命令，谁也休想从我这里把枪拿走。”

“如果我一定要缴你的枪呢？”

我把腰里的短枪一拍，认真地说：

“那这支枪可就不客气了。”

她听了我的话，悄声说：

“幸亏我多了个心眼，没那么做。要是傻里傻气地听了他们的话，说不定会挨你一枪哩！”

我在四方面军妇委接触的人多了，渐渐发现四方面军许多人都不赞成张国焘南下这种分裂党的做法，又都惧怕张国焘的残暴，不敢轻易表露心里话。由此，我感到老总

所讲“积极努力，耐心等待”的方针是很有眼光的。

妇委的同志们都对我很关心，每到星期六，总是催我早些回去。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老总，老总也不断告诉我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中央红军又打了胜仗，二、六军团到了什么地方等等。每次回去，我总要了解一下老总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况，嘱咐潘开文、贾守仁几个人注意警卫安全，防止可能出现的事。

一九三五年秋，四方面军南下到绥靖、懋功一带，四川军阀调集重兵堵截。面对严重的军事形势，朱老总积极负起了红军总司令的责任，同徐向前一起研究对付措施。我问他：

“我们反对南下，这样做，岂不是支持他（张国焘）的错误吗？”

“为了实现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我必须带领左路军和整个四方面军北上。这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做到。现在整个部队已经南下到这里，就必须打开局面，求得一块暂时立足的地方，然后才好去做四方面军和张国焘的工作，争取和团结他们北上，同党中央会合。”

我明白了老总的意思想。可是要打仗，却没有饭吃。早晨起床，没有粮食做饭。潘开文赶紧外出告急，搞来了一些粮食。老总上前方指挥打仗，我仍然回到妇委。

这年十月间，朱老总和徐向前共同指挥了懋功和天全、芦山地区的两次战役，共毙伤俘敌军一万三千余人，其中

俘虏五千多人，还打落敌机一架，控制了一大片地区。

就在这时，张国焘发现我每周到老总那里去，他下令：

“康克清是有错误的人，调她到妇女运动委员会，就是要把她同朱德分开。以后再也不准她到朱德那里去。”

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只好听从。我不能回去，老总就派潘开文或是贾守仁每星期来看我，给我带点东西。

两个战役的胜利，使张国焘的头脑无限地膨胀了，认为是他南下正确的最好证明，认为四川军阀加上蒋介石的中央军都不是他的对手。“打到成都吃大米！”眼看就能实现。他武断地坚持一直打到成都。结果，在以重大伤亡的代价，攻下名山东北的百丈镇后，敌人援军已到。他们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北、东、南三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反扑。红军英勇顽强，前赴后继，打了七天七夜，伤亡近万人，最后被迫撤出了百丈镇。不久，又在南线峡口，遭到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重兵攻击，受到惨重损失。

两次战斗的严重损失，加上南下行军作战的减员，使四方面军从阿坝南下时的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多人。敌人又以优于红军数倍的兵力，步步紧逼。四方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这时，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开会，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四方面军的许多领导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很受鼓舞，大家都认为全党、全

军应当在党的新策略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共产国际派到党中央的代表张浩（林育英）给四方面军发来电报。表示“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要求四方面军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朱老总、徐向前乘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劝他取消伪“中央”。为便于他下台阶，大家提出一个过渡办法：取消伪“中央”后，先成立西南局，暂归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领导，同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样就为张国焘留了一点面子。他表示接受，同意北上。这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初了。

战 胜 死 亡

在百丈镇苦战前后，我感到不舒服。浑身无力，不久就发高烧，几天不退。医生诊断说是得了副伤寒，是十分危险的疾病。红军长征途中，不少人被它夺去了生命。

从张国焘命令不准我再到朱老总那里去以后，他们就对我严格管制起来，只准肖朝英一个人来照看我。四方面军副秘书长刘少文见我病重，打算在行军途中把我一个人安置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我发高烧到摄氏四十度，处于半昏迷状态。肖朝英见我病成这样，怕出意外，不顾上面给她的禁令，牵出一匹马，骑上就跑，一口气跑到总司令的驻地。老总知道了我的病情，立即带着医生和警卫员飞奔前来。老总等医生给我看过病，打完仅有的一支退烧针后，

十分严厉地对刘少文说：

“她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工作，生了病，你们就要把她留下不要了。还瞒住我这个总司令，是对待革命同志的态度吗？”

刘少文无言可答。

老总接着说：

“她病得这样重，决不能留在老百姓家里。不能留下！谁还能不生病？生病不能走，用担架抬起走。”

肖朝英看刘少文不说话，赌气说：

“我们女同志抬，拼着性命也要把她抬走。”

老总决定把潘开文留下专门照看我，并把他们骑来的马留下一匹，以防不测。肖朝英找来几个女同志一起照料我，并准备由她们来抬担架。在行军之前，刘少文派来一副担架。第二天行军，我退了烧，身上轻松多了，不愿让人抬，一定要下来自己走，争执一番，还是按潘开文的意思改为骑马。开始还觉得很好，后来走来转去，不知什么原故，一看见水，不论是河水，还是山里的小溪，就浑身打战，得赶紧闭上眼睛。晚上，在离夹金山不远的地方宿营，又发起高烧来，因为没有退烧针，医生想了好一阵才说，可以试试用冷敷退烧。肖朝英她们找来许多毛巾，浸过冷水，轮流给我做周身冷敷。直到天亮，果然烧退了。第二天继续行军，大家不让我再骑马，只好睡在担架上。正走在山道上，敌人飞机来了，大家找低洼的山沟躲避，担

架下不去。潘开文要扶我躲到沟里，我坚持不去，说：

“我下去了也难以上来，一个人躲在这里，敌人不容易发现。你快把牲口牵到沟里去，免得被敌机发现。”

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把马牵走。我仰面躺在担架上，听着敌机俯冲、扫射、轰炸的声音，土地不停地震动。敌机好几次在头顶飞过，大概我们是在山的阴影里，未被敌机发现。等敌机飞走，我们继续赶路，不久就开始翻越夹金山。

过夹金山，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进入雪山区域，山势渐渐陡起来，担架抬不上去，按照前几次的经验，我走下担架，由潘开文帮忙拽住那匹马的尾巴，用一条绑腿把我的手和马尾巴紧紧地拴在一起。我这时身体虚弱，只觉得头重脚轻，昏昏沉沉，跌跌撞撞，高一脚，浅一脚，全靠马在前面拽，他们在后面推。不知走了多久，才爬到山顶。他们几个人为了照顾我，走得很慢。下山后，我们掉队了。有人告诉老总，老总说：

“她不是一个人，有那么多人照顾她。大家翻雪山，都很累，由他们自己走吧！”

到了懋功，我的病好了一些，高山反应也消失了。李伯钊来看我。我这时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她哭着跑上来把我抱住，我也紧紧地抱住她，两人都很激动。在张国焘的淫威迫害下，我们各自都有艰难的处境。

四方面军的情况不断向好的方面发展，张国焘已不敢

再肆无忌惮地对待老总。为了照顾我的病，老总叫我回去同他住在一起。肖朝英几个人一直把我送到总司令部，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接着，要过党岭山，它又高又大，远远就看见它那雪白的山峰衬托在蓝天之中。因为一定要在中午前翻过山顶，所以爬山分作两天。头一天下午出发，到半山腰过夜，那里是冰雪世界，大家分别住在一个个不大的牛皮帐篷里，每个帐篷里都挤得满满的。我和老总同潘开文、贾守仁、公务员七八个人挤在一起，虽说拥挤，却能抵挡寒冷。夜里狂风夹着大雪，滴水成冰。老总几次提醒，叫把帐篷再加固一点。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全靠白雪的映照，才能看出物体的轮廓。我提着马灯，他们几个冒着风雪把帐篷再一次加固。然后弄掉帐篷上和周围的积雪。弄完这些，每人仿佛都成冰人了，钻进低矮而暖和的牛皮帐篷里，真像进了天堂一样舒服。第二天继续爬山。这时雪停了。阳光下的白雪闪光刺目，叫人不敢睁大眼睛。许多地方雪深没膝，人马走出一条雪的壕沟，沿着壕沟走倒也省力，但是高山空气稀薄，每走一步，都觉气喘。好在是盘山道，不像夹金山那么陡峭。我的身体已进入康复期，拽着马尾巴走，也不像以前那么吃力，在周围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翻过了长征路上最高的党岭山。

到道孚后，我的病已完全好了。我被分配到四方面军党校任总支部书记。党校校长刘希文、教育长黄火青都对

我表示欢迎。黄火青原是九军团政治委员，因为反对张国焘，被调到党校工作。

我在重病之后，眼窝下陷，身体瘦弱，许多熟人看见，都认不出我了。大家劝我多吃营养品。藏族地区主副食就是牛羊肉和糌粑，糌粑也是牛油做的。我从小不吃牛羊肉，闻见膻味就犯恶心。黄火青劝我：

“你不吃这些怎么成？在这藏民区不吃这些就等于自杀，因为很难找到别的东西吃，你的身体难以复原，也难以支撑下去。就是勉强维持，北上几千里路，雪山草地，也难过去。所以你一定要学着吃，把它当成革命任务，不但能吃，而且要多吃，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

他的话打动了，使我感到非吃不可了。不吃，怎么能北上，怎么继续干革命？别人能吃，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于是我强迫自己吃，从开始只吃一点到逐渐多吃，终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和大家一样地吃羊肉、牛肉，吃酥油糌粑，也不再觉得膻味恶心了。我的身体也很快好转，几个月后，已恢复到和长征初期差不多了。

党校随总部到炉霍，我叫潘开文仍回到老总身边。刘希文见我身边没有人，叫我到红九军二十九师司号连挑选一个照料我的“小鬼”。我很久没有到连队去了，这次见到许多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感到非常兴奋，像回到家里一样高兴。在司号连逗留了半天，我挑选了聪明能干的小赵科。

迎接二、六军团

位于湘鄂川黔边的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突围后，沿着中央红军经过贵州、云南的路线，开始了长征。他们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的率领下，一路上不断打破蒋介石军队的堵截追击，正在向甘孜地区前进，准备同四方面军会师。

朱老总告诉我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当大家都听到这个消息后，一致想到我们拿什么来欢迎二、六军团的兄弟呢？战士们仅有的一点称得上纪念品的东西，都先后送给了贵州的“干人”和四方面军的兄弟，可说什么也没有了。

第二天朱老总把这件事布置下去，叫大家献计献策。人多智慧多，很快就提出了几十种办法，经过朱老总和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用本地特产的羊毛纺成线，每人织成一件羊毛衣、裤……，送给二、六军团每人一件。这样既表现了兄弟间的革命情谊，也是北上时的御寒衣服。

领到供给部从藏民购来的羊毛，又脏又黑，粘成一团。夹着羊粪、草叶、树枝、泥块，散发出腥膻气味，用手一扯，灰尘腾起。我出去找人请教，到了老总那里，看见潘开文、贾守仁几个人正在晾晒雪白的羊毛。经过询问，原来他们先用水煮掉羊毛的油腻，再用柴草灰滤过的清水反复搓洗，杂物灰土没有了，腥臭味去掉了，再把羊毛抖开，

放在阳光下晒，雪白松软的羊毛就出来了。我回来告诉大家照样做，不到两天工夫，肮脏的羊毛疙瘩全变成了洁白如雪的羊毛。

又遇到纺毛线的问题，就去请教藏族房东家的小姑娘。她拿来一个用羊骨头做的捻锤和一根树条，先把羊毛均匀地摊开，把树条放在中间，卷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羊毛条子。在条子一头搓出线头，系在捻锤上，再一捻，捻锤转起来，就从羊毛条子上抽出细细的白毛线。这同我们在家里捻棉线的办法差不多，只是一根毛线抵上十几根棉线那么粗。大家立即动手制造捻锤，有用木头削的，有用羊骨头、牛骨头做的，也有用小石头块刻磨的……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

捻毛线也是个技术，因为毛线不能捻得像棉线那样细，要掌握粗细均匀很不容易。妇女排许多人捻了半天，都是粗细不匀；有些急性子的就把毛线拽断重捻，结果废线头堆了一堆，还是不行。正巧，朱老总来检查进展情况，就把如何掌握捻毛线的要领讲给大家听。他从肖朝英手里接过毛条和捻锤，当场表演。他的动作轻巧熟练，捻出的毛线粗细均匀。大家想不到总司令竟是个捻线能手。

“快来看，总司令的线捻得多好啊！”

是谁一声吆喝，马上围来许多人。总司令放下捻锤，取下毛线交给大家传看，大家都赞不绝口。有人咂着嘴说：“这线，说是机器纺的线，也会叫人相信。”我后来问他，才

知道他从小在家里就捻过毛线。

半个月时间，松软的羊毛变成了一团团缠绕整齐的洁白毛线球。下一步要编织了。妇女排里不少人会打毛线衣，就成了大家的老师。不分男女同志，每人都抱着毛线球，用竹针一针一线地编织，夜深人静还能听见竹针打毛线的声音。那个藏族小姑娘跟着我们也学会了织毛衣。

不久，一件件洁白的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子……都打好了。每人至少有了一件礼品。

五月，红军总部移驻甘孜，准备在这里迎接二、六军团。口号是：

“迎接二、六军团！”“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二、六军团的主力到达甘孜。七月一日，在甘孜附近的一个大草滩上，举行“欢迎二、六军团，庆祝四方面军同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大会。我们每人都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高唱着欢迎二、六军团的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会场。当二、六军团的同志来到时，会场上响起了欢呼的口号声。大会开始，朱老总讲话，他特别强调：

“我们庆祝会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的目的是北上到陕北党中央那里。我们要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战胜一切困难，到达陕北。”

接着贺龙讲话，他表示完全拥护朱总司令的讲话，号召二、六军团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克服一切困难，同

四方面军共同完成到达陕北，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的光荣任务。

张国焘沉默不语，他显然对两人的讲话不满意。但是今非昔比，他不敢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

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赠送礼物。先把队伍分行作了插花调整，我们每人都面对一位二、六军团的同志，然后一声号令，大家都掏出早已织好的毛衣、毛裤、毛手套、毛袜子……送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他们接过礼品，激动万分，连连地说：

“太好了，太谢谢了，你们怎么想得这么周到？”

有的人翻过来掉过去地看，有的当场穿上，高兴地叫别人看：

“真合适，就像专门为我打的。”穿了又脱下来，怕弄脏了。

他们也有不少人拿出珍藏的小礼品，送给我们。有的手里没有东西，有些不好意思，我对他们说：

“这没有什么，今天是四方面军的同志欢迎二、六军团，不是交换礼品。”

在我们将要动身北上前，七月二日在甘孜举行了二、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会。这是一次为北上统一思想的重要会议。事后听说，会上对张国焘开展了严厉的批评。老总说：

“任弼时有思想水平，敢说敢干，一下就打中了张国焘的要害，使张国焘难以反驳。张国焘主持会议，神色很不

自然。看到大家都同意任弼时和我的意见，只好宣布会后立即北上。”

老总高兴，我也感到高兴。经过近一年的斗争，终于扭转了千军万马跳进深渊的危险局面。这是多么不容易呀！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代价真是太大了。

到 达 陕 北

就要开始北上了，老总征求我的意见，是不是跟他一块走。

“我的工作岗位在四方面军党校，当然应当随四方面军党校行动。过去我跟着总部行动，因为那时我是总部的指导员。”

他同意我的意见。

七月三日，朱总带着左路纵队出发。我们党校也随着后卫支队出发了。经过一年之久的曲折，终于实现了北上，整个队伍精神抖擞，服装整齐。大家高兴地唱起歌来。

红二、四方面军好英勇，
北上抗日下决心，
胜利向前进。

.....

这次行军，有了前两次过雪山草地的经验，又经过一番准备，开头几天比较顺利。最困难的还是没有粮食。出发时每人发六七斤青稞，自己设法磨成面。从甘孜到走出草地至少要个把月，六七斤炒面，省着吃最多也只能顶半个月。许多人未到草地，粮袋已空了。挖野菜吃，走在前边的还可以，后面的就越来越困难。

大家忍饥挨饿，依然充满革命的乐观情绪，依然彼此关怀。途中我们也遇到过前面部队留下来供后面部队食用的牛羊，想到后面还有一万多人的二方面军，除一小部分供给伤病员食用外，其余大部分都留给了后面的部队。

在卓克基、毛儿盖一带，遇到了藏民骑兵，我们叫他们蛮子骑兵，是藏族反动头人的武装，专门袭击红军。有一座小山，我们正要从那里通过，突然从山后窜出三百来个蛮子骑兵，狂叫着冲过来，见我们举刀就砍。正在危急时刻，红军部队上来了。赶跑了蛮子骑兵。这一次敌人丢下被打死打伤的战马二三十匹，我们立即全部宰了，大家饱餐了一顿马肉，又把剩下的带在路上吃，解决了眼前困难。但是马肉有限，很快就吃完了。

吃粮越来越少，我们在草地上行进越来越慢。有一天在一块高坎的干地上宿营，夜里，狂风裹着雨雪，吹开了挡雨的油布，吹翻了牛皮帐篷，每人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冷得发抖。天亮雨雪过去，找来柴草烘火取暖，换下湿衣，又向前赶路。这时我感到头重脚轻，担心再次病倒，忽然发

现平时紧跟我的小赵科不见了。问身边的人，都说不知道。有人说，他好像不舒服，掉队了。我急忙带两个身体强壮的同志往回找。走了好几里路，才发现赵科趴在一块离昨夜宿营地不远的草地上。喊他不答应，摸摸他的头，热得烫手。几个人把他抬到一块干地上，把仅有的一点酥油炒面和水给他喝下去。他是饿昏了。几个人轮流背他，一直到他醒过来，原来他已经三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他一直在咬牙坚持。

回想长征二万五千里，无数艰难险阻，最严酷的还是过草地。饥饿和疾病是红军遇到的最大困难和威胁，许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那里倒了下去，长眠在那里。

我带领的这一部分女同志人数不多，大家紧密团结，互相帮助，终于战胜困难，走出了草地。当我们回头看看想想那段艰辛的经历，许多人在惊叹之余，止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们党校到达洮州时，听说李伯钊生了重病，高烧不退，还大口大口吐血。我急忙跑去看她。她过草地时就不舒服，一到甘南就再也支持不住，躺倒了。她已好几天不吃东西，两眼深陷，简直叫我不敢认。她一见我，泪如泉涌，用那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抓住我的手说：

“克清！我活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若是不行了，请把我抬到陕北，我一定要回到陕北党中央去！”

她的话使我激动得流下热泪，两人又一次紧紧地抱在

一起。我边哭边对她说：

“你一定能活着回到党中央去！”

她在张国焘的强大压力下，曾写过几支歌颂南下的歌。后来认清了张国焘的真实面目，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北上方针。她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这个决心，我明白她的心迹。在长征路上，她像亲姐妹一样帮助过我，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这时站在一旁的傅连璋医生，也被我们两人的话感动了。他说：

“你们放心，我一定尽一切努力挽救伯钊的生命。这是我保留的一支退烧针，现在就给她打上，只要能退烧，就有希望……”

我激动得再三向他表示感谢。看着他打完针，等伯钊渐渐睡着了，才轻轻掰开她攥着我的手。几个小时以后，傅医生高兴地告诉我。

“伯钊烧退啦！有希望啦！”

到甘南后，不断地移动行军，时间紧迫，没有机会见到老总。到了九月，行军的方向突然改为向南、向西走，整整走了一天，大家起了疑心。第二天还是向西、向南，许多人忍不住议论开了：

“说是北上，怎么又朝南去？是不是要走回头路，爬雪山、过草地？”

“要是那样，我可不去了。”

“南下分明是死路，要去找死吗？”

.....

行军的劲头迅速消失。前面的不想走，后面的不愿走，走不多远就停下休息，坐的坐，躺的躺。行军号响了半天，再三催促，一个个才懒洋洋地站起来，走不到一里路，又坐下休息。这样走了一天，还没走几里路。有人大声喊叫：

“要是再过草地，我死也不去！”

正在这里时接到命令，不再西行，回师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全军上下一片吹呼。原来先头部队到达黄河边后，发现河对岸高原上已经大雪封山，气候寒冷，河宽流急，渡河极其困难，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一方面军和二方面军终于先后会师了。接着打了一个胜仗，在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一个旅又两个团。

朱老总完成了在四方面军的任务后，率领红军总司令部回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会合。毛泽东亲自带领许多领导同志出来迎接朱老总。他对朱老总在四方面军的功绩给了很高评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钢”。

当我带着赵科向保安行进途中，遇见陈赓。他认出是我，老远就叫起来：

“康克清同志，一年没见你，真把我们都想坏啦。你怎么一个人先回来？总司令被你丢到哪里去啦？”

说着，来到面前，跳下马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是个最

爱说笑的人。我笑着问他党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可好，告诉他总司令已经到了保安，我因在四方面军党校，晚走几天，现在也要到保安去。他听了笑着说：

“欢迎！现在你来到我的防地，就要听我的安排。先跟我去吃一顿饭，请你吃香喷喷的羊肉，然后我派人派牲口送你到保安。”

他的盛情难却，又赶上吃饭的时间，就到他那里吃一顿午餐。

几天后，我们来到保安——当时中国革命的心脏。进城后，首先看到周恩来，他在长征路上生了一场大病，病已好了，人显得清瘦。接着又看到蔡畅、李富春。久别重逢，都觉得格外亲热。他们把我带到老总住的地方，那是在岩石上开凿、里面用石板分作里外间的两孔窑洞。第一次住进窑洞，使我感到新鲜，同时感到到了这里，才是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党中央。这是我们为之百般奋斗、梦寐以求要达到的目的地，现在终于到达了。

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底。

第六章

凤凰山下

从保安到延安

保安县是个穷地方。在红军来到前，县城破破烂烂，只有七八十户人家。当地有个民谣：

保安穷山窝，
破庙比房多，
菩萨比人多。

这里的庙有财神庙、老爷庙、文阁庙、药王庙、城隍庙……真是不少。我到保安时，几乎所有的庙都被红军占用。他们来了不到半年，把这个小小的残破县城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上、石崖上书写大字标语，街道上贴着红红绿绿的彩纸标语：

“庆祝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胜利万岁!”

“一、二、四方面军铁的团结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万岁!”

“……”

看着这些标语，我心情十分激动。伟大的长征胜利了，它是以几十万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该是多么深刻！我们终于有了统一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去进行新的战斗。

在保安见到许多熟人。相隔一年多，久别重逢，彼此都急于知道对方的一些情况。不论同谁见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这时，张国焘也来到了保安。党中央几次催他到中央军委就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老总也不断去电报。他已别无它途，只好委托陈昌浩照管四方面军，自己到党中央来。他住在我们旁边不远的窑洞里，出门经常碰面。想到他干的那些坏事，我实在不愿同他搭话。老总批评我：

“你应当学会团结人，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对他记仇。要学会以德报怨。他现在能回到中央来，已经很难了。”

我有点不服气，说：

“难道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党、给红军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就白白算了？”

老总拿博古、李德作比：“他们在中央苏区所犯错误，给红军和革命造成的损失，不比张国焘还要大吗？我们还

是照样团结他们。”

我觉得他说的虽有理，但是对张国焘这样的人讲团结，我在感情上还是难以通过。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红军大学举行大会，欢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治委员。这是对红军总司令部胜利到达的祝贺，也是团结争取张国焘的一个行动。我也跟着一起去了，顺便也想看看红大。

朱老总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简要地讲了左路军、四方面军南下又北上的经过；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又对他最终取消“第二中央”，率队北上，回到党中央给予了肯定。他最后说：

“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应当拥护党中央的路线，维护群众的利益，准备担负起当前的历史任务。”这是对红大学员的希望，也是对张国焘的规劝和希望。张国焘讲话只讲四方面军能征善战，对自己的错误只字不提。他的讲话很叫人失望。直到他讲完，会场上才响起稀稀落落的几下掌声。

这一天，第一次听到红军大学校歌，特别动情，这大概是因为我上过红军学校的原故。歌词是：

“红大同志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干部决定一切，

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致要团结。

工作紧张、生活活泼，

严肃纪律，努力前进，

我为全国红军的精范，

武装上前线。

.....

据说歌词是成仿吾写的。我被红大那种奋发豪放的气氛激动了，再次产生了学习的愿望。我向老总提出，我希望到红大学习。老总说：

“这一期都快学完了，你参加第二期学习吧！不过你要是急于学习，也可以先去旁听。”后来，我同红大教育长罗瑞卿说好，每逢有重要的讲课报告，我就前去旁听。

一天晚上，老总回来很晚，我们都早已睡了，大约是午夜十二点钟。老总叫醒我，高兴地说：

“蒋介石给捉住了！”

“真的？是被红军捉住的吗？”

我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服，着急地问。

“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抓起来了。是敌人广播和我军情报得到的可靠消息。”

我静静地听老总讲述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被活捉的经过。老总接着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已通电全国，提出抗日

救亡的主张，并把同红军对峙的部队全部撤了回去。党中央马上要开会研究，准备派人同他们联系。

这个意外的大好消息使我兴奋得再也不想睡了。

“用不着你这样着急，我想先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好？”

我说：

“这个坏家伙，既然抓住了，可不能再给他跑掉。”

老总沉思不语。我最担心的就是放走蒋介石，连忙补充说：

“这个人，我们上过他多少当，吃过多大亏，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嘛。这次可千万别把他放了！”

老总等我把话说完，严肃地看着我，郑重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这是个关系全国，甚至关系世界的大事，一定要十分慎重地处理。反共亲日派正在调动大军准备向西安进攻，日本人正在巴望我们打起全面内战。照我看，蒋介石非但不能杀，恐怕还要放。”

一听说要放，我就急了。我说：

“‘活捉蒋介石！’这口号我们喊了好多年，好不容易捉到了，要是放了他，全国老百姓、全体红军都会反对。”

老总笑了，然后说：

“这是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情况很复杂。蒋介石是人家抓住的，估计他们会同我们商议。对这事决不能光凭

一时痛快，要统观全局，要有战略眼光。群众中许多人往往看不到全局和长远，需要有英明的领导来正确地把握局势。我们再不能像五次反“围剿”时，‘左’倾领导那样蛮干了。”

他的话使我冷静下来，“左”倾路线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不能不作深一层的思考。

第二天，西安事变的消息飞速传遍了保安城，人们都兴奋地议论着，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我的想法一样，不能放走蒋介石，不少人主张开一个大规模的公审大会，由群众民主讨论怎样处置他。这段时间里，西安事变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话题。各种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得十分快，大家知道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到西安去了。后来听说蒋介石的老婆宋美龄和他的顾问美国人端纳、宋美龄的弟弟宋子文也到了西安。形势更加复杂，大家担心蒋介石被放走。后来经过一番形势教育，渐渐知道从全国大局着眼。“放”比“杀”好，反对放的意见渐渐少了。

正如老总最初所估计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不过群众仍有疑虑，他们说：“放虎归山，必有后患。”这也是我那次同老总争论时的想法。

一九三九年的元旦十分愉快地度过了。过了年就准备向延安搬家。这是西安事变带来的一个结果。

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机关单位，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起，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朱

老总率领红军总部一部分人和部队打前站，提前一天出发。我也跟随同行。我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延安各界到兰家坪、杨家湾迎接毛泽东率领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欢迎队伍从大砭沟一直排到延安北门，鞭炮齐鸣，唢呐嘹亮，锣鼓喧天，口号声、欢呼声几里外都可以听到。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大会”。毛主席、朱老总都讲了话，受到热烈欢迎。

延安在陕北是个大县，县城也不过几千人口。大约是由于战争影响，市面上虽有几十家店铺在营业，但除红军外，见到的市民不多；临街大多是瓦房，杂有一部分草房，黄土崖下全是窑洞；街道坑洼不平。敌人的反共标语已被覆盖，到处是红红绿绿欢迎党中央的标语。人们含笑相见，是红军给延安带来了新生。

我们住到延安城北面凤凰山下的凤凰村。凤凰山气势挺拔，在延安城的西南方，从顶峰向南北伸出两条高大的山梁，好像一只巨大的金凤凰展开双翅，这就是它的名字由来。延安城从北门到南门，都顺着曲折连绵的凤凰山麓修建。凤凰村就在金凤凰向北伸出的翅膀尖上。这里自然条件比保安好，特别是用水方便，不像在保安，连洗脸水都要省着用，所以一住下来，每人都用热水洗了个痛快的澡。

会见斯诺夫人

在凤凰山住下不久，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来了。她经历坎坷，同情关心被压迫的亚洲人民。一九二九年，当她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后，思想感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她说：

“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

她来陕北之前，已听到不少关于“朱毛”的传说，特别是朱德传奇色彩的经历，更使她感到兴趣。她在陕北作了一些了解后，就要求见总司令。一见面，就提出要给老总写一本传记。

“你是个农民，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说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口了。”她把朱德看作中国的一位民族英雄。

老总像他平日为人一样，谦和地对她说：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红军指挥员。我们红军、共产党里可以写的英雄人物多得很。你不必写我，建议你还是写写他们吧！”

史沫特莱接受了老总的建议，在我们的住处吃了饭，就出发去红军部队。她在各地跑了两个月。当她回到凤凰山

后，仍坚持要给朱老总写一部传记。她说：

“我在采访了许多人，他们的言谈使我感到更有必要把你写出来。因为只有你才能代表红军，你就是红军的化身。这一点没有他人能比得上你。写了你就写了整个红军，也就写了这一段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一定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能不能请你抽出时间，同我详细谈谈你的经历？”

若不答应，她不会干休。老总只好答应从三月份开始，只要有空，就同她谈自己的经历。一直谈到五月，她在一次骑马时摔伤难以走动，才暂时告一段落。她除了听老总谈，还找许多人了解老总的情况。她也找我谈过，这时我已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她问了我一些个人的身世，主要是通过我了解老总。

四月里，又一名美国女记者来到延安。她就是一九三六年到过陕北的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她知道史沫特莱正在向老总采访，就把目标转向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忙对她说，我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像我这样普通的红军战士多得很，女同志也很多，四方面军就有一个上千人的女子先锋团，还有蔡畅、邓颖超……许多老大姐，经历都比我丰富，还是写她们好。她说，那些人当然要谈，而我是非谈不可的，因为“你不仅是总司令的夫人，而且有与众不同的经历，特别是在红军基层时间长，还指挥过战斗”。这些记者真有一股韧劲。她要做的事，总是千方百计，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正当我们双方各不相让时，老总讲了话：

“你就同她谈谈吧！实事求是地讲，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这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介绍宣传红军嘛！”

老总这么一说，我只好答应。那时我们同周恩来住在一起，门靠门，两家在一起吃饭。斯诺夫人有时也同我们一起吃饭。大家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在谈笑之中，她说要为我们两家四个人每人写一篇文章。

她同我谈话离不开翻译。我和她谈了大半天没有说完，又加了半天，从我的家庭到参加革命，同朱老总结婚；从前后五次反“围剿”到红军长征。我在谈话时，她一边听，一边飞速地记笔记，还不断提出问题。她向我提出一些关于妇女工作的问题。我曾做过一些妇女工作，对妇女也有出自本性的关心。但让我谈妇女工作，我却谈不出多少。我那时年轻，不懂得妇女工作的重要性。

她还询问我的恋爱婚姻观。我认为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男女双方真诚相爱的基础上，然后才会有幸福的结合。我喜欢孩子，也很想有个孩子。但怕有了孩子影响事业，所以我直率地对海伦·斯诺说：

“我不想生孩子，我要保持健康的军人体格。”

长期行军打仗使我养成不保存东西的习惯，连老总写给我的信也不保存。一天，清理背包时，意外发现一张过草地时别人给藏民拍的照片。我把它送给斯诺夫人，也许对她写红军长征会有些帮助。

我谈的这些，斯诺夫人都如实地写到她的《续西行漫

记》里。也许是翻译的缘故，个别有点出入。那些看法和想法，今天看来，有的似乎有些可笑，但它反映了我那时的思想实际。

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斯诺夫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然后张开双臂，把我紧紧抱住，向我表示感射。我还不习惯这种外国人的拥抱礼节，有些被动和拘谨。两天来，我们相互间建立了感情和友谊。我们年龄相近，她只比我大三岁。她感谢我给她的帮助，我觉得同样应当感谢她，使我认真地想了一些从来未想过的问题。当我们最后一次告别时，就在窑洞前合影留念。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虽然很少通信，但我仍记挂着她。一九九一年九月，海伦·斯诺荣获“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为此，我发了贺信：

海伦·斯诺荣获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庆祝会并与会同志：

欣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海伦·斯诺女士荣获“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我非常高兴，谨致衷心的祝贺！

半个多世纪以来，海伦·斯诺女士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为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她高龄之际，在大洋彼岸，她仍然一如既往，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情况，为促进中美友好的不断发展而不遗余力。

亲爱的海伦·斯诺女士荣获“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是受之无愧的。请向她转达我对她的深切思念，并附上三十年代我们在延安的合影，相信一定能引起她的美好回忆。

遥祝她健康长寿！

抗大生活点滴

红军大学从保安迁到延安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一九三七年年初，组织上通知我到抗大学习，我被编到抗大二队。

三月二日，红军大学第二期，也就是抗大第二期正式开学。还在一月，学员就开始集中了。开学这一天，一千三百多名学员服装整齐，队列雄壮，精神百倍地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毛泽东亲自确定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又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抗大校训。

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了话，大意是：“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老总也讲了话，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军事，学习对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努力学习政治，领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政策，团结全国人民，担负起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

开学后，抗大的学员达到一千六百多人，分住在好几个地方。一、二队学员全是红军的军、师、团高级干部，住在一个中学的房子里。二队女同志较多，成立了一个女生队，全是经过长征的女红军和少数白区地下党的同志。我在的这个班有个刚从白区来的女学生，她叫孙湘，是全队年龄最小的小妹妹。我是女生队队长，感到需要帮助她尽快适应集体的军事生活。

当时红军普遍打绑腿，但是初学的人都要经过练习，才能打成紧绷绷的人字形绑腿。我教她，她学得很快，几天工夫就打得合乎要求了。但是我发现，她每天晚上总是把绑腿解开后，又重新打好睡觉。这样非但睡不好觉，久了还会影响健康。经了解，原来有一天早晨她在匆忙之中，绑腿没有打好，早操跑步中途一条绑腿散开掉下来，差一点绊倒，她才想出了这个“万全之策”。我对她说，这不合乎军事要求，叫她一定要改过来。她答应了，可依然是老办法。我批评她说：

“为什么不能刻苦地练好打绑腿？连这点刻苦精神都没有，还怎能参加抗日？”

她委屈地掉下了眼泪，接受了。但她每天提前起床，悄悄地把绑腿打好，等大家起来，很快又被我发现了。我称赞她的顽强精神，然而这是不允许的。要帮她，就一定要找到原因。

夜里，我查铺查到她床前，用手电筒一看，全明白了。原来她脱下的衣裤鞋袜放置不合要求，随随便便放在枕下或是脚头，东一件、西一件，没有固定的位置和顺序，难怪她一早起来，花费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于是我又一次把着手地教她：晚上睡觉时，怎样按穿衣的顺序将衣裤鞋袜一件件地放在伸手就能摸着的地方，早晨只要按顺序，不开灯也能一件不乱；绑带在解开时，要反转来一圈圈卷好，放在帽子里，免得搞乱，等把全身衣服穿好，再打绑腿，最后戴上帽子，就不会手忙脚乱了。她学得十分认真，迅速掌握了这一切，纠正了乱的毛病，同大家的生活节奏一致了。

有一次，孙湘换洗晾晒的衣服全部丢失了。她从白区来，带的衣服不多。丢了这些，连换洗的也没有了。这时已是初夏，对于年轻的女孩子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困难。我急忙回家，从自己的衣服里清理出一套供她换洗的衣服。她知道我的衣服不多，坚决不要。我问她：

“你不要，有办法弄到换洗衣服吗？凭你身上这套衣服，能过个夏天吗？”

那时，不到规定发衣服的时候，是不发衣服的。她被我问得无言可答。看出来，她有点爱面子，于是我就动手帮她把衣服穿上试试，还正合身。她激动得扑到我身上。

初到陕北，吃小米总觉得米粒太小，太碎，咬不上，不像大米粒，吃起来舒服。吃馒头也有点不习惯，高粱米更

咽不下去。吃过饭总有点不饱的感觉。到抗大后，享受到对学员的优待，有时能吃到“二米饭”，又叫金银饭，就是把银白色的大米和金黄色的小米混合起来做的饭。比小米好吃多了。因为经济条件限制，每顿只有一个菜。一星期可以吃上一次肉，改善生活。孙湘到陕北虽说已有半年了，还有点学生气，吃饭很斯文，我一面推她上前，一面帮她向碗里夹肉。

抗大给工农出身的学员每人一本文化课本，还专设了文化教员。文化课本里，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作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能做好，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只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会学到某些道理，但要学得好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我觉得就像是对我说的。我下定决心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

抗大多半上大课，没有课本、讲义，要求上课都记笔记，不会记的也要学着记。以前在红军学校学习时，我听讲记不下来，课后就抄人家的笔记。现在过了五年，我已经能记笔记了，只是记得慢，记得少，只能拣主要的意思记，但是又要听，又要写，难免有许多遗漏。所以课后就找孙湘，同她对笔记，把漏掉的地方添上。我发现，她也

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内容，看了我的笔记，她连声称赞，然后把那些内容补上。

抗大大多数课程都是请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朱德讲党的建议，董必武讲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中国革命问题，博古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肖劲光讲游击战术……。通过这些学习，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

抗大的生活是愉快的，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每天紧张学习之后，傍晚自由活动，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有的唱歌，有的到延河边漫步闲谈，有的下棋、打扑克，有的到列宁室看书，或是吹拉弹唱。当时最吸引我们女生队的还是同一些男学员一起打篮球。老总最喜欢打篮球，常常到女生队同我们一起打。他一来，我就不愿同他分在一个队。开赛后，双方争夺激烈，我见球传到他手里，就叫：

“老总！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看也不看，就把球传过来，我接到球就跑到对方篮下投篮，或是传给自己队的人，球一进篮，跟他在一边的人就埋怨起来：

“总司令！你怎么把球传给了康克清？她跟我们不是一边的！”

“啊！啊！我忘记了，上了她的当，下回注意！”

总司令有些不大好意思回答。可是等到争夺激烈的时候，他只顾抢球，一听见我喊：

“快！快把球传给我！”

他又飞速地把球传过来，同我一个队的人乐得哈哈大笑，同他一个队的气得噘嘴：

“老总！你怎么又传错球了？”

后来，她们见他很难改过来，就不再传球给他。但是这样一来，她们等于少了一个队员，所以过不多久，又恢复了老样子。同老总一个队的人感到吃了亏，又重新编队，除了我和老总外，其余的大换班，掉了个过儿，谁也没有意见了。就这样，嘻嘻哈哈，大家玩得十分愉快。

那时，我们红军干部有一点津贴，师团干部每人每月有三元零花钱。每次发了钱，几个人邀上从白区来的孙湘小妹妹，到抗大的合作社小吃部，吃一顿馄饨或是羊肉饺子，又是一番乐趣。

第七章

在八路军总部

去五台前线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传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平型关大捷，消灭日军精锐部队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这个胜利震动了全国，延安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我们抗大提前毕业的许多同学就参加了这次战斗。

正在欢乐之际，接到通知，要我到云阳跟随即将去前方的一二九师部队，先到太原，再从那里去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我高兴极了，立即办了转关系的各种手续，同路去前方的还有马海德医生。他那时才二十七岁，中国话说得不很熟练，一字一句，但十分清晰。同他谈话，不用翻译，他善于言谈说笑。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到延安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去前方，是考察那里的医疗情况。马海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了一生，全国解放后，又

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卫生部的顾问，不久前去世了。他是一个永远值得怀念的人。

和我们同路去云阳的，还有美国女记者斯诺夫人、博古和肖克的爱人等十几个人。路上许多桥梁被冲毁了，多数人都骑马涉水过河。第一天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幸好掉到水里，没有受伤。

几天后到了云阳，八路军最后出发的一二九师大半已开始行动。我随即跟着出发了。第二天来到黄河边上，一条浑浊的黄色巨龙在绵延不断的群山之中，奔腾而下，又如一把巨斧把莽莽群山拦腰劈开。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奇特的河，汹涌激荡，使人惊叹，又受到鼓舞。

过黄河不久，遇到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因为是熟人，又热闹起来，到了曲沃，乘火车去太原。记得长征开始不久，夜间过粤汉铁路封锁线，看不大清楚，我趴在地上用手摸摸冰凉的铁轨，和垫在铁轨下面的枕木，奇怪火车怎么会在两根铁轨上跑。现在亲眼看见，觉得很是新鲜。战士们坐的是闷罐车箱，我同刘师长和一部分师部的人坐了一节客车，也就是现在的硬座车。火车开动以后，看着车窗外的景物，更是兴奋不已。

火车走走停停，沿路大小车站都挤满了人，从北方逃来的难民、流亡学生和前方下来的伤兵，到处都可以碰到。流亡学生听说我们是八路军，前来请我们派人给他们讲话。他们提出许多问题，主要是能不能打败日本？怎样打败日

本？他们已经知道平型关大捷，但是担心八路军人少，力量小，不知何时才能扭转中央大军节节败退的局面？还有不少青年学生要求参加八路军。经过谈话了解，一路上吸收不少青年学生，壮大了队伍。

虽说火车是走走停停，比起两条腿还是快得多，只一天多就到了太原，刘伯承派人把我和马海德送到坝陵桥的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在一个中学里，一部分教室改作八路军来往人员的临时住处。走进办公室，遇到彭雪枫，他是办事处的处长。熟人见面，格外亲热。听说我要到前方去，他十分羡慕地说：

“好事都给你们摊上了，我满以为到山西就是到了前方，没想到叫我到太原来看家，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哪有真枪真刀打鬼子痛快。”

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的工作重要哇，关系着前方八路军好几万人啊！”

他告诉我，八路军总部还在五台山地区，骑马也要走好几天。因为接近前线，路上不断有国民党的溃兵和土匪抢劫，很不安全，所以一定要等那边派人来接。他已经给总部发去了电报。

“知道你们心情急迫，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委屈你们在‘寒舍’住上几天了。”

我和马海德都巴不得当天就走，听了他的话，只好耐心等待。

第二天上午，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跑向指定的防空洞。正要进洞，有几个人走来。那打头的一个不正是周恩来吗？我十分高兴地迎上去：

“周副主席，你是几时到的”？

他一面同我握手，一面笑着说：

“康克清，你怎么让老总一个人先走，现在才到太原哪？”然后又说：

“我这一次到太原，大概比你晚一点。不过我自从到太原以后，已经陪着朱老总到太和岭阎锡山的指挥部去过一次了。”

“那你可真是劳苦功高哇！”

说笑中知道，九月初，他受党中央派遣，和朱老总一道同阎锡山谈判建立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商谈八路军的开进路线和八路军的活动地区，以及进一步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等一些问题。阎锡山害了“恐日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八路军和共产党身上，所以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周恩来知道我们在等着去八路军总部，笑着说：

“你一定得赶紧去，不然，老总要急坏啦！”

第三天，总部来了人，还有一支护送的队伍。因为急着赶路，来不及向忙碌的周恩来告辞，我们就上路了。进入五台山地区不久，下起雪来，越下越大，漫山遍野都变成了白色。这里地势高，气候寒冷，下雪比较早。骑在马

上，两只脚冻得难受，一路上我和马海德不断下马步行，走了三天，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南茹村。

组织部长周桓一见我们，就说：

“早就听说你们要来，这里太需要人了。”然后问我：

“你的工作是不是等你见过总司令再说？”

“请你先分配我的工作吧！等工作定了，我再告诉他。”

周桓想了一想，认为我还是在八路军总部工作好。我希望去战斗部队。他说：“现在局势变化很快，日本人可不是以前的中央军，怎么同敌人打游击，我们还没有经验，延安那边的女同志暂时都不准到前方来，你能不能先担任总部直属政治处的组织干事？”我立即表示：

“服从组织分配，没有意见。”

马海德对他说，他来考察前方的医疗卫生情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回去。

“不管你呆多久，多呆一天就是好的，对你这个大鼻子医生，我们尤其欢迎。”

他派人送马海德去小豆村总部卫生部。我到直属队政治处报到时，见到政治处主任李文改，他是个老红军，身体瘦弱，十分热情。他帮我把一切安顿好后，派人送我到南茹村朱老总住地。老总住在村的南边，紧靠山边，二层小楼，居高临下，有地道通后面的防空洞，从洞里又可以通到外边。房东金凤瑞说八路军是仁义之师，希望我们住在这里不要走。

老总比在延安时忙多了。他问了我一些延安和路上的情况，告诉我一些前方的消息。

过了一天，老总拿出几封信叫我看，全是他老家四川仪陇县的亲友们写的。他们听说他当了八路军的总司令，都想来“沾光”，在他的手下谋点差事。他问我：

“照你的意思，这事该怎么处理？”

“我看，一个也不叫他们来。”

“我已经给他们回了信。这是留下的信稿，你看！”

那上面说：

“希望升官发财的人，决不宜来我处。至于真正爱国，能牺牲一切，吃苦耐劳的人，不妨多来。我们的军队待遇平等。我与战士同甘共苦，非常愉快。因此，任何闲散人员前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他比我想的周到多了。这样既可打破那些想吃闲饭的人的幻想，又使那些真正决心抗日救国的人知道应该怎样做。

老总问我，是否知道阎锡山就是这里五台县的人，我摇摇头。他告诉我，阎锡山老家就在离南茹村几十里的河边村。为了炫耀乡里，他把铁路也修到了那里。然后又问：我们八路军里，有位领导干部也是五台县人，离阎锡山的家不远，知道是谁吗？

我平时从不打听领导干部的情况，他们是哪里人更不过问。老总见我答不上来，笑着说：

“是徐向前。他的家就在离这里不远的东冶镇附近的永安村。那里离阎锡山的家不过二十里。他们真可算老乡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派他回永安村老家看看，然后去做阎锡山和他的军队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有利条件！”

南 移 途 中

在南茹村，我们同老乡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们凡是有新鲜好吃的东西，总是忘不了送给我们尝尝。我们每当改善伙食时，就送一碗好菜给他们，或是把房东家的小儿子拉来同我们一起吃饭。我有空时就同他们讲讲时局和形势，他们特别愿意听，还不断地问这问那。有一次下雨，老乡全不在家，我见他家许多衣服晾在外面，忙收进来叠好。老乡回来不见了衣服，急得团团转。等我从政治部工作回来，把衣服送过去，房东大嫂拉住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时因为保密，都不告诉老百姓我们的真实姓名。南茹村有些青年人喜欢打篮球，老总经常同他们一起打球，我有时也参加打一会。有一次抢球时，一个小伙子把老总撞倒了，吓得丢了球来扶老总，老总从地上爬起来就问他：

“小伙子，把你撞坏了没有？”

弄得在场人都笑起来。有的说：

“这个大官真有意思，人家把他撞得摔了一跤，他不发火，反问人家撞坏没有。”

宣传部的一个同志来南山办事，我请他顺便给我同房东一家照相。相片洗出来，送给他们一张，一家拿着相片，看了又看，当作宝贝收藏起来。房东大娘在没有人的时候悄悄地问我：

“我们都看得出，你们是八路的大官。人家都说，你那位当家的就是八路军朱总司令。我没有说错吧！”

对于这样厚道的老乡，我只好对她说：

“不管你猜的对不对，千万别对人说。就是将来我们走了，也不要对人说。你能做到吗？”

她爽快地答应了。

十月间的一个深夜，八路军总部按照预定计划，离开南茹村向南移动。夜间行动主要是为了保密和避开敌机空袭。就在我们出发前几天，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对代县阳明堡日本空军的一个飞机场，组织了一次十分精彩的突然袭击，把二十多架敌机全部烧毁，还消灭了一百多敌军。这是一次重大胜利。敌人的飞机也因此连着几天不来了。但是我们总部南移，仍不能不多加小心。不久，敌机又出现了。

我们一路向南，在寿阳附近越过正太铁路。朱老总、任弼时同国民党将领黄绍竑、孙连仲等会谈。老总回来对我说：

“这些国民党将领同蒋介石一样，都是唯武器论，说靠现在的装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能同我们一道抗战已经不错了。依靠他们打败日本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发展人民游击队，扩大八路军。”

老总他同我一样，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一个是他过继的养母。两位老人都还健在。自上井冈山后，同家里断了音信，前不久得到消息。说四川今年大旱，粮食欠收，他担心两位老人缺食少衣，难以度过寒冬。我十分同情他的想法。可是我们两人除了身上的衣服和简单的行囊用品，没有任何积蓄。我们的津贴费加起来也只是五六元，寄回去也无济于事。

“能不能找人借点钱，以后再还他？”我对老总说。

“还？你以后拿什么去还？”

老总一下把我问住了。

“能不能找这么一个人，借了钱又不必还他？”

一句话，提醒了老总：“对！有这么一个人，就请他帮忙吧！”

这个人叫戴与龄，幼年时是老总的同学。老总在云南军队里当旅长时，他去找老总。老总派他在旅部任军需。听家乡来说，他现在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经是个少将，请他帮助，估计不会有问题的。老总立即提笔给他写信，告诉他八路军在前方敌后取得的胜利，然后对他说：

“家中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

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数十年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友好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请你代我速寄家中。此款我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

他写好让我看，我完全赞成，他随即问我：

“还有你家里，生父生母，养父养母，比我的还多，是不是也要想点办法？”

“不用了。他们都不过五十多岁，正是能劳动干活的年龄，不像你那两位妈妈，都已年过八十，非要帮助不可。”

后来知道，戴与龄接信后，果然寄去二百元，帮助老总家里度过了难关。他还给老总写了一封回信。

洪 洞 县

十一月中旬，我们向沁原县行进。第二天上路不久，下起雨来，越下越大，大家都披上雨布、斗笠。总部宣传队员冒雨在路边宣传鼓动，清脆的快板、浑厚的锣鼓声，使大家精神振作。在寒冷的雨水和泥泞的道路上，奋勇赶路。

正在冒雨行进，迎面来了一大群人，尖兵报告，驻在沁源县城的青年决死一纵队和沁源县抗日政府的干部前来迎接八路军。他们要求朱总司令去给他们讲话，总部政治部不敢贸然答应。正巧，老总听说这边有“情况”，骑马赶来，听见他们的话，在马上说：

“你们把人集合起来，我现在就去讲话。”

他们知道讲话的人就是朱总司令，跑上来握手问好。一阵欢呼之后，转身飞跑回去集合人。老总在他们走后，转身对左权参谋长说：

“那我就先去，给他们讲话。”

总司令一走，我们也跟在后面急速前进。这时大雨已变成濛濛细雨，不久，就隐约可见在山峦后面的沁源县城。离城不远的一座大庙门前挤满黑压压的人群，说是总司令在演讲。我和李文改几个人跑过去，只见老总站在庙门前的台阶上，戴着斗笠，披着雨布，正在眉飞色舞地讲话。下面听讲的有穿着制服、有穿便衣的，大约有上千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和掌声。老总讲的是抗战形势，抗战必胜的道路、前途和团结抗战的必要。

随后，我们跨过同蒲铁路，住到洪洞县的韩家庄。

洪洞县是个不大的地方，却有不小的名气。有两件事使它出了名。一是有一棵出名的大槐树，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省很多人把这棵大槐树视作老家；一是京戏《苏三起解》中玉堂春，有一段在洪洞县的经历。

我们在韩家庄住了几天，搬到高功村。在高功村住了一个月，移住马牧村。

这时有不少外国记者来到八路军总部访问。有苏联、英、美等国的记者。朱、彭两位总司令和任弼时同志分别同他们接谈。这些记者们大都把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

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身上。

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前方。他们一行三十多人，一律穿着整齐的蓝色制服，充满朝气和文化人的特点，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和我同期的抗大同学，全是第四大队的，在学校里曾演过话剧《母亲》、《回春之曲》。丁玲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时，他们大部分都参加了，所以有不少人我都认识。

还在沁县时，听说他们来了，组织上派我代表总部机关，带几个人去迎接他们。他们老远就认出了我，鼓起掌来，热情地把我们围住。我同丁玲以前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彼此知道，这次见面像老朋友一样亲切。她是个作家，却没有文化人的那种清高，十分随和，同谁都谈得来，一见面就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元旦来临，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举行新年联欢会。这天上午，总司令到杜家戍阅兵，受阅部队是一一五师的六八六团。我很想去看看部队这两年的变化和精神面貌，因为离得远，未能去。西北战地服务团给他们演出了话剧《八百壮士》。老总回来高兴地对我说：

“这一两年部队变化很大，无论精神面貌和政治思想都有很大进步，部队人数也大大增加了，现在的一个团比红军时一个师的人数还多。”

晚上，在大庙里举行庆祝新年联欢晚会。各单位都提前吃饭，早早整队来到会场。朱、彭两位总司令，任、邓

两位政治部主任也都来参加，同大家一样坐在台下。大家互相拉唱歌，气氛热烈活跃。联欢会上最精彩的节目，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演出。他们演了几个独幕话剧。丁玲也上了场。她在一个话剧《老爷》里扮演一个八路军的女宣传队员。

第八章

太行山上

慰问石圪节煤矿工人

一九三八年春天，为了迅速打开太行山区的工作局面，我们每到一处，发现思想进步、政治上可靠的人，就尽快吸收他们入党，建立秘密的党组织。我们在刘垣村和英寨住了近一个星期，在安置伤员工作中，根据多方了解，发展了几个党员，帮助他们建立了党小组，同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住的房东家有个女儿叫黑妮，十分热情能干，政治上要求进步，也吸收她做了候补党员。

这年六月，我接受了一项去石圪节煤矿慰问工人的任务。石圪节是长治地区一个著名的煤矿，位于潞城县西北的西黄沙岭，有上千工人。同各地煤矿一样，工人遭受惨重剥削，生活很苦。一九三七年底，在“改善生活，反对压迫”“团结抗日”的口号下，他们举行了一次大罢工，历时几个月，取得了胜利。那里没有党的组织，罢工由几个

工人进步分子带头搞起来，能取得胜利十分难得。他们请求八路军派人去帮助。朱老总对这事十分重视，要野战政治部尽快派人去表示慰问，了解情况，回来再作决定。野政研究后，决定派我带宣传干事、民运干事二人。代表八路军总部对石圪节煤矿工人表示慰问。

临行前，朱老总嘱咐说：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和八路军依靠的主要力量，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十几年我们总是在农村里，同工人阶级接触的不多。煤矿工人在工人阶级中生活最苦，也最富有革命斗争精神。他们这次罢工胜利给晋东南煤矿的工人运动树立了榜样，给工人运动史上增添了光荣的一页。要鼓励帮助他们。告诉他们要适可而止，还要团结争取资本家一道抗日。”

我们住在沁县南底水，离煤矿大半天的路。出发的路上，我把野政领导和朱老总的话，向两位干事作了传达。

煤矿上派了两位同志来接我们，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到矿上，就受到工会的热烈欢迎。工会负责人李辛酉、栗东山召集工人代表、积极分子开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朱总司令祝贺他们罢工胜利的话，他们听了都非常高兴。我又讲了总司令和八路军领导希望他们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学会又联合、又斗争的本领；要团结争取资本家抗日，对资本家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他们对这段话特别感兴趣，希望我再重复一遍，讲得更清楚一点。讲完后，他们

纷纷发言：“这一下明白了，打鬼子也要争取资本家参加。”

工会的负责人李辛酉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工会缺少有经验的人来领导，怎样对资本家又团结又斗争，也不好掌握，请八路军总部一定给我们派人来。

派人的事没有经过组织决定，我不能贸然答应。我说主要的还是要靠你们自己，依靠工会和全矿的工人，还可跟牺盟会取得联系。只要大伙齐心团结，就什么也不怕。派人的事一定尽力替他们想办法。这次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开了五个钟头，大家依然言犹未尽。

石圪节煤矿工人的生活很苦，我们说明吃饭要同工人完全一样，不要任何招待，走时算账。如果他们不听，我们马上就走。他们答应了。可是头一顿，李辛酉还是叫添两个菜，被我制止了。他们经常吃的是白薯干糊糊，能吃上一顿高粱米就是改善生活，白面很难见到。

我们到工人住的窑洞去慰问。窑洞的简陋不用说，十几个人挤在一铺长炕上，破被、烂席子，怕连翻个身都不容易。每个工人除了随身衣物和一点破旧行囊，再没别的东西了。工人们听说我们来了，纷纷跑来围住我们。听我们说明来意，都很感动，大家无拘无束地闲谈起来。他们打听抗战的形势，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八路军是个什么队伍，日本人会不会到石圪节来，资本家会不会投降日本……许许多多问题。我们一边谈，一边也问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年轻的工人们个个敢说敢讲，讨论得十分热烈，不

知不觉已到了深夜两点。经李辛酉提醒，才不得不结束这场热烈的讨论。

回到总部，我立即把了解的情况向野政和朱老总作了汇报，他们听了都认为急需派人去加强对煤矿工人的领导，但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不久，在供给部找到一个干部，他是党员，又当过煤矿工人，叫杜长钧，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经过北方局介绍，他到了那边。他熟悉煤矿工作，又是煤矿上的老把式，去后不久，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发展了党员，建立起中共石圪节煤矿党支部。一九三九年七月，敌人占领长冶不久，派兵侵占了石圪节煤矿。一部分工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党支部领导工人转入地下斗争。

现在，山西省潞安矿务局石圪节煤矿是全国煤炭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周恩来总理生前曾亲切接见该煤矿的工人代表。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为煤矿题了词。

杨尚昆帮我解决矛盾

一年来，太行根据地飞速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工、农、青、妇、文各种群众组织都建立起来。为了统一对群众组织的领导，相继建立了晋东南地区的工教会、农教会、妇教会和青教会。后来又建立了文化教育界救国会。

为了加强妇女工作，组织上打算把我和浦安修都调到

北方局妇委，领导晋东南的妇女工作。浦安修感到自己做妇女工作可能比做军队政治工作更合适，就去了北方局妇委。我的目标依然是成为军队中的一名女指挥员。我在四方面军搞过妇女工作，当时，我又是以宋美龄为首的全国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理事。这个指导委员会在晋东南和整个敌后可说毫无影响，但它是我们团结争取群众的一个有利条件。我当然应当很好地发挥从国民党方面取得的这个合法地位的作用。这两种情况使我处在矛盾中。北方局的领导杨尚昆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同意我仍留在部队里，继续做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的工作，同时兼任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名誉主席，尽可能地参加妇救会的一些领导工作。这是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七月下旬，敌人集中五万多人，开始“第二次扫荡战”，又一次分九路向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围攻。

八路军总部为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天气闷热难挡，出发不久，遇到一阵雷暴雨，许多人被淋得浑身透湿。由于敌情紧张，行军一直未停。暴雨过后，一阵凉爽，树木、山岩、茅草全被冲洗得明净发光。山间云雾缭绕，头上露出湛蓝的天空。忽然队伍停止不走了。我赶到前面查看，原来到了浊漳河畔。由于山洪暴发，奔腾直泻的浑黄泥浆，发出千军万马的呼啸，翻腾着向山下冲去，震得地动山摇。

队伍停在这峭壁陡岸的河边，再不能前进一步。这里

平时河水很小，人可以从河中间一排石头上面走过去。现在只要下去，怕会立即被洪水卷走。不远处传来阵阵清晰的炮声，敌人离我们已经不远。情况紧急，掩护总部机关的只有三个战斗连队，大家都心急如焚。

我怀着急迫的心情到司令部作战部打听，路上遇到潘开文。他这时已从总司令身边调到作战部担任作战参谋。听了我的询问，摇摇头说：

“这临时发生的情况，我也无法回答。”又用手指指前面：

“喏！两位老总都在那边，你去问问他们吧！”

在河边的一棵树下，朱老总拿着望远镜正在观看远近山头的地形；彭老总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柳枝，捋着柳叶，两人正在谈着什么。

我着急地问：

“部队过不了河，敌人眼看就会追来，你们两位看怎么办？”

朱老总慢悠悠地说：“天无绝人之路。”

“放心吧！山洪暴发，我们过不去，敌人也过不来！”彭老总说。

这时，炮声似乎更近了，听得更清楚了。朱老总才认真地说：

“山洪暴发，水来势猛，落得也快。敌人距我们最近的一路也必须渡过漳河，那边已有阻击部队。敌人到现在还

未发现我们总部的行踪。等水势一落，我们就过河。”

果然，两小时后，水势渐渐平缓下来，但依然比平时大得多，深得多，流得急。这时炮声已近在十里左右，不能再等了。几个会游泳的人，由朱老总的参谋兼秘书孙洪带头，把一根粗绳拉过河去，在河的两岸把绳子拴紧，然后大家一个跟着一个，手抓绳子涉水过河。我不放心两位老总，他们虽有警卫员照护，我还是跟随他们一起过了河。等到人马全都过河，太阳已经落到山后，阴影笼罩了一切。当部队沿着陡峭的河边山路行走时，刘白羽的背包掉到翻滚的浊漳河里，被洪水冲走了。刘白羽当时是位青年作家，他是专为给老总写传记，从延安到总部来的。他随同司令部一块行动。朱老总拿出自己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叫李树槐给刘白羽送去。

夜间，行军途中同敌人遭遇。敌人有好几千人，我们的警卫营只有三个连，急忙拉上去抵御敌人。敌人冲了几次都被击退了。所幸是黑夜，敌人弄不清我们的虚实，他们企图先展开包围，等天亮消灭我们，又用电台呼叫各路敌军向这里合击。我们利用黑夜的有利条件，在警卫营的掩护下，悄悄地通过敌人尚未到达的山路，插向敌人的侧后，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天亮以后，我们已经转移到太行山深处的偏僻地带。这里有许多丛林、茅草，便于隐蔽。吃饭、休息之后开始爬山，一直向上爬，转来转去，爬了整整一天，快到太行山

顶峰附近了。那里有两个小村庄，总部就在那里住下来。

站在太行山的顶峰上往下看，峰峦起伏，气象万千，真像《在太行山上》那首有名的歌曲所唱的：

看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砖壁村和枣林村

八路军总司令部住到武乡县的砖壁村，野战政治部住在南山村。这个地方工作缺少基础，老百姓听信谣言不敢接近我们。开头进村时，老百姓几乎全跑光了。经过多方工作，老百姓才渐渐回来。朱老总、彭老总都带头做群众工作。

朱老总看见一个老汉推碾子推不动，就过去帮他。两人一边推一边拉家常。推完，又帮他送到家里，老人请他喝水，还要留他吃饭，总司令都婉谢了。老汉问他是什么长官，姓什么？总司令说：

“我是个当兵的，你就叫我老朱吧！”

老汉为朱总一片诚意感动，加上他朴素的装束，就信

以为真，以后一见面，就喊他“老朱！”

过了很久，那老汉才弄清楚，他竟是八路军的朱总司令。

当时像这一类的故事、传说在砖壁一带还有许多。

起初，那里有“八路军调戏妇女”的谣言，吓得青年妇女躲在后山窑洞里，不敢出来。后来，老百姓认识了八路军，纷纷到山后叫回了青年妇女。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热闹起来。我每星期六从南山村回到砖壁，老乡都叫我“老康”，他们知道南山村人都是这么叫我的。日子一长，他们当中有人知道了“老朱”就是朱总司令，不敢再接近他，喊他。朱老总照样同他们接近，晚上还同村里的青年人一块打篮球。渐渐地，他们又“老朱！老朱！”地喊起他来。

砖壁是个缺水的地方，那里水井很少，又都很深，井绳有十二丈长，吊一桶水要花很大力气。我们去后，吃水就紧张起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帮助老百姓打了两口井，用水缓和了一些。随着天旱不雨，吃水又增加了困难，我们迁移到吃水方便的王家峪。总部住王家峪，野战政治部住在离王家峪四五里的枣林村，中间要翻过一座小山。

枣林村一带的妇救会干部知道我是晋东南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头头，有什么事就跑来找我。我对她们一概欢迎，凡能办到的，都尽力帮助他们办。她们组织女民兵射击，要我去指导，我就去帮忙，一时分不开身，我就另找时间去。

后来，她们告诉我，枣林村有个媳妇叫兰子，支前、做军鞋、学文化、参加妇女自卫队……事事积极。她的婆婆封建脑筋，不许她出来，还常常打骂她。到她家里去劝说的，都被她婆婆给轰了出来。大家对那个蛮不讲理的婆婆感到气愤。有人说：

“召集全村妇女开大会，跟那个老死脑筋讲理，才能叫她老实下来！”

她们把这想法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她婆婆也是个受压迫的妇女，这么办，弄不好就成了斗争大会，还是慢慢做她的工作为好。我准备找她谈谈。她们听了十分赞成，原来这正是她们的打算。她们都认为，把我这个晋东南妇救会头头搬去，一定能镇住那个不讲理的老婆子。何况我还是个八路军当兵的呢！

那是个贫苦的下中农之家。她们把我带到那里，只有一个人陪我进去。房屋破旧，陈设简陋，屋子里光线暗淡。没等我们看清楚，那位婆婆就连吼带叫地说：

“老总！求你们别再给我家添麻烦啦！你趁早走吧！”

我耐心地对她说：

“老大娘！我是特意来看看你，你身体好吗？”

“我用不着人看，没什么不好的。”

我只好说：

“我住在村里郝大娘家，你有什么事，就到那里找我吧！”

“放心！我不会去讨人嫌。”

说到这份上，我只好退出来。这时才看清，她身材矮小，不过四十来岁，那个受气媳妇兰子，躲在屋角，一声也不敢吭。同去的村妇救会长气得大声对她说：

“跟你说话的是管咱晋东南妇救会的康主席。你太不像话了。”

出了她家门，还听见她在屋里喊叫什么。

过了几天，我到王家峪总部开会回来，天已经晚了，走到兰子家附近，听见一阵叫嚷和哭骂声。停脚倾听，是兰子家里，还夹着痛苦的呻吟。我急忙带着通讯员高金山走进去。只见兰子婆婆正躺在炕上双手捧着肚子滚翻，头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哭叫一阵，又对兰子骂一阵，说她这病全是兰子害了她，是兰子作的孽，等她好了非要兰子的命不行……。兰子跪在她身边，左不是，右不是，吓得直哭。她婆婆见我们进去，像没看见一样，哭骂声反而更高了。我问兰子，才知道她婆婆心口痛，大约是胃病犯了。我叫高金山赶紧给总部医务室挂电话，请立即派医生来诊治。这时大娘出现呕吐症状，我急忙脱鞋上炕，和兰子一同照护。刚抱住她，她一阵痉挛，口吐白沫，昏迷过去。兰子吓得大哭起来。我试试大娘的呼吸正常，告诉她：

“这是一时昏迷，不要紧，稍等一会，医生就要到了。”

我们两人轻轻把大娘放下，躺好，擦去她嘴上的白沫。我问兰子，才知道大娘有过心口疼的毛病，但从没有像今

天这么厉害。我又问了兰子一些外出参加活动的事，兰子只是点头和摇头，两眼盯住昏睡的婆婆，怕她听见。她在婆婆面前，就像耗子见了猫一样。

这时，小高带着医务所的陈医生进来。经过诊断，给老大娘打了一针，等她慢慢睁开眼睛，又给她吃了药。这时，她的目光盯到我的身上，没有说话，已不像过去那样冷淡和厌恶了。陈医生说，再过几个小时，如果肚子疼了，可以再吃一次药；如果不疼，药留到明天早晨吃。他留下一点药，就走了。我怕她病情发生变化，兰子一人伺候不了，叫小高回去告诉政治处，说我今晚有事，不回处里了。我同兰子睡在一起，帮助兰子一同照顾她婆婆，顺便悄悄地同兰子谈心，告诉她怎样正确对待这些问题。因为睡在一铺炕上，我们谈的话，可能老大娘都听到了。她一声未吭。第二天天快亮时，我同兰子一起服侍她吃药。灯光下，她眼神完全变了，现出对我的感激。

天亮后，我看她睡得正好，悄悄起来向兰子告辞，并嘱咐她如何照顾病人。忽然，老大娘一翻身坐起来，拽住我的手说：

“老康！康主任！都怪我这个死脑筋不识好人心。现在我可认识你们啦，谁也比不上八路军好哇！从今后不管兰子去干什么，只要是你老康的意思，只管叫她去好了！”

从此以后，老大娘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兰子也成了妇救会和妇女自卫队的积极分子。枣林村的妇女自卫队从十

九人很快增加到三十五人。

周恩来在重庆，知道敌后生活的艰苦。凡有人来太行，总要托人带来一点四川特点榨菜、豆瓣酱一类的东西。有时还带一小包大米。这些东西在那时的太行根据地都是十分珍贵的。朱老总舍不得吃，总是留下招待从前方来的同志；有时就同彭老总、杨尚昆、左权几个人一块吃。有一次，邓小平、杨尚昆来谈话，这是难得的机会，老总把剩下的一点四川榨菜全部拿出来招待，还当众宣布说：“今天请你们吃周恩来带来的四川榨菜炒肉丝。”几个人听了都很高兴。

在伙房里，彭老总的警卫员自告奋勇要替炊事员炒菜。他说：

“上海、天津那些大饭馆炒菜不用铲子，用锅炒。你们没见过吧？那锅就是个炒瓢。手掂锅把，等火把锅烧热了，从火上拿开，使劲一掂，全靠巧劲，锅里的菜正好来个大翻个。这样用不了几下，菜炒好了，又鲜又嫩，特别好吃。”

他要当众表演，叫炊事员先把榨菜、肉丝、葱、姜切好，预备好调料。五六个警卫员围了一圈，只见他腰里系着炊事员的围裙，手拿带把的炒锅，等到锅里的肉菜吱吱作响冒出腾腾热气的时候，他把锅从火上掂起来说：

“瞧！我炒给你们看！”

开头他掂了两下，肉菜在锅里纹丝不动。第三次，他憋足了劲，使劲一掂，一锅菜全跳在空中，然后一个大翻

身，没等他伸锅去接，一锅菜全部扣到火里，惹得观看的人一阵大笑。

“这小子牛皮吹得太大，破产啦！”有人轻声说。

他吓得脸色发白，说不出一句话，急得要伸手到火里去捞。那菜和柴草灰早已和在一起，哪里还能吃？

“这道菜就算啦，大师傅想想法子，另外做个韭菜炒鸡蛋给补上吧！事已如此，都不要再说啦！”那位同志提了这个合理化建议。

那天，几位老总只顾谈话，吃饭时说说笑笑，谁也没想起吃榨菜炒肉丝的事。

第二天，左权参谋长想起，昨天怎么没有吃到四川榨菜，问他的警卫员，警卫员说出实情，惹得他一阵大笑。他把这事告诉老总，逗得老总也大笑起来。

然后对我说：

“告诉他们，以后再不兴吹牛皮了。”

给朱老总祝寿

十二月一日是朱总司令的生日，他已经五十四岁了。

不知什么原故，老总的生日被许多人知道了。从十一月份开始，就有人给老总写信，祝贺他五十四岁生日，表达自己的敬仰和决心。许多干部、战士纷纷寄来祝贺生日的贺信、贺诗、贺辞。总司令部管理科请示彭老总之后，在

王家峪广场上搭起了一个大席棚，把这些全张贴在里面；送来实物的，都按照老总的意思给退了回去。参观的人每天在席棚外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许多人一进到里面，一边观看，一边摘抄，作笔记。

我花了半天时间同大家一齐观看。有许多青年战士不但把总司令看作首长、领导人，有人还称他为慈爱的父亲；许多干部把他看作领袖；有的干部把他称作指引自己前进的导师。诗、辞、信中有许许多多赞颂老总的动人话语。山西人民抗日武装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写给总司令的一首诗：

敌后撑持不世功，
金剛百炼一英雄。
时人未识将军面，
朴素浑如田家翁。

十一月三十日这天，总部直属队召开了给总司令祝寿的大会。会场由直属政治处组织安排，气氛热烈。彭老总讲话，号召大家向朱老总学习。各单位代表讲话后，国民党军委会派驻第二战区副长官署的代表要求讲话。他表达了自己发自肺腑的对朱副长官的敬慕，最后说：

“大家都要以朱副长官的大名——朱德，这个德字来昭告全国抗战军民，大家都应当以这个德字来要求我们自己。”

快要吃饭的时候，司令部作战科送来一只膘肥体壮的大山羊。他们别出心裁地在羊角上系上鲜红耀眼的红绸子，像是不住地扇动翅膀的两只红蝴蝶，十分好看。作战科长王政柱和参谋潘开文进门就说：

“恭贺总司令五十四岁大寿！敬祝总司令健康长寿！领导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然后又拍拍山羊的背说：

“这只山羊是我们全科同志对总司令的一点敬意，请总司令一定收下！”

送贺礼的事，朱老总早已交待过，只收信、诗、词、画……送实物的，婉言退回，概不准收。作战科知道这一点，偏偏又送来。潘开文对我说，他们为这事研究了好一阵子，觉得老总平日生活太清苦了，一定要送只肥山羊给老总补补身子。白天不行，送早了不行，只有等到生日的最后一个晚上，外人不知道，知道也迟了。他最后说：

“康主任！你是爱护老总的，你也了解我们，和我们有同样的心情。无论如何，你要帮助我们，替老总把这头山羊收下。”

实在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两人再把山羊牵走。我叫李树槐先把山羊牵到一边拴起来，喂点草料，又留他们一起吃寿面。两人都是刚吃过，不肯再吃，稍坐一会，便高高兴兴地走了。

晚饭后，我同总司令商量，叫李树槐把山羊送回作战科，还给他们带去半篮花生和红枣，告诉他们：

“总司令领情了。山羊送给作战科的同志。你们天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太辛苦了。另外送你们一点花生、红枣。”

李树槐回来说，山羊送回去，完全出乎他们意外，有人还要再送回来，被他再三劝阻了。后来他们杀了那只羊，还是送来一盒烧好的羊肉。

有一天，彭老总问我：

“别人给朱老总写了那么多信，你难道就不打算写一篇？”

本来，我还有点犹豫，经他一说，就下了决心。我挤出时间，利用两个晚上把信写好，先给老总看。他看过只说了一句：

“你们不要把我说的太好了。这样，我看了也不舒服。”

我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然后送到展览的大席棚里。

十二月初，老总抽出时间，专门到大席棚里看了半天，回来写了一封回答大家的信。其中有不少内容就是那天祝寿大会上他的讲话。

那个规模不大的展览，因为来看的人多，直到新年元旦前才拆掉了那个棚子。那么多的信件材料都由直属政治处宣传股保管，后来几经战斗转移和人事变动，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包括我写的信和老总回答大家的信全都

丢失了。所幸，当时一位有心的人，就是作家刘白羽，他为了要给朱老总写传记，住在总司令部，只要老总一有空，就同他谈一生的经历。其他的时间，他都用来收集材料，找人谈话采访。他用蝇头小字把展览室里的诗、辞、书信都密密麻麻地摘抄到他的小笔记本上。经过三十多个春秋，“十年浩劫”之后，他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写出了生动地记述朱老总前半生的文学传记《大海》。

下面是他摘抄的我当时写给老总的信。

“……我记得，在离开我家一百多里的地方，第一次看见你，使我覺得你——红军的总司令——是一个极平凡的人，平凡得像一般农民一样。当时我很奇怪。其实那正是你伟大的特征。

“我记得井冈山红军下山时，你同士兵一样的生活、行动、吃饭、宿营。人们常说：‘苦是苦，朱军长和我们一样，还有什么话说。’……军队一住下，你便去和农民谈话，帮助他们做些平常的事情。这更影响了全军都爱护老百姓，……

“我和你相处十多年了，觉得你无时不以国家、革命为重，凡事不顾自己的利害。人们不能忍受的事，你能忍受；人们所不能干的事，你去开辟。我又觉得，在数次与敌人作战中，事先你周密精细地计划；战斗开始以后，你镇静地把握

整个战局，争取最后胜利。就是战争受到暂时的挫折，你也和平日一样地告诉同志们：‘要相信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还有，你是见书便读，学而不厌，总是前进的，不断提醒同志、督促同志、爱护同志。……”

老总在回答同志们的祝贺时说：

“你们不必祝贺我。我要祝贺你们！”

我的一生革命中，从封建、半封建、帝国主义压迫三层黑暗的旧社会里，斗争到现在，才算得到了一条道路。赶到打翻君主专制，有人认为目的达到，便心满意足。但我认为，革命方开始。以后，打倒了一部分军阀，一些人又满足去做革命成功的官了。但我还得前进。愈革命，愈觉得要革命。起初，我们人数不多，团结不坚固，又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做指导，只凭着满腔热血、正义。现在抗战救国，要做的事情，不是单独几个人在摸索了，而是成群成行的人。有领导，有组织，只要永远把握住革命的方向前进，就可以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里，我第一告诉你们的，就是无间断地、时时刻刻地和你们自己非革命的自私意识思想作斗争。”

他用极其简练而又深刻、朴素的语言，讲出了他几十年革命的经验，突出地用“第一”强调大家要 and 自私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这不仅在当时十分重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普遍意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朱老总七十六寿辰，我作了一首八句七言诗，表达我的心意。这首习作经当时朱老总的秘书沈毓珂修改如下：

雄图壮志依然在，
任重致远永不歇。
学诗学书学理论，
忧国忧民忧建设。
海量宽宏唯忘我，
平易近人众心悦。
奋斗一生服从党，
高龄优勉共产业。

两 条 毛 毯

一天早晨，天还没有亮，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司令部打来的，说总司令的房子里发生火情，烧坏了两条毯子。我立即带上警卫员小高，连走带跑匆匆忙忙翻过东山梁，小高在后面紧紧地追赶，叫我当心不要跌下深沟。五里山路，

跑到王家峪，东方刚刚露出一线红霞。

我一头扎进屋里，看见老总正在灯下看书，心中一块悬石才落地。这时，王政柱、孙泱、潘开文和李树槐都过来了。屋里充满烟熏火燎的气味，满地救火时泼的水痕，一摊一摊的，炕上东西全揭起来堆在半边，中间泼的水已经干得发白，四周还是潮湿的。李树槐拿来两块烧坏的军用毛毯，都在中间烧了一个大洞。两块毯子是上下一起铺在炕上的，下面的那块烧得大些，上面的烧得小些。

老总见我，放下手中的书本，取下眼镜对我说：

“早已没事了，你还来干什么？”

“光说烧坏了两条毯子，人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里烧成这个样子，我还能不回来看看吗？”

“是呀！康主任不说别的，只作为直属政治处主任，总司令这里出了事，她也应当来看看呀！”

几个参谋部都帮我说话。

他们一起向我讲了夜里起火的情况。

头一天晚上，欢送国民党委员长天水行营派来的一位姓刘的参议。这人年近六十，是彭老总开完党中央六中全会回来时带来的，他奉蒋介石命到敌后考察八路军的情况，同时负有监视的任务。他来到太行山区后，两位老总向他介绍了情况，又轮流陪他到各地视察，有时派专人陪他。老参议看到八路军依靠群众英勇抗战，对国民党军队的挑衅进攻团结忍让，越看越受感动。他对两军的磨擦讲了一些

公道话。因为年岁太大，不愿在外面太久，想早些回去。老总也希望他回去向蒋介石报告真实情况，替我们讲讲话，就叫人买了两只老母鸡，和彭老总两人欢送他。三人畅谈很久，烧炕的火一直未熄。客人走后，老总睡觉时，公务员忘了炕早已是热的，还像平时一样添火。老总劳累一天，上炕就睡。炕越烧越热，在火力集中的炕中间，先把铺在下面的炕席烧着，然后把第一条毛毯烧透，又引着了第二条毛毯。老总在昏睡中觉得身下太热，滚到炕里面，被烫醒了，嗅到难闻的烧鸡毛的糊焦味。睁开眼，只觉得烟雾腾腾，炕上一片红光，稍微一动，火星劈啪乱跳。慌乱中不辨东西南北，急忙喊叫“参谋！”。老总住的是三间两房，西屋里王政柱听见喊声，觉出烟气和糊焦味，急忙点灯去推老总的门，门从里面插着，无法推开。老总在里面喊：

“参谋！快来看看，怎么起火了！”

王政柱急中生智，跑到门外，使劲把老总东房的窗户砸开，喊了一声：

“快来人！总司令房子起火了！”随即从窗口跳了进去，打开房门，点着灯。这时，老总已光着脚站在地上，屋里烟雾弥漫，烧红的炕上火花飞进。他把老总拉到西房坐下。这时参谋、警卫员、公务员全来了，大家一起救火，等把火扑灭，把老总安置在王政柱的炕上睡下，才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这时老总插话说：

“我本想不叫他们告诉你，他们坚持要打电话，我就说：‘那就叫她放心，不必过来。’谁知没等他们讲完，你这个急性子就把电话挂了。”

正说着，彭老总过来了，听见我们说话，就笑着说：

“急什么？这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一边说，一边拿起两条湿漉漉的烧坏的毛毯看了看：

“全是中间开花，要是补上两块红呢子，真叫漂亮，你想做怕还做不出哩！”

朱老总也给他说得乐起来，转身又对我说：

“你要是回来住，炕上有两个人，着火之前，总会有一个先觉出来。”

我不想再跟他们说笑，走进东房去查看，发现老总的一块怀表、一支自来水笔烧坏了。这两件是他随身不离、工作必备的宝贝，实在是个大损失。我把自己随带的水笔取下给他。彭总给供给部要通电话，要他们立即给总司令送一块表来。

早饭后，李树槐把两块毛毯送到供给部的被服厂去修补。他们找不到红同色呢子，就在两面用两块红布剪成圆形缝上，中间絮上薄薄一层棉花，把烧坏的地方补了起来。他们送回补好的毯子，放在外面晾晒，真像彭老总说的，这么一补倒给它增色不少。

这两条毛毯，有一番经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暴动胜利后，董振堂把它送给朱老总。一九三六年底，周恩

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总特地把它赠送周恩来作御寒之用。抗日战争开始，朱老总奔赴抗日前线时，周恩来又把它回赠了老总。老总此后一直把它留在身边。这次烧坏补好，老总一直不离身地继续使用。因为它包含着对为革命牺牲的董振堂的怀念，也包含着老总和周恩来的深厚革命情谊。解放战争中，秘书兼参谋孙洪调离老总身边时，老总把其中的一条送给他。全国解放后，老总才把剩下的那一条交给了军事博物馆，并说明了它的历史。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对老总的的生活格外关心。每周回去，一再提醒他周围的人员注意他的饮食起居和安全，并仔细地作一番检查。新调来的一个小鬼服务员，把老总的痔疮药膏当成牙膏，挤到老总的牙刷上，老总尝出药的味道才发觉。从此我又特别注意每换一个人，都要认真地交待，直到他熟悉应做的事和需要注意的事项。

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本来就很艰苦，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八路军的供给后，困难就更多了。我们一边战斗，一边用自力更生、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困难。老总为此写了一首诗《寄语蜀中父老》：

伫马太行侧，

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
夜夜杀倭贼。

诗中豪情歌颂了八路军战士奋勇击杀敌人的英雄气概，形象地描绘出八路军战士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老总最初把诗给几个参谋和秘书看。第一句原是“饮马太行侧”，大家觉得“饮马”意思欠贴切，先改“驻马”，又经斟酌推敲，改作“伫马”。第三句原为“战士怯衣单”，也觉得与战士的艰苦奋斗精神有距离，经大家研究，改作“战士仍衣单”。改后，老总重复一遍，高兴地说：

“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一改，完全符合我军战士的实际了。”

王家峪一带是个贫困山区，这年又旱，入冬以后极少雨雪。开春后，旱象已成。地方党委和农教会号召担水浇种玉茭（玉米）。我们总部机关也抽时间支援群众抗旱，帮助他们担水栽种。朱老总听说，也抽空跑来，大家说他年纪大，不让他挑水，让他干轻一点的活。他抢过水桶，担了一个多钟头的水，才又回去工作。后来老总发现有个叫刘瑞林的老汉，孤身一人，玉茭种不上，正在发愁，就对他说：

“老汉不要慌，保证你那一亩玉茭全能种上。”

晚饭后，他带上秘书、参谋、警卫员，借来耕牛、犁耙。耕的耕，耙的耙，担水的，点种的，两个晚上，帮他

把玉茭全都带水种上。老汉高兴得要做饭菜招待，老总恳切地制止了他。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老总带头，发动总部机关开荒种地。入冬后，在蟠龙开出了一大片荒地。野战政治部在老总的影晌下，也在附近山坡上开出了大片荒地，开春后全种上了庄稼。

老总说，帮助群众要有长远的打算，一个好办法就是植树造林。要向群众宣传，还要由我们八路军带头。老总亲自选地方。王家峪村外有很大一块河滩地，除了发大水时上水外，年年闲着不用。因为离村子近，就选定先在这河湾地上植树造林。总部机关一带头，地方党委又动员群众参加，很快就把那长长的空旷河滩全栽上了小树苗。

如今，那些小树都早已长大成材，其中朱老总裁的那株杨树已长成参天大树。有趣的是，人们发现，那棵杨树的枝条折断后，每根枝条年轮的中心都有一个小小的红五星，呈紫黑颜色，这种天工造化，使许多人惊讶不已。这棵杨树已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围上了铁栏杆，并有木牌说明是朱老总当年亲手栽种的。

第九章

洛 阳 谈 判

去 洛 阳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忍无可忍，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为了争取团结比较进步的卫立煌，双方达成休战协议，我方主动退出太行山南部的七个县和一部分地区。

一天，老总对我说，党中央来电报，要他去洛阳同卫立煌谈判。不久，组织上决定我作为随员同行。

我对去洛阳不大放心。上个月，我们刚刚打过朱怀冰和石友三，消灭他们二万多人；还听说朱怀冰负伤逃跑后，现正住在洛阳国民党军队的医院里。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到那里去，会不会被人家关起来当作人质？我问老总：

“被国民党抓住，坐牢怎么坐法？”

“不知道！”他不经意地回答。

“我们两人若在一起坐牢还好办，遇事有个商量。若是

分开怎么办？”

“当然分开，既然抓起来，他们就不会把我们两人关在一起。”

他说得十分认真。

我不免有点顾虑。我参加革命十几年，全都在红军队伍、苏区或是抗日根据地里，从陕北到五台山经过太原时，也是住的八路军办事处，从未在国民党那边生活过，更没有尝过坐牢的滋味。

老总看出我的心情，才笑着说：

“我的好同志！你放心，卫立煌这人不是顽固派。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抗日，佩服我们共产党，还去过延安。反共磨擦不是他的本意，是他上面的和下面的顽固派搞起来的。我们处处团结争取他、照顾他。这次他既来电报欢迎我去，就决不会把我们抓起来。”

“要是蒋介石命令他抓，他的手下人再要胡来呢？”

“我们刚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蒋介石为了稳住他全国抗日领袖的地位，对这些事还装作不知道，可见现在他还不敢公开反共。我现在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和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他们若要抓我，可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你说，他们敢吗？当然，提高警惕是必要的，我们要防备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你这次去，就要多负些这方面的责任。”

老总的话解除了我的疑虑，也使我感到担子的沉重。

动身前，彭老总专门找我谈话，交待我的责任，指出此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我也找了刘亚雄、丁一和浦安修。一方面交待我分管的一些妇女工作，同时请她们帮助收集和整理抗日根据地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的材料。她们很快地为我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的第一步是先到黎城一二九师驻地，朱老总在那里参加北方局的高干会，第二天就向洛阳进发。

和我们同行的，有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及冀察分会副主任王葆真，还有延安电影团的吴本立。他和一些同志在华北敌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这是我们当时仅有的自己拍摄的较大型记录片，极其珍贵。不久前他们接到通知，要他负责尽快将影片底片送回延安，以便送往苏联完成后期制作。正巧赶上和我们同行。同行的还有总司令部的袁晓轩，机要科长黄友凤，总供给部的周文龙，他们去洛阳都有自己的任务。袁晓轩身材高大，骑着一匹在平型关缴获的日本大洋马，每次都走在队伍最前面，常常被许多未见过朱老总的人误认为是朱德总司令。老总的秘书孙泱、作战参谋潘开文、卫士长李树槐和警卫班的人员也随着来了。负责护送我们的是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的三连。这是个有光荣历史的红军连队，连里还有不少红军战士。

袁晓轩带一个排走在最前面作为尖兵，朱老总、王葆真、周文龙、电影团、电台人员和参谋、警卫班走在中间，

三连指导员带两个排走在最后。王葆真坐的是一乘轿子，朱老总穿着一新。为了这次去洛阳谈判，供给部特地为他做了卡叽布灰军装，他腰系有“瑞金纪念”四字的宽皮带，骑在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上，大家都说现在看来他至少年轻二十多岁。他高兴得朝我点头，我也跟着大家笑起来。我们每人都准备了一身干净整齐的军装，等到了洛阳再穿。

我习惯同战士们一起走路，叫吴本立把他的四盒电影胶片放在我的马上。几位骑马的见我同战士走在一起，都下了马。总司令看见我们说说笑笑，也下马步行，同大家说话。王葆真看见忙叫停轿，走出轿来说：

“我也来凑凑热闹，参加你们八路军的官兵同乐。”

老总带头鼓掌欢迎，然后对他说：

“我们可都是走惯了的。你要是累了，就只管坐轿，别受拘束。”

果然，他说笑一阵，大概累了，就又上了轿。以后他只要看见总司令不骑马，就下轿陪着走一段。

我们要过的第一道敌人封锁线是邯郸到长治的公路线，在离公路四五里的一个村庄住下。这是个有地下党组织、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我们一面休息，一面做过封锁线的准备。老总提醒我说：

“那几盒电影胶片全是宝贝，万一损失就无法弥补了。放在褡子里，万一有失，夜里是很难找的，你去帮助想个办法。”

我找到吴本立，他听了很感动，觉得总司令想得实在周到，决定自己来背，这样比较安全。他立即把四个胶片盒从马褡里取出来打进自己的背包里。我掂量掂量他的背包，沉甸甸的，比别人的背包要重两三倍，担心他背不动，叫他取出两盒给别人背。讲了半天，说什么他也不干，说：

“四盒胶片是一套，万一丢一两盒，整个影片就不成套了。一个人背，自己也放心。再说过去也不是没有背过。我保证不掉队，安全突破封锁线。”

我只好同意他的意见，但说明到了安全地带，影片仍由牲口驮。

深夜里，我们悄悄从村庄动身。天上繁星点点，凉风拂面，有时还能闻到山花的香气。现在正是春天最好的季节。我和三连长、袁晓轩带着部队来到公路边上。地方游击队报告：“已经派队伍将两头敌军据点监视起来，敌军巡逻队刚过去。现在正是过路的好时机，要迅速过去，迅速离开。”我立即下令：

“按行军顺序，跟随向导，迅速通过公路封锁线，继续前进！保持安静，紧紧跟上！”

远处可以看见敌军巡逻车的灯光在不停地移动。更远处闪烁亮光的地方是敌军据点。不时传来附近村庄上的狗叫。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紧张，连走带跑气喘吁吁。我站在公路中间，观察通过的每一个人。我担心吴本立背着四盒胶片跑不动，一再叫向后传：

“电影团的吴同志上来没有？”

当电台的同志赶着牲口到我面前时，告诉我吴本立就在他们后面，我急忙迎上去，黑暗中认出了他，感到他喘着粗气，就伸手去夺他的背包。这是红军时期行军时我常做的动作。吴本立也认出了我，我的手刚碰到他的背包带，被他的一只大手挡住了：

“康主任，我不累！保证一口气到达目的地。”

“这一片全是敌占区，还要走二十里才是我们的控制区，我帮你背一段，然后你再接着背。”

“二十里算什么，我曾经一气背几盒胶片走四十里哩！谢谢你，等我背不动了，一定请你帮忙！”

没有办法，他是那样执拗。正在这时，听见隆隆的汽车声，远处移动的灯光越来越近了。等到最后一个人通过了公路，敌人的汽车灯已经照亮不远处的山林。在我们离开公路约一百米时，轰轰的车队声通过了我刚才站立的地段。

拂晓前，进入了我们的控制区太（行山）南地区的平顺县。天亮后，平顺县长带着县政府和牺盟会的代表前来迎接。下午，新一旅旅长韦杰、政委唐天际前来迎接，随后到达新一旅旅部驻地壶关县郭家垞。不久前，新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牲口。他们把大部分战利品陈列起来，请我们去看，并向总司令汇报。看着听着真叫人心花怒放。王葆

真连声称赞“打得好！”当着总司令的面翘起大拇指：

“八路军在你这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麾下，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再往南去，就是国民党控制地区——高平县境了。老总对我说：

“吴本立带的电影胶片，要防备国民党的检查。他们要存心捣乱，不用没收，只要把盒子打开，叫胶片全部曝光，就全完了。我想还是放在我的公文箱里比较保险，他们是不敢搜查的。”我们觉得总司令言之有理，这就万无一失了。

进入国民党控制区

一进入高平县，就感到同抗日根据地截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满目荒凉，人民生活困难，吃草根、树皮，村庄附近凡能吃的树皮都扒光了，树叶全捋光了。路上偶尔遇到几个老百姓，全是面黄肌瘦，神色憔悴。

国民党二十七军的一个连在边界附近一个小村庄上迎接我们，老总讲了几句感谢和鼓励的话，由他们带路继续前进。这个连分明是经过挑选的，比一般国民党军队外观上要强得多，个个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不把我们三连放在眼里。后来他们发现三连竟然背着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人人腰里缠着日本军的六五皮子弹带，每个班还有一挺日本歪把子轻机枪，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他们的上尉连长低声地问三连连长：

“你们是不是司令长官的警卫队？”

“不！我们是太行游击支队，这次执行临时任务，护送总司令去洛阳。”

“你们游击支队都像这样，全是日式装备吗？那八路军正规军呢？”那个上尉惊讶中带着几分狐疑。

我在旁边听出了兴趣，忍不住插话说：

“不瞒你说，到现在我们的武器上面没发多少，全都是从日本人手里缴来的。谁缴得多，先装备谁，剩下的再给别人。这两年我们胜仗打得多，所以不论正规军、游击队，差不多都换成了日式装备。”

“听上司说，八路军游而不击。真是耳闻不如目见哪！”

上尉说着，发出慨叹。我立即说出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你现在可以明白了，八路军是英勇抗日，还是游而不击。”

他听了，仔细地打量我一阵，忽然问道：

“你不会是个女八路吧！”

“你看我是个男八路，还是女八路？”

我想使气氛活跃一些，就带着几分玩笑向他反问。谁知他吃惊地瞪大眼睛，神情惶惑，好像有些不知所措。

“我还有事，你们谈吧！”我借口走开了，听他轻声地问三连连长：

“这一位是……”

“啊！她是我们总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朱副司令长官夫人。”

“啊！”只听他一声惊讶。

经过一天半的行军，到达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部所在的陵川县。这里地势很高，被称作“太行屋脊”。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带人在军部门口列队迎接。朱总司令同他寒暄几句，他恭恭敬敬带着我们到院子里，让进了会客厅。三连被安置在附近一座大庙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心情有点紧张。虽说老总一路上给我说了不少宽心话，我依然觉得随时都会出现意外情况。对范汉杰同朱老总的谈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叫李树槐安排住处，就同特派员到三连的驻地，顺便了解一下周围的地形和民情。

三连连长和指导员看见我们，远远地就迎上来。说：

“大庙里地方倒挺宽敞。可是离首长住地这么远，一旦有情况，叫我们怎么执行任务？”

这确是个问题。从军部出来，我已看了一路。在这个住满军队的小县城里，很难再为三连找到一个合适的住处。三连是个满员连，一百八十多人，只有在这里，才能住得开。我又想起朱、彭两位老总对我说过的话。既然人家请我们来，就不能一点也不相信他，何况他也不敢轻易搞我们。若真的动手，光靠一个三连也不行。于是就对他们说：

“你们想的很对。不过人家既把我们以客人相待，我们也就不必考虑太多，保持高度警惕就是了。要叫他们看不出来，这叫外松内紧。要表现我们八路军英勇沉着的风度，不要弄得草木皆兵，叫人家笑话。加强岗哨值班，夜里睡觉可以不脱衣服，枪支弹药放在身边。有了情况，随时联系。”

等我说了，特派员又布置了他们要注意的保卫事项。后来我们一起在大庙里面和四周转了一遭。看见战士们全是紧张的临战状态，我对大家说：

“现在我们跟随总司令到了友军的防区，大家保持警惕是对的，但必须抓紧时间轮流休息。这里到黄河边，还有好几天的路，还要经过敌人占领的地区，不注意休息，就难以完成护送总司令的任务。”

晚饭后，我把这些报告总司令，他同意我的做法，又提醒说：

• “告诉同志们，千万不要把自己搞得过分紧张！”

这第一夜，大家心情都十分紧张，干部虽未实行坐班，也都未能睡好。

从总部动身前，我们已准备好沿途国民党军队抓捕我八路军和地方抗日人员的有关材料，其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陵川县里就有不少。昨天一到，总司令当面向范汉杰提出，希望释放陵川县监狱在押的八路军、决死队的人员和地方抗日工作人员，以及抗日军人的亲属。在释放前，还

打算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们。

王葆真对范汉杰说：

“卫司令长官面谕：途中凡朱副司令长官提出要求释放在押的八路军等人员，均应予释放；如有特殊情况，应速电告。”

范汉杰表示即予遵行，第二天上午即可去监狱探视。

第二天早饭后，二十七军政训处派了一个中校军官带我们去看在押人员。他们把一百多人集中关押在监狱的一个大院子里，其中有少数妇女和孩子，得知朱总司令要来看望他们，一见到我们就欢呼起来：

“抗日无罪！”

“制造磨擦、破坏抗日有罪！”

“回八路军去打鬼子！”

“坚决跟随朱总司令抗日到底！”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人一边喊，一边擦眼泪，叫人感到同志们的可爱，顽固派的可气、可恨。有的人跑过来当场要跟我们走。老总给他们讲话，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叫他们做好准备，很快就会有人带他们走。临走时，老总叫我向监狱长要了一份花名册。回来后，老总立即决定三连抽出两个班，由一个排长率领接他们出狱，并护送他们到太南抗日根据地。

又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来到国民党四十军的驻地羊

北河。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请朱副长官给他们的军官讲话。朱老总给他们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大敌当前，要以团结为重，互谅互让，才不致被敌人和暗藏的亲日派挑拨利用，才能取得抗战胜利。他举了一些古今事例，使许多人受到感动。

第二天傍晚，走到接近敌占区的封锁线。四十军一个营在附近守候。他们说，已在这里等了一天一夜，白天挨了日本人不少炮弹，大概是被日本人发觉了。老百姓的房子被打坏不少，所幸部队没有多大伤亡。老总关心地再三询问，他们才说：只是几个弟兄受了轻伤，已经送到附近师野战医院去了。我听旁边一个国民党士兵向三连战士嘀咕说：

“你们要是晚到一天，我们就怕完不成这次接送副司令长官的任务了。”

他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可以看见一些残垣断壁，还有几处余火未熄的袅袅烟丝，那损失和伤亡是轻不了的。他们把我们带进一处完好的村庄休息，天黑以后，护送我们通过封锁线。封锁线上，可以看见不远处敌人的碉堡楼里射出的灯光。在据点周围和附近的公路线两旁都拉有铁丝网。我们经过的时候，早已有人打开路口两边的栅栏门，一连队伍在监视敌人的据点。除了远处的狗叫，树上的惊鸟，再听不见别的声音，也不见敌人的巡逻队，气氛不像我们根据地那边紧张。这说明他们双方很少打仗。

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不久，国民党二十九军派一个连来接应。连长同三连连长碰巧是陕西老乡，老乡见老乡，谈吐分外香，两个人很快就无话不谈了。他对三连长说：

“我们的队伍在冀南，先说是打鬼子；后来被你们八路军的一个支队揍了个老厉害。要不是我们团长见势不好，带头跑得早，就怕现在我们还都在你们那里当俘虏哩！我们是两星期前，刚刚换防到这里。”

“你知道那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吗？”

“我也说不清楚，政训处长官说，是八路军抢占了我们的地盘，叫我们把地盘夺回来。”

“我们八路军只知道抗战打鬼子，只从鬼子手里夺回被他们占领的地盘。对你们这些兄弟友军，希望共同团结抗日，决不会夺你们的地盘，也决不打第一枪。但是我们有四句话，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冀南那一仗，是石友三先动的手，逼着我们不能不打。”

“哦，是这样……”他若有所悟，像是明白了。

我在后面听着两人的谈话，这时挤到两人中间，对那位连长说：

“虽说打了仗，我们总还是一家人，还要共同团结抗日。这次我们朱总司令到洛阳，就是要同卫司令长官谈判，解决一致抗日的问题。你们来接我们，不也是为了共同抗日吗？”

说得他连连点头，说：

“能这样可就好了。我们当兵的谁都希望这样。”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五月上旬，我们到了河南省的济源县。来到王屋山，朱老总走到这里兴致特别高，他问我们几个人，知不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我们几个人没有一个能答得上来。老总说：“这是古书《列子》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然后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给我们讲了一遍，几个人都听得十分有趣。他讲完后又说：

“按照这个神话故事，愚公门口的两座大山一个叫太行山，一个叫王屋山，两座山都在这里。只是现在看来，太行山比王屋山要大得多。王屋山只是太行山脉南端的一小部分。愚公说不定就是这一带的人哪！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干一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决心，恒心和毅力。”

我第一次听他讲这个故事，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毛主席在“七大”结束时，又讲了这个故事，联系到整个革命事业，寓意更深了。

王屋山已是太行山的最南端。我们走到山的尽头，向南望去是黄河冲积的一片平源，背靠崇山峻岭，面对滚滚浊浪，在灿烂的阳光之下，不由人心旷神怡。我又想起了《在太行山上》那首雄壮的歌。老总更是激情满腔，要来笔墨，在山上古庙里写下一首七言绝句《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谈判见闻

下了太行山，很快就走到黄河边上。在河南浉池县境渡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已派专人在渡口等待。过河后，分乘几辆小、大汽车来到洛阳。洛阳是好几个朝代的首都，同我以前到过的许多中小城市大不一样。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第一战区的司令长官部。卫立煌带着手下的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老总上去同他们亲切握手寒暄，其中许多人他早已认识。王葆真把我拉到前面，向卫立煌介绍：

“这是朱副司令长官的夫人康克清女士。”

“欢迎！欢迎！我们在临汾好像见过。”

卫立煌立即上前同我握手，他的记性很好，说他还记得那次欢迎大会上，我领着大家喊口号的情景。他这么一说，我也记起来了，忙跟在老总身后同他们一一握手。到客厅里坐下后，朱老总同他们谈笑得很热闹。卫立煌问我一路上累不累？走这么远的路习惯吗？没有等我答话，王葆真就插上来说：

“康女士真了不起，这一路来，行军、休息、宿营的指挥、安排全靠她哩！”

晚上，卫立煌为我们设宴洗尘。将军们都带了夫人作陪，只是未见卫立煌的夫人，后来才知道他的夫人去世不久。宴会开始，卫立煌起立为老总敬酒，然后说：

“为欢迎朱太太光临我们第一战区，我敬朱太太一杯酒。”

我心里直纳闷，这朱太太是什么人？想必是他们另外请的客人，紧跟老总后边就给她敬酒，一定是位重要的人物。刚才怎么没见介绍？这时卫立煌举杯朝着我看。老总在在我身边见我不动，用手捅我一下：

“人家给你敬酒，没听见么？”

我这才明白过来，朱太太就是我，急忙站起来声明说：

“对不起，我没有听出来，因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称呼。”说得全屋的人都笑起来。卫立煌一边笑一边说：

“我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朱太太，以后你可别再闹误会罗！”

卫立煌开了头以后，那些作陪的将军们都一个接一个地过来向老总和我敬酒。我再三说明不会喝酒，只能勉强上上口，表示一下。

酒宴快要结束时，卫立煌把年轻漂亮的长官部参谋长的夫人叫过来，对我说：

“今后请参谋长太太陪你。你们两位太太一定会合得来。朱太太今后有事，找参谋长太太就行。”

这位参谋长太太人很机灵，待人热情又随和。她听说

过我能双手打枪的传闻，总想要我讲点过去打仗的故事。我说：“那都是以前国共两党打仗的事，现在还有什么好讲呢？”

这天晚上，一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长官部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演出河南梆子《涤耻血》。原来，这个演出团是前年春节卫立煌向朱老总提出，经朱老总同意，派人帮助他们建立起来的。这出戏演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故事，内容不错，有的地方叫人感动。只是我第一次看河南梆子，对那高声尖叫的唱腔很不习惯。

晚上看戏回来，我对老总说：

“听他们喊我朱太太，我周身都不舒服，真别扭极了。”

“对嘛！干革命不当官太太，当官太太不革命。我赞成你这个思想，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也不希望你只当我的太太。不过他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成了习惯，我们既来了，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见我不说话，他又说：

“我们到这里，主要是做统一战线工作，需要保持警惕性，也需要改变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习惯。只要不涉及原则立场，一切都要服从工作需要。”

我们到洛阳的第二天，一战区要开个欢迎大会请朱副司令长官讲话。会前卫立煌来同总司令商量，看到我就说：

“朱太太，我看你带的那支手枪太大。那是男同志的玩艺，女同志带着总觉得不合适。”又说：“我这里有支德国

小手枪，叫‘掌心雷’，还有一百发子弹，都送给你。”

我悄悄看老总一眼，见他有首肯的表示，才收下礼物，向卫立煌道谢。

坐在一旁的老总说话了：

“辉珊兄（卫立煌的字），你这么客气，也该我们送你一点东西了。”说完，转身叫卫士长李树槐拿出日式手枪、战刀、一架日本望远镜和一件完好的日本军官呢大衣，又拿出一包图书、报刊。

“这些书报是我们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这些战利品全是不久前缴获日寇的。东西不多，请你笑纳。”

他叫随从副官把这些全部收了起来，然后一起去参加欢迎会。大礼堂里面坐得满满的，卫立煌讲了热情的欢迎词，总司令讲了抗战形势，然后讲了团结抗战的重要，闹磨擦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等。台下近千的听众鸦雀无声。我坐在一旁也听得入了神。等他一讲完，全场发出热烈的掌声。旁边的几个军官说：

“我们头一回听这样新鲜的政治演讲，讲得太好了。”

我巡视全场，发现有些人没有鼓掌，有一个人还制止别人鼓掌，并在说些什么。

当天下午在长官部的会议厅里，双方开始会议谈判。这一边，总司令的随行人员全部参加，不过五六人；那一边除了卫立煌、王葆真，参加的人超过我们一倍。有的顽固分子先发制人，谈判一开始，就指责我们“进攻石友三、朱

怀冰的军队，是制造磨擦、破坏抗日的不法行为……

卫立煌听到这里，气得一拍桌子：

“朱副司令长官亲自到洛阳来，是为了共同协商解决问题。不能允许你们胡说八道！”

这才煞住了那几个人的气焰。

总司令这才沉着地用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事实真相。总司令的一番话，有理有据，说得他们无言以对。

随后进入了具体问题的谈判。谈判桌上有斗争，谈判桌后面的斗争更为激烈。当时就听说有人散布卫立煌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卫立煌已经被共产党拉过去了”。总司令针对这些，以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党的豁达大度和坦诚地团结抗日的愿望，做到既斗争又团结，作出必要的让步，力促协议的早日达成。

经过连续两天的谈判和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了几项协议：冀南豫北国共两方驻军以漳河为界；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补发近年来扣发八路军每月六十万元军饷，等等。

有一天我们乘车参观洛阳有名的古迹龙门石窟。那里沿着高大的石山开凿出一些巨大的石窟，里面精工雕凿了许多大小石佛像，形态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其中一个洞窟，据说共营造二十四年，一尊释迦牟尼坐像，高约九米。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佛像，站在那里，要仰着脖子朝上看。在石窟洞外，还有一座全是用石头建筑起来的

方形四层石塔，据说是唐代武则天主政时建筑的。

老总对大家说：

“这是一千多年前，从北魏到隋唐时期，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文物，是闻名全世界的艺术珍品。”可惜的是不少佛像已残缺不全，有的在石壁上留下大疤痕，佛像不知到哪里去了。长官部领着我们参观的副官说：

“这都被人盗走了。”

老总感慨地说：“保卫和发扬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进行革命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

三连驻地离长官部有二里多路，只要有空，老总和我总去看他们。三连刚到洛阳，就引起驻地老百姓的注意：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装束，一色的日式武器装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见到老乡总是笑脸相待。听说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八路军，每天都有不少人跑来看望。不少青年学生到三连驻地找战士们谈话，了解前方和八路军的情况，有的报社要派记者采访。这事被当地国民党地方党部发觉，立即以安全为名，在三连周围派上岗哨和便衣特务，禁止人们同三连战士直接接触。

每到傍晚，三连就到驻地附近小学校操场上打篮球。老总晚上没有事，就带着我们一起同他们打，一律按身材高矮站队，按单双数分两边。每逢这时，操场周围总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都是人，忙得国民党的特务们临时加入，防备老百姓同我们接触。不知怎的，观众当中有

人认出了朱老总。

“你们看，那个年纪最大的，就是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

“总司令是大官，起码也是个上将，哪能随便同当兵的一块玩，不怕失了身份？”

“这就是他们八路军的特点，叫做‘官兵平等’，不在意就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

“……”

这是我在场边休息时听到的一些对话。后来，观众们终于相信了那确实是朱德总司令，对八路军这样的人民军队印象更加深了。

在洛阳，我们仍然执行星期天的制度。到了星期天，战士们可以轮流上街购买需用的日用品。战士们自觉遵守纪律的行动，进一步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到处流传有关八路军战士的美谈。卫立煌知道了，就问朱总司令：

“你们的兵像这样随随便便上街，如果乘机开了小差，怎么办？”

朱老总听了，哈哈一笑说：

“我们还在红军时期就是这么办的。我还没有听说有星期天上街开小差的事。”看着他不解的神色，朱老总又接着说：

“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他们都是自觉的革命战士，懂得只有抗日救国才是自己的出路。抗日救国最光荣，当

逃兵则是最可耻的。”

卫立煌连连点头：

“是啊！我们现在治军，要都能达到你们这样就好了。”

我们离开洛阳的前一天，朱老总到三连讲话，给他们很高的表扬和鼓励：他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下一个任务是由黄友凤科长和特派员率领他们胜利地返回八路军总部。

经西安返延安

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我们乘火车离开洛阳时，卫立煌亲自带人送我们上了火车。这是专为朱老总准备的一节专车车厢。有卧铺间，还有办公、开会的地方。

因为防空和防备黄河北岸敌军炮击，火车在傍晚以后才开。到了风陵渡南岸附近，前面铁路被日军炮火破坏了，只得下车，~~虽是夜里，~~骑上牲口很快就到了华阴车站，那里已有一列火车在等着。次日拂晓时分，到达西安车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带着办事处的同志们，早已在车站等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派人迎接。老总决定还是住在办事处，住在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一到办事处，伍云甫就请老总给大家讲话。在老总讲话时，伍云甫向我介绍了办事处周围的情况。办事处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门口外面那些小商小贩和来往

转游的人，许多都是特务。有人出去，他们就盯梢。一些青年学生、工人到这里来后再出去，也成了他们盯梢的线索。办事处南边不远处的一幢小楼已被他们买去，不分白天黑夜，那里都有人用望远镜向这边窥探和监视。西安经常发生绑架的事，经济性的叫绑票，为的勒索钱财；有的是政治性的，针对我们和一些进步群众。前天办事处的一个运款员失踪了，现在还没有查到下落。所以办事处规定，晚上一般都不外出，白天出去也要在两人以上；在外面吃饭也要防备有人下毒。头面人物请客，他们不敢放毒，但也要有一定的警惕。

我们到西安的消息传得很快，一些报社记者不断来向总司令采访；学校、机关、群众团体请他去作报告。有人来找我，说西安的新闻界和妇女界联合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要我去谈谈华北敌后妇女工作和妇女参加抗战的情况。这是让大后方人民了解抗日根据地的好机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等人一走，我不免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当众讲话。老总看出我的紧张情绪，对我说：

“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做好。过分紧张不利于工作。你要把听你讲话的人看作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不要总觉得他们都是文化很高的知识分子。他们来听你讲话，是为了知道八路军和根据地的情况。因为我们八路军、根据地有许多值得他们羡慕和学习的东西。你不能叫他们

失望，一定要如实地把这些告诉他们。你只要保持自己的本色，老老实实在地讲，一定会讲好。”

听了他的话，我冷静下来。经过一番准备，在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会场。我对会议主持人说：“我不习惯会前向大家介绍，等到了开会时间，站起来一说就行了。这样比较随便自然。”座谈会在院子里举行，会场布置得很随便，我挑选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坐在门旁的台阶上。这天人来的很多，还不到开会时间，不大的庭院树荫下早已座无虚席，院子里很快站满了人，连过道台阶也都是人。人多使我高兴。我记住老总的話，决不能紧张。当听到主持人宣布开会时，我就从容地站起来：

“就在这里讲好吗？”

“这位就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夫人康克清女士，她刚从山西省太行山前线归来，现在欢迎她给我们谈谈华北前线和敌后妇女抗日斗争的情况。”

我把已准备好的内容一层一层地讲了出来。我为在敌后积极向敌寇作斗争的妇女事迹所感动，我介绍的内容又感动了到会的每个人。我感受到讲话的效果，就更加自然从容了。等我讲完坐下，立即展开讨论，她们提出不少问题，一致希望我再多谈一些前方姐妹的故事。我尽自己所知，又谈了一些。后来因为时间早已超过，主持人才宣布会议结束。这次座谈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周恩来从延安去重庆，在西安停留期间，多次同朱总

一同会见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有时把我拉去作陪，还在他们那里吃饭。他们请客，只要有“请朱副司令长官及太太光临”的字样，我就得去出席。说实话，我对这一类的应酬，实在不愿意参加，但老总说这是任务，也是革命工作。我只好勉力而为。

我在跟随他们参加上层应酬中，得悉发生了一件事。前面说过，办事处的运款员吴永昌失踪了，估计是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去的。我把这件事告诉朱老总，老总详细地询问了他失踪的前后情况。在蒋鼎文请吃饭的时候，提出了这件事，请他们通知有关方面，尽快把人放回来，否则，我们只好登报声明并揭露事实真相。老总的话说得很婉转，比较客气，但意思十分清楚。周恩来也讲了一些话。这使得蒋鼎文他们都不敢等闲视之。蒋鼎文当场表示，若真有此事，他要严厉处置胡作非为的人。三天以后，办事处接到西安市公安局的通知，要办事处去领人，说吴永昌是违反治安规定被拘押的。把他接回来以后，才知道他被国民党中统局抓去拷打逼问，他什么也未说，前天转到警察局。他浑身是伤。后来他跟随我们一起回到延安。

将要动身回延安前，伍云甫提出要借总司令回延安之便，帮助带一批延安急需的通讯器材。他说，上次用卡车运一批延安兵工厂需要的钢材、枪筒，怕查出来，外面用棉军衣裹住，结果还是在半路上被查出来，全给扣下了。这次为了稳妥，在卡车上用木板做了一个夹层，把通讯器材

材塞到夹层里面，上面依然是一批新做的棉军服。朱总司令亲自坐在第一辆车的驾驶室里，并打出一块牌子“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专用车”。这一着，果真有用，一路上既无阻拦，更无盘查，顺利地把这批通讯器材带到了延安。

和我们一同去延安的，还有作家茅盾和他的夫人、儿子和女儿，社会科学家张仲实等四十多人。这一来，我们的人员大增，增添了许多乐趣。我们分乘四辆大卡车，一路上也可算是浩浩荡荡了。第一天到铜川，朱老总同茅盾、张仲实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促膝谈心，直到深夜。

第二天中午，我们来到中部县黄陵所在地的山脚下。顺着台阶爬上桥山。山上有很大一片园林，全是千年古柏，林木森森，气象宏伟。这里就是我们祖先黄帝的陵墓。我们在陵墓前面停下来，一起照相留念。大家绕着巨大的陵墓走了一圈，又登上汉武帝率十八万大军祭黄陵时修建的“祈仙台”。从台上下来，老总请茅盾先生给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

“我看，还是总司令来讲最好！”

朱老总微笑着，带头鼓起掌来：

“欢迎茅盾先生给我们谈谈黄帝的故事。”

一片热烈的掌声使茅盾先生难以推辞，只好回身站到台阶上给大家讲起来。他是浙江人，话不好懂。我连听加猜，懂个大概，知道黄帝是我国五千年前古代文明的开拓者、创造者，是第一个统一中原的人。当时还没有文字记

载，他的史迹全由传说流传下来。以前黄帝的陵墓所在地传说不一，有说在河南，有说在河北，有说在山东，还有说在甘肃。司马迁写《史记》时，为这一问题作过大量调查，又专门到桥山附近考察了四十多天，最后肯定了“黄帝崩，葬桥山”，就是现在的陵墓所在。

那天老总也讲了话，他说：

“从黄帝开始，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但是最近一百年来，我们受尽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欺辱，人家叫我们‘东亚病夫’，说我们是‘一盘散沙’。现在，我们民族觉醒了，全国人民点起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朱老总的讲话言简意赅，深深地打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们的车队来到延安。我在想，离开两年多的延安会有什么变化，远远看见延安南门外黑压压的有许多人，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到了近前，老总看出是来欢迎我们的，忙叫车子停下，带头下了车。来的人有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的负责同志，各学校、机关、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朱老总一面同大家握手，一面把茅盾、张仲实向大家介绍，我

也被许多久别重逢的熟人包围起来。大家说着走着，不觉之中来到延安南门外的大操场上。一抬头，那里竟是早已布置好的大会会场，主席台上面一条红幅：

“欢迎朱德总司令胜利归来！欢迎茅盾、张仲实先生！”

原来要在这里开欢迎大会。

在主持人的招呼下，我也随着上了主席台。台下万头攒动，红旗招展，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使人感到无比的亲切热烈。

会上先由总司令讲话，他的话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茅盾和张仲实也讲了话。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从西安到延安，我们又回家了。

——茅盾——

第十章

延安岁月

大生产运动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毛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一九四〇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就开始搞起来了。

朱老总也一直惦念着生产的事。他把急办的事办得差不多了，先后约了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曹菊如、伍云甫等同志，一起到延安西川一带的裴庄、盐店子、高桥、砖窑湾、西河口、河家岔等地视察那里的通讯材料厂、农具厂、造纸厂、难民纺织厂、卫生材料厂等。又到安塞，看了那里的纺织合作社、第二机器厂，以后又去杏子河川的茶坊、纸坊看了第一、第三机器厂和八路军印刷厂。这些都是红军到陕北这几年搞起来的，大半是手工或半手工操作；一部分采用机器生产，规模都不大，工艺水平也比较落后，按当时条件看已觉得很不错了。表明我

们在陕北已迈出了自力更生的第一步。我只要有空，每次都跟着去了，老总看得很仔细，问得很认真，所到之处，都开了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

高桥镇难民纺织厂的工人多半是从国民党地区和敌占区逃荒到陕甘宁边区的难民，其中还有少数红军和八路军的家属。这个工厂解决了一大批难民的生活，解决了边区人民穿衣的部分需要，又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朱老总和董老、徐老听了他们的汇报都十分高兴。老总说：

“这个纺织厂办得好，办得对，一定要把它越办越好，成为边区最好最大的工厂，要很好地利用边区的资源，不但搞棉纺，还应当搞毛纺。边区羊毛、骆驼毛很多，可以纺毛线、织毛衣，也可以织毛呢、毛毯。”

董老、徐老、张鼎丞……都赞成老总的意见。他总是强调：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发展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并准备~~应付最大的困难，使边区的经济从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达到巩固边区，逐步改善边区人民生活，为更好地支援前方抗战作出贡献。在工业方面，他经过调查，提出要充分开发边区资源，以发展纺织业和发展盐业为主，来带动各行各业。要发展多种经济，提高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益，把边区建设成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模范区，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巩固后方。

老总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发挥军队在生产上的巨大作用。他对我说：

“两千年前，还在西汉时代，我国就实行过屯田政策。封建帝王都懂得叫驻守边境的军队种田生产，减轻国家的负担。前方敌后现在正在打仗，但是像陕甘宁边区这种环境，军队驻防，平时很少打仗，为什么不能多搞一些生产呢？前方抗日根据地的后方机关有些也是可以酌情搞些生产的。”

既要屯垦，就要有合适的地方。他听人说南泥湾是个富饶的好地方。他就带上秘书、参谋等身边的人员，和八路军留守处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去调查，实地踏勘。

几天以后，他回来高兴地说：

“这一回我把南泥湾、临镇、牛武镇一带全跑到了，可称得良田万顷，真是块好地方啊！可惜荒芜了这么多年。这一次党中央决定调三五九旅回来，防备顽固派的进攻，可以到那里一边驻防，一边生产。平时不打仗就可以开荒生产。一个旅用不多久，就能把那里变成陕北江南。”

他像孩子般高兴的劲头，也感染着我。第二天他就向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有名的“南泥湾政策”，很快得到同意。

这年年底，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奉调回陕甘宁边区。老总见到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就说：

“王胡子，你带这么多人回来，边区是个穷地方，地广人稀，养活不起你这个部队，怎么办？”

当年，王震曾像马克思那样留过满嘴大胡子，所以王

胡子就成了他的雅号。后来，他把胡子剃掉，雅号却去不掉了，直到今天，老同志们还习惯地这样称呼他。他听了老总的话，瞪大了眼睛，正在思索老总说话的含意，老总接着又说：

“还是红军时期的老办法，军队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不过当时因为敌人围剿频繁。未能大规模搞起来。现在有一片肥土地。我已经看过，就在南泥湾。那可是块硬骨头，吃下去一定有滋味，就是啃起来费劲，王胡子，不知道你敢不敢要？”

王震把大腿一拍：

“有什么不敢的？只要是你老总说的地方，再硬的骨头我也把它啃下来，再大的困难我也非拿下它不可。老总！南泥湾在哪里，我现在就带人去看。”

“莫急！莫急！时间有的是。今天你先在我这里吃饭，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看。”

第二天，老总就同王震一起带着三五九旅几个团的负责人，再次到南泥湾仔细勘察。当时的南泥湾一片荒凉，渺无人烟。他们白天翻山越岭，爬沟跳涧，远眺近看，在地图上标记。晚上在山崖边，破窑洞的灯光下规划未来生产的种种设想。那里因为长久无人去过，白天经常碰见野禽飞鸟、鼠兔獐子，晚上经常听见阵阵凄厉的狼嚎。

一九四〇年冬，边区政府召开延安各界生产动员大会。边区政府主席林老在大会上讲话。特别说到：

“朱总司令最近曾到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对我们生产建设有很大贡献。”

一九四一年还没有开始，边区的生产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这年春天，我们从杨家岭党中央的住地，搬到王家坪中央军委的住地。到王家坪以后，老总就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作两半，一半留在王家坪工作，一半由卫士长李树槐带到南泥湾去，在王震的领导下办一处农场。同时，他自己动手，带着警卫员、公务员一起在中央军委总部大门两边开垦出两块菜地，大约有三亩左右，种上了白菜、水萝卜、菠菜、葱、蒜、韭菜、辣椒、西红柿、豆角、南瓜、黄瓜……十几种蔬菜。他每天一清早和工作之余，就带头到菜地里浇水、施肥、锄草。一畦畦整齐的菜园，绿油油的小苗由小变大，渐渐长高，有的爬上了支架，很快就枝繁叶茂，开花结果，许多蔬菜相继可以食用了。有人见他劳动，觉得他工作忙，年纪又大，请求代他劳动。他说：

“我这既是劳动，也是运动。你要高兴，就来跟我一块干吧！”

这时，我已住进了中央党校，每个星期六回家，在他的带动下，也跟大家一起到那两块菜地里忙上一阵。

总司令的行动成了一个无声的命令，中央军委总部机关的人很快都行动起来。机关的高干生产组提出保证为边区棉纺生产需要，种出三亩好棉花，跟着各单位都制定了

自己的生产计划。随着生产劳动的发展，部队机关又组织大家挖水沟、修水利、修路、填坑、……把王家坪很快变成了舒适、美丽的地方。

七月里，老总要我同他一起到南泥湾看看。王胡子高兴地为我们开了欢迎会，请总司令讲话。他们白手起家，经过半年艰苦奋斗，解决了住房和吃粮。秋粮下来以后，可以基本自给。老总高兴地号召他们：

“今年粮食力争自给自足，明后年达到耕二余一，向边区政府缴公粮。”

会后吃饭，王胡子拿出他们刚收下的新麦做的白面馍和面条，自己种的菜、养的猪、喂鸡下的蛋，池塘养的鱼。这顿饭菜全部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听着他的介绍，老总说：

“吃你这顿饭，真比什么山珍海味还要香。因为这是用自己的汗水浇出的果实呀！”

王胡子高兴地说：

“总司令，南泥湾这块硬骨头我可是啃下来了。现在已经有了点滋味。明年你再来瞧吧！”

后来，我们又去看了李树槐的那个农场，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好景象，到处都叫人高兴不已。

一九四二年七月里，老总陪同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再游南泥湾，我也去了。过了一年，南泥湾真是大大变样了。老总和四老当场赋诗应和。可惜我不会作诗，要不然也要跟着他们凑上一首。

老总写的诗，最近查出来，全文如下：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已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梢。

从此，南泥湾有了“陕北江南”的美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

“南泥湾政策”》。

一九四三年十月，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听说南泥湾被三五九旅搞成了“陕北江南”，要去看看。老总和我陪着他和邓颖超，还有刘少奇、洛甫、王稼祥一起去参观，先后几天里，到过旅部、七一八团、七一九团、补充团，看了大田和已收的庄稼，参观了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厂、妇女毛纺厂，听了汇报介绍，又去看望了医院里的休养员。三五九旅已开出荒地十万亩，这一年已收粮一万二千石（二百四十万斤），全年可达二万石。粮、油、菜、被服，经费已可全部自给而略有节余。达到而且超过了老总在年前提出的目标。他们不但完成了光荣的屯垦任务，还打退了顽固派的进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和边区生产展览会，朱老总在闭幕大会上有一段讲话。他说：

“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参加军队以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以后还是工农。他们的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

一九四四年底，三五九旅已经开荒种地二十六万亩，收粗细粮三万多石，上缴公粮一万石，平均每人生产粮六石一斗，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达到耕一余一的水平。军队从事生产，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当时人民的主要负担是上缴救国公粮。一九四三年，边区政府收救

国公粮十八万石，一九四四年减为十六万石，一九四五年减为十二万石。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少有的。

大生产运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党校生活片段

我一九四〇年回到延安后，深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知识。我征得朱老总的同意，按照组织手续到中央党校报了名。

党校十一支部几乎全是红军时代的老同志，大部分又是工农干部，所以把文化课作为第一年的主要课程。在学校开始专门学了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被册支。这次文化学习比较全面，读了许多好文章，像朱自清的《背影》。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也很紧张、活泼。每天课后总要打打篮球、排球，有时到野外延河边散步。每个星期六回家，星期一返校，我总要把老总那片菜地里的黄瓜、扁豆、西红柿或腌制的辣椒带一些给大家吃。几个女同志一起先把菜做好，然后敲着盛菜的洗脸盆喊叫男同志：

“我们这里有好吃的菜，消灭不了，你们男同志肚子大，快来帮助打冲锋吧！”

这些男同志已经有了经验，每逢这个时候，早就有了准备，听见脸盆响，就端着菜盆跑过来：

“克清同志，我们不能总是沾你们的光，也一起尝尝我们的菜吧！”

他们那大锅菜，我们也照样各有一份，大家感兴趣的，自然还是我带来的新鲜蔬菜和小菜。十几双筷子一起集中打歼灭战，一阵快打猛攻，满满一盆菜霎时就光了。回头看看我们几个女同志还不曾动手。

“女同志到底是女同志，打仗冲锋、吃饭抢菜还是不如我们啊！”

“吃了我们的菜，还瞧不起人，下次看我们的！”

有一次回到王家坪，老总在火盆上炖猪蹄子，高兴地对我说：

“这是我的手艺。你瞧，我也能烧菜给你吃了。快尝尝吧！这猪蹄子可是好东西！”

“我不吃！”

他听我一说，十分诧异：

“这么好吃的东西，你怎么不吃？”他像是担心我有什么心情不愉快的事。

“我这个人在吃东西上，毛病比较多，猪心、猪肝、猪蹄子这些一概不吃。”

听我这么一说，他遗憾地摊开双手：

“哎呀！结婚这么多年，我竟然忘了了解你这方面的情况，太可惜啦！”

我连忙说：

“这不要紧，你把给我吃的那份拨出来，我带到党校去给同学们吃，不是一样吗？”

老总一听，高兴了，马上叫新来的警卫员康厉志找来一个小盆，把一大半猪蹄子拨进去。我看只剩下两个，打算再拨回去一些，他笑着说：

“你们党校那边人多，让他们都尝尝吧！我有这两个，足够了。”

这次回党校，吃饭时，一小盆猪蹄子引起男女同学们一片欢呼。我说这是总司令亲手做的，让我带给大家吃。有人激动得举起拳头喊口号，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既是这样，我们必须把它吃个一干二净，才能对得起总司令的厚爱。”

党校还常常在星期六晚上组织跳交谊舞。我们从太行回到延安时，中央办公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为中央领导同志组织这样的舞会。起先老总要带我去，我觉得别扭。干革命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跳过舞，更怕跳不好，让人家笑话。老总说，没有什么难学的，你只要踩住鼓点节拍，别踩住对方的脚就行了。毛泽东说过，跳舞对我们这些人既是休息，也是一种最好的运动嘞！

听他这么一说，我动了心，就跟他一起去了。毛泽东一见我就说：

“克清同志也来了，欢迎欢迎！看来你是个思想开通的人，我能请你跳一场吗？”

我连忙说：“我是头一次来，还不会跳，得先看看再学。”

“不会没关系。这里跳的全是最简单的慢四步。我一边带，一边教你，包你一学就会。”

他的热情使我不好说别的，老总笑着朝我点点头。我站起来有点为难地说：

“我不会，又笨手笨脚的，怕踩着你的脚！”

“没有关系！我来教你！”

果然这种舞很好学，也很好跳，我很快就学会了。从此，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又多了一项强健身心的文化娱乐。当时中央党校也常常组织舞会，我和老总也不时到党校去同那里的同学们一起跳舞。

到了星期天，也像抗大时期一样，常常有人来看望老总，或是我的同学、老战友到王家坪看我。大家在果园树下说说笑笑，有什么吃的就一块吃，无拘无束，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师傅在老总亲自指导下做出的川菜味道，总使客人赞不绝口。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们听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由此逐渐开始了整风学习。九月，中央决定高级干部先进行整风。中央党校一部、二部都是领导干部，整风学习就先开始了。

一九四二年二月，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动员报告。这是个十分重

要的报告。在学习中，我当时有一点想法，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如果说知识分子不会杀猪也是个缺点，那么多读书有什么用？整顿三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讨论中有人提出：“毛泽东是否也有主观主义？”这么一说，大家就吵吵起来。有的说：“这个提法不对。”“现在党中央的领导是历来领导中最正确的，最成熟的，怎么能这样提？”“这样讨论，会影响领导威信和对领导的信任。”“这次整风的目的在于认识和清算过去党中央领导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不应当转移目标。”也有少数人说：“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怎能谈得上自觉的信任和拥护。”“该怎样理解共产党员的高度自觉性？”“整风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要说的话全说出来，才能达到集思广益的要求。”后来，党校二部的领导张鼎丞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他说：

“党校礼堂门口有毛泽东写的四个字，请大家都去看看。四个字是‘实事求是’。这也是他的根本思想，这次整风的基本精神。评价毛泽东有没有主观主义，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可以从他的革命实践去看，从他的许多讲话和著作中去看。如果你们找出他的主观主义，就说有；如果找不出来，就是没有。”

他的话虽不多，却把提问题的人和所有的人说得口服

心服。经过不断地学习、研究，联系实际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而王明则是主观主义的典型代表。

整风学习过程中，不断有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

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党校副校长彭真请他给大家作报告。他讲了大半天，其中讲到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卑不亢，针锋相对，采取了对付国民党的许多措施，很快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打下去了。刘少奇讲了党的建设。朱老总讲军事问题。彭真因为是副校长，讲话比较多，也很风趣。讲到一个人犯了主观主义，用一个歇后语说：

“这叫胡子上贴膏药——”停顿了一下，大家正在揣摸这句话的意思，他接着说：

“毛病。”一下子逗得全场大笑。

他批判主观主义不看客观实际行事，用竖着长竹竿进城作比方。批判经验主义，讲一个故事：毛驴驮盐过河，从水里走，水把盐化了，使它减轻了负担。第二次驮棉花过河，它依然从水里走，结果棉花被水浸透，到了岸上压得它直不起腰。他说：“这就是毛驴犯经验主义错误的结果。”

党校还请过一些国际友人作报告，如日本的冈野进、祖籍黎巴嫩的马海德等。

美军在延安有个联络组长鲍瑞德上校，能讲中国话，但不熟练，他也到党校讲过话。他根据亲身的经历见闻，讲

了不少钦佩八路军、新四军的话，表示不赞成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解散新四军。他还在中央军委驻地王家坪办了一个美军现行轻型武器装备的展览，我们都去看了，有冲锋枪、机步枪、手枪、防毒面具、防毒衣、各种地雷、磁性雷、黄色炸药……当时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多数还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展品中有一种无声手枪，当场由一个美军上尉表演，他打得很准，在近处可听见“扑哧”的声音，远处就难以听出来了。他要我们也去试试，几个人学着他的样子打了，陈锡联、王智涛打得都不错。

一九四三年春天，王政柱随彭老总从太行前方总部回到延安，带回了朱老总留在那里的一头骡子和一架望远镜。那头骡子是老总一九二八年从井冈山上带下来的，经五次反“围剿”，长征路上，张国焘杀总司令的坐骑，总司令总算把它保护下来。几次过雪山都是它帮了我的大忙，后来它又到了抗日前线。现在回来，也该退役了。大家听说是井冈山下来的，都不赞成杀它，说它劳苦功高，给它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井冈山下来的骡子”。军需部按月发给它草料和粮食。许多人听说，都跑来看它。这时整风已进行了一半。有人看了这匹骡子就说：

“有的干部不学习，闹地位待遇的人，还不如总司令的骡子。它从井冈山到今天，贡献那么大，什么也不计较。”

抢救运动

整风学习进行了一年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出了一点岔子。

一九四三年夏天，党中央直属机关召开大会，党校一部、二部参加。康生作动员报告，题目是《抢救失足者》。他说，为了纯洁革命队伍，要把暗藏在我们党和各级革命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出来。办法是号召他们自动坦白交待，同时进行内部和外部的调查。

几天后，中央党校召开坦白大会，会上有好几个人坦白，说他们是国民党派到陕甘宁边区来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分子。听他们讲自身的经历，简直像听故事一样，每个坦白的人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会议临结束时，主持人肯定了他们每人的坦白交待，要求他们坦白交待得越彻底越好。同时，号召凡是有问题的人，都要像他们一样，不要错过坦白交待的大好时机。

以后，校方隔几天就要开一次坦白大会，每次都有人上台交待问题。不知怎么搞的，一些平时表现不错的同志，上台一坦白，就成了国民党特务。这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怀疑，国民党真会派那么多的特务到边区来吗？在抢救失足者之前，怎么一个也没有发觉呢？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总。老总说，

“你还是应当细心地听他们讲，他们能讲出来，总比不上讲好。”

我问他：

“有些平时表现很好，同我很要好的同学，交待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今后同他还接触不接触？”

“他不讲出来，你怎么能知道？他讲了你知道了，就不用怕他了。”

“可是你能说他讲的全都是真的？没有假吗？如果他讲了假话怎么办？”

“只要他能讲出来就是好同志。应当相信他。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他已经讲出来了，你还怕他什么呢？”

朱老总是个忠厚长者。我知道他，也了解他的用心。但是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国民党特务，我不能不感到困惑。

后来，越坦白越神乎，河南、陕西、甘肃好几个省里都出了红旗党。红旗党是什么，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突然冒出来，说是反革命组织。这问题涉及好几个省的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他们都在党校一部、二部学习。组织上责成两个部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对他们进行帮助。

有一天，党支部通知我去做张维桢的工作。他不知道有红旗党这回事，他说：“如果坦白的人说的是实话，那也只是他知道，我是从不知道的，而且更没有担任过红旗党的负责人。”有人因此说张维桢态度顽固，于是组织大家轮流同他谈话，实际上是一种车轮战。每天二十四小时，除

了吃饭、上厕所，不准他休息，更不准睡觉，一定要等他说了“实话”，才准他睡觉。我怀疑这种做法，像这样去逼迫一个人，使他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说出人们要求他说的话，是信还是不信？

这次分配我的任务是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对张维桢进行夜战，动员和促使他交待问题。当小组长向我传达支部的意见时，我当场回答说：

“不去！”

好心的同志劝我：

“你这样，不怕人家说你右倾吗？”

“右倾就右倾。像这种用车轮战去逼着人家交待问题的
事，我不干。”

我回去把这事告诉老总。

老总沉思了一会说：

“搞车轮战实际上也是一种逼迫的手段。不让人家睡觉，把他搞得昏昏沉沉、糊糊涂涂，在这种情况下，能如实地把问题说清楚吗？搞任何事都要实事求是。我们要一个人讲问题，是要他在清醒的状态下讲出来好；还是在迷迷糊糊的情况下胡说乱讲的好？”

我说：“当然还是头脑清醒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好！像这样逼着讲出来的话还不如不讲。”

他虽然没有告诉我应当怎样做，我的心里却有把握了。我不去参加车轮战，他们只好另换了别人。

半个月后，听说我们一部的一个“抢救对象”袁德胜被连续搞了十来天的车轮战，因为他什么也不说，负责“抢救”他的人打了他。八月十五日党中央已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他们还这样干，实在太不应该了。我向一部领导提出我的看法，他们表示同意，同时希望我去对袁德胜做些挽回影响的工作。

在一间小小的单人拘留室里，我见到了袁德胜。他头发蓬乱，正坐在地铺上垂头打瞌睡。被褥、衣物都凌乱不堪，可以想像出对他实行车轮战的一些情景。知道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了，我迟疑了好一阵，决定把他叫醒。他睡得很沉。我用力摇动他的肩头，才把他叫醒。他猛然一惊，抬头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对我充满警觉和敌意。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

“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他们对你搞车轮战，打你都是错误的，今后再也不许他们这样搞了。你放心吧！你有什么问题，只管实事求是地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想不起来、记不清楚的慢慢想，想清楚了再说……一定要合乎实际、不能乱说。……。”

你听明白了我的话，没有等我说完，已是两眼热泪，像个孩子般呜咽起来。

“要相信我们的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感谢党……感谢你……”他说着已经泣不成声了。

十月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中央党校把这一批有问题的“被抢救者”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临时支部，住在一个山梁上，和我们完全分开了。许多人在那里受审查，逐步把问题查清楚了。还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问题一时难于查清，日本投降后，到处需要干部，就派他们到实践中去经受考验。

参 加 “七 大”

中央党校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

中央党校几年的学习，帮助我们每个人提高了认识，为“七大”的召开作好了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始了。

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这个礼堂是一九四二年由中央机关的同志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座高大的建筑，气象雄伟，使人振奋，这就是“七大”会场——中央大礼堂。它同现在到处出现的许多现代化的高大建筑无法相比，可在当时，它在延安是独一无二

的。主席台会标的横幅上面，台口穹窿式的门楣上一条大幅标语：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主席台上共五个座位。这时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又增加了朱德、周恩来，共是五人。会场两面墙上插着二十四面党旗，表示我们党已走过二十四年的历程。插党旗的木座呈英文“V”字形。经人解释，我才明白“V”是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把党旗的木座连起来，意思就是：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是胜利的二十四年。”

我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这次共到代表七百五十五名，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

大会开得非常好。从大会的第一天开始，有几个重要报告：毛泽东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然后就是热烈的大小会发言和讨论。我也积极参加了讨论。我们这个代表小组组长是傅钟，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我想到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特别是我目睹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她们积极支援抗日战争，参加对敌斗争，搞生产、做军鞋、缝军衣、送军粮、救伤兵、抬担架、站岗放哨、除奸防特，送郎送子参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妇女人数又是那么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建议在报告里加强这方面的内容，把重视妇女、发动妇女、组织妇女、教育妇女、

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充分发挥妇女在抗日战争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写进去。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就鼓起掌来。

“到底是妇女代表，处处不忘妇女！”好几位代表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傅钟一边笑一边说：

“说得好！说得好！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去！”

他等担任记录的同志把这条意见写完，又要过来看了一遍，然后抬头对我说：

“克清同志，你这条意见很重要，它关系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实际作用和切身利益。现在已经作为我们小组的意见记下了。”

大会正在热烈的进行中，传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世界侵略战争的祸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已经有两个被打败了，只剩下一个亚洲的日本。我们和盟国联合对付日本，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大家都为这消息兴奋得坐不住了，想打回前方迎接将要到来的胜利。

大会秘书处传达了中央领导的精神：正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大反攻的胜利局面，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大家一定要安心把这大会开好，才能更好地去迎接胜利。

大会开了五十天，六月十一日胜利闭幕，毛主席作了《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朱老总也讲了话，他强调全党要在“七大”的政治路线基础上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的

周围，去争取胜利。

“七大”胜利地闭幕了。毛主席说它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现在看得更清楚了。“七大”和全党的整风给后来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七大”结束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人继续留在党校学习“七大”文件，完成整风学习。党中央把这么一大批干部放在身边，也是为了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好应急的准备。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中央党校整整学习了四个年头，是我一生中学习时间最长、收获最丰富、受到的教育最深刻的一段经历，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緬 怀 左 权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左权牺牲了。

左权是一九四二年春天牺牲的。当朱老总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不觉流下泪来。

左权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以后又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一九三〇年学成回国，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担任过红军学校教官、红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参加过长征。抗战后，一直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他青年有为，处事果断，又待人诚恳，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时同他接触较多，听到

不少对他的好反映。

当时，他还没有结婚，老总十分关心他的个人生活，多次同我说要帮助他找个合适的对象。正巧，一九三九年春天，刘芝兰随中央巡视团来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他们一行十二人，代表中央的各个单位在晋东南做了许多工作。开晋东南妇女代表大会时，刘芝兰代表中央妇委讲了话。她是浦安修的同学，聪明能干，十分讨人喜欢。我同浦安修商量，一定要把她留在晋东南工作。那时，浦安修已经调到北方局妇委。经过我们一番宣传动员，又做了巡视团领导人的工作，终于把她留到北方局。这时，我想到把她介绍给左权副参谋长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朱老总一听，十分同意，立即征求左权意见。恰巧，左权的心目中也正在想着她。刘芝兰当时二十二岁，可算女同志中的佼佼者。我当时正忙着直属政治处的工作，一时脱不开身。老总决定亲自去找她谈。

老总找到刘芝兰，问明她还没有男朋友后，就径直向她介绍左权的情况。左权是一九〇六年生人，当时三十三岁，人很英俊。刘芝兰对他也有好的印象。但是她对恋爱持慎重态度，表示还要考虑一下再说。

老总认真地对她说：

“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左副参谋长就等着你的回话。”

他们那次谈话的结果，刘芝兰答应先同左权见见面再

说。后来她又找我和浦安修征求意见，还问我同老总当时是怎样结婚的。我如实地对她讲了，说：

“你们现在环境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像左权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现在是战争环境，只要双方都认为合适，还是趁早结婚为好。”

以后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结婚那天，两位老总，我们大家都去了。许多人贺喜，喜气洋洋，十分热闹。

翌年，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刘芝兰生了孩子，因前方敌人扫荡频繁，不便带孩子，一九四〇年八月刘芝兰带着孩子回到延安。

老总把左权牺牲的消息告诉我以后说：

“现在还没有告诉刘芝兰，你看如何找她谈为好？”

“在战争中牺牲是很难预料的，不过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她今年才二十五岁啊！”

老总对我的话点头称是，然后拿起他刚写的一首《悼左权》的诗给我看：

名将以身殉国家，
原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随后我们两人一起去看刘芝兰。她已经知道了消息，一

见我，两人就抱作一团哭起来。我们劝慰她好一阵才走。

后来，她告诉我，一九三二年左权在苏联陆军大学学习时，曾被怀疑为托派，还受了处分。他对这事一直感到冤枉。整风开始后，他曾向党中央申诉，以后又拿着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彭老总讲：

“王明如果还在党中央负领导责任，我这问题就翻不了身。”

因为他的处分是在莫斯科作的，又属于托派问题，所以长期难作定论。粉碎“四人帮”以后，直到一九八四年，才由党中央纪委给他排除了。

朱老总的两件家事

我自己没有生育孩子，却十分喜爱孩子。看见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甜甜的滋味，总想把他们抱一抱，亲一亲。有人称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一点也不错，他们象征着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再多再大的烦恼，到孩子面前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一九四〇年十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成都找到朱老总的女儿朱敏还有她的姨表妹贺高捷，一起送来延安杨家岭。她那时已经十四岁，表妹十三岁。一见她们，我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高兴。

朱敏那时身体不好，得了淋巴结核病。延安的医疗条件差，为了治病，为了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机会，在延安住

了一个多月，就把她和贺子珍的女儿娇娇、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一起送往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朱敏在德国法西斯占领区吃了不少苦头。当时我想发电报问问情况，但朱老总不同意，说：“人家国家的安危是大事，我们女儿的安危是小事。”他言之有理，也就打消了我的念头。

一九四四年三月，朱老总得到消息，他的生母在二月十五日病逝了。他给我看了家乡的来信，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我知道他的心情十分沉痛，想安慰他几句，分担他的痛苦。但再一想那些话还用我来说吗？我只用眼光默默地注视看他，彼此的眼神说出了我们心里要说的话。

过了许久，他轻轻地对我说：他的母亲生下十三个儿女，只留下八个，其他的因为没法养活，生下来就溺死了。因为大人要忙家务活，小时候让他们自己在地里爬。他们吃的是菜饭、红薯饭、杂粮饭，穿的是自家手工织的像铜钱一样厚的粗布。他家是个大家庭，母亲妯娌几个轮流煮饭。因为地方逼着退佃，一九〇四年，一家分作两处，全家借钱供他一个人读书。后来他当上了旅长，才把借的钱还清。他的母亲一生劳动，老年还经常纺线，去世前一分钟还在做饭。她老人家是在锅台边倒下去的。

他说，母亲不仅养育了他强健的身体，还教给他最宝贵的东西——坚强地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三十多年的革命军事斗争生活，他从未被困难吓倒过。还有就是勤劳刻

苦的习惯和劳动的知识技能，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从不感到劳累。

母亲生前想见他一面，一直未能做到。他认为母亲是会理解他的。这位好母亲，是我的婆婆，也是我的母亲，可惜我没有能够见她老人家一面。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生母和养母，他们不也是我的好母亲吗？

世上有多少这样伟大而又平凡的好母亲啊！正是她们养育了我们这一代，也同我们一样在创造历史中尽了一份力量。

老总对我说：

“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未能在她老人家身边。”

这以后有一个月他没有刮胡子，胡子长得老长。我明白，这是为了悼念他慈爱的母亲。

为他母亲的去世，四月十日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蔡畅大姐在会上讲话，号召妇女学习钟太夫人终生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高尚美德。后来孙泱把朱老总回忆母亲的谈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回忆我的母亲》，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新中国建立后，这篇文章曾选用在小学的语文课本上。

撤离延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国共两党虽经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为时不久，国民党就发动了内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总司令六十岁寿辰。这时内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老总听说有人要给他祝寿，执意不肯。

可是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还是在中央大礼堂集会，热烈祝贺朱总司令六十诞辰。大会主席是林伯渠，先由刘少奇讲话，赞扬老总：

“几十年来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结晶，给予党和人民极大的光荣。”

朱老总讲话说：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要革命，但摸不到路，后来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全国内战，妄图从人民手中夺回抗战胜利的果实。不但遭到我们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而且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世界舆论的谴责。占领张家口，召开伪国大，已使他陷于完全孤立，是他走向灭亡的开端。中国人民一定要胜利，一定能战胜独裁卖国者。反动派一定要失败。我相信可以亲自看到中国革命获得成功。”

朱老总还收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叶

剑英、彭德怀、王震等同志的题词、贺信和贺电。董必武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七律二首，诗中有：

半生戎马为人民，不随流俗与同沦；
革命将军老据鞍，甘为民仆耻为官。

谢觉哉也赋诗二首祝寿，其中有：

尽人传说非凡将，一见才知不似官。
群众英雄出群众，英雄永健普天欢。

这些诗都道出了老总的为人和品格。

诗人柯仲平的诗《朱总司令六十大寿颂——人民翻身歌》，表达了许多人的心意：

你知道人世间什么最香？
老百姓的情义最香，香得最远；
你知道人世间什么最甜？
老百姓的情义最甜，甜到几时都还甜得最新鲜。

.....

我们老百姓的心花都在向你开，
老百姓的心花永远开在你身边！

我觉得这首诗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同时，开始了疏散和撤出延安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我还在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学员大多数都已回到原来所在的各个解放区，一大部分去了东北，剩下的都是在中央和军委机关工作的人。当时决定中央和军委及其后方机关的大部分撤过黄河，到晋绥和晋察冀一带。我得到通知，可以随中央妇委行动。老总因为要指挥作战，我们暂时分开了。

延安在敌机不停轰炸、敌军步步进逼的紧张情况下，因为早有准备，指挥得当，显得镇定如常。虽说到处是战争的气氛，撤退还是井然有序的。城里的人很快减少了，杨家岭、王家坪一带也迅速冷落下来。动员大会后不久，我们撤到了瓦窑堡，老总和刘少奇、任弼时很快也来了。毛主席在敌人占领延安前不久，才离开了王家坪。

三月底，我随董老、帅大姐（孟奇）等人，带着一些机关干部和后方人员家属，分乘几辆卡车，在拂晓时分来到黄河边上。这时是河水干枯季节，河面不宽，渡船摆渡，很快就过去了。不料没走多远，一辆卡车轮子陷到水沟里，司机发动了半天，后轮只是空转。没有办法，只好大家一

起下来推。人多力量大，终于连推加抬，把汽车推出了陷坑。这一天，刮大西北风，天很冷，坐在车上，手脚都冻得发疼。这一群人里面，我和帅孟奇都可算是壮丁。董老年纪大了，我们就自动负起组织指挥大家行动的责任。经过的地方全是解放区，也没有遇到敌机空袭，顺利地走到晋西临县的三交镇。过兴县时，见到贺老总和他的夫人薛明，贺老总一面招待我们吃饭，一面风趣地告诉我们许多打胜仗的好消息。

不久，刘少奇、朱老总也到了三交镇。负责陕甘宁边区中央后方工作的叶剑英、杨尚昆也来了。三交镇一下子变得十分热闹。

住了几天后，中央妇委的帅孟奇大姐和朱旦华同志等，在临县三交参加已经开始的土地改革工作。

我们到兴县不久，就听到土改中有打人、杀人等违反政策的事。起先还有点不信，很快就亲眼看到了。几位中央妇委的同志见面谈起来，都说要我回去向朱老总反映。我回去反映了情况，刘少奇和朱老总听了以后，刘少奇说：

“运动当中出点偏差是难免的，有的不能看作偏差。用不着着急。马上要开全国土地会议了，问题都会搞清楚，会得到解决的。”

这些问题，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河 间 访 赵 烽

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九月，党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我从头至尾都参加了。

我在会上再一次反映了兴县一些地方土改中的“左”的现象，提出应当防止类似现象的重演，使土改健康地发展。

土地会议后，我在西柏坡住了一个时期，参加中央妇委的一些工作。在这个时期里，我随朱总司令到过安国、河间、束鹿、晋县等地，了解了不少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情况。

十一月初，正当攻打石家庄战役将要开始的时候，我随老总来到河间县的黑马张庄。老总在那里听取冀中行署领导干部汇报，指挥战斗，我到河间城里去了解妇女工作和土改工作的情况。

河间县妇女联合会主任赵烽，在延安中央妇委工作过，是熟人。早饭后，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河间县委机关。那是个星期天，赵烽还带着孩子在床上没有起来，一见我，又高兴又埋怨：

“大星期天跑来，也不先打个招呼。”

“你这里又不通电话，等把通知送给你，人也就到了。现在人和通知一齐到，不是更亲热吗？”

我们高兴地拥抱了一下。她顾不上吃早饭，一边奶她不到一周岁的小宝宝，一边谈起河间的妇女工作。她问我

来河间县的目的。我向她传达了中央妇委关于土地改革中如何发动妇女群众的意见。她急忙拿出笔记本记录。谈着谈着，她向我讲起这一年来她如何从延安到张家口，又怎样从张家口来到冀中工作。谈兴正浓，忽然外面一阵大乱，有人喊：

“飞机来了！”

跟着响起轰隆轰隆的几声爆炸，窗棂震得咯吱咯吱响，接着是一阵机枪扫射的声音。

“快走，这里不安全，城外有防空壕，离这里不远，我们快到那里去！”

赵烽抱起孩子，简单包裹一下，就带着我跑出去。这时听到飞机嗡嗡的吼叫，三架敌机正在河间城上空疯狂施虐。外面街上全是惊慌失措、东奔西跑的人群。这里没有什么防空设施，人们也不知道向哪里跑。我问明了防空壕的位置，就向慌乱的人群大声疾呼，指着防空壕的方向：

“向那边去！那边有防空壕。”

人群随着我们来到防空壕。我把赵烽和她的小宝宝安置在壕内一个单人掩体避弹洞里，又急忙跑了出来。这时外面依然有不少人惊慌地乱跑，如不制止，很快就会成为敌机袭击的目标。我看见跟在群众里一起跑的有两个民兵，一手一个把他们拉出来。他们起先要反抗，一看我穿着八路军军的军装，立即问我有什么事，我说：

“你们两人协助我，立即把这些乱跑的老百姓带进防空

壕，飞机不走，谁也不准出来。赶快，敌机马上又要过来了。”

两个民兵看我站在一个坟头上指挥，立即来了精神，答应了一声“是！”就分头去拦阻劝说群众，我站在高处喊叫：

“谁也不准乱跑，不准暴露目标！听从指挥，进防空壕隐蔽！”

三个人互相配合行动，霎时间，乱跑的人群消失了，露在外面的只剩下我们三个人。眼看敌机临近，我们三人分作三处隐蔽起来。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两圈，在附近投弹、扫射，一直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的目标。敌机飞走了，两个民兵高兴地跑到我的身边：

“同志！亏了你来指挥，要不是你，刚才那一团糟的样子，准被敌机发现，我们可就要遭殃了。”说着，两人一起向我行了个举手礼，然后说：

“首长，还有什么任务吗？”

我说再等一会，如果敌机不返回来，可以叫大家出来。下次再遇到敌机空袭，你们记住，一定要这么办，千万别叫老百姓乱跑。看着几处浓烟滚滚的大火，我急忙跑去查看那里的灭火和急救工作。那里只有少数民兵在灭火，我要他们立即派人通知县委调部队和民兵来灭火抢救。

不知过了几时，赵烽抱着孩子来到我的身边。她告诉我，她住的房子被炸塌了，火炕翻了个底朝天，衣物全埋在瓦砾堆里。经过大家帮忙，把东西清理出来，临时寄居

在一个老乡家里。她招呼我去吃午饭，我抬头看天，才发现早已过了晌午。

这次敌人轰炸，群众损失不少，还炸毁了一个面粉厂。午饭后，我向县委传达了中央工委关于土改和妇女工作的指示，又提出了这次轰炸的一些教训和对群众的救济、救护工作的意见。

不久，我军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中等城市石家庄。老总对这次战役十分重视，亲自参加帮助部队总结经验，还写了一首诗《攻克石门》：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北 官 庄 土 改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我到冀中地区饶阳县第四区北官庄小区搞土改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兼任这个小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叫张福年，北官庄村共有三百七十七户，一千四百多人，共产党员四十八人。

中央土地会议以后，晋察冀中央分局在平山县接着开了五十天的土地会议，然后地委又开了会。我进村的时候，

正赶上“搬石头”，把所有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依附地主、富农的党员一律停止党籍审查。所有党员，只要贫雇农有人揭发，就当作依附地富的党员看待。干部被撤的、被关的，各村都有。干部普遍抱有埋怨和消极情绪。他们说：“辛苦十来年，冒风险拼性命，落得这般下场，令人心寒。”“这是‘卸磨杀驴’，用不着了，就给你一刀。”“早知今日，悔不当初。”被停止党籍的，许多人痛哭流涕，有的发誓赌咒：“这辈子再不干革命，生下儿子也不许他再当干部。”为数不多的没有被停止党籍的干部，也像霜打的一样，打不起精神。

布置我到北官村的头一件事，是收缴所有干部手里的枪支，说这是“搬石头”的需要，规定所有干部不论有无问题，有枪的一律收缴。这样就等于说干部全是不可相信了。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是：“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否则群众就不敢起来揭发干部。”

我一进村，就看见两个民兵押着一个人。一问，才知道是押着干部到他家里去取枪。那干部就是本村的副村长。

“他是犯了反革命罪吗？”我问。

“不！我们这里村村都这么办，干部凡是有枪的，都派民兵押着，直到把枪缴出来才算完。这枪统统交给工作组。”

听了这个回答，我实在不能赞成，怎么能用这种方法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因为是初到，决定先观察一下再说。幸好，一直到我离开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表明干部本

质上都是好的，即使受到极大的委屈，也能忍受下来。只几天时间，缴来的长枪、手枪、手榴弹已经有了一大堆。工作组几个人背又背不了，放在屋里又不放心，简直成了一个大累赘。研究再三，还是交给贫雇农委员会代为保存。

北官村工作组，我去时已有了三人，组长是区长张福年。我一到，他就表示接受我的领导，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我说：

“我是来学习的，你照样是这里的组长和小区的区长。”

“你是区委副书记，我当然要听你的。”

群众反映，张福年比较粗暴，工作方式有些简单生硬。他为人直爽，心直口快，对上级的要求，总是坚决执行，很少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他搞了不少“左”的行动。我去后，他同我一直配合得很好。有人又说他右倾。他说：

“‘左’也好，右也好，反正我要跟着老康跑！”

他们都叫我老康。工作组还有个张计时，是区公所的秘书，为人比较老实。另一个人记不清楚了。我去后不久，上级又派来一个女同志柳溪，很年轻，她说她同丈夫一起要求下来参加土改，经受学习和锻炼。她丈夫叫胡苏，分配在陈各庄工作组，离这里有十多里。她缺少实际斗争的锻炼，热情而幼稚，受了一些“左”的影响。我觉得她能带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到农村来工作，单凭这一点，已是大不寻常，使我对她有了最初的好印象。跟随我到北官庄的警卫员，我也叫他参加土改中的群众工作。

后来，我们这个组又来了一个人，他见到我，把介绍信一递说：

“我是犯错误的，来参加土改接受锻炼和考验。”

他叫刘昂，原是胜芳市的市委书记，因为工作中犯有右倾错误，受留党察看的处分。听说我在北官庄，要求分到我这个工作组。

当时，县委宣传部长带一个工作组，也在北官庄小区，他兼小区区委委员。他一到，就带上五个民兵，到离北官庄三里的一个村庄，先缴了村里五名干部的枪，接着又把他们全部关起来，说“这样才好做工作”。这立即引起群众和党员的强烈不满：“把自己人都当成国民党啦！”那五个村干部在群众中一直是有威信的。

开始，我是比较孤立的，张福年虽然支持我，但在会上总是一言不发。区委书记史敬堂，起初对我的意见不以为然，后来经过许多事实检验，两种不同意见的反复比较，他渐渐理解了我的看法，同我的意见由接近走向一致了。

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我明确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渐渐为工作组多数人接受了，在他们不反对的情况下，我开始行动了。

北官庄也关了几个干部，一间上了锁的西房，阴冷潮湿的泥地上，铺着一些麦草，几个村干部冻得蜷缩在里面。每天家里给他们送饭。经过调查，他们都没有严重问题，有两人只是成分高一点。支部委员耿宝山是富农出身；民兵

中队长王同心家里也是富农；还有两人据说是同地主、富农划不清界限。可是揭发出来的几件事，全是正常的工作行为。我问张福年，碰到这几件事你会怎么办？他说：“若是换了别人，也一定得这么办，也只能这么办。”

“那你们为什么说界限不清呢？”

“这都是贫雇农揭发的。现在是贫雇农当家。不然，就会犯‘右倾错误’”。

“办事只要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革命利益和党的土改政策，就不能叫右倾。难道你不怕犯‘左’的错误吗？”

我反复说明了什么叫右倾错误。工作组里没有人反对我的意见。于是我决定把关押的四个村干部全放回去，通知四人的家属把他们领走。他们临走时，都是满眼热泪。张福年告诉他们，这次放你们回家，多亏了“中央派来的老康”。又规定他们回去后，“要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因为他讲到我，我只好向他们声明：

“放你们回家，不是我的力量。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

听了我的话，有两个感动得哭出了声。

村支部书记，靠边站了，他的一支步枪“汉林春”，也被缴了。经过调查，他没有任何问题，我同张福年商量，经他同意，把枪还给了他。

对待不符合干部政策的事，我敢于提不同意见。我对

区委书记说：

“你也是原来的干部，为什么这样对待村里的干部，把他们全都撤掉？”

他略一思索说：

“不能不这么办。我知道，原来干部中有许多是很好的干部。我要是同情他们，自己也要跟着挨斗。”

我说：“根据我的了解，村里原来的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少数。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这样对待他们太不应该，也太不公平了。”

我的这些话，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说我“姑息干部”，“有右倾思想”。我当然不服，同他们争论也没有用。我正式向冀中区党委提出：

“请你们把北官庄村交给我，由我按党的土地政策、干部政策办事。错了，我负责；对了，证明党的政策成功。”

区党委书记林铁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回去，我就把这意见向工作组宣布了。

这时，村里已经建立了贫农团，有两户贫农，因为是干部，不准他们参加。他们说：“现在革命不要我们了，被一脚踢开了。”痛哭流涕。我向贫农团的积极分子反复做工作，让他们参加了贫农团。他们积极起来，依然让他们当干部。后来发动贫雇农对过去的工作和对干部提意见，他们说有顾虑。

“换衣不换帽，这次‘搬石头’，谁知你们是真搬，还

是假搬？”

把群众同干部完全对立起来，对土改是很不利的。我提醒他们，能不能把干部和地主、富农看成一个样？干部有错误，应当怎样看待？如果将来你们当了干部该怎么办？经过讨论，贫雇农中有了实事求是地对待原干部的思想基础，也打破了他们的顾虑。我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一条一条告诉干部，促使他们检讨、反省。再按照村里各户的实际，把贫农团由原来的六十八户，增加到八十户，把几户党员和当过干部的贫雇农都吸收进去。然后采用完全民主的方式，由他们自己提名，自己投票选举贫农团委员。结果，五个委员没有一个党员或干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它表明过去党支部和干部的工作作风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这对党员和干部也是一次现实的教育。看着党员一个个像败了阵的公鸡，只好劝他们虚心地看待过去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北官庄从我去了以后，再没有关过一个干部或党员，原来关的也全都放回家了。村民们议论说：

“北官庄的工作组就是不一样，像共产党办事的样子。”

按照上级的布置，先斗争干部，搬开了石头，再去斗地主、富农。我觉得这事还是交给群众讨论好，就组织贫农团讨论：“先斗地主，还是先斗干部好？怎样对贫雇农翻身有利？对土地改革有利？对团结一致打老蒋有利？”“原干部是阶级敌人，还是自己人？他们有缺点错误，是让他们认识错误慢慢反省，然后‘搬石头’；还是像外村那样狠

斗一场，甚至把干部打死好？”花了两天时间，经过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都改变了开始时打算先斗干部的想法，认为还是先斗地主好。

一九四八年二月，北官庄成立了新农会。广大农民提高了阶级觉悟，当家作主人的思想特别强烈，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不久，我接到要我回去参加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通知。四月初，我回到了西柏坡。

济 南 之 行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当时济南有城市人口七十多万，是我军解放的最大城市。为了取得大城市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人和妇女工作的经验，中央组织一部分干部到济南作实地考察。中央妇委派我和帅大姐、曾宪植同志一起去。

这时，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从西柏坡到济南，一路畅行无阻。我们遇到便车就搭乘；遇不到，就靠自己的两条腿，从西柏坡到济南大约有一千华里，我们走了十多天。到山东境内，老乡全吃大葱，伙食花样很少。我们感到很不习惯。走到德州，见到满街的鲜活鱼，饭馆子里叫喊着“鲜炒活鱼”。我们几个人的出差费、伙食钱统一归帅大姐掌管，闻着扑鼻的鱼香，我们向帅大姐建议：

“大姐，咱们有多久没吃过鲜活鱼了？少说也有二三年

吧！好不容易碰上，吃它一回吧！”

问了价钱，帅大姐摇摇头：

“不行，咱们买不起。”

“这一顿多花几个钱，以后我们每顿饭节省一点，就补上了。”

那时，我们的经济制度很严格，帅大姐处处以身作则，有大姐风度。她坚持说：

“我们是从党中央来的，制度都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的，我们不能带头破坏制度。”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一到济南，就碰见了王云。她在延安中央妇委工作过，彼此十分熟悉。她的爱人李士英当时也在延安工作，有一个孩子叫延娃，十分可爱。“七大”以后，一九四六年，李士英随谭震林同志调到华中。我随朱老总到机场送行，没见到她去。回来就跟她开玩笑，问她：

“李士英调到华中工作，跟谭老板（大家对谭震林的称呼）坐飞机走了，你怎么不去送行？”

“我不在家，谁知道他一声说走，连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她说着有点动气了。

“他们搭的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飞机，飞机刚到延安来，急着要回去，谭老板他们都是临时作的决定。李士英找不到你，就让我回来告诉你，不要着急。”

看她的神色缓下来，我就逗她：

“我看你还是赶紧收拾一下，等到再有飞机，你也赶到华中去。前方带孩子不方便，你就把延娃留给我，我保证比你带得还好。”

“我不去，我在延安有自己的工作，他在华中干他的。”

她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底同我们一起渡过黄河，一起搞土地改革，又参加了土地会议。土地会议结束，她随山东代表团到渤海区党委，接着参加土改、整党工作。后又到了济南。我们分手整整一年了。李士英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她在工厂里做党的工作。

这个时期，济南几家纱厂的工人正在闹工潮。他们受国民党暗藏的特务控制，四个工厂一起闹罢工。我们的同志没有经验，一进厂没有摸清情况，就简单地想以改革工资制度、增加工资的办法，来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引导工人同资本家作斗争，而没有首先深入生产第一线，发动群众与敌特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结果，给敌特以可乘之机，他们一面给资本家撑腰，一面又拉拢工人跟他们跑，使我们的工作陷入被动。陈少敏批评这是用农村工作的办法搞工人运动，不了解新解放城市工作的特点。经过艰苦的工作，工潮平息了。王云说，市委领导和负责工会工作的同志们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准备组织下一步的斗争，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时，田家英到济南来了。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派他到新解放的东北城市进行调查研究，绕道济南，稍

事停留。他同我们一起从西柏坡出发，路上嫌我们走得慢，一个人赶到前面去，他比我们早一天到济南。我们到济南后，就四处打听他住在哪里。问遍了他可能去的每个单位，市内的每个招待所，人家都不知道田家英这个人。我们怕他出什么意外，就请公安局长李士英帮助查询。后来在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他，李士英派人把他送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来。一见到他，曾宪植同志就同他开玩笑：

“我们几个全是中央妇委的女同志，你这个男同志跑到我们这里来入伙，没有一点关系，可不好对外人解释啊。这样吧！你答应做帅大姐的干儿子，我们就名正言顺地收下你，这里有一间现成的空房子，正好给你住。怎么样？”

“这有何难？本来，帅大姐比我妈妈也小不了几岁。不过，你们要是用住房子来要挟我，或者是以后又因此生出许多新的条件，我还不如重新回到那家小旅馆去。”

田家英带着几分知识分子的腼腆，却又带着点幽默，一面笑着回答，一面提起他那一小卷行李，抬脚就向外走。帅大姐急了：

“家英，别听阿曾的！”

阿曾幽默地说：

“我早把话说清楚了。当干儿子完全自觉自愿，不这样，还不要呢！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是他怕难为情，要找个借口逃跑，怎能怪得我。”

说得在场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田家英脸涨得通红，

走不是，不走也不是。还是王云过去夺过他的行李卷：

“你就当这个干儿子吧，保你吃不了亏，还有好处。帅大姐这样的干妈，你到哪里去找？再说，那家小招待所，你也回不去了。”

一边说，一边把他的行李送到旁边那空房子里去。

我们中间多了田家英，生活的话题就多了。又因为他等于默认了当干儿子的事，就常常成了我们开玩笑的对象。对这点，他从不计较。那天晚上，赶上吃大葱，田家英不吃，我们说，连大葱的辣味都受不了，哪能称得上个男子汉。我们几个都表示，谁也不是山东人，但现在都学会吃大葱了，还争着表演给他看。不过，我们吃的全是葱白，还都蘸了黄酱。田家英给我们一激，抓过两棵大葱，把外皮一剥，就大口大口连葱白带葱叶，也不蘸黄酱，就着煎饼、窝头吃起来。不一会，就被辣得两眼流泪，头上冒汗，惹得我们又是一阵大笑。不过由此一来，他倒真正学会了吃大葱的方法。

我们到济南后，王云就陪着我们到学校、工厂、机关去参观。了解妇女工作和工厂工作的一些情况。也遇到不少红军时期的、延安抗大的和中央党校的熟人。还参加过几次晚会，看了新安旅行团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歌剧《血泪仇》，很是感人。

有一天，我到龙飞虎家，他的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因为平时没有人管，到处拣拾没有爆炸的炸弹、子弹壳、瞎

火子弹……卖给收破烂的，换钱买零食吃。我去时正遇到他妈妈追着打他。问明情况，我告诉他们，我们在西柏坡办了个育才保育院，可以接收教育他的这个儿子。育才保育院是为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建立的。龙飞虎夫妻听了高兴得如同去了一块心病，一再对我表示感谢。说马上派人跟我一起走，把他的儿子送进育才保育院去。后来他的这个儿子成长为有用的革命人才。

我们在济南前后半个月的时间，学习了不少东西，然后搭乘一辆便车，回到了西柏坡。

第十一章

投身妇女儿童工作

苏区的妇女

回顾我从一名红军战士，从部队火热的战斗生活，投身妇女儿童工作，一千数十年，直至如今。对于这个转变，我并不懊悔，但总还是有些遗憾。对于部队，对于人民子弟兵，我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延安，朱老总向史沫特莱介绍我时，曾说：“她是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对朱老总的这番介绍，我怡然自得。这个介绍，既有事实的根据，即从一九二八年九月，我跟随陈毅率领的工农红军上井冈山起，无论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都是作为部队的一名成员，在朱老总率领下，担负着一定的工作。同时，这个介绍也是根据平时我向他流露表达过的愿望——做一名军事工作人员。我的这个愿望，曾得到他的支持。

我和千千万万普通妇女一样，非常喜欢孩子。孩子们第一声呼唤“妈妈”的声音，该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哪位妈妈不为这声动情的呼唤所陶醉，甘愿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他们身上？从咿啊咿啊的婴儿，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我都喜欢。不过，我自己却不愿意生育孩子。想起童年、少年时期，我听到、看到的农村妇女生孩子的苦痛；想起在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生育孩子前后产生的麻烦，使我感慨颇多。

在中央根据地不断反“围剿”的战争动荡环境里，在长征路上，女同志根本无法带孩子。贺子珍、陈真仁、张琴秋等同志，还有其他女同志，她们艰难地生下孩子，很少孩子能够活下来；活下来的也得匆匆寄养到群众家里。如今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个时代妇女同志生育孩子的情况，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刘英大姐是一九三二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的。早在莫斯科时，她与张闻天就相识。在中央根据地和长征路上，他俩因工作关系，朝夕相处，彼此爱慕。刘英怕婚后怀孕影响工作，不能行军，坚决不结婚，直到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以后，他们之间才解除“禁令”。

一九二九年，我与朱老总结婚，怀着与刘英和许多女红军一样的心情，坚持不生孩子，今天看来，这种观点可能有些过分，有些绝对化。

长征到达延安，一如既往，我怀着做一名军事指挥员

的向往，在抗日军政大学紧张的学习之后，与朱老总一起，奔波于太行山区抗日前线。一九四〇年返回延安，尽管环境相对比较安定，生活条件也相对有了好转。但还是不敢生育孩子。

世上的事有时是那么令人不可思议。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从对做一名军事工作人员的执著追求，逐步与妇女儿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形成的。

我是千千万万在旧中国饱受人间压迫的妇女之一。小时候，我和与我同命运的小姐妹们常为“生就的苦命”而叹息，憧憬着美好的生活，幻想有朝一日世道变了样，像鸟一样，在蓝天下自由地飞翔。日盼夜想，还是逃脱不掉“童养媳”、“望郎媳”的苦难生活。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到了我的家乡。我做了区妇女会的秘书。从这个时候起，我朦胧地理解和接受了“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大概也从这个时候起吧，这种想法悄悄进入我的意识之中。在一定情况下，我自觉又不自觉地把部分精力投入其中。在这方面，朱老总给了我一定影响；苏区妇女群众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她们还在遭受封建压迫的事实，这些都使我深受教育。作为妇女，作为她们中的一员，难道我不该为她们做些什么吗？

一九三一年初，为庆祝这一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中共苏区中央所在地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妇女工作

委员会，发布了庆祝这个节日的通告。通知要求广大妇女群众鼓励男子当红军，踊跃参加慰劳红军、支援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只有这样，妇女的婚姻自由、妇女的利益，才有保障。通知还要求各区、乡召开大大小小的纪念会，把通知精神传达到广大妇女群众中去。三月八日这一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黄陂召开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大会，来自四乡的妇女群众，戴着斗笠、唱着山歌，聚集在会场。会上，朱老总号召妇女群众积极投入扩大红军和慰劳红军的活动，参加生产和革命工作，支援革命战争。苏区妇女群众在参加武装斗争，在母送子、妻送郎参加红军的扩红运动；参加生产建设，供给红军吃、穿、用等给养；冒着炮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往来运输物资、抢救伤病员；在节约捐献、购买公债、支援战争等方面，都做出了不朽功绩。我的思想转变，应该说是在这些活生生的生活基础上悄悄进行的。

苏区妇女群众怀着保卫苏区的信念，掀起一次又一次母送子、妻送夫、姐妹送兄弟、未婚姑娘送情郎的参军扩红高潮。被誉为扩红、生产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先进的模范县——江西兴国，据一九三〇、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四年不完整的统计，这个县参加红军的人数是四万。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里曾提到，长冈乡的青年，一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了红军。一九三四年该县人口十八万，红

军家属就有六万，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据一九七八年兴国县的调查，全县烈军属和其他优抚对象，占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主要是红军时期牺牲的烈士的家属，有些已全家无人，无法可查的烈士，尚未计算在内。

我的家乡江西是山歌之乡。各种内容生动、情真意切的送郎参军山歌，至今还在我耳畔萦绕：

送郎当红军，
切莫想家庭，
家中事务呀，
妹妹会上心。

送郎当红军，
冲锋杀敌人，
保家卫国呀，
为国为人民。

这些山歌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亲人参加革命战争的自豪和相互的鼓舞。苏区妇女这种自我牺牲、勇于献身的精神，至今我仍念念不忘。

俗话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苏区妇女送子送郎参军的同时，承担的另项艰巨任务是参加生产，供应红军给

养，慰劳红军、抬担架，抢救伤病员等后勤工作。一九三三年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曾赞扬道，“才溪乡在成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群众生活的改良到百分之百以上。”才溪乡生产搞得这样红火，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很重要的因素是“耕种主要靠女子”。

那时，苏区的农田、山地里，到处回响着妇女们夸耀参加生产、支援革命的山歌声：

春风吹来百花鲜，
多少细妹学犁田，
你能赛过男人来，
亲哥看了笑连连。
如今世界唔比先，
劳动妇女学犁田，
英雄哥哥前方去，
后方生产催承担。

苏区妇女承担这些工作，完全靠自觉。以军鞋来说吧，记得仅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上，各县代表就认领完成军鞋任务三十万双。这些军鞋都是妇女亲手缝制的。一双双鞋头上缀着用彩线结成大小不一、数目不等的各种色彩鲜艳的绒球，鞋帮上绣着花，鞋底上扎

有：“勇敢杀敌”等一些大字……。深夜灯下，妇女们为红军缝补衣衫，千针万线，凝结着妇女的深情厚谊，道出了深深的军民鱼水情。

妇女同志真劳心，
三十万双草鞋送红军，
一双草鞋千万针，
红军哥哥穿了记在心，
穿上草鞋你们跑得快，
勇敢冲锋杀敌人。
深秋寒露夜三更，
红色姐妹围明灯，
十指灵巧拈针线，
帮助红军补衣襟。
补衣没有补衣布，
脱下内衣做补丁，
一块补丁一颗心，
军民情谊似海深。

我还记得，每当红军出征时，沿途村村设有茶水站。如果是在夜间，妇女们点起火把，静候迎送，漆黑的夜晚，一支支燃亮的火把，从这村到那村，像一条长长的看不到头的长龙。妇女们、孩子们端着一碗碗用磨碎了的芝麻、豆

子、茶叶冲好的“末茶”，挎着一篮篮各种各样油炸的果子和鸡蛋、花生，往红军口袋里塞……这些动人的情景，温暖鼓舞着战士们的心，高高兴兴奔赴前线。

战争打响之后，妇女们翻山越岭，冒着枪林弹雨，有的还背着孩子，把自家生产的鸡蛋、花生、饭菜甚至生猪送到战场，送到红军营地。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五个战役，有三个是在江西兴国县打响的。一次，兴国东村妇女组织了一百多人的慰劳队，挑着两头猪，还有花生、豆子、布草鞋，敲锣打鼓，走了九十多里地，送到前线。在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情况下，食盐极为短缺，苏区妇女千方百计从白区采购食盐。一个妇女装扮成丧妇，嚎哭着，跟随在装满食盐的棺木后面，谎称去埋葬死去的丈夫，把食盐运到苏区。

苏区妇女群众实心实意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我耳闻目睹，深有感受。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亲身体验，“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思想，日积月累，一点一滴注入我的思想深处。

晋东南妇救总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到达五台山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政治处任职。政治处主要是做战士、伤兵员的思想工作，也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自然包括了占人口半数的

妇女。我是妇女，便于与妇女群众接近，因此这部分群众的思想工作就落在我的头上，责无旁贷，我确也非常关心这项工作。

这年十一月，太原沦陷，根据毛泽东指出的“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华北“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路军总部进入晋东南地区后，总司令部所属各单位和一二九师主力各部分别抽调干部、组成许多八路军工作团、游击支队和民运工作队，与中共地方党组织结合，到武乡、襄垣、屯留、潞城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新政权机关和工、青、妇等组织，以及有妇女群众参加的自卫队等武装组织。从此，群众性的抗日斗争逐渐展开。

为了统一领导各县的妇女工作，一九三九年一月，晋东南地区召开了有各县妇女代表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如何统一晋东南各县的妇女组织问题。朱德、彭德怀都到会讲了统一组织的重要。同年二月，由八路军、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等三个组织的妇女发出倡议，号召全区选出妇女代表，召开代表大会，成立晋东南妇女抗日救国总会。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发起人中有我和浦安修，当时我俩都在八路军总部政治处工作。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发起人还有八路军总部

鲁迅艺术学校校长李伯钊、牺盟会的刘亚雄、黎颖、华逸和决死队的丁一等人。倡议书发出后，各县纷纷响应，有二十多个县选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成立大会在沁县开村召开。会场设在一处大院落，院内搭起了棚子，正面屋檐下摆着一张桌子，是主席台，院内用砖头支起一排排的木板，是代表的座位。成立大会受到党中央的重视，由刘锡伍、刘芝兰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巡视团，自延安远道前来参加。大会第一天，朱老总做了形势、任务和妇女工作的报告。他以通俗生动的语言，热切希望广大妇女群众投入抗日斗争行列；要求妇女组织要关心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并表明党组织和部队要支持妇女工作。巡视团的同志向代表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妇委有关妇女工作的指示精神，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妇女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党内的妇女工作系统，重视培训地方妇女干部，加强对根据地妇女工作的建设。

我和浦安修也分别在会上发了言。就在这次会上，我当选为晋东南妇救总会的名誉主席，刘亚雄为主席，浦安修为常委，其他发起人都被选为委员。我的日常工作还是在八路军总部。妇救总会的实际工作由刘亚雄和丁一负责。

尽管当时我是八路军总部直属队政治主任，日常工作是在总部。但晋东南妇救总会名誉主席的职务，仍然把我与妇女工作连在一起。我住在贫农老大娘家，乡里村里媳

妇受婆婆气的，找我来诉委屈；婆婆不满意媳妇经常出入妇救会、识字班、站岗放哨、耍刀舞枪的，来找我，夫妻吵嘴的，也来找我。我在做战士思想工作之余，也把这些妇女工作揽了起来。一次，我住房隔壁一家刚刚娶来的一个新媳妇，整天坐在炕角上哭，也不吃饭。原来这个姑娘才十四岁，就被从未见过面的夫家用花轿抬来了。我了解情况后，召集群众开会。在会上说：“老乡们！咱们都是从封建地主土豪劣绅的石板下钻出来的，谁也不愿再受人欺压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咱们的日子过得还要好。”我的话大概触动了群众的心坎，人们在微笑、点头。接着，我提出要和大家商量几件事：头一件，媳妇要自由找，不要再用钱买。第二件，男人不要打老婆。第三件，公婆爱媳妇，媳妇敬公婆，一家人要和和睦睦。第四件，大伙都要为抗日出力。群众都表示同意，事情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把妇女工作做好了，才能动员青壮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站岗放哨，防奸防特，做军衣、军鞋等，这一切才能落实，也才能军民密切配合，筑成铜墙铁壁，巩固抗日根据地。

朱老总、彭老总当时就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干部要注意培养妇女工作，他们自己还为大家做出了表率。为培养和输送妇女干部，开辟和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一九四〇年初，北方局妇委在王家峪附近石圪塔村，举办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的学员，一部分是晋东南各县妇救会秘书，一部分是来自晋西北等其他地区的女知识分子。训

练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卓琳、刘芝兰。朱老总、彭老总和中共北方局书记兼妇委书记杨尚昆先后都到训练班作报告，号召妇女干部要帮助妇女群众从族权、神权、夫权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为抗战做贡献。学习结束，彭老总在结业典礼上讲话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响应号召，到前线去，到基层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战斗。

军 民 鱼 水 情

一九三九年七月，朱老总率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县砖壁村以后，在百忙中，他总是要抽出一点时间到群众家问寒问暖，访贫问苦。当他了解到这个村的妇女还受着封建宗法思想的严重束缚，要总政负责群众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妇女骨干，做好妇女的发动工作。在全村妇女大会召开之前，他到开会地点对村妇女干部叶四唤说：你们这个村妇女人数不少，做好妇女工作很重要。现在你们还受压迫、受剥削，婚姻不自由，常挨打受骂，你是妇女中的骨干，要好好把妇女发动起来，组织妇女参加抗日工作，参加生产，让妇女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还要组织大家同买卖婚姻、封建势力作斗争。朱老总还亲切地告诉叶四唤，要大胆工作，八路军是为穷人办事的，会给你们撑腰作主。由于保密缘故，那时群众还不知道他就是总司令，但八路军为受压迫的妇女作主，像春风一样吹到妇女群众的心窝里，

伴着《妇女拥军》、《盼八路回家来》、《军民是一家》、《妇女解放》的歌声，掀起了一股妇女学习政治文化、参加劳动、支援八路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如同红军时期一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大批过去被人踩在脚下、遭受迫害的童养媳，在革命的浪潮涌来时，她们冲出牢笼，参加八路军、游击队，为抗日救亡做出了贡献。被称为太行山下一朵无名花的当代花木兰，她的事迹令人极为感动。她原名王九焕，是山西武乡县许家塙村人。许家塙村距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王家峪村不远。王九焕十二岁当童养媳，丈夫是个三十四岁的呆傻，她受尽公婆虐待，公公甚至要奸污她，她坚决不从，曾要投井、上吊。八路军进驻武乡县以后，她看到光明，想投奔八路军，却又怕部队不要女兵。一九三八年冬，她女扮男装，化名“王子清”，参加了八路军总部警卫连，随军转战太行。她打过仗，负过伤，入了党，随着年龄的增长，为掩盖突起的胸部，她用带子把胸部紧紧缠住。来了月经，在夜里悄悄把裤子洗净。一九四〇年辽县（今左权县）战斗中，她负伤住院，必须开刀。当医生将昏迷的“王子清”上衣脱下，慢慢解开一圈一圈紧紧缠在胸部的裹带时，泪水模糊了医生的眼睛，周围的同志都惊呆了，同屋的三位男伤员迅速搬了出去……。伤愈后，她坚决不下战场，要跟随部队作战，领导安排她到医院工作。以后，她随军出太行、渡黄河、转战中原，进军大西南。

王九焕的事迹是我以后才知道的，她引发起我对当时的回忆，也说明武乡妇女工作活跃的一个侧面。

革命战争时期的妇女工作与军事斗争，与部队的政治工作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分不开的。我也就从中逐步培养了我对妇女工作的感情，积累了一些经验。

延安《中国妇女》杂志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创刊，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杂志的主要任务是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妇女群众中去，总结交流各根据地妇女运动的经验；开展妇女问题的讨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广大妇女群众。当时，这本杂志不仅发行流传在各抗日根据地，还发行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其中有些文章公开转载在重庆《新华日报》上。

一九四〇年五月，我与朱老总及来自新疆的茅盾、张仲实等由西安抵达延安，在南门外举行的欢迎我们的大会上，我也讲了话，介绍华北前线妇女抗日斗争事迹。我特别提出，前线缺乏妇女工作干部，希望延安女子大学培养的女干部，能派赴前线工作。《新中华报》报道了这次欢迎大会和我的讲话。

当我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途经西安时，曾应邀在一次座谈会上，介绍华北妇女抗战情况。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瑶姑参加了座谈会，在该报作了报道，特别谈到：“华北妇女运动的开展，是依靠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八路军是民族解放的战士，因此他自然乐于赞助在民族中占半

数妇女的解放。军中的女同志自然更是开展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我尝到了做妇女工作的甜头，有苏区时期的基础，而华北敌后工作三年的所见所闻，使我对妇女工作的意义有了较深的理解，对为妇女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愿望逐渐坚定起来。

战时保育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在不长的时间里攻占了我国华北、中原、华东、东南大片国土。千千万万个儿童在敌人的炮火和屠刀下，惨遭杀害，幸存下来的儿童，不少失去父母、家园，饥寒交迫，四处流散。为抢救民族后代，培养他们成长。一九三八年春，中共长江局妇女组成员，同时又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妇女组组员邓颖超，会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刘清扬、沈兹九以及国民党等党派、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一百八十四人，联名发起筹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本着国共两党合作，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争取国内外各方面人士的支持、赞助，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推选宋美龄为理事长，李德全为副理事长，聘请蒋介石、冯玉祥、孔祥熙、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以及民主党派、海内外爱国团体和侨胞，各界

知名人士沈钧儒、郭沫若、茅盾、老舍、蔡元培、胡适之、陈嘉庚、胡文虎和国际友人与驻华使节史沫特莱、斯诺、司徒雷登等共二百八十六人为理事。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反响。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纷纷捐款、捐物。宋庆龄以她在国际上的崇高威望，给外国朋友们写了公开信，呼吁救济中国难童。她在香港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不断收到海内外朋友们募捐的资金、物资，支援中国儿童保育工作。

继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后，全国各省、市和香港、南洋群岛先后成立了二十多个分会，建立了五十三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难童三万余名。

同年七月，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各界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鲁迅师范学校、延安市托儿所等十多个团体发起筹备，于四日召开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陕北小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女学员，延安市女自卫军女少先队、儿童团等千余人。大会主席刘秀梅报告成立保育分会的意义时，指出儿童保育与抗战救亡是分不开的，保育儿童首先是保护儿童不当亡国奴。大会选出宋庆龄、宋美龄、何香凝、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许广平、刘群仙、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王汝琪、曹孟君为名誉理事。蔡畅、张琴秋、丁玲、史秀云（陕甘宁边区妇联副主任）、徐明清、杨芝芳等十五人为理事。我当时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工作，也被选为理事。

我和朱老总分别住在枣林村和王家峪村，虽说两村相隔不过五六里，平时很难回去一次。当时华北前线的工作相当紧张，总部机关分散在好几个村，我跑这村，去那村，处理问题，做思想工作、群众工作，这些几乎占满了我全部时间，因此，有关当选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一事，当时我无力兼顾。但战区群众、儿童残遭日本侵略军的杀害，我不仅两耳充闻，而且也曾目睹。一九三九年春，日军侵占山西沁县、武乡县附近的故城，一次就有八个七八岁的小孩死于敌人的刺刀下，有十九名妇女被敌军奸污。我心中涌上极大的愤慨和仇恨。“抢救民族后代，培育儿童”是与抗日救亡、与妇女工作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察绥、苏皖、山东等根据地、解放区，先后都办有托儿所、保育院，并曾建立了儿童保育分会。为推动各解放区保育工作的开展，加强对这些保育机构的统一领导，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发起组织中国解放区儿童保育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在杨家岭召开成立大会。选出委员七人，蔡畅为主任，我为副主任。不久，蔡畅离开延安，我代行她的职务。保育委员会成立后，经常派人到边区各保育院、托儿所，指导协助工作。

从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理事，到解放区儿

童保育委员会代主任，就这样我走上了儿童工作这个岗位。与许多同志一起，成为新中国儿童保育工作的一名园丁。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地方。群众生活水平低，愚昧落后的旧习俗带给妇女儿童灾难，令人痛心。缠足妇女从事锄草等辅助农业劳动时，双膝包着厚厚的旧布、旧鞋底，跪在地上，匍匐前进。缺医少药，群众信奉的是神汉、巫医，当时儿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抗日的烽火迅速燃烧起来。边区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开展对日斗争。在这种斗争形势下，边区的儿童保育工作以服务于抗日战争为前提，是从抢救战区难童、抚育抗日将士遗孤、收养开赴抗日前线的干部子女着手，逐步展开的。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成立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原延安市托儿所为基础，经过整顿、扩建，筹办为战时儿童保育院（即现在的中央军委总政托儿所）。直属保育分会领导。第一批收托的烈士遗孤、战区难童和边区少数领导干部的子女计八十六名。为祝贺这所保育院的成立，十月二日在延安南门外柳林子保育院举行了成立典礼。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王明，以及孟庆树，艾思奇等人都出席了。朱老总正从山西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这天，他也参加了庆祝典礼，还讲了话，鼓励工作人员做好工作。毛泽东亲笔为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新中华

报》发表了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

一九四〇年保育院扩建，迁到延安北门外。朱老总、林伯渠、徐特立等领导都题词祝贺和勉励。经过在重庆的周恩来争取由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拨款，按期汇寄到边区。

一九四一年，延安女子大学和中央统战部托儿所与战时保育院合并，收托儿童达三百名后，改称第一保育院。当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保育院疏散迁移到山西，解放后迁返西安，更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

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斗争日益艰苦，为使前方抗战干部和在边区工作的干部解脱教养孩子的牵挂，一九四〇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托儿所，指派李维汉和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璋负责这项工作。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左权、邓发等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曾寄托在这个托儿所。一九四二年，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在洛杉矶募得一笔款项、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通过层层关卡运到延安，其中一部分赠给中央托儿所。为纪念和感谢海外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一九四二年中央托儿所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一九四六年六月，毛泽东曾到这个托儿所看望孩子和工作人员，并亲笔题词“已有进步，更求进步”。解放后，这个保育院迁移北京，改称中央军委保育院。在延安、在北京，朱老总和多次前往参观。受托探望和接出他们的孩子，到我们家过节假日。

此外，延安还有一定数量的机关托儿所、变工互助托

儿组等。

生活在延安这些保育院里的孩子是幸福的。他们受到中央及各方面人士的关怀。保育人员更是竭尽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洒下辛勤的汗水。

前不久刚刚病逝的我国报界老前辈赵超构先生，他在一九四四年以重庆《新民报》记者身份，参加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参观一个多月。他的著作《延安一月》曾风行全国。在这本书里，他谈到，在延安、在边区，使他感动最深、印象最深的是：参观第一保育院和洛矶托儿所。他写下了如下的感受：

“保育院幼稚部所在的地方就叫儿童沟，那真是儿童之沟。两岁至六岁的小孩像牛羊一样，散放在空气和阳光下面嬉戏。这些儿童，多是活泼健壮，逗人欢喜。延安人的生活虽然那么节约，对于儿童生活似乎并不吝啬，成人的衣服是土里土气的，这些小孩子的衣服样式却是十分摩登，穿得个个都像洋娃娃。我们试为他们起外号，有的小脸儿红红的，叫做‘苹果’，有的特别肥胖，叫他‘东瓜’。”

“孩子的娱乐是充分的，较小的一组坐在玩具一样的小椅子上，跟着阿姨唱歌，有的连歌还唱不下来，只能傻笑；大一点的便都在操场上，围着阿姨做游戏。跳的、叫的、相追逐的，笑做一团。从小就过惯了集体的生活，孩子的气质似乎比家庭的小孩有些异样，一点不怕生人。我们在那里，几乎每个人都被这些可爱的‘小鬼’拖住了，手上、腿

上，拉得紧紧的。他们很会饶舌，没有什么羞涩的样子。有一个五岁的女孩在我怀里，忽然对我的手表发生兴趣，他追究这是什么人‘发给’我的，我说是买来的，她抬头看我，非常惊讶。我问她‘你喜欢这个么？’她回答道‘等我长大了，公家要发的。’我这才知道，他们根本还未了解买卖是怎么一回事，她只知道什么东西都是由公家发给的，怎么懂得复杂的金钱与买卖关系呢？”

当年的“冬瓜”“苹果”已经成长起来，有的当了工程师、讲师、导演、翻译、研究人员……，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现任国务委员、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中央芭蕾舞学校的舞剧编导蒋祖慧，她是丁玲的女儿都是延安第一保育院的娃娃。

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延安的儿童保育工作迅速开展。这项工作服务于抗战的重要性日益被干部们所理解，得到中央的关怀、支持。中共中央、中央妇委、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保护母亲儿童的措施，还一再号召女干部到保育战线上来。这呼唤使我进一步投入儿童保育这块春意盎然的园地耕耘……。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时，那一幕幕、一件件，仿佛就在眼前。

战时儿童保育院成立不久，《新中华报》发表的社论《保育我们后代的战士》说：“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地区，大批中国儿童被装运去日本，施以奴化教育，培养成将来屠

杀我华夏子孙的刽子手，成千成万儿童被杀害，在上海已有一千多儿童饿死。河南尉氏县，敌军烹食我国儿童。”社论呼吁：“保育儿童工作是我们今天极重要工作之一，谁忽视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谁就是等于对抗战建国的怠工。”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延安，保育院提前安全迁到安塞县。就在敌人袭击的时刻，边区的男女干部、群众纷纷请缨，要求到前线杀敌，却无人自愿留下来做保育工作。为此《新中华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孩子怎么办？》情深理透地剖析道：“今天的苦难在两方面，前线和后面。要当好汉上前线，但后面也有前线……前面的前线和后面的前线互相帮助，前面不好生打仗，孩子不能活。孩子在家里哭，前面仗也打不好。”文章疾呼女同志们“到保育院去！”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保护母亲儿童的决定》，明确指出“适当的解决保育儿童问题，可以使工作人员安心革命工作”；批评那些对保育儿童工作“采取轻视与莫不关心态度”的人；号召“全体党员积极起来，注重保育儿童的工作，并希望女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参加保育工作”。中央和边区政府还先后颁布了产妇、婴儿待遇，机关、团体、学校设立托儿所，以及增加托儿所经费、儿童保育费、产妇休养费、婴儿养育费等问题的规定。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央妇委召开保育工作会议，出席

会议的有延安各托儿所长、医科专家、党、政、军、财金部门的领导人。会前，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侯健存，诗人肖三的爱人叶华巡视了延安十四个托儿所。会上，他们就儿童饮食、卫生、教育工作提出建议。中央妇委同志鼓励大家到保育战线上来，保育工作也是光荣的革命事业。

“保卫民族后代！”“女同志到保育战线上来！”这声声召唤来自中央领导，来自纯真的孩子。我从前线回到延安时，正是这阵阵声浪在延安上空回响的时候。凌莎、丑子冈、黄杰……走到保育战线上来了。他们是延安时期保育工作者的先驱。

凌莎是广东梅县人。早在梅县师范学校读书时，她接受进步思想，参加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梅县妇女协会主任。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她曾两度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东方民族殖民地学院学习。返国期间，先后任满洲省委妇女部长、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九年自莫斯科回到延安，曾在女子大学工作。在党的召唤下，她自愿到第一保育院任院长。全国解放后，在东北、武汉和北京从事教育工作，一九六二年病逝。

我并不认识蒋镓女士，也从未见过面，但她的事迹，曾深深地感动了我。

蒋镓女士是战时儿童保育会下属四川合江儿童保育院院长。浙江宁波人，她的丈夫周明栋是武汉名医，家资丰厚。抗日斗争的战火，唤醒她从安适温暖的家庭生活走出

来，投身到抗日斗争洪流。她自愿到武汉陆军第五医院做护士，精心护理负伤战士，受到伤病员的爱戴，被誉为伤兵之母。在医院工作一年多的时间，负伤痊愈的将士重返前线前，曾两次自发地给蒋镓献旗。

武汉失守后，她受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之托，护送百余名难童从武汉出发，辗转行程数千里，历尽艰苦，平安到达四川。在孩子们苦苦挽留蒋妈妈的稚声泣语中，她毅然不再返回武汉与家人团聚，出任四川合江儿童保育院院长。她全心全意照顾抚育孩子，四处奔波操劳。孩子们亲昵地称她为“好妈妈”、“院长妈妈”。她终因积劳成疾，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逝世。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追悼专刊。邓颖超撰文哀悼，称她是“一位贤淑、慈祥、诚朴、充满母爱与博爱的人”。赞扬她“坚定不移地献身于抗战救国，为了伤员，为了难童，专诚致力工作，日以继夜，忘食弃家，以至舍己身亡”。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和边区战时保育院送的挽联“懿范永存，精神不死”“众孤失恃，遐迩皆悲”，也登在这个专刊上。陕甘宁边区保育分会和边区战时保育院联合举行了追悼蒋镓女士大会，纪念和弘扬她献身伤兵看护和儿童保育事业的忘我精神。

抗日前线的干部、将士子女，需要留在延安抚育；从抗日根据地，从日益蔓延的战区源源不断送来的烈士遗孤、难童需要抚育。孩子们饱含深情渴求母爱的眼睛；保育工作先驱们的模范行动；中央的号召；朱老总对儿童工作的

关怀……，是一股股有形、无形的力量，使我在党校学习的后期就已把儿童工作排在我的日程上。

一九四四年秋是抗日战争总反攻、争取胜利的前夕，延安将有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中央有关部门商定再筹建一所保育院，解决这部分出征干部的子女抚育问题。中央妇委书记蔡畅要我负责筹建工作。周恩来在重庆得悉情况后，从他们的活动经费里，挤出一部分作为捐助。任务在身，责无旁贷，我挑起了这副担子。这所保育院在行政上由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领导，朱老总也把这项工作看做是他份内的事。我们从前线回到延安以后，他经常到保育院、小学校去看看瞧瞧，凡是儿童活动的节日、项目，他都去参加，有时还拉上我。刘伯承和他的爱人汪荣华当时在前线，他们的儿子刘太行就由朱老总和我照料。刘伯承从前线回来后，小太行硬是不认不叫爸爸、妈妈，只认朱老总和我为爸爸、妈妈……。

在筹建保育院的那段时间，朱老总和我们一起爬坡、翻山，几经查看，选中延安城北枣园川南面小砭沟里的半山腰做为院址。这里空气新鲜、阳光充足。院址选好后，他常常和我一起去，看看窑洞打得怎样？为防止孩子掉下坡，检查孩子经常进出、活动的坡前，修栏杆没有？栏杆牢不牢固？购置各种物品、添制玩具、用具时，也都过问。经过半年多的筹建，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在抗日接近最后

胜利的时刻，迎来了第一批孩子。这就是延安第二保育院。

建院以后，朱老总和我经常到保育院看看有什么困难？孩子生活如何？记得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他到保育院后，特别耐心地向那些不安心保育工作的同志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长在革命环境里，要很好地把他们培养为革命接班人。他语重心长地对那些满怀激情、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却又被分配做保教人员的青年说，前方工作是革命工作，后方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培养革命接班人，同样是革命工作，这叫革命工作有分工嘛！他指着保育院两棵野生桃树，引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成语，形象地告诉工作人员，你们要把那两棵树管理好，十年树木嘛。

从我自己思想成长、转变的过程，对这些不安于保育工作的同志是理解的，体谅的。我相信，经过工作，他们也是会转变的。这些年轻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封锁线，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谁个不想在火热的斗争中锤炼？但组织分配到保育院这个岗位上，就必须安下心来。在那个年代，我们信奉的是“服从分配”、“干一行爱一行”。第二保育院后来从延安撤退时，一百多个孩子，辗转行程三千里，安全到达北平；另批孩子经过海路六千余里，安全到达哈尔滨，与他们前往东北开辟工作的父母团聚，就是因为有一批觉悟高、热爱孩子的工作人员。

第二保育院院长张炽昌，是一位男同志，从建院初期起，挑起这副重担，直到进入北平。一九五三年前后调离。他始终忠于职守，在保育工作岗位上，一千十数年。这是极难能可贵的。

张炽昌是一位来自贵州，经过正规军事学校学习的青年。他投奔到延安后，在军事机关工作。建院初期，保育院面临重重困难。当时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和我几经商量，调张炽昌来院加强工作。一个军事干部，又是男同志，他思想不通，是可以理解的。他向胡耀邦申述说：“我根本不懂得保育工作，也没学过教育，对孩子的事一点也不懂。”胡耀邦笑笑说：“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嘛！我们很多指挥员、政治委员，都是拿锄头、拿锄头的工人、农民，他们也没有学过军事、还不是在战争中学习打仗？”他问：“组织上是不是决定我干一辈子保育工作？”看得出，他正在“服从组织分配”的原则下，自我斗争着。我找他谈话，告诉他：抚育这一百多个孩子的担子并不轻，保证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躲过敌机的轰炸；战胜各种疾病的感染；懂得正确教育孩子的方法；还要善于团结来自五湖四海、思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工作人员，共同做好工作，这比领导一个连、一个营还要困难些。要想到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那些男女干部，革命需要这些孩子的父母去前方，他们把孩子交给党，中央很关心这些革命后代的健康成长，保育院有责任把这些孩子带好。

张炽昌终于肩负重任，来到保育院。他要解决那些不安心工作，个别甚至常常啼哭的保育人员的思想问题，要采取防范措施，防止孩子发生意外；要攻克腹泻、麻疹、口角炎等儿童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防治；要加强保育人员政治、业务、文化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地保育和教育孩子。当时，有位同志向我反映，保育员对哭闹不听话的孩子说：再哭，就把你送给老百姓。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革命是为了老百姓，取得革命胜利要依靠老百姓，用“送给老百姓”来“威吓”孩子，将给孩子造成什么印象？

那时，我没有学过如何启迪婴幼儿德智体美全面、健康成长的问题，也没有学过如何把适合儿童情趣的教育内容渗透到各科教材和日常生活之中。革命战争年代里，我耳濡目染所接受的教育，是阶级观点、革命观点，说话办事要符合革命利益，时时事事都提到“政治原则”高度。但幼儿教育有其本身的特点。现在想来，当时的教育方法尚有欠缺。但我们的保育工作者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熏陶下，一心一意散发着光和热，尽管工作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他在工作上还是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这位勤勤恳恳的张炽昌，他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全部贡献给了保育工作。

马 背 摇 篮 曲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年十一月，胡宗南在延安附近郿县增兵两个师，战火随时可能燃烧到延安。党中央决定，延安的非战斗单位一律撤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我心急如焚，延安大小托儿所、保育院近三十个，带着这么多孩子转移，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几经研究，第一保育院由边区政府民政厅负责安排，指挥转移；洛杉矶托儿所由中央卫生部、解放区保育委员会委员傅连璋直接负责；我分工抓第二保育院的转移安排。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就向张炽昌等院领导打过招呼，告诉他们内战不可避免，蒋介石一旦挑起全面内战，一定波及延安。我们要做好孩子安全转移的准备，驮孩子的小木床、医药用品、防寒用品、食物……这一切又需悄悄进行，不要声张。形势越来越紧张，十一月五日我告诉张炽昌等院领导，力争三天，最多不得超过五天，保育院必须撤离延安，转移到太行解放区。待保育院撤离后，中央即给沿途党、政、军有关方面拍发电报，要他们给予协助。你们每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来电报，报告孩子、工作人员是否安全到达。我一再向院领导讲，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一定要把孩子安全带到目的地。

保育院向全体工作人员做了动员，提出“一切为了革

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和“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号召，从上到下实行责任制。在短短的几天内，中央为他们调配了几十头骡马。保育院自己准备了一批批驮在牲口背上的小木床，上千斤饼干、六百斤油炒面，五百斤煮鸡蛋，还有挂面、大米、糖……，一样样整齐有序地装在木箱里。做好行军的一切准备。这真是一次艰难、特殊的行军呵！

十一月十一日，他们怀着依依之情告别延安。巍巍宝塔山下，延河水边，转移的队伍先后踏上长途行军的征途。每头牲口背上驮着两个小床，孩子睡在小床里，盖得暖暖和和，长长的骡马队伍，行进在陕北高原上。

我目送这一支支转移的队伍，心头一时涌上数不清的想法，酸甜苦辣说不清。长征，我们曾是那样走过来的；如今，这些孩子是这样睡在马背摇篮里“长征”的。他们将会遇到哪些艰难险阻？又将怎样在他们的父辈们、保育院叔叔、阿姨的护卫下，战胜重重艰险呢？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保育院的队伍到达绥德县东三十里铺村时，几架国民党飞机从远处飞来，负责瞭望的同志立即吹响警哨，全体工作人员迅速将孩子从小驮床里抱出，找好地方隐蔽。来不及隐蔽的，保育员扑在孩子身上，就地卧倒，把孩子紧紧地保护在自己的身体下。

一个夜晚，保育院队伍出发，赶在拂晓前到达黄河边，抢渡黄河，以避开敌机轰炸渡口。近千米的河面，两只小

船往返摆渡，天亮前，孩子们全部安然渡过黄河。十一月下旬，这支马背摇篮队伍的孩子们来到晋绥解放区汾阳县柳林镇，计划在这里休息几天后，通过一座终年积雪的绵山，继续前进。正巧彭德怀从前方回延安，路过这里。他关切地把孩子和工作人员安排在一所小学校里，要他们留下住两三个月，他说：“现在正是天气最寒冷的季节，在这种时候翻越绵山，不要说孩子，就是大人也受不了。”一个月以后，晋绥解放区司令员贺龙来到柳林镇，他找到保育院领导说：“我们已经接到中央的电报。保育院孩子的父母正在各解放区战斗，中央很关心这些孩子。前方在打仗，物资、药品虽有困难，但你们在柳林镇等候过路期间，仍然按照延安时期孩子们的生活标准供给。”他指示地方上要保证供应白面和肉食等食品。

保育院从延安出发，受到沿途党、政、军领导的照顾，在柳林镇休整后，迎着二月春寒，在两渡口通过敌人封锁线，过汾河，翻越崎岖山路、羊肠小道，翻绵山、十八爬大山，历经三个月，终于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到达太行解放区的山西襄垣县南里信村，安下家。住了一年。石家庄解放。又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迁往河北省平山县。这次行程近千里，所经地区都是新解放区，孩子们已从马背摇篮改坐大车。几十辆铁轱辘大车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孩子们的歌声、欢笑声，伴着车轴的吱嘎声，在春天的田野里回响着。路旁绿色草地上一丛丛五颜六色的野花，在田

野庄稼的衬托中，十分美丽。引得孩子们仰着小脸，扬起小手，一边指指点点，一边嚷嚷：阿姨！我要花，阿姨！你看多好啊！这样一支奇异的行军队伍，走过一片田野又一片田野，一九四八年五月到达河北平山县刘家会村。又过半年，北平和平解放。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保育院迁到北平。尽管当时铁路运输任务极为繁忙，铁道部的领导还是拨给保育院两节车厢，其中还有一节是软卧车厢。孩子们是坐着火车进入北平的。至此，第二保育院从延安出发，历时两年十个月，全部行程三千三百四十里。

还有一部分孩子行军的路程更远，时间更长。他们是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的子女。一九四七年八月，保育院在山西襄垣县时，接到晋冀鲁豫中央分局通知，要保育院派人将这部分孩子计三十七人送往东北，与他们的父母团聚。八月出发，辗转迁回到胶东地区，从威海渡海到大连乘船绕道朝鲜和日本间的海峡，在朝鲜车北部清津港登陆，受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接待，通过图们江大桥，坐火车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各自回到自己父母身旁。

我是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离开延安的，尽管我没有与保育院的孩子们一起出发，但却无时不在关怀他们的去向和安全。我唯一能做的是尽早根据保育院行进路线发出电报，请沿途有关部门多方给予关注。我也坚信，在张炽昌等人带领下，依靠和团结全体保教人员，一定能战胜困难，胜

利完成任务。

进入北平前后，我听到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好人好事。陈赓司令员喜报落水儿童健在，就是其中的一个。当第二保育院经两渡口敌人封锁线，过汾河的时候，五岁的慕延和不满两岁的三八睡在摇篮里，牲口失蹄，两个孩子掉进河里。跟在这头牲口后面的全超，迅速跳进冰冷的河水，先救起慕延，小三八却被水冲远了，他不顾冰冷，再次纵身入水，终于把小三八捞上来，但孩子已休克。全超这位十八岁的小青年，带着两个孩子找到一户老乡家，把孩子放在热炕头上，进行急救，孩子苏醒了，发了高烧。掩护干部、孩子过封锁线的部队扫尾清查时，发现了全超和孩子，立即将他们带到部队，由医生进行抢救。保育院的队伍到达太岳军区的韩洪镇后，大家都为失落两个孩子焦急万分。正在这时，收到陈赓司令员的电报：“两个孩子健在”。二十多天以后，全超带着孩子，又一次通过封锁线，赶上队伍。

保育院在晋鲁豫边区襄垣县暂住期间，一天，十多架国民党飞机轮番袭来。保育员肖桂英正陪同患病的正南在医院看病，一颗炸弹投在医院附近。在飞机投下炸弹的片刻，肖桂英紧紧抱起正南，跑出医院，用棉袄紧紧把正南裹在怀里，俯身卧倒，趴在正南身上。“轰”的一声，一颗炸弹在她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弹片卷起冲天的尘土，厚厚的一层压在肖桂英身上、腿上，使她透不过气来。正南哭

喊着阿姨，嚷嚷憋闷得慌。肖桂英拨开厚厚的土层，搂住正南，移动被震被压得麻木的双腿，匍匐着向前爬呵、爬呵，找到一个低洼地方，隐蔽起来。好大一阵，敌机飞走了，肖桂英拖着疼痛的身子，看着安然无恙的正南，微笑了。

当年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现在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徐庆东，由他编剧、谢晋导演的电影《啊！摇篮》，再现了这段历史。

马背摇篮里的孩子们是不会也不应忘记这段历史的，永远不会，永远不应忘记的……。

一九八四年春节，原延安保育院的十一名老师、阿姨和十七名小朋友，在北京自发地组织了一次茶话会。当年的小朋友给老师、阿姨们每人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赠送了纪念相册。相册上有“小朋友”们的献词。献词写道：

“献给在那战火纷飞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里，用延安的小米和革命的理想，哺育了我们的延安保育院的老师阿姨们。

“几十年过去了，你们在我们心灵里播下的真理的火种和深厚的同志情谊，一直在我们心中燃烧光大，它不但鼓舞和激励着我们，而且鼓舞和激励着我们的下一代，为中国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第十二章

在新中国的舞台上

西 柏 坡

撤离延安后，我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河北平山县的。直到一九四九年春进入刚解放的北平，我在西柏坡工作、生活近两年时间。

这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程。

在西柏坡迎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迎来了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迎来了即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各族妇女团聚的盛会——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准备这一盛会，我分别参加了连续多天的中共中央妇委会议和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

一九四七年九月末到一九四八年夏，我们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妇委委员在邓颖超主持下，连续召开了三次妇委扩大会议。中央工委对妇委扩大会议很重视。在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对妇女工作对象、方针、方法与妇女组织

等问题讲了话。朱老总也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妇女组织要好好整编，建立起妇女儿童工作。他还严肃批评了女干部不安心妇女工作的思想。

长征到达延安，重新建立中共中央妇委后，一九四五年九月，我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妇委委员。当时，我觉得，自己来自基层，文化水平低，既不会写，也不能讲，从事妇女工作时间短，经验少，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在一次会上，我坚决提出辞去妇委委员的要求，一再表示：“真正从工作着想，妇委成员应从各个地区的妇女工作者中选出。”我还表示，我可以从事退伍军人的工作。我是在红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对部队工作有特殊的感情，我的意见未能得到与会同志的支持。邓颖超首先表示：“妇委人选是经中央提出的，希望你打消这个想法。”张琴秋、杨之华边鼓励、边规劝，张琴秋诚恳地说：“孩子问题不解决，妇女的工作等问题就无法解决。希望克清设法促成、完善儿童工作”。杨之华讲：“克清在保育工作方面做出了成绩，解决了很多问题。保育工作是建设事业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希望打消离开妇委的想法。”有的同志郑重其事地讲：“全国革命胜利高潮到来之前，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妇委的班子非常重要。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充实妇女运动的司令部，不同意克清离开妇委。”

刘少奇对妇女工作的意见，朱老总在会上的讲话，妇委同志们的批评和劝导，使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意识到

已挑起的担子放不得。于是，我与妇委同志们一起，对保育工作认真地做了研究。我也第一次凭我的直觉，在这次的会议上，将意识到的问题提了出来：现在的保育院并未真正解决妇女干部的问题。延安时期保育院孩子们的生活，由于中央、边区政府的支持、照顾，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千方百计保证孩子们肉、蛋、面、水果、蔬菜等主副食供应。这些孩子与群众生活差距很大。该办什么样的保育院？还有妇女生育孩子问题、妇婴卫生问题……我脑海中盘绕着这些问题，我向自己，也向妇委提了出来。

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军作战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这时候，国统区的爱国人士、著名大姐沈兹九、李德全、刘清扬等也陆续到达西柏坡。

为迎接这个新高潮，总结自一九四三年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以后的工作，讨论全国革命胜利形势下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由邓颖超主持，先后召开了中央妇委会和妇委扩大会。同年九月党中央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儿童保育工作是以上系列会议的议题之一。对过去的保育工作怎样认识，今后如何开展，在讨论过程中，参加会议的成员从各自看到、感到的角度，都谈到儿童保育工作与妇

女干部的成长是分不开的，也把妇婴卫生工作提了出来。会上对这一工作有共同认识，也有分歧意见。会后我又到平山县附近做了调查。

这是我参加中央妇委以来，第一次坐下来与妇委成员认真地讨论保育工作问题，也是在妇女工作领导层里明确分工，由我主管儿童保育工作。这就是说，全国革命胜利后，我要在新中国儿童保育园地上耕耘，挑起领导儿童工作这副担子来，我要不失时机地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取得妇委成员们的帮助和共识，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帅孟奇大姐谈到，妇女干部的问题多得很，不解决保育问题，妇女干部问题的解决都将落空。妇女干部问题最好与保育问题配合解决，二者是相互联系着的。她还谈到：“部队有成千上万的家属，要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学习，家属不要只带孩子。要培养她们成为建国的人才，要预计到将来实行薪水制的时候，他们能够自食其力。可是，这些家属的孩子问题尚未解决。我认为也要从她们中培养一部分保育人才。”帅大姐的讲话启示了我，有相当多的随军家属的孩子问题、工作问题要解决，否则革命胜利之后，这些送郎参军的家属出路安在？帅大姐这位长期做党的工作、组织工作的老大姐想得好远、好深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军队干部家属代表会议讲话时，特别谈了“把家属队办成职业学校”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把所有家属队变成职业学校，

每人至少学会一种本领。战争快要胜利了，原来不能独立工作、能力很弱的一部分女同志怎么办？我们要提高她们，使她们变成革命工作的干部，这是我们的责任。要使她们在战争胜利后个个站起来，既带了孩子，又有一门本事，经济独立，才是妇女解放的基础。”

无论在延安，还是在其他一些根据地，限于条件，为数不多的托儿所、保育院收托孩子的名额有限，随之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除烈士遗孤、前方将领子弟、战区难童外，余下不多的名额，收托高级干部的子女，一般女干部的孩子很难送进。因此，会上大家也反映有些女干部背着孩子下乡工作、颇为艰苦。还有相当一部分女干部把孩子寄养在群众家。据北岳区、冀中九分区、太行区、太岳一分区、冀南区地方女干部托带孩子情况调查，其中百分之六十七的孩子都送到群众家喂养。由于群众缺乏科学育儿知识，喂养不当，这部分孩子的死亡率较高。还有一部分自己带着孩子坚持工作的女干部，遭非议、受歧视。这部分女干部强忍困难，有时孩子病了，也难兼顾。还反映，部分女干部过分看重孩子，借口不工作，供给照发不误。一次，邓颖超发言，援引列宁对托儿所问题的论述“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是这些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毫不华丽、毫不夸张、毫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

托儿工作与妇女干部密切相关，是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一点妇委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大家结合现实发言互相补充，使我的认识更加深化了。

我在几次妇委和妇委扩大会期间，曾有过这样几层意思的发言：

(1) 有些女干部有了孩子，就停止工作。应注意吸收她们的孩子入托儿所，而不能只以男同志地位的高低决定孩子是否可以入托。

(2) 只有母亲体会到保育事业的重要，保育事业才能发展，成立机关托儿所，首先要打通母亲的思想，只有这些母亲有迫切需要，领导给予支持，托儿所才能办下去。

对于保育工作的研究，目前只限于妇女工作干部这个圈圈，应在开拓和深入工作上下力量。有些女同志愿意组织托儿所，把孩子托起来，但没有钱。应按现有规定，把保育儿童的经费集中起来，办机关日间托儿所，使保育工作群众化。

(3) 保育儿童是一门科学，带孩子像养花一样，浇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培养一个熟悉业务的保育工作者要两三年时间。要教育保育工作者具有事业心。

(4) 保育问题是女干部问题的一个部分，对群众来说，如何普及妇婴卫生知识问题，更是普遍要求。

会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同时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再次确定我

负责主管儿童保育工作，配备干部，组成了一个小班子。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的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平山县南庄开幕。

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前夕，被战争长期隔离、各处一方的妇女工作者相聚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探讨全国革命胜利后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这真是一次“群英会”。太岳区代表从山西阳城动身，绕道尚未解放的太原，一路上坐牛车、马车、敞篷汽车、还徒步爬山越岭，穿过羊肠曲径，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其他远自东北、华东、华北、陕甘宁等各解放区以及国统区的妇女干部长途跋涉，更为艰苦。

朱老总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刘少奇、周恩来做了重要报告。经济学家薛暮桥作组织合作社的报告。周恩来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形势报告中；谈到培训女干部问题时，说：“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关键问题是必须要有计划地训练、培养大批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这方面很感不足。希望今后要加速培训妇女干部。”这时他微笑着称道蔡大姐、邓大姐是如何坚持走完长征路的，讲到许多女同志又是如何坚持爬雪山、过草地的。他夸赞说“女同志的自信心很强。”

邓大姐做了妇女工作的讲话和闭幕时的总结。她充分肯定了我国妇女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指出新形势下仍要继续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组织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为中心的工作方针；积极动员妇女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支援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解放。罗琼、李培之、杨之华分别做了妇女参加生产、妇女干部和婚姻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结合解放区有关婚姻问题的法规，讨论了婚姻法问题，为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新中国法律——《婚姻法》做了准备。会议还决定把“妇女抗日救国会”改称“民主妇女联合会”。

会上，我以解放区儿童保育委员会代主任名义作了题为《保教合一的问题》的发言。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老总等中央领导都集中住在西柏坡村。中央妇委的帅孟奇、杨之华、李培之、罗琼等住在东柏坡。两村相隔一里许。全国胜利前夕，工作繁忙、生活紧张，但充满情趣。

任弼时在中央分工领导妇委工作，我与他爱人陈琼英在江西苏区早就相识，加上一一起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跋涉，在西柏坡时，我们往来较多。他带着女儿远志、远征、远芳和小儿子远远。远征是红军长征进入西康阿坝地区时生下的。朱老总曾和弼时同志一起到河边钓鱼，让人做了鱼汤送给陈琼英。从那时起，我和朱老总就和小远征结下了“友谊”。远远是陈琼英在延安时生育的，胖乎乎的，很像爸爸，惹人喜爱。这些孩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乐趣。我

们四个大人常常带着孩子们在滹沱河边散步，我还给胖乎乎的远远起了一个绰号“小地主”，远远也常尾随在爸爸身后，出现在毛泽东、周恩来、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之间，毛主席送给远远的绰号是“小政治委员”。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国妇女第一次组团，由蔡大姐率团参加国际民主妇联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妇女代表大会。团员韩启明当时任晋察冀边区妇联主任、献县县委书记，是抗日战争初期起在基层锻炼成长起来的干部，工作踏实，有闯劲。她到西柏坡集中后，邓颖超曾陪同她来看望朱老总，朱老总摆了“黄瓜宴”，招待她和正在我这里闲谈的帅孟奇、李培之、杨之华大姐们。说是“黄瓜宴”，其实就是将每根黄瓜洗净，然后切成几块长条，摆在两个盘子里，分送大家吃，这在当时也是极美好的小宴呢。朱老总走到大韩面前，亲切地对她讲：“启明，你这土八路这次出国，好好开开眼界。”星期六的跳舞晚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还有王光美等翩翩起舞。我与朱老总跳了一阵之后，朱老总邀韩启明一起跳，说这是出国前的一项准备，是一种“礼节培训”。

怀仁堂的两次盛会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我和帅大姐等中央妇委的全体工作人员坐着敞篷汽车，进入刚刚解放的北平。三月二十四

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怀仁堂隆重开幕了。来自祖国已解放、尚未解放的地区以及台湾、香港和华侨的四百六十六名代表，她们之中有女工、农妇、女民兵和解放军女战斗英雄、女知识分子等，齐集在怀仁堂，共商妇女解放、实现全国妇女大团结、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光荣使命。

在那些日子里，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完的话语：多少艰难的战斗岁月，多少烈士的鲜血生命……。我们参加长征的十几位同志也在这里相遇了，李伯钊建议在怀仁堂前台阶上合影留念。坐在怀仁堂庄严的会场里，我想了许多、许多……。

蔡畅大姐向大会致开幕词，邓颖超大姐向大会作《中国妇女运动当前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决议》，通过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决议》写明：“在日益加重建设新中国的任务面前，妇女工作的中心是恢复与发展解放区内的工业和农业生产。要在不忽视乡村妇女工作的条件下，以城市妇女运动为工作重心。”还提出：“在有了初步工作基础的城市中，应围绕在生产事业的周围，逐渐解除束缚妇女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和迫切的、特殊的困难，改善妇女生活，提倡妇女儿童福利事业，举办托儿所、妇婴卫生及助产训练等。”

在西柏坡期间，为筹备这次盛会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草拟大会报告、发言稿；编了一套丛书，《解放区的儿童》

是其中之一。我在大会上作了儿童保育工作的发言。站在怀仁堂的讲台上，面对各族各界姐妹，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我谈话比较镇定，介绍了当时孤儿、难童、弃儿的悲惨生活；因国民党扒开黄河花园口，豫、苏、皖黄泛区需要救济的儿童约达一千余万；新解放区内因营养不良、缺乏医药，儿童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四百五十以上，我还介绍了在延安及老解放区如何竭尽全力为保育儿童所做的各项工作。在谈到今后保育工作的方针时，我说，全国胜利在即，在建设新中国的任务中，保育儿童的工作极为迫切、重要。大量孤儿、难童需要救济；城市中女工们和职业妇女的孩子需要保育和教育，便于她们能专心地参加国家建设；在农村中需要扫除封建迷信、推广妇婴卫生，训练与培养大批医药卫生和保育人员，组织中西医深入农村，为人民服务；采用各种形式，推广托儿事业。我呼吁：妇女团体要起号召与推动作用，把保育事业作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一环来看待。

一九四九年九月，我与朱老总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代表出席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六百六十二人，他们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解放军、各个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人士等。这是一次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会，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的空前发展，也是一次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盛会。

看到这么多熟悉的、不熟悉的人，我极兴奋，无论大会、小组会的发言，特别是讨论今后如何执行大会决议等问题时，我非常认真地听和记，但还是记不完全。当时，我与朱老总分别编在两个小组。会下，我曾问朱老总《共同纲领》等决议上，有这么多内容，将怎样执行？朱老总讲，要努力，要实事求是地干。

大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大法。其中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项规定特别引起我的关注。当举手表示同意通过这部纲领时，我真是浮想联翩。我和千百万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望郎媳、童养媳以及所有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贫困妇女，终于盼到了天明，获得了做为一个中国人的权利，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千百年来这种梦寐以求的权利，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

会议期间，我见到了久为敬仰却未曾见过面的宋庆龄。她的举止端庄、光彩照人。她的传奇式的革命经历，她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敬重。就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她是我们国家的名誉主席。

朱老总也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会后，新中国的领导人，与爱国人士、华侨、外宾等

常有接触，有时，需要夫人陪同。一九五六年国际妇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组织决定我以国家副主席夫人身份，单独迎见外宾。为了各种外交、内交的活动，在穿着上也不能老是灰布列宁服。记得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赴华沙出席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宋庆龄同志特意送我一双半高跟鞋，我在办公室穿上走了几步，赶忙脱下，实在不习惯。同志们一面笑，一面劝我慢慢会习惯的。她们说，今后你穿这种鞋子的机会还多着呢！

移 风 易 俗

在延安时，刘少奇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妇幼卫生工作是关系千百万妇女儿童的保命大事，做好这件工作，就是保护了母子的生命，能得到男女群众的拥护，也就体现了妇女工作以参加生产为中心的方针，直接保护了国家的生产力，是妇联的经常工作。”蔡畅、邓颖超大姐常提醒妇女干部，要把推进妇婴卫生和儿童保育，增进妇婴健康，建设人财两旺的新社会作为己任。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党和人民政府都很重视这项工作，群众组织更是常抓不懈。现在新解放的广大地区，该怎样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呢？

在旧中国，婴幼儿死亡率高得惊人。广大农村流传着“只见娘怀儿，不见儿唤娘”的哀诉。群众说：“我们搞好

生产，建设祖国，可是连个孩子也养不活，闹生产是为了啥？”“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这道出了妇女群众对生儿育女的恐惧。生儿育女、妇女病等，是被视为最见不得人的丑事、秽事，婴儿难产，仰仗接生婆或家人及左邻右舍的妇女，用杆钩子钩出难产儿，从而把产妇子宫钩破的事并不稀奇。或是生拉硬拽，好端端的一个孩子因此变成残疾，甚而致死。用破瓦片、碗碴子割断新生儿脐带，造成新生儿死亡也不少见。旧中国广大群众被封建迷信、愚昧落后和贫穷所主宰，受害而死的妇女、儿童更有千千万万。妇女在产后三天内只喝三撮米煮的稀米汤，一个月内不能吃稠饭，饿得产妇走不动路，体质虚弱，还对那些产后吃鸡喝鱼汤的外来干部觉得惊讶。向她们宣传产后需要营养，要吃饱、吃好，多吃几餐，她们却说：“我们不比你们外地人，你们那里水土软，吃了硬的好消化，我们这里水土硬，吃了好的难消化。”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和多民族的国家。各个地区、民族的生活水平、习惯不同、有各自的特点。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传统习俗窒息着人们的思想，这是共同的。改变人们在生儿育女、妇婴卫生方面的旧思想的习俗，需要时间，需要投入巨大的力量。可喜的是，当老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后，农民都有“生儿育女”、“人财两旺”的愿望。工作好的地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和号召，在农民心眼里逐渐代替了巫婆和鬼神。一九四八年华北解放区有

不少农村妇女到城里医院，羞羞答答却掩盖不住求子心切，他们是来请“洋医生”为他们医治不孕症的。只要把工作做深做透，群众是会接受科学方法处理生儿育女、妇婴卫生这类保命大事的。

回顾解放初期，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建立后，我们即在京郊通县举办了第一期妇婴卫生人员训练班。各级民主妇联也相继举办长短期不等的新法接生员和改造旧产婆的培训班，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各地培训新的和改造旧的接产人员二十多万。但据一九五五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统计，实行新法接生在农村一般平均不到百分之五十。把消毒接产知识交给群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中华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任部长李德全是位热心妇女儿童工作的大姐。抗日战争时期，她致力于战区难童的抢救抚育工作、团结大批进步妇女，从战火中先后抢救了两万多名难童，安置到重庆等地。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讲话时，曾称赞李德全“对于抢救难童保育工作有极大的贡献”。她任卫生部长后，特别关心妇幼保健事业，全力支持向广大群众宣传消毒接产法，普及妇幼卫生知识。她强调，妇幼卫生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妇联组织，深入发动群众。

有李德全大姐的支持，妇联与卫生部妇幼卫生司几经研究，分工为技术指导由卫生部门负责，妇联的责任是发动和组织教育妇女群众，使妇婴卫生、新法接生的技术普

及到千家万户。这里的所谓技术指导，可概括为一句话——消毒剪脐带，就是妇女生产前准备好一根结扎婴儿脐带的绳子，一块干净的布和布带；再找一块干净布，把这些东西包好，放在锅里蒸，放凉，收起来；剪子用酒或酒精消毒。有些地方把它编入妇女识字班的课本。不少地方则在庙会上搭个棚子，挂起妇幼卫生常识图，基层妇女干部组织妇女群众逛庙会，也到这里看图、听课。这些基层妇女干部一般是消毒接产法训练班的学员，是散在农村里的新法接生员或是妇幼卫生知识的宣传员。用现在的话讲，这样做，幅射面广，收效显著。卫生部门统计，一九五一年新生儿破伤风死亡率降低到百分之七点二，一九五四年降为百分之零点五四，产妇死于产褥热的也成倍下降。新法接生的开展也初步扭转了民族地区历史上人口逐年下降的状况。

群众性卫生运动和妇婴卫生工作的开展，逐渐破除了群众中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落后习俗。当年平原省淇县一名妇女一贯迷信，孙子有了病，请巫婆看，未看好，妇女代表动员和协助她请来医生，孩子的病看好了。妇女代表以这个实例向她宣传，这位妇女把供奉了四辈子的神像撕掉，贴上了毛主席像，边贴，边说道：“一把抓下纸神来，双手贴上毛主席像。”在毛主席像旁边，还贴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上下联及“努力生产”的横批。她们感谢共产党领导得好，把妇女卫生，娃娃生病的事都告诉了

她们。

农村灶膛里的灰用处可大呢。在根据地时没有肥皂，我们把它浇水过滤，用这种水洗衣服，滑溜溜的有碱性，去泥垢。更多的是，我看到农村妇女把灶灰盛在一个长布袋里，当月经垫用。遗憾的是那块布不干净，一条灰带子用于整个月经期。更有甚者，不少农村妇女月经来了，用破鞋帮、破鞋底、旧布等，好歹有个垫就算了。产后干重活，经期泡在水里插秧、拔秧，由此而造成的妇女病、不孕症，是解放前农村妇女群众的常见病，农村缺医少药，又羞于启口。这是一门科学，必须把经期卫生告诉群众。

一九五一年在全国民主妇联第一次召开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邓颖超大姐把月经带问题搬到讲坛上。她向参加会议的妇女干部和一部分男干部大声讲道，月经带要洗净、晒干、放好。

一九五三年在华东妇联召开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讲坛上，我重复了邓颖超大姐的话，并说：“月经卫生除宣传用干净的月经带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月经垫的问题。月经垫直接靠近身体皮肤。不论是用布或棉花，都要勤洗勤晒，月经后要洗洗外阴部，月经来时夫妇不能同房。”我还强调：“既要向妇女群众也要向男同志宣讲这方面的妇女卫生常识，还必须向党内男女干部宣传，争取各方面的人参加到宣传工作的行列，而且要抓住一切机会和场合，广泛

宣传，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懂得妇女的特殊问题，体谅妇女的特殊困难。”

在以后的多次会议上，我们把妇女经期卫生、孕育常识在大庭广众面前宣讲。因为这是保护妇女身体健康、繁荣后代、保护妇女劳力的一门科学，改变人们把它视为丑事的偏见，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经过各级妇联干部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记得一九五七年全国妇联第三次福利会议期间，广西、内蒙等民族地区还介绍了她们的经验。广西壮族一位代表说，她们动脑筋想办法，用玻璃瓶装上水，里面放个鸡蛋，比作孕妇子宫里有个胎儿，如果用力挤压、震荡瓶子，瓶压破，水外流，鸡蛋也会掉出来，说明孕妇做过重劳动容易流产、早产。这种浅显、形象的宣传，深深打动了男女群众。这个以女劳力为主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地区，有的妇女还因产后做重活，造成子宫脱出，痛苦异常，多年不得解决，愤而自杀的事，通过宣传，男人们主动多做重活了。

怎样喂母乳，如何给婴儿加辅食，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做适合不同年龄的婴幼儿的辅食等等，也是一门科学、一门学问。我未生育，也未喂养过孩子，但我从事的工作逼着我必须学习、了解。

我生长在南方农村，又曾长期生活在北方农村，在这些地方，孩子从初生到两三岁就吃母乳而不懂加喂辅食；母乳不多时，只喂米面糊糊；叼干奶，大人就嚼些吃食喂喂；

再就是喂奶无定时，等等。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五花八门给孩子断奶的招数：有的在母亲乳头上涂苦胆、黄连、墨汁；有的在糕饼上写个“忘”字，以为孩子吃后就会忘记吮吃母乳了。进入城市后，当我去到工厂、街道调查时，发现一般居民中也有上述情况。此外，不给婴儿洗澡、洗头，孩子有病不知如何护理等等，更是常见。解放初期，我国婴幼儿死于腹泻、麻疹等病的比例相当高，特别是夏秋季，孩子吃些不干净、不新鲜的瓜果，很容易腹泻，群众还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惯例”。解放后，工厂哺乳室、托儿所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保育人员多是从生产一线抽调的年龄较大的女工，她们没文化，不懂科学育儿，培训工作又一时跟不上，只有因循旧的育儿习俗。

怎样从中国祖传的育儿经验中吸取合理部分，参照各地的物产、风情，赋予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我向群众学习，向同志们学习，向医务工作者们讨教，努力增长这方面的知识。

一九五一年夏，我随同朱老总赴青岛，到街道、学校、工厂和一些单位考察托儿工作，在保育工作座谈会上，大家就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工人家庭的生活条件，按其现有的生活标准，怎样给喂奶的母亲加一些下奶的饮食，保证和促进乳汁的分泌。如何断奶，怎样给孩子加喂辅食；如何利用当地丰富的农副特产，选择新鲜蔬菜、水果、制做适合儿童的食物。这些食物应以富有营养而并不以貴重

为原则，食品要多种多样，要搭配杂粮。会上还谈到怎样根据儿童的教育阶段，从乳婴开始培养孩子的生活习惯，进行美育、智育等教育。从实际出发，正是党的一贯教导。我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提出要从中国祖祖辈辈母亲们教养儿童的经验中，研究哪些是应该发扬或提高的，哪些是应该废除的。例如“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迷信、不讲卫生以至打骂、吓唬的做法是不对的，等等。

计 划 生 育

计划生育工作，在建国后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周恩来总理从一九五六年起，曾多次做过有关批示、讲话。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他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就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一九六二年，他在中国人民政协三届三次全国委员会上指出：“在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农村中，要提倡节制生育，希望妇联也来提倡一下，过去做过，证明是有效的。”一九六五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还讲过：“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

全国妇联及各级妇女组织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几度把它纳入过妇女儿童福利工作范围之内，尽管做得并不完全尽如人意。

解放初期，我们以苏联为师，在很多方面照搬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在妇女生育问题上也如此。旧中国由于多种原因，人口增长缓慢，新中国建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生活好转，他们要求人丁兴旺。毛主席、党中央据此提出“人财两旺”的口号。我们在推广新法接生的同时，确也忽略了部分妇女干部和群众有少生孩子要求，特别是有些生育过两三胎的，她们有的已不愿再生育。有些妇女基于各种原因，一旦怀了孕，就要求人工流产。我们却一味根据苏联经验，鼓励多生多育，并规定人工流产为非法，禁止出售避孕工具和药物，更谈不上绝育了。这种做法不仅使我国人口一度增长过速，也给有些要求节育、少生的妇女带来痛苦。

计划生育是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一个方面，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迅速增长，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工作势在必行。一九五六年前后，中央提出了计划生育问题，随之这项工作也纳入各级妇联妇女儿童福利工作范畴之内。一九五六年，全国妇联第三次福利工作会议上，福利部部长田秀涓所作的《一年来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中几个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各级妇联组织应协助卫生部门在群众中进行适当宣传，使有避孕要求的能有计划地生育。会

上我要求妇联干部要协助卫生部门开展避孕的宣传工作，把避孕知识与办法教给妇女，使她们能够做到有计划地调节生育密度，更有效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

此后，这项工作一度开展得很好。但自从刮起了一阵批判新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风后，再加上三年困难时期众所周知的原因，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待到“文革十年”，我国人口的增长如脱缰野马，一下“跃进”到十一亿多。

庆幸的是，现在计划生育工作已为国人共识，列为基本国策了。

探索儿童保育工作

社会需要的事物是最有生命力的。从多年的工作实践，我对此越来越笃信不疑。

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对中央妇委关于群众路线问题的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给我的印象也日益加深。他说：劳苦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妇女解放也要妇女自己起来”，“任何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自觉是搞不起来的”，“群众如果不发动起来，我们任何革命事业都是干不出来的，一切要依靠群众的自觉与自动”。

新中国儿童保育事业的方针是：以生产为中心，根据群众需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灵活多样，依靠群众，发挥社会上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举办。也就是说，要妥善地

解决托儿组织“为谁办？谁来办？如何办？”三个问题。这套较完整的想法，我是从不断的学习、实践和总结群众的创造，集中大家的智慧中得来的。

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后，一九五〇年三月，我在天津、北京两市调查，两市的工作给我很多启示。同年九月，全国妇联一届三次执委扩大会上，我直截了当讲出：“提倡开办多种多样的托儿所，这是目前全国各地的体力、脑力劳动者的共同需要。”以后，我又去青岛、上海、广东等地做了调查，与卫生部、教育部、工会女工部等有关同志做了多次商谈。一九五一年十月，我们召开了全国妇联第一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在《两年来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情况、经验和今后任务》报告中提出：“以生产为中心，为广大体力、脑力劳动妇女及其子女服务”，以“有多少力量办多少事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步骤地来推广新中国妇女儿童福利事业。”

第一次福利工作会议之后，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实践，一九五三年三月，在华东妇联召开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我进一步提出：

第一、为谁办？为参加体力、脑力劳动的妇女而办。

第二、谁来办？应由群众自己来办。群众要办什么样的，就办什么样的，我们应毫无保留地将办托儿所的办法教给群众。

第三、办什么样的？根据劳动妇女的需要和经济条件、

举办多种多样、标准不一的托儿组织，不能只向高的看齐，必须逐渐随着父母经济条件而提高托儿所的标准，才是实事求是的。

五十年代各地创办了为数众多、形式多样、标准不一的托儿组织。其中有工厂、学校附设的哺乳室；几个距离相近的中小机关、学校、工厂联合举办的托儿所；机关、工厂等单位与街道挂钩，由街道基层组织出面办的托儿所、幼儿园；由群众自办、自管、自给的街道托儿站和托儿户……，遍布在大小城镇。这些托儿组织各具特点。五十年代中期，又陆续增办了街道食堂和小饭桌，解决双职工家中无人做饭的小学生午餐问题。街道妇代会与小学校配合，把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学生，按居住远近组织起来，课后到家中有爷爷、奶奶或街道积极分子可以照料的家里，做作业、游戏。我认为，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适合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产物。

除此之外，鉴于为数不少的女干部享受供给制待遇，一部分大的机关、单位开办了设备齐全、吸收有婴幼儿教育专业和有经验的师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大型保育院。这批保育院一般都是全托，孩子生病有隔离室，无须家长请假看孩子。这种托儿机构对于当时食宿集中、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开会，日日夜夜较为繁忙的部分女干部来说，确也解决问题。但这类大型保育院耗资大，干部子弟集中，生活优越，容易脱离群众。从延安时期起，我就觉得有局限

性，认为干部子弟应和群众子女学习、生活在一起。这也正是我力主托儿组织应以日托小型为主，要教育母亲应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

北京市第一个街道托儿站设在西城区六部口，它是为参加挑补花手工艺出口产品的劳动妇女举办的。这一带的部分家庭妇女，有从事这项传统手工艺生产劳动的习惯。北京市妇联加以组织，成立了挑补花生产合作社，产品出口东欧国家。在群众要求下，一间房子办起了一个托儿站。虽然简陋，但解决问题，得到妈妈们的拥护和社会人士的赞许。

一九五二年建立在天津市河北区体力劳动人民聚居区的一个街道托儿站，是应附近一些劳动妇女的要求，由街道妇代会出面加以组织，群众自行协商出钱出力举办的。一位家长自愿腾出一间房子做所址，家长和街道积极分子中有会粉刷房屋、糊顶棚、做木工的，纷纷前来相助。张家捐几双筷子，李家送来几个碗盆，赵家借给桌子。王家拿来几块木板，家长自带小凳……，一个街道托儿站就建成了。还成立了由家长、街道积极分子、妇代会和居委会干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集体商订章程、管理办法。孩子可以带饭，由站里热，也可自带米、面，由站里统一做。

以上这些托儿站虽简陋，但灵活，适合群众要求，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散居街道、单位又无法解决的劳动妇女的子女寄托问题，深受群众欢迎。群众把它比为自己“生下

的儿子”，千般爱护、万般扶植，有了问题，共商解决。这些托儿组织，也曾受到来华的外宾，尤其是第三世界外宾的赞赏。

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自然的。在群众性托儿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各级妇联干部也有过争论，争论最大、时间较久的是群众性托儿组织的性质，由此涉及的提法问题——是民办公助？还是群众自办、自管、自给？勿庸讳言，托儿组织是社会福利设施，并非生产组织或企业单位，保教人员的工资待遇、福利，必要的设备增置和维修等等，单纯依靠群众自给，存在一定困难，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赠，也有限度。群众性街道托儿组织纷纷建立后，这些困难一一产生。根据各地妇联的来函、报告，以及我们外出调查，在全国妇联的福利工作会议和全国妇联常执委会上，不少同志提出，群众性托儿组织应由“群众自办、自管、自给”，改为“民办公助”。我何尝不体谅群众的苦衷呢，但我坚持不同意亮出“民办公助”的牌子。我的思想是，街道托儿站经费有困难，可以以适当方式、适当名义，如祝贺“六一”儿童节、评比奖励等，给托儿站下拨一笔款。如果公开提出“民办公助”，可能会导致群众性托儿组织失去群众性，增长依赖性，躺在国家怀里，从而也会妨碍街道托儿组织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底，由我牵头，以妇女儿童福利部的名义，草拟了一份《关于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的报告》上报中央，内容之一是，提请中

央给予群众性托儿组织以经费补助。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国妇联召开第二次福利工作会议时，我的会议总结发言里，依然坚持提“自办、自管、自给是城市街道托儿组织的方针”。面对街道托儿站诸多的困难，各地妇联的不同意见，此后，我也不再坚持提“自给”了，侧重强调“简便灵活”和“人民生活福利的改善必须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

托儿组织群众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女爱国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华侨和有些家属，不少人热望走出家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或是捐资、献物、让房，或者自己设法建成私立托儿组织。团结和吸收这部分人的人力、物力，使之发热发光，用于保育事业的发展，可谓两全其美。如北京洁如乳婴托儿所，是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在全家支持下，出钱、出房办的，她自任所长，女儿王光中毕业于北平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幼儿教育专业，负责托儿所的业务。儿子——医学博士王光超和儿媳——妇产科权威严仁英为医务顾问。这个乳婴托儿所在医药卫生、饮食营养、婴儿教育、生活照料等方面，都是一流水平。在当时乳婴托儿所奇缺的情况下，虽然还远远满足不了众多的需要，确也解决了一些干部的问题，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在上海，荣漱仁出面联络了一部分爱国工商业者家属，集资兴办了一流水平、为高知识阶层女职工、研究人员需

要的幼儿园。在寸土如金的上海，荣漱仁献出住宅两处。天津著名老中医毕鸣歧的爱人，从自己居住的花园洋房拨出几间，做为街道幼儿园园址。在重庆、青岛、南京、沈阳……许多大中城市，这类的事例很多。

由李德全任理事的中国妇女联谊会、邓裕志为总干事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刘王立明为会长的中华妇女节制会，解放前就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团体并肩战斗。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后，这些机构立即宣布参加为妇联的团体会员。这三大妇女团体的会员们在各自团体领导倡导下，为发展新中国的儿童保育事业，都做了大量工作。

正是依靠社会各方面的众多力量，新中国儿童保育事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社会各阶层热心妇女广泛团结，共为保育事业献计献策，出资出力，这是党的号召，更是他们拳拳报国之心。我所能做的，只是通过各级妇联沟通情况，交流经验，肯定和传播各地卓有成效的做法和经验。

进城之初，国家首先抓的是恢复生产，因此办好工厂哺乳室、托儿所是儿童保育工作的当务之急。在工业城市，尤为重要。那时，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兼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妇联福利部义不容辞，把整顿、办好工厂哺乳室、托儿组织列为重点工作。凡是这样做的地方，对生产有利，也受到女工母亲们欢迎。曾在上海从事音乐和电影工作的李丽莲，抗战初期参加革命，辗转到达延安，解放战争时期派赴东北工作，她在大连主持筹办大连渔网厂托

儿所。这个工厂在未办托儿所前，有些女工带着孩子上班，影响生产。托儿所建立后，女士们安心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解放初期，各地尤其是工业城市的妇联组织的确花了大力气抓工厂托儿组织的建立、整顿，还抓了保育人员的培训，收到一定成效。各级工会女工部建立后，这部分工作逐步由女工部管理。

在中央苏区时，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中央特别强调要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那时苏区的山峦田野上，妇女群众你追我赶参加生产运动，真是轰轰烈烈。蔡畅大姐还亲自下田犁地，给妇女群众示范，打破“妇女下田遭雷轰”的封建迷信。邓颖超大姐、贺子珍、我和所有女干部都参加过农业生产。

为了解决妇女群众参加生产与带孩子的矛盾，在工农妇女代表会的推动组织下，有了各种小型的互助抱娃娃组。一九三四年二月，中华苏维埃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地颁布了《托儿组织条例》，责成各省县区内务部门检查实行。在这前后，苏区《红色中华》报曾用整整一版篇幅报导了组织托儿组织的意义和各地开展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过去不大参加农业劳动的北方广大农村妇女也从锅台逐步走向田间，参加农业劳动，特别是互助合作化运动之后，这种现

象更为显著。伴之而来的也出现了参加生产与带孩子的矛盾。各地反映，广大妇女投入农业生产劳动，有些户孩子无人照看，只能把孩子拴在床上、锁在屋里。摔伤的、被绳子缠住致死的……时有发生。有的母亲把孩子带到田边、地头，任其日晒、乱跑，也发生过不少伤亡事故。事实教育了我们，农村同样需要开展托儿工作。五十年代初河南等地妇联从群众需要出发，普遍开办抱娃娃组，选择重点创办农忙托儿所。随之，在河南省的二十二个县范围内有了近四千个农忙抱娃娃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待到农村互助合作化高潮在全国农村涌来之时，农忙抱娃娃组、幼儿园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村托儿所、幼儿园，以相当快的速度在农村相继开展。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日臻完善，为生产服务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孩子健康成长，母亲安心生产，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农业社领导等各方面的重视。

一九五六年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上，我与田秀涓分别作的大会报告和总结中，不仅谈及农村托儿问题，还以全国妇联名义下达了一个《关于农村托儿组织管理办法介绍》。这个条例尽管还简单，只是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生产水平，却凝聚着群众的创造，妇女干部的心血。如今中国农村大地特别是农工副业生产好的地方，那里的托儿所、幼儿园，无论在建筑设备方面，还是儿童教养方面，大大超过了城市某些托儿

组织，费用全部由大队支付，完完全全成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这是巨大的变化。

“多送些王昭君来”

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我代表全国妇联赴内蒙参加包头钢铁厂一号高炉出铁剪彩典礼。包钢是苏联专家帮助建设的项目，剪彩典礼很隆重。参加典礼的中央负责人为首的是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周总理，苏联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

一次宴会上，大家都为庆祝包钢出铁而干杯时，周总理端着一杯酒来到我跟前与我碰杯，口中讲道：“希望你多送些王昭君来！”可真把我搞得丈二和尚摸不到头，一时被弄得一愣一愣的。周总理微笑着看我，待我悟出原委来，也向总理报以微笑。举手干杯。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五八年初，我曾率队到安徽省三个专区的农村做调查，一九五九年我也曾去上海、江苏等地，那正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一片大跃进声的年代。我在江南一些地方看到的是上海孤儿院、育婴堂已经饱和，但仍不断有孤儿、弃婴送来。孤儿院、育婴堂无法给孩子们搞到牛奶、肉食，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向我诉说，我的心像灌了铅似的沉重。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常务书

记乌兰夫，猛地我想起了蒙古大草原。我曾随同朱老总到过那里，牧民有吃不完的牛奶、奶酪、牛羊肉，却缺儿少女。解放前，内蒙地区性病流行，疾病蔓延，缺医少药，人口逐年下降。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族只有八十三万多人，民间到处传说着“小病抗，大病躺，得了重病把命亡。千里幼儿少，白骨遍砂梁”。蒙古族姐妹们悲惨地哭诉：“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听小儿喊声娘。”

五十年代初起，各级妇联配合卫生部门，在草原上开展了大规模的“驱梅”（治疗梅毒性病）工作，中央卫生部派出医疗组，为内蒙人民治病。马海德大夫以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也参加了医疗组，为“驱梅”工作做出重大贡献。到六十年代初，草原上的性病基本控制住了，而相当部分群众留下了令人遗憾的后遗症——不孕和孕而不能生育。在大跃进的年代，内蒙并未受到多大困扰，辽阔的草原上，牧民生活美好，但因没有婴儿的啼哭，生活缺少生气，多少夫妻郁郁不乐。那里的阿爸阿妈是多么盼望有个小生命围绕膝前，给生活增添乐趣呵！当时我还未想到这些，只是向乌兰夫提出，能否给江南几个城市孤儿院的孩子们一些奶粉。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送些奶粉不成问题，但这能解决孩子们多长时间的问题呢？”我问他：“还有什么好办法？”他接着说：“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很多人没有孩子，送给他们抚养，既能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弃婴，又能解决牧民需要

子女的问题，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看如何？”他想得真周到，我的悬念也放下了，立即表示赞同，即刻与他商量移入婴幼儿工作的初步设想和安排。

一九六〇年一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乌兰夫为国分忧，提出内蒙有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土地，物资丰富，人口稀少，希望能从内地输送一些婴幼儿到内蒙抚养。在这之前，他已就此问题向周总理做过请示。总理大概就是在这前前后后知道了原委。他非常关心这件事，曾向乌兰夫问起工作进程，表示：“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生产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总理还叮嘱乌兰夫，让他和我好好计议，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安排好。

我也曾向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主任乌兰夫等人谈起过这件事，她们非常赞同。在自治区党委和卫生、民政等有关部门精心安排下，相互配合，做了大量工作。六十年代初，陆续有两千余名从四个月到六七岁的江南儿童，在医务、保教人员护送下，千里迢迢，一批批从上海、安徽、常州等地进入内蒙。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男女“王昭君”们生活得如何？一九八八年夏，据专程去那里了解情况的同志讲，只要到内蒙稍稍寻问，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真实故事，竟

相在草原传颂着。

锡林郭勒盟气象局工程师巴特尔深情地回忆蒙古族老阿妈张凤仙、老阿爸道吉尔抚育包括他在内的六名上海孤儿的情况。这六个孩子是来自己上海六个家庭的孤儿、弃婴。二十几个春秋，在老阿妈和老阿爸的抚养教育下，老大巴特尔毕业于南京气象学校，是盟气象局工程师。老二黄志钢在镶黄旗物资局工作。老三党玉宝是呼和浩特市森林武装警察总队司令部中层领导干部，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时，他曾率队前往扑火。老四毛世勇是镶黄旗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老五其木格（大女儿）是锡盟宝昌市运输公司会计。最小的高娃（女儿）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在北京医学科学院情报所工作。除了高娃外，其他五人均已成家，为草原生下又一代小公民。这一家各在一方，但他们兄、弟、姊、妹、妻、婿和阿妈阿爸之间凝结着深厚的亲子之情，兄弟之谊。尽管当年他们分别来自六个家庭，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同是在阿妈阿爸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哥巴特尔说：“对我们家老太太老爷子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至今，每年春节全家都聚到老阿妈老阿爸的蒙古包里，畅叙亲情。

锡林浩特市郊区跃进公社住着蒙古族牧民夏林达娃一家七口。女儿娜仁花皮肤黑黑的，说一口蒙古语，汉语她只能听，讲简单的词。她一九六〇年从上海孤儿院“移入”老阿妈家时才两岁，现在已是三个孩子的中年妇女了。

挤奶、打奶油、做奶豆腐……样样行，是个地地道道新一代的牧民。女婿是自己找的上门婿——蒙古族牧民撒音巴特，生了三个混有汉蒙血液的男孩，壮壮实实的。那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家。

为纪念两千多年前对汉蒙两族团结和好做出贡献的王昭君，呼和浩特市昭君墓前矗立着一座紫铜塑像，董必武曾为之题诗，其中有一句是：“昭君自有千秋在”。总理为我敬酒，要我多送些王昭君来，他的寓意原来在此。

总理当时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他的家族中也出了一位“王昭君”——总理的侄女周秉建。这位并未依仗权势上调、听从伯父意见的姑娘，远去内蒙插队。她遵从自己的意愿，爱上了蒙族歌唱家拉苏，并结为伴侣。周秉建穿蒙族长袍、讲蒙语，牧羊、牧马、做奶茶……。拉苏能以极佳的汉字给岳母写信。这是一个融汇蒙汉文化的家庭。儿子随母姓，取名周日和。周日和在蒙语中是心脏的意思。拉苏说，孩子是他同周秉建两个人的心脏。

抢救和抚育孤儿、难童，一向是儿童福利部工作的业务内容。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一九五〇年冬，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有关处理接收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等团体的决定后，以政府民政部 and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为主，各级妇联配合，在全国范围内接收美国政府津贴的以宗教团体为名开办的“育婴堂”达四百五十多个。这些育婴堂一般都有二三十年，湖南衡阳市一个慈幼院已有一百多年历

史。这些“育婴堂”里的婴儿食不饱、衣不暖，疾病得不到治疗，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八百到九百。人民政府接收这些育婴堂后，采取领养、雇乳母、津贴本母自养、办理寄养、留院抚养等措施，加以安置，同时继续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这些孩子受到社会的关怀，具体由民政部门负责领导，纳入他们的业务之内。

做为一名从事儿童工作的人，我深为不安的是，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丢弃女婴和残疾婴儿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向全社会呼吁：救救孩子！

教育失足少年

五十年代初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少年犯管教所看到那些心灵上染有污垢的孩子，我心情非常沉重。一九六五年据有关部门统计，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犯罪率为万分之一，工人家庭子弟占相当比例。少年犯罪的始发年龄为十六岁，其中很大一部分自小学年龄开始，犯有小偷、小摸行为。少年犯罪一般是盗窃、流氓滋事。当时我不理解的是，工人阶级的后代、新中国土地上生长的孩子，小小年纪怎么就犯有劣迹？染上恶习？面对现实，我想，我们的责任是尽最大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加强教育，唤起他们的良知，指导他们从泥潭中自拔，走向新生，走向光明。

党和政府从清理青少年犯罪的滋生土壤，挖除社会根源着眼，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流氓、盗窃、刑事犯罪活动。教育、公安部门和青年团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一时间全国各地形成一股探讨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良好气氛，以防微杜渐和挽救失足者。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二年六月一张题为《热爱和平》的招贴画，从祖国心脏北京，飞向全国各地，很多单位、家庭、街道的墙壁上，几乎都贴有这张画。画上男女两个孩子，各抱一只鸽子，女孩的娇媚，男孩的憨真，曾使守卫在边疆的战士们忍俊不禁，发誓要为保卫孩子的幸福生活，时时警惕来犯之敌。这张画引起一切善良人们会心的微笑，为了孩子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加紧生产。全国各地寄来成百上千封信。祝福这两个人间天使，也还有很多人到孩子所在的北京北海幼儿园去看望他们。父母也以有这样的孩子而自得，对他百倍娇宠。这些情况使男孩子产生了一种优越感，骄傲、不讲礼貌……都一一表现出来了。当他进入小学以后，老师们没有及时采取启发诱导的教育方法，有时却是粗暴的训斥，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越变越“坏”，父母也一改娇宠而施以责骂、棒打。家庭和学校的冷遇，最终导致孩子出走。在老师眼里，他已是“无法管教”了；在家长心中，设想是否把他送到感化少年儿童的学校。后来他被东四第二中心小学接收，在校长、老师的诱导教育下，他参加了少先队。他在转变后写

了一篇《我爱老师》的文章，以一颗怀着羞愧的童心追述他所走过的一段还算不上曲折的路，又怎样在老师教育下回过头来，下定决心争取做一个“三好”学生。《中国青年报》以《昨天人们手上的“凤凰”——马越成长中的风波》为题，做了详细的报道。这篇文章在结尾处严肃而又沉痛地写道：“马越成长中的风波，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这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高尔基的话，‘爱儿女，这是连母鸡也会的，但是善于教育他们，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事业。’”

这篇报道使老作家冰心难过了好几个日夜，她以“寄小读者”的慈爱之心，细腻之笔，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写道：“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儿童，在不健康的环境中生长着，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大家广泛地、彻底地注意和讨论的时候了！”“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儿童的三个重要方面。”“家庭，责无旁贷地有特殊的责任。”在文章里，她告诉父母们应该如何以身作则，从细微处向孩子进行品德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健康、活泼、诚实、勇敢的青年，输送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队伍里去。

从马越成长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我调查了解的一些社会上和少年犯管理所儿童中的问题，我深深地感到，加强全社会对儿童品德教育的重要性。一九五五年七月，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发言呼吁：全社会

要重视对儿童的品德教育。呼吁全体公民要关心爱护儿童，检举摧残儿童的坏人坏事，对那些摧残儿童的罪犯，应依法惩办；要求父母、教师担负起教育儿童的责任，要求社会给儿童工作以热情的关怀和支持。我自己也常常与一些同志去教养院、劳教所看望孩子，鼓励他们珍视自己的前途，好好学习，走向新生。提醒他们，人生道路有坎坷曲折，跌倒了，爬起来，鼓起勇气，重新做人。强大的舆论、全社会的热情关怀，似阳光雨露，滋润着一棵棵幼苗，蔫了的焕发精神，折伤了的，伤痕愈合，日渐欣荣。

当我追述这些往事，面对一九八五年以来，青少年犯罪率逐年上升，犯罪年龄向低龄化发展，犯罪类型、手段日趋严重的问题，我不禁忧心忡忡。我要以一个老年人的殷切期望，真心实意地向那些曾犯有劣迹的孩子呼喊：珍惜你们的前途！跌倒了，爬起来！重新做人！同时，也希望全社会都要重视对失足少年的教育。

一个篱笆三个桩

我很喜欢中国的谚语。许多谚语揭示出人生哲理，引人深思，使人清醒，我尤为喜爱的一句谚语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它形象地道出了任何一件事都需要大家团结一致，热心相助，才能成功的真谛。

我不是什么好汉，在几十年的工作里，我是抱着从师

问友的思想态度，与同志们真诚相处的。

全国妇联福利部建立初期，绝大多数是来自高等学府、具有幼教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有的还曾在美国学习、工作过。她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业务知识，以及一定的工作能力。在与这些同志几十年相处中，我始终记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他们，努力做到扬其长，避其短。

我有两位得力的助手——福利部副部长李丽莲和秘书柳玫。李丽莲善解人意，对同志亲切，长于做年轻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柳玫在延安时期起就在第二保育院工作，她是来自重庆的革命青年，为人朴实无华，勤勤恳恳，纯正宽厚，待人诚挚。她俩好像是福利部的粘合剂。

我还有几位业务上得力的中年骨干——张淑义和李铿。张淑义在抗日战争前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社会系，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上海从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赴美国学习、工作。一九四六年奉调来延安，曾在洛杉矶托儿所工作。她业务娴熟，长于写作，善于思考，心直口快，有棱有角。李铿毕业于燕京大学，参加革命时间也长，多年在白区工作。解放前又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系。她也曾到美国工作、进修过，她有业务专长，工作勤恳，性格内向。

全国妇联福利部由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组成的。在工作中，我们之间有时有争论，甚至争得红了脸，或哭鼻子，也有过误会和不快，但彼此信任、尊重，

气氛是和谐的。对于那些年轻姑娘，我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偏爱，和她们商量工作，慢言细语地谈心，有时还开个玩笑，请她们到我家做客，常常把朱老总的吃食拿来给她们分享……，以致当时有些部门的同志戏称我是福利部的一只“老母鸡”，翼翼下护着一群“小小鸡”。

在工作中，我也曾批评过一些同志。例如，解放初，拿着奶粉、饼干到农村试办农忙托儿组织的做法，以及不分条件、地点，强调用牛奶、鸡蛋等做为儿童营养的必备品。我认为，要关心儿童饮食营养，但不能千篇一律，各地物产品种有区别，南方鱼多，东北黄豆多，南方主食是大米，北方有玉米、小米、杂粮和白面。我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谈，“必须根据群众的生活水平，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我们是做群众工作的，要为群众办事，但不能超越群众现有的经济条件，更不能过高要求，否则就会脱离群众。要根据各地群众生活水平、习惯和当地的出产，提出简易可行的办法，教给群众。”

我和同志们互相学习，互勉共进。我深为快慰的是，这些同志尊重我的意见，彼此的心情也是愉快的。我们之间携手共事数十年，让集体的智慧发出光和热，凝聚在工作之中。如果说几十年来儿童保育工作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正如我喜爱的那句谚语——“一个篱笆三个桩”，或者如“众人拾柴火焰高”“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些谚语所昭示的哲理。

参加国际会议

北平和平解放，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城，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的欢迎。同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平召开了亚洲妇女代表大会。这是北平解放后第一次国际妇女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二十三个国家的代表共一百九十七人。我是与会的中国妇女代表之一，并被指定参加第四报告委员会，参加讨论《保护儿童权利》的报告。另三个报告分别为：《国际民主妇联为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亚洲妇女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和《保护亚洲妇女权利》。大会还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告英、美、法、荷等国妇女书》……等。我国代表团团长是邓颖超。蔡畅以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主持大会的工作，大会主要负责人是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扬·古久里。整个大会实际是处在苏联的影响之下。

在讨论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同苏联代表团巴甫洛娃、别德洛娃等人有过一些争论。主要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提法。还有她们要求我们只在亚洲起作用，世界范围的事由她们负责。我们认为对于和平问题，只简单地这样提，而不加任何说明，会使人误认为我们要向侵略者乞求和平；在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面前，空谈和平是无益的，和平必须

经过斗争才能得到。对于战争也不能一概而论。侵略战争、非正义战争要坚决反对；但是正义战争、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就应当给予支持。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我们中国既是亚洲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的国家，也要参与世界的事务，谁也不能限制我们只问亚洲的事。苏方代表巴甫洛娃对我们的意见感到很难驳斥，不好从正面反对，只是反复阐述她们的固有观点。我的态度很坚决，说话也比较生硬，区棠亮给我们当翻译，我讲话全是直来直去，不想转弯、不想作让步，这样坚持到最后。苏方表面上只好说两个观点基本一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正确的；但是做法上，仍按大会主持人的既定方针去办。我们把这个情况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因为这是国际上第一次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会议又是在我国举行，为了斗争策略的需要，为使会议圆满成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作了让步。

总的说，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它第一次把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妇女团结到一起，提出了争取妇女的平等地位和妇女的解放，关心和改善妇女生活，要求全社会都来关心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事业，帮助她们消除各种疾苦。这次大会对我国的妇女儿童福利事业，无疑也是个促进。

一九五〇年十月，通知我作为全国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参加中国和平代表团去华沙出席在那里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顾名思义，开这个会的目的是要动员全世

界的人民保卫和平，反对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在二次大战之后继续制造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任弼时同志病危的消息。任弼时是朱老总的亲密战友，特别是在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斗争中，他们默契配合；在长征途中，彼此相助，战胜困难。听说任弼时病重，朱老总和我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他。他当时已不能说话，只是用眼光表示对我和朱老总的感谢。我们一起劝慰他和陈琼英，相信他会好起来。不料，他那么快就离开了我们。他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去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才四十六岁。

参加了任弼时的追悼会后，就准备出国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代表团的团长是郭沫若，团员共二十多人，包括各方面的代表，有廖承志、马寅初、龚澎、袁雪芬、陆瑾、黄宗英……有的同志虽说过去不认识，见面后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坐火车从满洲里出境，走上了苏联境内最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整整走了七天，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森林和高山，经过贝加尔湖，那湖大得像是无边的大海，水是淡的。火车从它的南端绕行，走了不到它的周长五分之一，却走了很长时间。穿过西伯利亚大森林以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这些地方很少人烟，给人以荒凉的感觉。沿途的火车站上也都冷冷清清，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好在车上给我们预备了伙食，倒是不用发愁。代表

团成员大多数不会说俄语，有时停车到站上想找人问几句话，结果彼此听不懂，只好打手势，有时打了好一阵，彼此还是莫名其妙，常常把意思弄拧了，还闹出了大笑话。火车过了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就进入欧洲，也就进入了苏联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本土。人烟渐渐多起来，不再像西伯利亚那样的荒凉了。

一周后才到达华沙，这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到了国外，吃的住的都同国内有很大不同。使我感到很习惯、想家，觉得还是中国好。虽说这里战争已过去五年，但到处残垣断壁，战争的痕迹迄未消除。可以看出，二次大战给他们的破坏是十分惨重的。他们组织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参观，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是很苦的，说起来，农民的生活比我们的农民要好些，但是我感到还是我们的农民生活好。

我们一到华沙，很快就投入紧张的会议生活中。这次大会可说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紧张的会议，整天开会，晚上也不回旅馆，连续开到十点钟以后，甚至开到凌晨两点，弄得许多人一边开会，一边打盹，会上讲些什么，一问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样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开会，表面上看似乎大会的组织者把时间抓得很紧，其实是事倍功半，恐怕连一半的效果也达不到。大会开得平淡，没有争论，有点不同意见，讲讲也就算了。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威望高，几乎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有不同的意见，不经他们同意也

没有用，所以人们也就不多说了。我一边参加开会，一边想，像这样的会只能开一次，再开第二次还能行吗？这次大会通过了不少文件和宣言，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总部设在芬兰的赫尔辛基。

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后，在动员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

一九五二年四月，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在维也纳举行，我奉命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也是代表宋庆龄前去参加。代表团由教育部、卫生部、司法部、全国妇联、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有关方面代表共十七人组成。这次会议是为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保卫儿童，保卫母亲，教养孤儿，保卫和教育好下一代，共有六十四个国家的代表五百多人参加。当时维也纳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实际在美、英、法控制之下。我国同奥地利尚未建交，由苏联派飞机把我们送到维也纳开会。维也纳不像华沙破坏得那么厉害，许多地方已看不出战争的痕迹。会议开了十天，资本主义国家代表虽占一大半，但多半是比较进步的民间代表。所以整个会议的倾向比较好。

我在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和平对于我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其中特别揭露美国在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华北沿海投放细菌的罪行，呼吁反对细菌战，禁止细菌武器，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中、朝儿童的生命。我的发言引起许多代表的重视和响应。“保卫和平！保卫儿童！”成了大会上

一致的呼声。

回国时，路经莫斯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列宁墓、红场和地下铁道。我们仍然经过阿拉木图回国，同行的还有日本、朝鲜、越南的代表团，还请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到中国参观访问。这是出国前周恩来总理对我的交待。他说：“会议结束后，你们可以邀请一些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团来我国参观访问。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团，他们有许多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受压迫最深，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到我们这里看看，对他们会有帮助，也可增加彼此的了解。”因此，我在向国内报告，并得到批准之后，才有选择地对她们做了邀请。不料苏联方面反对，说她们是特务，这不免引起我的反感。我在代表团的党组会上说：“如果她们真是特务，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可以对她们做工作，她们到中国，通过亲身感受，也会受到教育，只会有好处。如果她们不是特务，我们听了苏方的话，冤枉他们，又得罪她们，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好处。”我的意见得到党组一致同意。有人还说，苏方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最愚笨的。

谁想一回到家，我就受到批评，说我有大国主义思想。这真叫人哭笑不得。我是反对人家的大国主义，反被说成我是大国主义。我怎能接受？我同苏方人员的接触都是有据可查的。张淑义是代表团的翻译和联络员，我同苏方来往的一言一行，她可以全部作证。怎能说我是大国主义呢？

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应当尊重，但不能因此把每个苏联人的话都看成不可违反的金科玉律。我们是个独立的国家，有中国人的尊严，有自己的思考，有最起码的自主权，怎能把这些最起码的要求说成是大国主义呢？

由于我的坚持，一些批评我的同志也感到理由不充足，难以批评下去。但是领导不好下台。有人说：“像你这样，以后就不能出国了。”我说：“不能出国就不出国吧！这问题如果搞不清楚，我也不愿再出国了。”就这样不了了之。

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组织第三次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团团团长是贺龙，副团长有好多人，我也是。当时刚刚停战不久，我们到了最前沿的上甘岭，亲身感受到现代战争的残酷，那里的山头全被炮火削平，树木被打得干干净净。在那样残酷激烈的战斗中，朝鲜的老百姓、阿妈妮冒着生命危险，头顶物资弹药支援前线。我们国家的革命战争固然也艰苦，但是我们地方大，回旋余地大；他们地方小，一个半岛，产粮也有限，要支援这么大的战争，实在不容易。我们看了东西海岸的阵地，前线与后方的许多地方，朝鲜的首都平壤也被炸成一片焦土，正在着手恢复。金日成接见了我们，崔庸健也参加了——他的妻子是我国东北人。在我们访问期间，志愿军又出现了一位罗盛教式的英雄史元厚。他从冰水中救出一个朝鲜儿童，自己却因在冰水中时间过久而牺牲。朝鲜政府和人民把这件事处理得十分隆重。直到今天，朝鲜各地还在传颂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国际主义战士史元厚”的故事。这次访问朝鲜和慰问在那里的志愿军、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第十三章

对宋庆龄的怀念

保卫儿童委员会的由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莫斯科会议决定每年六月一日为国际儿童节。一九五〇年，国际民主妇联等六大国际民主团体组成国际儿童节筹备委员会，向全世界发出“保卫儿童权利，争取和平”的呼吁书。一九五一年二月，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柏林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扩大保卫儿童的决议》，为了消除战争威胁，保护儿童生命，改善儿童生活，号召父母们、儿童工作者、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各方面人士，以及一切关心儿童问题的人们，动员起来，努力争取和平，保卫儿童。会议还要求各国成立保卫儿童委员会。

中国民主妇联是国际民主妇联成员国之一，一九五一年七月，由我代表全国妇联牵头，会同卫生、教育、文化和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工会、团中央等十个政府部门、群

众团体、几经协商，于同年十一月成立了由二十二个全国性人民团体的代表、十一个方面热心儿童福利事业的委员共九十六人，组成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这些委员中有著名社会活动家、医学、教育、司法界的著名专家学者，长期从事妇女、工人、青年运动的革命者，如李德全、傅连璋、林巧稚、杨崇瑞、诸福棠、朱学范、刘宁一、陈少敏、杨之华、史良、王汝琪、谢觉哉、陈其瑗、蔡畅、许广平、邓颖超、沈兹九、曹孟君、陆瑾、伍云甫、熊瑾汀、倪斐君、李昌、冯文彬、廖承志、陈鹤琴、雷洁琼、韦悫、何香凝、陈嘉庚、章元善等。保委会主席是宋庆龄，副主席有邓颖超、李四光、李德全、廖承志、傅连璋、韦悫。我任秘书长。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热心儿童事业的机关、团体以及个人，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儿童福利工作，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保卫儿童权利。

这个机构以国内儿童工作为基础，侧重对外交流和宣传工作。一九五五年前后，我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到保委会工作上。

进入北平之前，我没有见过宋庆龄，但对她非常敬佩、景仰。她协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她与何香凝一起，忠贞不渝，置生死于不顾，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志，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她与中国共产

党精诚合作，在敌特横行的上海，竭尽全力协助我党和党的地下工作者，巧妙地完成了大量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完成的任务。她为民族解放事业战斗的业绩，我早已耳闻。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她心系祖国，为中国儿童福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能在她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保委会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以母亲的赤诚之爱，用上海腔调的普通话诵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宣言》：“人类的生命，依靠儿童来延续，创造人类幸福的事业，依靠儿童来承继，因此，我们有义务担当起保卫儿童的责任。”“我们有必要与国内和国外所有善良的人们携手，共同为保卫儿童而努力，让和平的鸽子，拨开战争的迷雾、使幸福的太阳，永远照耀着大地！”《宣言》谴责战争贩子带给各国儿童的灾难。向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号召母亲们、国内各界人士、团体和所有爱护儿童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儿童福利事业，贯彻保卫儿童权利的政策法令；拥护并执行国际妇联关于加强与扩大保卫儿童运动的决议；欢迎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与中国人民一起，为儿童建筑伟大的幸福乐园。

宋庆龄的名字是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这个崇高目标，她几十年如一日，

迎着疾风骇涛，勇猛直前，赢得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一九五一年四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决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宋庆龄在维护与巩固和平斗争中因有卓越的贡献，特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在北京举行的隆重授奖典礼上，主持人——加强国际和平斯大奖金委员会副主席郭沫若致词，盛赞她“对于中国儿童的福利、中国人民的福利、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和这位伟大女性的名字联在一起，通过《中国建设》杂志和各种渠道，传播到全世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在这位伟大女性领导下，把《宣言》付诸实践。我这个秘书长能和她一起，为中国儿童、为世界儿童的幸福，尽绵薄之力，是一件愉快和美好的事。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委会的工作全部停顿，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恢复工作，这时我被选为副主席。一九八一年宋庆龄逝世后，我担任主席。对她的逝世，我极为悲痛，十分怀念和她一起工作的桩桩往事。

国际儿童文化交流

一九五二年十月，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三十七个国家的三百七十八名代表参加。宋庆龄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同年十二月，宋庆龄率团出席在维也

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为了迎接这两个大会，扩大宣传中国儿童对和平幸福生活的赞美，对世界各国儿童的祝愿，保委会出版了由宋庆龄题写英文标题的英文单页画报，封面是蓝色天空与和平鸽的背景，下面有白、黄、黑三种肤色的小朋友并肩微笑。画册刊登了中国儿童生活片段、中国儿童分别给出席会议的代表和日本、印度小朋友的信。

继之又出版了中、英、法、俄四国文字的《新中国儿童》画报，和英文译名《儿童眼中的新中国》的中国儿童作文选集。在这些出版物里，孩子们独具匠心，以他们巧妙的构思和智慧，写出和画出了在和煦的阳光下，绿茵茵的草地上，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小朋友友爱地嬉戏玩耍，或是憧憬着长大以后当工人，开机器；做农民，耕土地；任保育员、教师，抚育一代又一代成长；当解放军、保卫祖国……这些洋溢着中外儿童的情谊、理想的出版物，飞向世界五六十个国家，受到成人、儿童读者的欢迎，有的重版达五次之多。澳大利亚妇联分会一位书记来信说：“这些画表达了中国儿童的生活和爱好”、“成人也喜爱这些图画，因为它们通过儿童的语言，越过一切障碍，使人们对伟大的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日内瓦红十字协会总部少年部主任称赞中国儿童画册“制作的精巧，构图的独特性，是西方人不易见到的”。还有许多外国朋友称赞中国儿童的作品是出色的、卓越的。中国儿童李长河画的长幅《农村

景象》，在一九五七年印度举办的一次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获总统金质奖。

宋庆龄的挚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极为关心、爱护这些儿童的创作。他以西方人的习惯、感觉，向我们建议：儿童画册的封面应该有吸引力，使人一看就能注意到动人的儿童形象；把那些能抓住动作、性格以及一切使图片生动的小册子，“推销”到对中国尚不友好的西方国家去，是很重要的。至于《儿童眼中的新中国》所选刊的儿童作文，给人们总的印象是教条的、死板而不自然的。对西方读者而言，缺乏一种感人力量。因为西方人读惯了给人愉快、自然之感的文章。他建议“今后不妨试一试，从较长而生动的文章里，提炼出一些片段的节录来。再配上一些更多更好的图片”。多么中肯的批评，多么好的建议呵！

一九五三年宋庆龄将她写的《为新中国而奋斗》一书的稿费全部捐赠为儿童福利基金，女作家丁玲也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奖的奖金捐赠给保委会。一九五四年得到她们的赞同，把这两笔捐赠用于儿童文艺创作评奖。

在以往的国际儿童文化交流活动中，有国际友人们的赞许，也有国际挚友的批评，更有宋庆龄在精神上的鼓励、款物上的赞助和工作上的指导。这些都浇灌着中国儿童文艺创作园地。盛开起一枝枝国际儿童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花。

朝、越难童在中国

美国侵朝战事爆发后，应我国政府邀请，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与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办，将两万余名在战争中失去父母和家园的朝鲜孤儿、难童，于一九五二年冬分别安排到我国东北的吉林、松江、辽东、辽西等省收养。这些孩子的父母，有的是与敌人拚搏牺牲在战场，有的是在工厂生产岗位或在田间劳动时，死于美军的枪炮、炸弹。有一幅母亲被炸死、孩子仍在母亲怀中吮吸乳头的照片，至今我记忆犹新

敌人的残暴，激起朝鲜儿童复仇的怒火。十二岁的权永浩，看到父母被杀害的惨景后，立誓报仇。参加朝鲜人民军当了侦察兵。三年内，他参加过十多次战斗，受伤八九处，荣获军功章和少年功臣的称号。后来他被俘了。敌人威胁他，逼他说出游击队和粮食所在地，他忍受着鞭打，什么也不说。后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救了出来。战争摧毁了这些孩子的家园和幸福生活，孩子们受尽磨难，体质瘦弱，绝大多数患有各种疾病。

一九五三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保委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救济总会等人民团体派出由我任团长的慰问团，前往东北慰问朝鲜难童，向朝鲜儿童致以节日祝贺。我们分赴安置在东北的所有朝鲜初等学院、爱

育园等处，给居住在那里的儿童、工作人员赠送慰问品，放映电影，观赏孩子们表演文艺节目。慰问团还带去大批中国儿童以及在华的印度、捷克人士的慰问信和捐款。这些活动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儿童对朝鲜难童的关怀，增进了中朝人民的友谊、团结。朝鲜初等学院教员李熙敏在座谈会上说，今天是我第三次身受中国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最感动的日子，我将永远不忘。第一次最受感动的日子是，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作战，援救朝鲜的危亡。第二次是带着朝鲜孤儿到中国。朝鲜儿童也都纷纷激动地表示，一生一世忘不了中国人民的恩情，忘不了这次中国人民的慰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南人民继续蒙受帝国主义战争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西南宁、桂林，收养抚育近千名越南孤儿和父母对抗战有功的干部子女。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也曾派人携带慰问品前赴广西进行慰问。如今这些孩子都已长大。我想他们是不会忘记这段历史的。我也相信，中越人民的友谊之花永不凋谢。

支援是相互的。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得到各国人民道义上、人力上和物力上的帮助。长白山的丛山密林，滔滔的黑水河畔，长眠着与中国人民东北抗日游击队并肩战斗，打击日寇的朝鲜儿女；在红军时代的苏区，在延安、在八路军中，有来自朝鲜、越南的英勇青年，他们

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中国人民永世不忘。中国革命胜利后，有责任有义务向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之中的国家和人民，伸出友谊之手。

中国福利会

和宋庆龄的名字紧密连在一起的，还有设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它是从事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教育福利事业的人民团体。现任主席是黄华，我是名誉主席。

为了让后来人了解情况，我想应该详细说说。中福会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那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宋庆龄邀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人士，于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成立于香港。当时宋子文为会长（一九四一年五月退出“保盟”），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保盟”广泛团结国内外一切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人士，争取各方面力量，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救济战区难民和伤兵。一九三八年，在“保盟”资助下，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大夫任第一任院长。“保盟”先后动员组织了国内外一批又一批医护人员去根据地工作，募集了大批医疗器械、药品和其它救济物品送往根据地，还向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边区保育院和托儿所提供援助。著名的洛杉矶托儿所

就是用美国华侨的捐款在延安建立的。“保盟”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版)半月刊,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况向世界作了真实报道。该刊先后由贝特兰和爱泼斯坦任主编,以后增出中文版,由邹韬奋和金仲华先后主编。

宋庆龄和“保盟”还在香港举办了一系列的义卖、义演活动,募集资金,支援边区人民和战灾儿童。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先生都曾协助“保盟”作出巨大贡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香港,形势发生变化,“保盟”迁至重庆,面对国民党的重重阻挠,继续开展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宋庆龄在重庆宣布“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会址迁往上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始了新的更艰苦的斗争和工作,继续以支援解放区为主要任务,同时在上海开辟儿童文教福利事业,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放区救济总会密切合作,从美国政府操纵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争得了一定数量的救济物资和医疗药品,运往解放区。到一九四八年,国际和平医院已发展至八所和四十二个地方分院,并先后办了六所白求恩医科学学校和许多制药厂。基金会团结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外友人,介绍他们参加解放区的工作或为解放区运

送物资，有的还因此牺牲了生命。多次为解放区运送医疗器材和物资的加拿大夏理逊大夫（当时任“联总”医务官），就是在最后一次运送物资时，因途中备受劳累和折磨而不幸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在山东张秋殉职的。

在黑暗统治的旧上海，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先后在劳动人民聚居区办起了三所儿童福利站。为贫苦儿童提供食品、医疗，并教他们识字，宣传革命道理。一九四七年四月，又创办了儿童剧团，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在此期间，中国福利基金会多次举办义演、义展、义卖活动，筹募福利基金。从一九四六年起，还设置专门基金，帮助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文化人士，使他们能维持生活并从事创作。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救济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宋庆龄和周恩来共同研究确定了中国福利基金会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同时进行国际宣传。同年八月十五日，改名为中国福利会。

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对中福会的工作作了全面的调整和规划。除一九四七年已经成立的儿童剧团外，一九四九年七月创办了幼儿园，一九五〇年四月《儿童时代》创刊，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儿童杂志。同年十月建立了托儿所。一九五二年于北京创办了《中国建设》杂

志，同年宋庆龄用一九五一年获得的“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十万卢布，将上海妇幼保健站扩建成为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在原儿童福利站的基础上，创办了少年宫。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儿童剧团建团十周年时，命名为儿童艺术剧院。一九五八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场。至此，中国福利会形成具有妇幼保健、儿童文化、校外教育、国际宣传等八个机构的人民团体。

五十多年来，中福会所属单位已有很大的发展，并在工作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中国建设》（现改为《现代中国》）杂志已有七种文字，八个版本，在全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表》、《友情》、《马兰花》、《小足球队》、《童心》、《宋庆龄和孩子们》等获得文化部的各种奖励。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从开创时仅有五十个床位，现在发展为三百六十个床位，成为具有保健、医疗、科研、教学等功能的综合性医院。该院所属的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已被卫生部命名为中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少年宫建宫初期仅有十几个兴趣小组，目前已发展到一百多个。全年接待参加各类活动的少年儿童达一百万人次，培养了大批人才。托儿所、幼儿园始终是上海市质量最好的幼托机构之一。《儿童时代》拥有两代人的读者，在儿童刊物中有较高的声誉。儿童艺术剧场多方面为儿童服务，受到广泛好评

一九八一年宋庆龄逝世后，根据宋庆龄一生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的思想，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中国福利会的事业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九八五年成立了中福会儿童电视教育制作中心，先后拍摄了一批故事片、艺术纪录片和科教片。如儿童电视剧《芒芒和他的朋友》、《状元村的孩子》、《陶来的寻找》；二十集儿童电视连续剧《特别中队》；专题片《艺术摇篮曲》等，为少年儿童提供了精神食粮，丰富了儿童文化生活，也推广了中福会各事业单位科学研究的成果。一九九一年创办了上海规模最大的寄宿制幼儿园——宋庆龄幼儿园，可收托五百名三至六岁的幼儿：幼儿园十八个班级，每个教学班都有配套的生活和活动设施场地，园内另有音乐、舞蹈、绘画、计算、常识和电脑等六个专用教室。保教人员遵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持一切为儿童服务的宗旨，重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开展学前教育的实验示范工作。一九八五年设立了“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表彰卓有贡献的妇幼工作者，先后已颁发五届，并把这项事业推向全国。

中福会坚持“实验性、示范性、加强科学研究、发展国际交往和合作”的方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充分显示了中福会事业的社会性、灵活性和外向型的特点，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儿童文化教育、妇幼保健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将不断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中福会的领导班子比较健全，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扎实有效。每当听取他们的汇报时，我总是由衷地感到欣慰。看到宋庆龄的革命精神在继续发扬，宋庆龄开创的事业在继续前进！

宋庆龄基金会

二十世纪举世闻名、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病故。她在重病期间，还时刻关怀着亿万儿童，亲自口授给当年“庆祝‘六一’儿童节报告会”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提到“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她的话激励着千百万儿童工作者，大家决心为培育下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

宋庆龄同志生前说过：“儿童工作是缔造未来的工作”。她还说：“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等待的。”她高瞻远瞩，把培养少年儿童工作视为只争朝夕的大事，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我还记得，一九七九年三月她抱病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庄严号召：“关心儿童，人人有责。”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在她生前友好和亲属的倡议下，在邓小平同志和廖承志同志关怀下，宋庆龄基金会于一九

八二年五月宣告成立。小平同志是名誉主席，廖承志同志是顾问，大家推选我为主席，荣高棠、荣毅仁、高登榜、吴全衡为副主席。我深感责任重大，又义不容辞。

宋庆龄基金会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宋庆龄毕生努力的儿童文教、科技和福利事业，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国际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回顾这几年来，在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下，在国际友好人士、海外华侨的积极支持下，宋庆龄基金会为儿童办了一些好事，在国际友好交流、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方面，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筹建中的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因资金困难，进度缓慢，现已在园内兴建了一座“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设有多种科普器械，对儿童少年进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几年来已有三十多万儿童少年去参观学习。该馆还举办了微电脑、英语等多种培训班，有五千多名儿童参加培训。一九九一年又兴建了一处“科普乐园”，利用光学、声学等原理设计的九项科普游戏器械。是集科学与娱乐为一体的儿童少年游乐场所。

我们还设立了“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有贡献的作家，推动和繁荣我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设立了“宋庆龄儿童科学发明奖”，目的是激发少年儿童从小热爱科学，大胆实践，勇于创新。

此外，与有关单位合作，我们先后举办了幼儿师资培训班，深受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欢迎。还组织了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外儿童夏令营等。在开展这些活动中，我们贯彻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对丰富和活跃少年儿童的课余文化生活，开发智力，培养高尚情操，促进友谊，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中，我们注意了扶持贫困地区。在甘肃省定西县、北京市延庆县建立了妇幼保健院，两个保健院均建立了三级保健网，定期对所辖地区的妇女、儿童进行体检和疾病预防，改善了当地的卫生保健工作。甘肃省镇宁儿童流动图书馆也已投入使用。这几年已接待三十多万小读者，还在二十个中、小学建立了流动借书站，丰富了当地儿童的文化生活。正在进行的儿童流动图书馆，有河北赵县、山西五台县、安徽金寨县、四川仪陇县和广安县、湖南韶山市等。我认为这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利用与国际儿童义养会的合作项目，在宁夏自治区同心县为七个村兴建了四所小学校舍，在校学生已超过一千四百多人，解决了当地学龄儿童入学难的问题，还帮助建造了容量二十三吨的水泥蓄水窖一千三百多个，基本上解决了七个村的村民饮水、用水问题，群众说：“过去用水贵如油，现在用水不用愁。”一九九一年，宁夏南部山区遭受大旱，水贵到一角一斤，但受援区的农

民因有了水窖，不但人畜饮水有了保证，还有浇菜地和洗用的水。我们还为这七个村兴建了四十二公里高低压电的线路，二千多户居民有了生产和生活用电。群众通过收录机、电视机可获得各种信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法规。电也为儿童提供了电化教育的条件，使孩子们扩大了知识面，开阔了视野。现在七个村办起了十一个米面加工点，解决了群众过去粮食加工的困难，还计划办农机修理、副食加工等工副业，为农民脱贫创造条件。当我听到这些工作汇报时，很感欣慰，因为它符合宋庆龄生前的心愿，烧香烧到了枯庙。

邓颖超同志曾经说：“宋庆龄故居，是对青少年和群众进行近代史和现代史教育的课堂。”遵照邓大姐的指示，我们积极组织群众参观“宋庆龄生平展览”，长年开放，并有计划地组织在外地巡回展出，已经先后在海南文昌县、南京、西安、深圳、福州、厦门、赤峰、武昌等地展出。一九八七年首次展出，是在海南文昌县宋庆龄的故乡，我荣幸地前往参加开幕式，当时到了不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盛况空前，人们都以能一睹宋庆龄昔日的丰采而欢欣，也从中深深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

宋庆龄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了保卫儿童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了祖国的统一，她呕心沥血，贡献了她的毕生精力。展出的实物和图片虽然很有限，但它浓缩着宋庆龄同志的革命

精神和高贵品格。我深深体会到“国之瑰宝”这四个字，宋庆龄同志是当之无愧的。她那种不为黑暗、邪恶所压倒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她那种不为世俗、利禄所左右的高风亮节；她那种为追求真理而坚忍不拔的斗争艺术；她那颗爱祖国、爱人民、爱儿童的赤子之心……无不令人钦佩、赞叹，永远值得我们颂扬和学习。

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向基金会的同志说，要学习宋庆龄同志的革命精神、学习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她热爱儿童、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她从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宋庆龄同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确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一定要把宋庆龄开创的事业继续办好，让宋庆龄的精神发扬光大。

第十四章

风 雨 同 舟

批错了几位同志

自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起，到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直至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和朱老总一起，与全党、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历经了不寻常的年代。

许多事情来得那样突然。我努力强迫自己思想要紧跟，有时却有些茫然不知所以。我讲过错话，也办过错事，但我坚信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事实，根据事实讲话。因此，有些时候我也甘冒不韪，力图讲出我所了解的实际。在特定的环境和压力下，尽我所能，据理力争，关心一些同志，保护一些同志。尽管有时我做起来，并不尽如人意，但有两点我是清醒的：第一，事实是不能随意更改、颠倒的，历史是不能随意歪曲、抹杀的。第二，同志之间真正的关系是在其困难之时，给予真正的帮助。我还深有体会的是：一

个人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证明，在特定条件下，这二者都不容易。

一九五七年春，全国妇联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商讨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在议定大会筹备机构和人选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组织大会发言组”，由我和沈兹九大姐负责。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全国妇联党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组长是章蕴，我与曾宪植、罗琼、曹冠群为副组长。随后，又决定由我和杨蕴玉负责整风办公室的工作。

这场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宣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正式开始，在很短时间内，陆陆续续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等文章和讲话。一场大规模的、由开始确定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党内整风运动，急转为来势迅猛的反右派斗争。

我是在这场斗争中被任命为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发言组的负责人和机关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整风办公室的负责人。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做为全国妇联这场

运动的双重负责成员一对有些同志的批判、斗争，我一直感到内疚和歉意。

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付印的发言稿，共三百一十五份，计百万字。其中有关朱老总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的讲话和被确定为大会主题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报告及有关这方面的发言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对出席大会的妇女界右派分子斗争、揭发、批判的发言稿也占三分之一左右。女作家丁玲、当代中国著名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还有女界知名人士刘王立明先生。她们都曾分别多次在大会、小会上受到批判。

在领导机关内部的反右派斗争中，我记不起章蕴大姐是何时起就不出席整风领导小组会的。我与杨蕴玉自当年七月份起，负责整风办公室工作，同年十一月初的整风领导小组会上，当确定由我分工全面负责整风反右派运动之时，我提出异议。从此，我辞谢机关整风领导之任。

当年，我们组织对一些同志的批判、斗争是错误的。浦熙修、刘王立明都未及看到对她们的平反改正，即含恨而逝。丁玲这位历经坎坷、蜚声国内外的女作家，我们在延安时就相识，那时她写的《三八节有感》，一直为人们所争论。一九九一年为纪念她从事创作六十五周年和逝世五周年，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丁玲生平和创作展览上，这篇《三八节有感》被予以肯定。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人们一致推崇，曾译成数国文字。

解放后，她先后不公正地被指为“反党集团”的头目、“右派”、“叛徒”，流放到黑龙江垦区，长达近二十年。一九七五年她与陈明“无罪释放”到山西定居。一九七九年党为之平反，回到北京。丁玲一生坎坷曲折。大起大落，她的一生是传奇式的。她后期写作的《魑魅世界》与她一生写就的著作，在中国文坛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她回到北京后和她病危时，我去看望过她。一九八六年病逝后，我是怀着深深的歉意，向丁玲遗体告别的。

我还要提到彭子冈。她是一位爽直、快语，表里如一的好同志。一九五七年她和徐盈双双被划成“右派分子”，一九七九年又双双得到改正。正当子冈再度执笔之际，不幸患脑血栓病，导致半身瘫痪，语言功能受到障碍，从此，这对患难与共的挚爱伴侣，不能再形影相随，并肩遨游在新闻天地。获悉子冈病逝消息，我又是带着歉意，向她的遗体告别的。

要 实 事 求 是

反右时，我对社会上各界鸣放出来的问题，对其中相当部分的其人、其事和具体情况都很少了解。但机关内同志们在鸣放中提的尖锐意见。有些我是了解的。特别是我过去所在的福利部的一些同志，他们的言论以及平时的工作、为人、作风我是了解的。因此，我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右派思想与对我们提的意见，要有区别，要实事求是。”我还就我所熟悉的几个同志的所言所谈，强调提出：“他们之中或是思想幼稚，或是骄傲自大，爱看别人缺点”，“我们的党员很容易把人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我列举了两个同志的名字之后又说：“她们的言论并不是右派言论。”

在多次分析机关大量鸣放出来的言论、提出的问题以及同志们就其中一些人的言论进行揭露批判之后，记得在一次整风领导小组会上，我转达了组长章蕴大姐的意见：“一律不能戴右派帽子。要和风细雨，充分说理。”我是赞同她的意见的，被初步确定为右派的同志，多年来工作勤勤恳恳，即便有些过激言论、不当意见，但说他们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根据不足。但处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批判斗争的深入，权衡了社会右派言论，全会划了一个右派小集团和几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原在福利部、后调到妇女干部学校任教的一位业务骨干。

她是抗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冒着生命危险，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整风反右期间，她向党交心，谈了她的一些错误想法、一些糊涂观念，如“对党缺乏感情”等。我以为，从她的历史看，属于思想糊涂，无论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党给她的工作，她是努力执行的；对于党的号召，是积极贯彻的。历次讨论她的问题时，我坚持这个观点，直到我表示不再参加整风领导小组的那次会议上，我依然表示了以上意见。但她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如她自己所谈：“我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自己给自己戴上的。”这之后，她下放到农村；回北京后，摘掉右派帽子，分配到一个高等学校任教。“文化大革命”时，再次受到冲击，受迫害身亡。

整风反右后期，为了执行来自上面的要求——右派分子的数字要达到一定比例。一九五八年全国妇联书记处、党组曾召开过多次会议，讨论“增补右派分子的问题”。运动初期，被福利部列为右的一位年轻女同志，又被提了出来。她是解放初期被分配到福利部的大学生，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时期，她正在沦陷区一个中学读书，后来她只身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求学。抗战胜利后，她随学校复员回到北京，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所有这些，在她参加工作后，都向党组织做了交待，还主动拿出她解放前后的日记，请组织审查。我一直认为，她对党组织没有隐瞒什么。有些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对待。因此，我发表过“在运动中她的言论不是右派言论，不是右派”的意见。我的意见曾获得主管干部工作、也是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宪植同志，还有罗琼等同志的认同，总算保了她。

庐山会议前后

建国以后，我经常随同朱老总赴外地视察工作。五十年代末，随同朱老总赴外地视察工作的次数更为频繁，时

间也更长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慰问当地生产，关心群众生活等情况。给我的直观感觉是，这些实地考察，加深了朱老总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如对部队的某些工厂，他提出要做到战时军用、平时民用，还提出过开发海南岛等。

一九五八年以后，众所周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失误。在那些令人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小麦等粮食亩产不断“刷新”，美好的愿望失去了理智的控制，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当时错误地认为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精力应转向工业，在钢铁产量上提出超英赶美，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会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一阵共产风、浮夸风刮过之后，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年底，武汉会议开始纠“左”。

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继续随同朱老总到全国各地考察，他对农业生产等问题，特别是对公共食堂和对家庭制度要巩固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是他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重点，是他被批成“右”的根由。我也因为批评公共食堂等问题，被视为“右倾”，并受到非难。

记得一九五九年一至二月，我随同朱老总去广东、湖

南。在广东江门市视察之后，他曾向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谈到：农村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像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同年六月，他去东北三省考察，在听取中共旅大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之后，谈道：在农村里，粮食要分到各家各户，愿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要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走。

在吉林、黑龙江，他也分别就两省省委负责人所谈情况发表意见：吃饭不要钱不行，要把粮食分给个人，由个人调剂，如加点菜和薯。办食堂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搞好群众的生活，主要靠群众自己，而不是国家。六亿人口，谁包得了？不能没有家庭，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得住。一位生产队长向他反映，办食堂有困难，朱老总说，既然群众对办食堂有意见，队里办食堂也有困难，你既然带头办起了食堂，能不能带头解散呢？这位队长表示不敢，怕上头批评。

就在这次赴东北视察工作时，朱老总与同行的董必武、林枫同志联名致函报告中央，其中关于公共食堂问题，是

主要内容之一。报告写道：关于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让群众在家里做饭，好处甚多，最主要的是群众的生活由群众自己掌握。因此，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在家中自己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

庐山会议上，朱老总对农村所有制、农业生产，特别是对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的发言和对彭老总的态度，招致了对他的批判。从此他缄口不言。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我们从东北返京后，稍事休息，即动身去江西庐山。六月二十九日清晨到达，住在当年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里。

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当时已经觉察到的“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左倾”错误。会议初期的气氛是轻松的，与会者畅所欲言。被称之为“神仙会”。彭老总在西北小组会议上，极其诚恳、坦率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问题，提出意见。他还上书毛主席，坦诚陈述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来庐山前，朱老总对公共食堂就持否定态度。来庐山后，当时任江西省妇联主任的朱旦华同志在和我们谈话中，反映了江西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等问题有意见。这又一次反映了群众的呼声。

会议初期，朱老总在“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批评了共产风、公共食堂等问题，他甚至讲过：“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还是回家好。”他还提出巩固家庭制度的看法。他讲：“现阶段，我国农民还有私有性的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私有性，目前是行不通的。农村搞公共食堂，从生产上说可能对，但从消费上说，吃了大亏。工人还发工资嘛。实行供给制实际上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要自负盈亏，还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当时，对公共食堂持否定态度的，不仅仅是彭老总、朱老总。

谁能想到，庐山会议中途来了个急煞车，由纠“左”变为反右。庐山上的这一场斗争，对彭老总等的错误处理，如今虽已澄清，但多年来它带给人们的阴影是难以彻底消除的。

在这一场斗争中，身临其境的朱老总不仅由于他在会议前期强调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在会议展开对彭老总的批判时，他又被视为是袒护彭老总的。朱老总在发言中谈到彭老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当彭老总做了“检讨”后，在层层加码的批判风雨中，朱老总又公开表示：“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这样，朱老总自然也被视为是右倾。多年来的共事，朱老总对彭老总是了解的，对他怀

有深厚的感情。回到北京之后，我与陈琮英一起去看望彭总和他的爱人浦安修。安慰浦安修不要着急，我向她表示，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认为：在困难时能真诚相助，这才是真正的同志。

庐山会议前，全国妇联决定召开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中心内容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精神，总结“大跃进”以来妇女工作的经验教训。会前，有关会议的内容、开法经过中央主管领导和妇联党组研究讨论，确定由曹冠群主持会议。会上，有些同志反映“大跃进”中妇女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男女老幼齐上阵大炼钢铁，农业仅仅留下妇女老弱劳力，由于劳动过度，子宫脱垂等妇女病严重等等。对此，有的同志比较尖锐地讲，这是什么主力军，是受罪的主力军、可怜的主力军。有些同志对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持怀疑态度。后来，在妇女运动理论上，随着“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的妇女运动是否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提法等问题，在会议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时，蔡畅同志自庐山打来电话，传达毛主席讲话的精神。曹冠群及时传达了这一精神，会议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弯，由总结大跃进以来妇女工作的经验教训，改为批判“右倾”错误思想。

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曹冠群，而且逐步升级，甚至扩大

到在机关全体党员大会和党员扩大会上进行批判。全会二十天左右时间内，贴出大字报近两千张。其中揭发批判她的大字报六百余张。随之，在中央主管妇联工作的领导同志指示下，把她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全会陆续揭发的“右倾”言论中，有些我也认为是“右倾”，有些我的思想有共鸣。尤其对食堂问题，我同意那些“右倾”观点。对批判曹冠群的“右倾”言论，如“食堂不适合现在生产水平与物质基础，是一阵风刮起来的，是强迫命令办起来的”，“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论点，我倾向曹冠群的看法，但也不敢公开站在她的一边。现在回想起来，曹冠群同志讲的是真话，是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际。

在批判右倾思想运动中，我终于也被视为有右倾思想队伍中的一员。在中南海举行的，有中央和全国妇联领导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我曾讲过“没有粮食怎么办公共食堂”，批评我“反对人民公社”等等。我曾反驳道，我没有条件反对人民公社，记得当场罗琼曾为我辩护过。对有的问题，我确也未隐瞒自己的观点。

大跃进年代，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曾向全国妇联党组强调指出：“儿童教育方针应是强调社会教育，由社会、国家来负责，学生要住在学校，一般不搞半日制，托儿所（幼儿园）也搞全托，不搞半托。”“共产主义过渡很快，靠家庭教育不好。今后儿童教育要由教员、保育人员来负责培

养共产主义思想。”他进而提出，要在城市、农村实现“母子康复一条龙”，即城市以街道、农村以公社为单位，办妇产院、育婴室、托儿所、幼儿园等系列配套服务设施。不管家中有无照料，产妇一律到产院生育。产假后，婴儿留在育婴室抚育。随后陆续入托儿所、幼儿园托带。对于这种做法，我是不同意的，也曾在书记处会议上表达了我的意见。

一九六〇年五月，全国妇联在哈尔滨召开全国城市学前儿童保育工作现场会，中心内容是根据中央领导指示，强调要改变过去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教养孩子的旧传统，转而而为以社会教育为主的保育儿童方针。会上，交流了一些城市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全国妇联书记处部分领导人参加了这个会，我这个分工主管儿童工作的，留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妇联第三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经过讨论，认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对曹冠群的批判和处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取消，恢复她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职务。在全国妇联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蔡畅宣布了这一决定，并代表全国妇联党组当众向曹冠群赔礼道歉。接着，全国妇联和省、市妇联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定为右倾思想的同志，也先后平反，恢复名誉。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给全党带来极大的损失。更为令人痛心和难以忘记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给全国人民带来

的灾难。即使处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坚信，在党的领导下，错误会得到改正的。当时，我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艰辛，共同努力，迎来了经济的恢复。

七 千 人 大 会

一九六〇年七月初到八月十日，党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针对自然灾害和已可看出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制定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对工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实际上是对前一阶段大跃进的纠正。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强调阶级斗争问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时又面临着反对修正主义，同苏联赫鲁晓夫的斗争。所以他说的，大家都相信、拥护。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全国部分地区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严重情况。后来，把它归之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这些固然都是原因，或者说是客观原因，而主观原因则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的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以及刮共产风、浮夸风和农村工作中的强迫命令等等。这些却无人敢提。到了一九六一年底。面对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局势，于是才有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县委书记

以上参加的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统一了全党思想，纠正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对全国形势好转起了极大的作用。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和检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指出：产生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建设工作中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要克服盲目性，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朱老总在山东组会议上的发言大意是：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来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

这次大会开得个个心情舒畅，人人满意。一些受过批

判的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毛泽东形容大会情况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和妇联书记处书记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心情也格外舒畅。

这次大会也有不足，就是只纠正了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这种纠正由于历史的局限也是不彻底的；而对政治斗争中的“左”，可以说认识得很不够，甚至还在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不久就又搞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随 朱 老 总 返 乡

一九六〇年三月初，我随朱老总一起回四川仪陇县老家。他自一九〇九年离家到昆明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有五十一个年头没有回过家乡。

我们在二月最后一天乘飞机出发，经过西安、贵阳，三月四日到达重庆。在那里参观了红岩村原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旧址，还看过西南师范学院。朱老总高兴地为他们题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攀登科学高峰，做好人民教师。”

三月八日到达南充市，第二天就来到朱德的老家——仪陇县马鞍场。途中还参观了一个油井，夜里住在马鞍中学。一路上，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生产。这时大跃进和大炼钢铁造成的恶果已经看得出来，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不

少地方都有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挨饿。朱老总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干部强调，“一定要把粮食生产搞好，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他在仪陇县还要求他们发展社办工业，发展副业生产，根据本地山区的特点，开发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种植各种果树……农、林、牧、副、渔都可以发展，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建设。他特别要求各级干部“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

他家昔日租佃的房子大半已不存在了，仅剩下的几间，也都破旧不堪。他小时生活是很苦的，在家乡，朱老总坚持要同家乡父老兄弟吃一样的饭。那天中午，食堂吃的全是稀饭，因为我们去了，食堂才临时加了点大头菜。看着眼前的情景，老总好一阵不说话。后来，他还是笑着对大家说：“人民公社越办越好了，去年大家出了力，有了成绩。暂时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我们大家齐心，靠自己努力，一定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家家都会过上好日子。”

我们去看了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药铺和席聘三老先生私塾旧址。这些房子早已改成住家用。他的记性很好，哪里原来有棵树，哪里原来没有，全部都记得清清楚楚。人们领我们去看一处比较好的砖瓦房，说是朱老总小时住过的。他看了摇摇头说：“没有住过这房。那时我们家是地主家的佃户，地主怎能把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过了一会，他想明白了，说这是他当旅长时挣的钱，捐给家里砌起来

的房子。房子盖好，全给家里人住，他从未回过家，当然就没住过这栋房子。县委陪同的人说，这个房子现在没有人住，计划在这里办一个朱总司令的陈列馆。他听了连连摇手，严肃地对他们说：

“不要办我的展览，现在还有一些孩子没有地方上学，你们就拿它来办学校吧！一定要让学生到这里来上学，不可搞我个人的陈列馆。”

几年后，再去打听，那里果然办起了一所小学校。

我们在马鞍场中学住了两夜，第三天去参观解放后办起的马鞍小学和中学。朱老总给小学题字：

“努力学习，热爱劳动。”

给中学题字：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共产主义的新人。”

回到仪陇，老总十分兴奋，当天就提笔作诗，写了两句：

二十三岁着戎装，

七十四岁访故乡。

刚写到这里，有人来访，掷笔会客。客人走后。我和秘书沈毓珂，请他接着写下去。他笑着说：“诗兴已过，想到手边的句子也全忘了。以后再写吧！”以后他虽写了几首，但这首诗始终未写完。

他要到附近墓地去转转，凡有墓碑的，都叫秘书帮助仔细辨认。在一块略有残缺的墓碑上，辨认出一个“钟”字。他说：

“这一定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在那里徘徊凭吊，回忆往事，久久不忍离去。可看出他对启蒙老师的深情。

第四天经仪陇县城返抵南充市。这一次，我们还去了宜宾市和自贡市。自贡是有名的盐都。在江西苏区和长征途中，我深深体会到盐巴的可贵，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但不知道盐是从哪里来的。这次参观了地下天然气喷出的自流井，用地下打出来的盐卤，放在燃烧的天然气上熬制成盐的全过程。这里过去全是手工操作，现在已逐渐做到机械化了。它使我又长了不少知识。

一路上，老总不断地听地、县领导的汇报。当时南充地区灾荒严重，人民还吃公共食堂。他们都强调：灾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老总向他们指出，不能把灾荒都推给客观的自然灾害。必须看到人为的因素起了决定作用，要求他们切实转变作风，为减轻灾荒帮助人民做些实际的事。

两 次 回 万 安

一九五一年夏天，我曾回到老家万安。那次我和朱老总一起先到了杭州，我已计划好回家看看。老总本来要陪我一起去的，后来考虑到他一去就会惊动沿途许多人，就

决定我单独回去。由于那时地方上还不平静，他让警卫员齐明臣陪我一同前往。他带着几个秘书去华东海军视察。

这时，江西解放已经两年，但仍不平静，尤其山区和较偏僻的地方，还不时有敌特散匪活动。我和齐明臣两人都带了短枪，人少行动方便，也不觉得什么可怕。一路上只觉得舒畅兴奋，真有几分古代浪游江湖的侠士之感。特别是到了人烟稀少的山区，回想起童年在罗塘湾的情景，更有回到大自然的畅快。为了不惊动乡里，我们绕开万安县城。一直走到太阳落山，天黑时分来到罗塘湾的养父家里。我从一九二八年离家，已整整过去二十三个年头。罗塘湾受战争影响，已是破烂不堪，但我还可勉强辨认出旧时途径。养父罗奇圭突然看见一个身后带着警卫员的女干部站在面前，急忙丢下手中的活计，站起来迎接。

“叔叔，还认识我吗？”

他听出了我的声音，踉跄几步跑上来，拽住我两只手，就哭了起来。我急忙问：

“婶婶呢？”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说：

“她，她……不在啦！”

霎时间，我的眼泪犹如断线的珠子纷纷落下。想起养母待我的恩情，这次回来就为的是想看看她，报答她的一片养育之恩，谁料，竟永远见不到她了。

罗家奶奶也去世了。他们在白色恐怖时期都遭了不少

劫难，总算挺了过来。奶奶活到抗日战争后期。想起她待我的许多好处，止不住又一次流下泪来。

养父忙着给我们预备晚饭，我和齐明臣一起下手帮忙。一边吃饭，一边观察。养父已接近七十岁，完全成了老态龙钟的人。年轻时，他就不善理家。失去养母，他没有再娶，家里乱得不成样子。几间房屋，都已东倒西歪，眼看过不了几年就要倒塌了。吃了饭，我和小齐动手帮他把正房上上下下整理了一番，总算可以落脚和睡觉了，又腾出了准备客人来坐的地方。这时已是半夜，我决定休息。小齐坚决不肯睡，一定要守夜。他说，来时班长有交待，必须保证我的绝对安全。我下了命令，他才勉强和衣躺下。第二天早起，养父告诉我，小齐守了一夜，真是个尽职而又倔强的小伙子。夜里，因为养父把牛和猪拴在一间棚子里，猪和牛打架，整整吵闹了半夜。我走路困乏，竟全然不知。清早，养父把猪和牛分开，发现牛已被猪咬得遍体鳞伤。未到中午，那头牛竟然死了。那是几家合伙买的一头牛，养父只有一条腿（四分之一），还有三条腿是人家的。养父要把死牛拿去卖，我怕被猪咬死的牛会有传染病，叫他们把死牛埋了。然后问明当地牛价，由我出钱，叫养父再买一头更好一些的牛。

第二天来看我的人多起来，万安县三区政府住在罗塘，听说我来了，区长、区委书记都跑来看我，一定要我到他们那里去住，这天我只好住到了区政府。

我的生父康定钧一九三〇年就去世了。生母黄年姑也在三十年代去世。我的三个弟弟都在童年夭折，活得久的也只得十一岁。送给人家的几个姐妹，这时也只剩下我的姐姐康伍秀还活着，她已远嫁在太和县。区里派人把她接来，姐妹相见，又是一番欢乐和悲苦。

我住在区里很不习惯，乡亲们来看我，常遭阻拦，我在区政府只住了一晚，第三天又搬回养父家里。这样，可以随便同乡亲们谈心说话，轻松多了。来看我的群众越来越多，连许多外乡素不相识的人也都闻声跑来看我。可以说是出一屋进一屋，前茬未走，后茬又到，屋里屋外都是人，站的坐的，到处是人。我尽可能地同他们谈话、做工作，回答他们的问题。人太多了，无法招待，只好烧一桶茶，谁喝自己去倒。小齐说：“这一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真是热闹。”他们都觉得住在养父家里不安全，一致叫我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拗不过他们，只好换了一处地方，但来找我看我的群众依然有增无减。小齐为了我的安全，劝我早日回去。看着他为我夜以继日不肯休息，我才决心结束这次回乡的访问，一个星期后，离开了罗塘。回来路过万安，只吃了一顿午饭，谢绝县里的挽留，赶回杭州。

这次回乡，时间不长，却了解到不少宝贵的情况和材料，我把其中一部分说给朱老总听，帮助党中央及时了解下情；有关妇女、儿童工作的部分，对全国妇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也有一定帮助。

一九六二年，我第二次回万安老家。

六十年代初，朱老总有了气管炎，每年冬春之交，都要到比较温暖的南方，以免发病。他一到外地，就忘了休息疗养，总是到基层调查研究，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我只要工作允许，就同他一道，一边陪同照顾他，一面也到各地调查了解，推动妇女儿童福利工作。这年我们在春节后出发，二月十七日到南昌。他到各处参观视察听取汇报，我找省妇联主任朱旦华了解妇女儿童工作的情况，到企业、工厂、街道、托儿所、幼儿园调查女工的福利和儿童保育工作。我们都感到抓生产工作的重要。特别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刮共产风造成的影响，要尽快发展工农业生产；而做好托儿所、幼儿园的工作也是使工矿企业、街道、农村的妇女能更好地去从事生产劳动。二十六日，老总听取省委书记刘俊秀的汇报后，反复强调要发展生产，强调等价交换，按劳取酬。他说：

“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他所指的就是在这之前刮遍全国的共产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

三月三日，我们来到吉安，沿途又作了一些调查了解。群众反映：这一阵比大跃进、大炼钢铁那会好多了。大家最满意的是：停办了公共食堂；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生产队划小……觉得比过去方便多了，也活泛多了。

三月四日，我们来到井冈山。由于当年反动派白匪军的焚烧破坏，原有的村落、住家、房屋大多不存在了。解放后，也只按照需要修复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如当年毛泽东和朱老总住过的八角楼。我们瞻仰了新修的烈士纪念塔，这比起过去红军时期修建的纪念塔雄伟壮观，已大不相同了。又去看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和大小五井、五大哨口……一些地方。过去我住的几处村庄、房屋都已荡然无存，现有的房子全是后来盖的。

从井冈山下来，又驱车去永新、吉安。我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回到万安。朱旦华执意陪我一起到了万安县城。第二天回到罗塘。这时养父已再婚，里外收拾得比较像样了。又过了十一年，养父变得更加苍老，他已经接近八十岁，行动、说话还同过去差不多，精神上也比过去好了不少。许多亲友都跑来看我。我把带回的糖果、景德镇的瓷碗等分送给他们，大家都格外高兴。在养父家吃了一顿饭，来看的人越来越多。这时，老总还在吉安等着我，所以匆匆了解一些情况后，当天就赶回万安城。第二天了解万安县妇联工作情况，听说她们办起一所幼儿园，就和朱旦华一起去参观。这幼儿园还在初创阶段，比起北京、上海大城市的要差多了。物质条件有些还跟不上延安时的保育院。她们主要是经费困难，所以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希望给些支援。我同朱旦华回去后，都尽力给了她们一些帮助。

三月中旬，我同朱老总一起到福建省的武夷山疗养院。

那里已建成一个很好的风景区，我们驱车加上爬山，在深山树林中转了大半天。武夷山比井冈山大得多，山岭雄伟，地形险要，我们只跑了它很小一部分。老总看了，颇有感慨地回忆说：

“当年，中央苏区开始建立时，毛泽东曾提出，要到武夷山建立根据地。我还有点不大理解，只觉得这地方偏了一点，其实，革命发展的实际条件和需要，偏不偏，都是相对的。那时若在这里建立中央苏区，虽说有点偏，但从这里的地形和周围条件看，在这个地方，打破敌人的‘围剿’是不难的。”

两次回故乡的时间都比较短，以后再也没有回去。只是过年过节往家里寄点钱，贴补他们生活上的不足。养父在一九六五年病故。生父康家的后代还常来北京看望我。故乡的山，故乡的水，常在我梦中出现。对故乡的生产建设更时系心头。

第十五章

十年动乱

参加铅山社教

一九六五年九月，由我任组长，与全国妇联几位同志到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公社江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铅山后，我带的这个工作组又增加了解放军第二炮兵文工团的几个团员，全组共二十余人。

江村紧靠两条公路的交叉处，是个生产大队，当时有四百多户，一千多人，分八个生产队。三年困难时期，经过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生产有了恢复，但少数干部有账目不清、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等问题。我们进村后经过调查，有两名干部分别有一千元和几十元左右的多吃、多占、贪污、挪用等情节。对这样的干部如何处理，群众议论纷纷，工作组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对这两名干部应给予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我不由想起一九四八年在河北饶阳农村搞土改、三查三整的往事，感到这次“四

清”与那次的土改虽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这就是目标都是对着基层干部。朱老总对农村基层政权和对农村干部的分析，一九四八年的经验教训，都使我深深感到，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处理干部问题非常重要。尤为重要的是，干部无论犯有多大错误，关键是应对其进行教育，提高认识。为此，首先要统一工作组内部和群众的认识。我向工作组表明：我们工作组是来教育人的，而不是来整人的。我还在群众会上反复阐明，这两名干部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应以教育为主。同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提出“减、缓、免”的处理意见。经过反复工作，也得到群众的赞同，两名干部做了深刻检查，退回钱物。以后，他们重振精神，带领群众生产，关心群众生活，受到群众的欢迎。

在当时情况下，还有一名干部受到党内处分，那是江村前任支部书记江兴隆。他因家贫未能娶妻，土改后，一个富农老婆同丈夫离婚后，又与江兴隆成婚。婚后夫妻关系和睦，生有子女二人。后来发现那个妇女有海外关系。此事被上面领导知道后，批评江兴隆丧失阶级立场，“四清”前，撤了他的支部书记。这次“四清”他又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村干部和群众中不少人把他看成是阶级敌人，也有人认为他是被敌人拉过去的，已蜕变为阶级敌人。主张召开全村大会批斗，然后法办。我认为江兴隆是党员，前任支部书记，对他的处理更应慎重。经过工作组同志与他

谈话，弄清情况后，我问他：

“你的老婆过去是富农，又有海外关系，你这个党员和这样的老婆无法同时存在，党和老婆你选择哪一个？”

他稍加思索，然后十分认真地回答道：“我这个老婆能洗衣缝补，下田劳动，喂猪喂鸭，做饭，带孩子……帮助我解决眼前生活中的许多困难。没有她，我这个家就散了，我的生活也难过下去。党我想要，老婆也离不开，现在只允许我要一个，为了要活下去，维持这个家，我只好先要老婆了。”

就这样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劝他退党。后来我感到他确有实际困难，他的老婆也非坏人，劝他退党，这个处分有些过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江兴隆曾给我写信，要求恢复党籍。我考虑了他的要求，将他的信转给了当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同志，并讲明他的情况。后经江西有关部门研究，恢复了他的党籍。

在补划成分的工作过程中，我也一再向工作组和村干部讲明，要实行“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我亲自把关，深入群众，核对财物，广泛听取意见，集体反复研究。全村划为贫农的户占百分之八十九，中农占百分之八，大大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团结向上、致力生产的气氛日益高涨。

江村是个穷村，农业生产落后，人均只有六分水田，其余多数是旱地，因为缺水，只能种一季水稻。要改变江村贫穷落后的现状，我与大家一起进行实地调查、讨论，认

为首先应解决缺水的问题，决定修两座小水库。这样，许多旱地也可引水灌溉，增加八百亩水田。我与县水电、物资局等有关部门联系，请他们派人协助勘察设计，购买钢材、水泥等。一切准备就绪，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立即在江村掀起。我与工作组的同志们也和群众一起，天天到水库劳动，大家还展开了劳动竞赛。

一九六六年三月底，两座水库相继建成，当年就改善灌溉面积一千余亩，每年可增收粮食三十多万斤。

我还与江村妇女一起在山坡上开垦种植了三十多亩的茶树。经妇女们讨论，把这片茶树命名为“三八茶场”。现在这片茶场已发展到一百多亩。据说这些茶树长得郁郁葱葱，绿化了山地，也给江村增加了经济效益。一九八三年第五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时，江西的代表还特意带来了这个茶场生产的茶叶，送我品尝。此外，他们又办起笋竹林场，人均收入大大增加，村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户建起了新房。这个原来贫穷落后的农村，与全国许许多多农村一样正在走上富裕之路。

刮起打倒朱德的黑风

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达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

“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

“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上海会议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老总说的这几句话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觉出了老总身上的细微变化。他在主持第三届人大常委第三十次扩大会上，有这样一段讲话，要求大家认真读马、恩、列、斯的书，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时，

就天天读书。今书也读，古书也读。今书就是毛主席的著作，古书就是马、恩、列、斯的著作。我感到很有兴趣，也劝大家读一读。”

一九六六年五月，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

在这次会上，林彪作了长篇发言，蛊惑人心地大叫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还在会上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攻击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老总的名，把老总不赞同他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说成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老总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蜚语。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林彪在军内的亲信，也恶毒地散播“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这年八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公开攻击朱老总。有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的支持和策划，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开始兴起。

一九六七年一月，我们在中南海的住所，铺天盖地贴满了“打倒朱德”、“朱德滚出中南海”等内容的大字报，地上也有用石灰刷的“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标语。朱老总看了这些大字报后说：“是我的，我承认；不是我的，谁写的谁负责。”

月底，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在灯市西口的墙上，辟有“朱德罪行”专栏。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批朱联络站”；他们还准备于二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老总，并让我陪斗。只是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干预，这个大会未能开成。

事情并未因此而了结。林彪一伙进而篡改历史，他妄图打倒朱老总，为他自己树碑立传，篡夺最高领导权制造口实，大肆宣传是毛泽东、林彪在井冈山会师的。在他们的胁迫下，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陈列物说明中，竟把朱老总挑粮的扁担，也说成是林彪的扁担了。

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上，吴法宪当面诽谤、侮辱朱老总，向他提问：你在井冈山是怎样反对毛主席的？更为甚者，还有人一手遮天，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案”，诬陷朱老总是他们虚构的这个组织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还设有常委若干人。据称，一九六七年七月，这个组织曾秘密召开过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一个“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企图发难、叛乱。林彪一伙下令到处追查，只是由于后来追查不出结果，而且已经露了马脚，这起假案才不了了之。当时朱老总对此淡然处之，不为所动。记得，有天我回到家里，看见他正在看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所谓“中国共产党（马列）”的组成、人选等。朱老总边看边

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

年事已高的朱老总那些年处在这种逆境下，他心情抑郁，终日少语。当他看到那些造谣、诬陷几位老师的大字报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陷入更为愤懑的沉默中……。

一九六九年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朱老总依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可是他遭到不公正的围攻，被污蔑为“三反分子”。会上，面对这些，他曾严正表明，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一直坚信，只要毛泽东、周恩来在，事情总会搞清楚，坚信历史早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

我也未能幸免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是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的成员。一九六七年春，机关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南海的造反派来全国妇联贴出大字报，说我攻击江青，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大字报还说我是“走资派”等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实下，我被揪了出来。

当时我随同机关同志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贴满在北大校园各个角落墙壁上的大字报，尽是一些颂扬聂元梓，炮

轰工作组，打倒黑帮分子等内容。大字报还提醒人们要跟上形势。当时，我还是努力想着要跟上形势，惟恐跟不上被打倒，但还是出现了被打倒的事实。我惴惴不安，又不理解，我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心中充满一个个的疑团。

我向朱老总述说了心中的疑虑、不安和怨愤。我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还不知会怎么样呢？”他不紧不慢，颇为沉着地安慰我道：“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的。”他还告诉我，毛主席不相信我会反对他，他还让董老告诉我，要我待在中南海，不要出去。可朱老总却要我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他说，群众是讲理的。

我穿着一件棉大衣，天天挤乘公共汽车到妇联机关，打扫卫生、擦地、生炉子。几个“走资派”在一间屋子里写检查，接受群众监督，准备随时出席大小批斗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多名群众给我戴上一顶纸糊的，写有“走资派”字样的高帽子，让我和另一名戴高帽子的“走资派”李宝光站在一辆大卡车上，他们沿路高呼：“打倒康克清！”“打倒李宝光！”卡车在北京市区缓行着。在到中南海西门时，“打倒康克清！”的口号声喊得更响，更多了。次日莫斯科塔斯社立即播出朱德妻子康克清游街的消息。游完街回到妇联机关后，不知怎的，我冒出一个想法：我游了街，被称之为“走资派”，我还能回中南海的家吗？

我给中南海打了一个电话，得到同意后，我回到了中南海，警卫人员好心地对我讲，不让你出去，你坚持出去，你不去，谁敢到中南海来找你？还是呆在中南海，不要出去了。

戚本禹秉承林彪、“四人帮”的旨意，在这年三月三十日给全国妇联群众组织写信，内容之一是，康克清可以批判。不久，有一派群众被授权并得到支持，在经委礼堂召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批斗会，还对我搞了个“喷气式”。会上，只许群众批斗，不准我回话。尽管我倒背双手，低着头，我还是开口驳斥那些不是事实的批判。在那段时间里，不管是什么样的批斗会，我只有一个信念：对自己和别人的事，都要实事求是。是我的错，我承认；不是，我不承认。对别人的事，知道的讲；不知道的，不讲。事实被歪曲了的，不管是谁的，只要我了解，我也要如实予以说明。

下 放 从 化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宣布军队进入紧急状态。朱老总觉察到这里有“鬼”。他曾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呵’。”但在“加强战备、疏散人口”的借口下，许多被视为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被疏散离北京。朱老总被指定到广东

从化。

这个决定宣布后，他需要我跟他一起走，便于随时照料他，他也不放心我留在北京。可是，当时我的一切行动得听从全国妇联军代表的指挥，没有他们的允许，我是不能随意行动的。我向他讲了为难之处，他无奈地说：“那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朱老总的这个要求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在他的干预交涉下，我总算和朱老总一起到了广东从化。

十月二十日当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后，广州军区负责人从机场直接“礼送”我们到从化，不让我们进入市区。

从化是个风景优美的疗养地区，有温泉，有疗养设施。这次来可不像往次，可以自由行动，做些调查。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我和朱老总实际上是被软禁了。聊可安慰的是，我与朱老总可以相依为伴，但我还是不习惯。在北京我是“自由民”。记得我曾对老总说：“在北京我是自由民，可以随便走动，现在我只能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自己的家也回不去了。”我还满腹牢骚地对他讲：你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们现在这样无法无天地对待你。

朱老总却不在意地笑笑，说：“平常我们工作忙，难得有机会休息一下。准备将来回去更好地工作。在这里不也很好吗？不进城，也是一样生活。”

在那寂寞的日子里，除了警卫员，只是我同朱老总形影相随。孩子们远在各地，时间越长越是不习惯。我思念战友、同志、亲人，我思念北京，更思念那些与我们同样处在逆境中的老同志们。不久曾碧漪带着她两岁半的小孙女红红“疏散”到从化。我与她在江西苏区时就相识，此时此地来了一位老战友，还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跑前跑后，为我和朱老总的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这时已是一九七〇年的春天，我们三个大人常常带着小红，手提小竹篮，漫步在雨后的树林草丛中，采摘野菜、蘑菇。大约是出于对朱老总的照顾吧，我们的伙食不时还有些鱼、肉、蛋和海味。我和老总的伙食挺不错的。而曾碧漪那里很少有什么荤菜，每逢此时，我或是把小红红叫来与我们共享，或是分一份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允许可到广州走走，或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在从化生活将近一年。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与朱老总被通知回到北京。毛主席出面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宪法。动身前，朱老总与我商量，到北京后不再回中南海住了。他说，那里的条件虽好，但也实在不方便。搬在外面住，孩子们可以常来常往。回北京后，我们搬到万寿路现在的住处。

朱老总人大常委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到北京市及郊区的工厂、农村视察工作。他最关心，也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而林彪、江青一伙却把扎扎实实抓生产的人诬

为“唯生产力论”。朱老总常在家里同一些来看望他的同志们说：

“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但实际上他们是在破坏革命和生产。不劳动、不生产，能行吗？粮食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陈 毅 来 访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随朱老总去北戴河。一天，陈毅兴冲冲地跑来。经历这场“文革”灾难，老友们见了面分外高兴。陈老总当时虽仍处在被红卫兵造反派们的围攻中，但依然谈笑风生。我问他：“红卫兵贴了你那么多大字报和打倒你的大标语，你真的一点儿也不考虑吗？”他笑笑说：

“怕个啥子哟，大不了就是我这一百五六十斤！我已经死过好多次，是马克思他老人家有眼，不接受我，现在我随时准备到他老人家那里去报到。可是叫我背叛真理，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他对我们说：“这次是周总理叫我来看看你们的。总理想亲自来看望你们，但现在总理出国去了，叫我代表他向朱老总问好，希望你们多保重。”听了陈老总的話，我很感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总理啊总理，你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永世难忘。”朱老总慢慢地一句一字地诉说着他的心声：“我们这些人为革命干了一辈子，现在为了顾全大

局，作出这样的容忍和个人的牺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少有的，将来许多问题都会清楚的。”这后几句话他怕我们未听清，又重复了一遍。我们沉默良久，一切尽在不言中。

难以忘怀的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同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朱老总也去参加了。回来时他兴奋地告诉我，毛主席对他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评他们，我说你是红司令……”说的时候，朱老总心情激动，眼圈都有点红了。

没有多久，一九七四年元月，我参加了江青他们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在会上耀武扬威地点郭沫若同志的名，矛头指向周总理。我把所见所闻、所担忧的事都如实向朱老总谈了。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江青的手已经伸向军队。朱老总听后，沉思片刻，然后宽慰我说：“你不要害怕，军队尽管出了几个败类，但绝大多数是好的。地方的大多数也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能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当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我听后如释负重。

一九七五年二月成立中国妇女四大筹备组，组长是从山东来的杨坡兰，外地来的尉凤英、巴桑、吕玉兰、杨富珍等都是副组长。她们先后到京后，都住在京西宾馆。原全国妇联的领导干部大部分都被打倒了，他们吸收我和李宝光任筹备组副组长。开会地点就在京西宾馆。当时中央分管的直接领导人是吴桂贤。全国妇联的业务工作已经停止了七八年，妇联干部都希望早点恢复工作。

我同她们共事中，觉得杨坡兰执行了极左路线，对老同志存有戒心，保持一定距离，对十七年妇女运动持否定态度。筹备组分工要我管组织工作，但我的意见常常遭到反对。如当时全国妇联有二百多名干部，绝大多数人都闲着无事，她们对妇女工作有感情，熟悉情况。我在会上几次提出：现在有好多工作没有人干，有好多人又没有工作可干，应该把这部分力量使用起来；我还主张尽快恢复出版《中国妇女》。杨坡兰虽没有公开反对我的意见，可是她总强调原全国妇联的干部受十七年的影响太深，不如从外地调一些年轻人来，在没有可靠的人选之前，不必急于恢复《中国妇女》。这时，驻全国妇联的军代表尚未撤走，他们总是和杨坡兰一个鼻孔出气。我的意见通常属于少数，难以通过。有一次讨论干部问题，军代表又唱老调：“恢复工作，尽量调新的、年轻的；原来全国妇联的干部一个不留，输送不出去的，自己也可以找工作，找到工作，我们用汽车欢送。”我听了很生气，就针锋相对地说：“你们这不是

要搞扫地出门吗？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你们不尊重历史，不尊重实际，怎么能做好工作？”会议开得不欢而散。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当周总理病故的噩耗传来时，犹如晴天霹雳。朱老总两眼望着天空，热泪盈眶。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周总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朱老总的健康情况也不太好，工作人员怕他伤心，劝他不要去参加周总理遗体告别。他坚持要去。到了北京医院，他左手扶着手杖，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最后告别的军礼。他悲痛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那些天，他吃不下，睡不好，但仍执著地投入国事活动。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健康，他却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好，我应该更多地做工作。”

总理逝世不久，姬鹏飞、李金德同志来看望朱老总。我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朱老总激动地说：“总理逝世了，我们的政权要维持原状，我们的国家威信只能高，不能低；生产只能上，不能下；有些人只想当官，就去做特务……”

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朱老总在不少场合曾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很好。”

就在这时候，中国妇女四大筹备组决定出版《中国妇女》试刊。当《中国妇女》试刊出版时，正值周恩来总理

病故，全国悲恸。编辑人员怀着沉痛的心情，在试刊里加了一幅插页——周总理遗像和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悼词的全文。试刊通过邮局很快发往全国各地。一个星期天，杨坡兰突然召集在京筹备组同志和《中国妇女》试刊编辑人员开会，传达吴桂贤的指示：试刊原计划没有插页，要将插页追回。当时，我和在场的同志都感到很不理解，难以接受。认为一旦追回插页，读者搞不清刊物出了什么问题，影响不好；况且周总理病故，一个面向全国的刊物，竟无所表示，不仅读者会有意见，编辑人员也过意不去。负责编务的侯荻同志还提出，如果上面追究，我们就说已经发出去了，无法追回。要追查责任，我们可以写检讨。可是杨坡兰和吴桂贤通了电话，执意要求：发加急电追回，并要求当地不拆邮包。群众毕竟是聪明的，后来追回的试刊里，很多插页都被抽去了。周总理的崇高形象，邓小平同志致悼词的情景，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那年清明前后，群众自发地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放满了花圈和鲜花，还贴满了悼念诗词。“四人帮”慌了手脚，蓄意制造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有天，朱老总问我：“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我说不知道。他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这时，全国妇联也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久，吴

桂贤认为妇联的批邓搞得冷冷清清，需要加温。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些警卫人员，原来吴桂贤光临妇联，意在加强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导。在座谈会上，吴桂贤列举邓小平的所谓罪状，大家批了一通。我说就按你们说的，邓小平也还是功大于过。接着，又在工会大楼召开了工、青、妇三家筹备组联合批邓大会。会上不少人发言，各有各的苦衷和动机，有的调子很高，令人吃惊。我思想不通，只能保持沉默。大会开了两个半天，在快结束时，吴桂贤要作总结讲话，突然点名问我讲不讲话？实际上这是逼我表态。我只好简单地讲了几句，谈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意义。也讲到邓小平不重视妇女工作、两勤方针十年不变等等，勉强过关。

紧跟着，机关又开始追谣，搞人人过关，每个人都必须交待去了天安门没有，去了几次，见到了什么，抄了什么诗，弄得大家人心惶惶，不得安宁。七月二十八日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京、津，机关停止工作，转入抗震，才停止了追查。

痛苦的诀别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朱老总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不知何故，会见时间推迟了，当时外交部工作人员未通知朱老

总，他在人大大会堂长久地等候。外边天热，室内空调温度过低。朱老总九十高龄，在室内外温差悬殊的房子里呆久了，着了凉，引起咳嗽，伴有低烧，吃了点止咳消炎药，症状不见减轻。二十五日那天我回家比较晚，他一夜不停地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发现痰里带血。经北京医院医生会诊后，他们建议住院治疗。朱老总想到第二天还有会见外宾的任务，说：“不要紧嘛，等明天会见外宾后再住院也不晚。”

那天，我照常上班，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我说：“朱老总的病，医生看过，建议马上住院。”我问住哪个医院？顾英奇大夫说：“还是住北京医院吧！”我说：“拜托医生啦。”

当时天气很热，老总住在四楼，病情严重。这样，我就紧张起来，朱总的病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严重？我说什么也不相信，他各方面看来都还比较正常。天气热得难受，没有空调，把房门、窗户都打开也不行，里外一样热。我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房子，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由于病情加重，朱老总表现出烦躁不安，饭吃不下，觉睡不好。热，更使他感到难受。电扇也不解决问题，更不敢直接对着他吹。我找医生了解病情，他们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接着，组织会诊。

早饭后来了一屋子的人，会诊之后，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众说不一。后来决定用卡达霉素，据说这种药用多了对肾脏有损伤，会尿路不通。果然，打针以后，排尿越来越少，输进药液一千至两千 CC，排尿只有二百 CC。肾脏出现问题，有尿中毒的危险，我请求换药。这时，在老总身体四周都放了冰块。院方和医务人员也想尽办法，竭力抢救。

当时为朱老总专门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同江青的关系比较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老总一次。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

七月初，朱老总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李先念来到医院看他。这时，他想的还是国家和人民，他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生产建设。当时，他闭着眼睛，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他轻声慢慢地说：

“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又说：

“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他说得很慢，我和先念两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都有些激动，他的这些话都是针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而发的。特别是后面的话。

后来，再有人来看他，他都要睁眼看看，但是已不能

说话。很快就神志不清了。这时叶剑英打电话，要来看他。我极度悲痛，对叶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朱老总去世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朱老总从住院到去世，只有十天。六月二十六日住进北京医院，七月六日去世。我同他在一九二九年结婚已近五十年。随着岁月的推移，相互的了解和感情也与日俱增。他走得如此匆忙，他自己怕也毫无思想准备。去住院的那天，他还作了很快回家和继续工作的打算。我也十分乐观地打算不久就会接他出院。所以没有想到需要问他一些话，他也没有留下要向我交待的话。一想到这些，真是心如刀绞。

那一段时间，我沉浸在无边的悲痛之中。但是，很快我就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我想到老总的为人，想到他对我的希望，特别是他生前“革命到底”的遗言，我必须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坚强、勇敢地担起未来的担子。对老总的最好怀念，不是悲痛和泪水，也不只是几句誓言，而是坚定不移地以实际行动，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先辈们的理想早一天实现。

遵照朱老总生前的意愿，我把他历年积存的两万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

粉碎“四人帮”前后

办完老总的后事，我带着孩子们去几位领导同志家表示感谢。到叶剑英家里，说了几句话以后，他问我：“老总去世前有什么话留下？”

我想了一想，对他说：

“在首都体育馆那次批林批孔大会后，老总知道江青要插手军队。他不止一次对我讲，军队虽说有个别败类跟她跑，但绝大部分军以上单位掌握在我们手里，中央也还是在我们手里，地方县以上基本也在我们手里。有那么一些跟她烂掉了，也只有少数几个。你去问问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谁愿意再回到地主，资本家压迫的旧社会去，他们一定都不愿意。所以，要相信群众。”

叶剑英听得很认真，认为老总的话很重要，叫我不再对人讲了。这时，聂荣臻来了，寒暄了几句，我就告辞了。后来知道，他把老总的话告诉了聂荣臻，两人都很同意老总的看法。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一个偌大的城市，倾刻之间变成废墟，死伤人口数十万，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灾难。中央调去大批解放军，帮助抢救那里的受灾人民。

我提出我想到唐山地震灾区去看看。唐山离北戴河不

远，我每年陪老总去北戴河疗养，老总喜欢北戴河，也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座山，他曾对我说：

“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最好啦！”

他去世时，我想起这一点，没有吱声。因为我觉得，火葬是包括老总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一致同意的。要是提出把他单独安葬在北戴河，不符合这个规定，会给组织添麻烦。这次就由我代表他到北戴河和唐山看看吧！我带了女儿朱敏、儿媳赵力平和工作人员，一起去唐山。一路上看到不少被砸伤的人，还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看到伤员，我们就下车对他们表示慰问，鼓励他们安心医治、疗养。

到达唐山，看到原有的高楼大厦，已荡然无存，几乎全都变成了瓦砾堆。过去，我到过繁华的唐山，如今竟是一片荒凉，老百姓和解放军全都住在帐篷和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解放军在那里一边清扫瓦砾，准备重建，一边还在进行抢救工作。这时离大震虽已有半个多月了，但还不断有压在楼房底层的人被抢救出来。有些人的生存能力竟是那样顽强，在缺食、无水的情况下，竟能支撑半个多月，可谓创造了奇迹。

这个时候，唐山一带余震依然不断。有一次震得比较厉害，响声很大，人们都跑了出来。我们在那里，每天慰问伤员，还帮助解放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顺路我们也去了北戴河，下车凭吊了朱老总生前住过的地方，还有他喜欢的那座山。

到九月九日，我们驱车回到北京。这天下午三点钟，听到广播，毛泽东去世。我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大半年里，三个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的党和国家损失实在太大了。

我们的国家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之际，于十月六日终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又一次惊天动地的大胜利，结束了动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后“左”的思想的泛滥，把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从偏离的航向拉回正常的航线上。举国欢腾，比最盛大的节日还要热闹。连续三天，百万以上的人参加庆祝游行，我和章蕴大姐都参加了妇联的游行队伍，使我无比激动。这真是我有生以来最感兴奋的事。我想到朱老总，可惜他已离开了我们，若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看到那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他也一定会感到无比欣慰的。

过了几天，汪东兴约见我，要我出面负责全国妇联的工作。有了“文革”中的那段经历，使我感到做什么都有困难，我对他说：“实在不想再干了。”他说：“我们考虑了人选问题，现在只有你出来抓全国妇联的工作最合适。”

一九七七年三月，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来全国妇联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原来全国妇联的‘四大’筹备组撤销了，成立以康克清为组长的全国妇联领导小组，由德高望重的康大姐来主持全国妇联的工作。原筹备组的成员各回原来的地区和单位。”

“德高望重”我不敢当，但既已公开宣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好再推，我又回到了过去办公的地方。

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主持全党、全国、全军的工作，很快就看出来，他是很难胜任的。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小平，他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治国安邦之才。又深孚众望，是领导全国最理想的人。要求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

我和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决定一起去看望小平同志，同时动员他出山。那时，他住在西山。我们进去坐下后，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说：“现在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事情好办了，没有什么事非我不可，不要出去了。”我们说：“你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正是时候。这时候不出来，还要等到何时？”他以微笑来回答我们的动员。

第十六章

新时期的开始

拨 乱 反 正

经过“十年浩劫”，全国各级妇联组织被砸烂，领导干部被打倒，不少一般干部和群众也受到迫害，有些还被迫害致死。现在，全国妇联的同志精神焕发，渴望工作。可是人们心灵深处留有伤痕，冤假错案一大堆，运动造成不少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隔阂。要治愈这场灾难的后遗症，使大家凝聚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需要下一番功夫。任务十分艰巨。这只能上靠党的政策，下靠群众的智慧，还要充分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好在这时全国妇联已解放了一批干部，罗琼、曾宪植、李宝光、黄甘英等人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妇联领导小组，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首先在妇联组织中进行拨乱反正，开展“揭批查”，分清是非，解放干部，团结群众，同心协力做好工作。接着成立了复查小组，

先查清“左”的错误思想和“四人帮”在妇联工作中造成的影响；复查十年浩劫和历次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总结建国十七年以来妇女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领导小组召开各种座谈会，让大家把心里话说出来。有的同志不愿在会上讲，要个别交谈，我们尽量挤出时间，耐心地倾听她们的申诉。同时对负责复查工作的同志反复强调“对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不能以人划线，要按政策办事”，“对任何人和事的判断，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必须实事求是”……这样，使蒙受冤屈的同志都先后得到了平反和解放。原来错定为敌我矛盾的二十一个人，全部平反；原来受党内和行政处分的十八人，全部撤销，不留尾巴。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妇联党组召开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平反大会，由我主持，罗琼同志代表党组作复查平反工作的报告，宣布对原来受审查的一百多人的结论，都进行了甄别和修改；全国妇联机关三百多名干部和职工“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没有一个敌对分子，没有‘五·一六’组织，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一个同志的结论留尾巴，没有一个开除党籍的，没有一个受党纪及行政处分的同志。”对在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同志，对迫害致死的同志，在平反之后，分别给予慰问或给予沉痛悼念，要求大家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对于“十年浩劫”中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本着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精神，教育她们进行自我批评，接受

教育，提高觉悟，振作前进。教育打过人的同志主动找被打的同志赔礼道歉；做过错事的同志，主动在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言行，取得大家的谅解。

由于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他们把十七年妇女工作所执行的路线诬为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必须分清妇女工作的路线是非。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妇女解放的原则精神，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际出发，组织大家结合亲身感受，认真学习研讨。最后，一致认为，建国十七年来党领导妇女工作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全国妇联也作了正确的执行。

回顾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于全国解放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大会要求中国妇女要遵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当社会秩序安定以后，即以生产为中心，进一步为妇女群众服务。

第二次妇代大会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举行。大会提出：“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教育、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并搞好工、农业生产和祖国各方面的建设，充分发挥妇女应有的作用。”

第三次妇代大会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召开。大会提出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妇女运动

方针，妇联组织要提高妇女在政治、经济、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地位，还要充分发挥妇女们热爱祖国、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五十年代末期，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妇联工作也有失误之处。如不从实际出发动员小脚老太太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片面强调男女都一样，不适当地提倡妇女也干带电作业、下矿采掘等工作。

一九七七年九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我写了纪念文章《毛主席率领我们走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回首往事，我深深感到，人总是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走过来的。如果忘记历史或割断历史，不从实际出发，那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我和千百万旧中国的穷苦女孩子所走的道路表明：中国妇女的解放，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回想在苏区时，一九三一年毛泽东写了《兴国调查》，后来曾自我批评说，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专门调查妇女和儿童的情况。因此，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在长冈乡，特地对女工农妇代表会代表的产生和会上讨论的详细情况，如婚姻家庭问题，妇女迷信问题等，都作了专题调查。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革命根据地是充分显示出来了，在查田运动、军事动员、革命政权、生产战线等各个方面，妇女都作了非凡的贡献。

我印象尤深的是：红军第四军建立不久，毛泽东就明

确指出，宣传和组织妇女群众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自那以后，我们人民军队的民运工作中就把开展妇女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成为长期的优良传统。

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九三一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实行土地革命。当身受重重压迫的妇女们同男子一样分得了一份土地、浮财的时候，真是兴高采烈，扬眉吐气。接着，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被选进工农民主政府，和男农民一起掌权、一样当家作主了。就在那一年，苏区颁发了婚姻条例，从法律上废除了包办买卖婚姻，实行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一夫一妻的新婚姻制度。童养媳、望郎媳可以带着土地回家和父母团聚了。寡妇可以再嫁了。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〇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妇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随后他就要求，开展边区妇女工作应当从生产着手。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中更鲜明地指出：“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的任务。”要求“各地妇联会、妇救会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衡量妇女工作的尺度”。毛泽东审定这个决定的草稿非常仔细认真，逐字逐句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在“妇女”前面大都加上“农村”二字。这两个字内涵深

刻，体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思想。我们认真地学习了这个决定，而且切实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十年动乱后第一次以全国妇联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座谈会。有一位著名的女科学家，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会场。人们问她怎么到得这么早？她激动地说：“盼了十年，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李伯钊行动艰难地赶来开会。她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留下行动不便的后遗症。我们都又一次经历磨难，一见面不由得紧紧拥抱在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正在北京开会的全国人大女代表、全国政协女委员，是一次女同胞人物荟萃的大聚会。大家心情舒畅，互致问候，会场气氛空前活跃。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蔡畅、邓颖超、陈慕华参加会议。当我宣布开会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大厅，表达出亿万姐妹的心声。接着，邓颖超大姐讲话，她从国际“三八”妇女节的由来谈到我们今天纪念这一节日的意义，号召全国姐妹们振奋精神，万众一心，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然后，到会的姐妹们纷纷发言，热烈而激动人心。会后，新闻单位纷纷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消息：“老大姐们出来了”、“全国妇联开展工作了”、“建国十七年来妇女运动的路线是正确的”……预示着新时期妇女运动充满勃勃生机的局面即将到来。

总结建国以来妇女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讨论新时期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以及妇联的自身建设，准

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为开好这次大会，我们派出调查组到各地调查研究；四月召开了全国妇联三届六次执委会和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七月又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均为四次妇代大会作准备。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同我们作了一次较长的谈话。他指出：开好这次大会，要具备两条。第一条，选举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一个能代表全国妇女、率领全国妇女阔步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班子，一个团结战斗，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能充分发扬民主、使群众满意的班子。第二条，要起草好会议文件：一个工作报告，一个妇联会章程，这是妇女工作纲领性的文件，是公开树起的旗帜。要集思广益，把好的意见集中起来。一定要搞好。他还谈了精心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二十一世纪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这项事业需要花心血，是非常重要的事业，需要中国妇女关怀它、培植它。要讲出感情来，讲出伟大理想来，保证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保证我们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要求：从事妇女工作的干部都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最后以鼓励的语气说：这次大会必须开好，应该开好，也一定能够开好，经过你们的努力，可以开得好上加好！

第四次妇代会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八日至十七日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次盛会，是一次团结、胜利的大会。一千九百多名全国各族各界妇女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她们身穿各民族服装，满怀喜悦和豪情壮志，受亿万妇女的委托，来到北京，汇报各自的工作，并参加新时期妇女工作方针任务的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任蔡畅主持了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副主任邓颖超致了开幕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词。我受全国妇联三届执委会委托，作了题为《新时期中国妇女运动的崇高任务》的报告。报告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全国各级妇联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对“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是非进行了拨乱反正，提出了我国各族妇女在新时期的崇高任务。报告发出了“四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指出今后我国妇女运动的任务是：一、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立新功；二、当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后勤兵；三、精心培育革命后代；四、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家庭关系；五、加强和发展国内、国际统一战线。报告多次被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看

着大家精神焕发的神态，我也十分感动，使命感和紧迫感充满心头。

大会经过分组讨论，反复酝酿，最后通过了《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推选宋庆龄、蔡畅、邓颖超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选举了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二百四十五名，候补委员五十五名。最后宋庆龄为大会致闭幕词，她勉励新时期的中国妇女要为完成大会制定的新任务竭尽全力的一切力量。

接着，召开了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我为全国妇联主席，副主席有史良、罗琼、吴贻芳、曾宪植、雷洁琼、林巧稚、李宝光、郝建秀、黄甘英、林丽韞、关建、阿沛·才旦卓嘎、玛依努尔。我当时感到自己肩挑担子沉重，对于党的委托、人民的信任，我只有以实际行动来回答。

现在回过头来看，“四大”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未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仍提“三大革命一起抓”，“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等。

同年十二月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的徘徊局面，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根本上冲破了“左”的思想

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认真地审议讨论，给予平反；对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选举和增强了党中央的领导班子。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又一次受到深刻的教育，使我感到我们党有力量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国家的前景一片光明。

一九七九年三月，全国妇联召开了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着重研究妇联工作如何紧跟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做好妇女工作。认为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拨乱反正，把广大妇女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使广大妇女得到解放。要运用民主与法制来保障妇女的权益，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这次会议还提出，全国妇女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要注意抵制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发扬优良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特别要教育好子女和广大青少年。

在各地妇联工作取得进展后，我们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托幼工作座谈会、妇女参加农业机械化搞得好的先进县妇联领导干部的座谈会……交流经验，

研究进一步搞好妇女工作的种种意见。

为贯彻党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我和妇联书记处书记及有关业务部门的领导，着重研究了有关妇女的切身利益问题：

一是男女同工同酬。要认真做到从事同等数量和质量，创造同等价值的劳动，男、女报酬应一样，不应对妇女有任何歧视。男、女生理、体力有差别，但从事不同的劳动时常常是各有所长，应当充分发挥妇女的长处和特点，调动她们的积极性。

二是根据妇女的特点，多吸收她们参加工副业、养殖业、编织业以及刺绣、缝纫等适于妇女的劳动，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妇女的特长。

三是努力提高妇女的科学文化知识。“文革”中，妇女文盲大量增加，要在妇女中大力开展扫盲的同时，加强对妇女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使广大农村妇女都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为之出力。这几年因为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农村中出现许多不良风气，所以提高广大妇女的思想政治觉悟，更是迫不容缓。

四是加强妇女的劳动保护，办好幼儿园、托儿所，这是妇女的切身利益，也是做到男女平等必不可少的条件。

怀念戎冠秀

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全国妇联四届四次执委会专门抽出两天时间，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这次讨论由全国妇联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韩幽桐主持。大家对宪法草案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以及保护母亲和儿童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感到满意，普遍赞扬草案中新添加的关于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规定。

参加讨论的同志对有关妇女、婚姻、家庭、儿童的条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希望新宪法能够明确提出反对重男轻女、歧视妇女；规定父母有教养子女的责任；反对破坏他人的幸福家庭等。大家表示：要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讨论，使广大妇女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

在这次会上，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发了言。她的话虽不多，但反映了她的深切感受。她说，在宪法中应明文规定做好拥军优属的工作，让全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那些为国出力献身的军烈属。

提到戎冠秀，上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她。她的光辉事迹是和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人民解放军的慈母情怀连

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三八年，正是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为民族、为国家的存亡，她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河北平山县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下盘松村的男人们去了前线，妇女们挑起了支前和生产两副担子。妇救会会员做的军鞋、军衣数不清。戎妈妈看着前来交活的姑娘、媳妇，语重心长地说：“子弟兵是谁的？咱们可要了清，是咱老百姓的。离了子弟兵，鬼子会把咱们全杀死。国家灭亡了，咱们都要变成亡国奴。……”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扫荡中，戎妈妈带领妇女给前线战士送水、送饭。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为了挽救伤员，戎妈妈用尽心血，用温开水给伤员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一勺勺给伤员喂饭吃。为了掩护一名重伤员，她急中生智，硬是让伤员踩着她的肩膀，藏进了暗洞。多少个日日夜夜，她守护在伤员身边，当他们伤愈重返前线时，都情不自禁地喊她一声“娘”！

解放战争爆发了，在扩军大会上，戎妈妈深情地说：“我有三个儿子，验上哪个，就去哪个，都验上了，都去。要不嫌我老伴上了岁数，就让他给八路军喂马去。”英雄母亲的一番话语，激起了参军热潮。后来，她的小儿子光荣地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在往后的岁月里，她又先后送走了三个孙子参军，报效祖国。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戎妈妈站在天

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兴奋不已。回到村里，她对乡亲们说：“如今是咱们的天下了。咱们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要努力建设新中国。”当时村里比较穷，小学校缺房子，她二话没说，主动把土改时分到的五间大瓦房，无偿地让给了小学校，自己搬进了两间小平房。

一九八八年春，戎冠秀同志病重住院，这年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我赶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看望她。只见她安详地躺在病榻上，当她女儿凑近耳际轻声告诉她：“娘，康妈妈来看望你老人家了，你还认识吗？”她睁开双眼，轻轻点头，嘴唇颤动，想说什么，但已听不见她的话语了。我紧握她劳动了一辈子的手，宽慰她说：“你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现在有病，要安心治疗养病。”我们那次相见，仿佛就在眼前，想不到竟成了永别。

戎冠秀同志虽死犹生。她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 次 盛 会

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一个赶学比帮的运动逐步形成，涌现了大批锐意改革，勇于开拓，积极建设的先进分子。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当建国三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妇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表彰全国“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大会。这次受到表

彰的有八千多名“三八红旗手”和一千多个“三八红旗集体”。邓颖超同志以党中央的名义向代表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受表彰的“三八”红旗手中，年龄最大的是八十三岁的老英雄戎冠秀，年龄最小的是十七岁的新疆姑娘帕尔古丽。她们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了优异的成绩，集中体现了我国妇女的优秀品德和智慧，是全国各族妇女学习的榜样。我深深地体会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收到了大批书面材料，她们的事迹都非常感动人。我愿简要地回忆一下，以教育今人，鼓舞来者。

工交战线上的“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以大庆人为榜样，积极投入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挖潜力，创优产，夺高产。她们钻研技术，学习科学，勇于革新，成为生产的闯将，技术革新的能手。大庆采油四部女子采油队，建队九年来，为国家生产的原油相当于旧中国原油总产量的七倍多，一九七八年被评为石油部的高产稳产采油队。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无锡市女工查正南，四年来创造了七十多万米无次布的新纪录。哈尔滨星光机器厂女工苑淑琴，七年干了十七年的活。北京市七九八厂女工陈伦芬，不断改革工具，提前两年跨进了一九八一年。

农业战线上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学习大寨人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实行科学种田，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中，干劲倍增，努力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福建惠安县女队长、归

国华侨骆丽琼，带领社员团结战斗，十七年来，粮食亩产从六百多斤提高到三千多斤，花生亩产从一百多斤提高到六百多斤。陕西植棉老模范张秋香，废寝忘食，一心扑在棉花生产上，不断摸索棉花高产规律，热心培养青年植棉能手。湖北天门县黄潭公社的植棉姑娘，在棉花栽培、防治病虫害、培育良种等方面，开展科研活动，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新疆泽普县“五七”家属队（维吾尔族），在戈壁滩上创造了亩产二千三百五十斤的高产。内蒙锡盟牧民古日吉德（蒙族）养牛十三年，实现了受胎率、保胎率和犊牛成活率均达百分之百的优异成绩。

科技战线上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奋发图强，勇于攻关。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炼油厂总工程师徐谦，二十七年如一日，战斗在石油战线上。她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大搞技术革新。成功地改造了“催化裂化装置”，为国家节约了八百四十多万元，一千一百五十吨钢材，去年又进行技术革新、设备改造共达二百四十三项，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旅大市计划生育科研所所长王家光，多次成功地试制了妇产科医疗器械，为安全有效的实行计划生育，取得了成效。广东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的张诒仙，因公摔伤，身残志坚，自学外语，翻译热带作物科研资料一百二十多万字，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在科学技术战线上，妇女同样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财贸、服务战线上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积极开拓业务、保障供给，为生产、生活服务，满腔热情地当好四化建设的后勤兵。上海乍浦街道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服务站、少年辅导站、儿童小饭桌等多种多样服务事业，开展邻里互助，千方百计帮助职工安排好家务、孩子，为广大职工投入四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西藏江孜县妇联，克服各种困难，普遍地办起了不同类型的托幼组织，婴幼儿入托率达百分之八十三点九。吉林特等劳模、中国农业银行延吉县营业所会计玄姬淑（朝鲜族），坚持财务制度，热心支援农业，二十四年经办五十二万笔帐目无差错。

文教卫生战线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为培育革命后代，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安徽合肥市安庆路第二小学徐玲君，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团结同志、提高教学水平，取得了优异成绩，一九七八年被授予特级教师的光荣称号。贵州遵义医学院教授黄慧芬和同志们一起，在丝虫病防治研究上，填补了我国医学科学中的一项空白。北京首都医院内科副总护士长傅福贞、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护理水平，改进了病房管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仁措（藏族），自愿回草原当赤脚医生，常年走访病人，送医上门。牧民说，她做的好事像山花和星星，看不尽，数不清。还有女文艺工作者、女运动员等等，她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为四化服务，为祖国争光。

国防战线上的“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的同志们，一心保卫四化，支援四化，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涌现了一批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女战士、女民兵、支前模范和英雄母亲们。解放军某部通信连英雄总机班，二十四小时连续作战，通信联络无差错，保证了战斗胜利。指战员们称赞她们是火中的凤凰。云南省傣族十姐妹支前模范民兵班、荣立一等功的支前模范广西防城县民兵副排长陈玉英等，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祖国，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广大妇女工作干部，积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深入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关心妇女的切身问题，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有些也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她们是妇女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湖南醴陵县妇联，在县委领导下，引导妇女走农、工、副综合发展的道路，关心妇女疾苦，培养妇女干部，做出了成绩。江西万年县珠田公社妇联，办了八十多所妇女夜校，组织妇女学文化、学政治。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妇代会主任赵玉芳，带动妇代会委员、代表，深入一家一户，做好思想工作。郑州市二里岗办事处妇联委员邵玉华，满腔热情地做好青年思想工作，组织待业青年从事集体生产服务事业，深受群众称赞。

表彰大会上，听了她们先进事迹的介绍，大家深受教

育。我在总结讲话中，特别提出，要向“三八”红旗手、“三八”红旗集体学习。首先，要学习她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我们要积极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习和讨论，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不断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做出新成绩。

修 改 婚 姻 法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一九四八年由中央妇委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经广泛征求意见、修订，于一九五〇年颁布执行。三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婚姻法有些条文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经过十年动乱，封建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又有回潮，不少贫苦农民、城市职工为此负债累累，甚至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童养媳、换亲、租妻、重婚、拐骗买卖妇女、男女青年因恋爱婚姻问题而自杀、被杀的案件不断发生。一九七八年六月，全国妇联领导小组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同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有关单位，组成修改婚姻法小组。这个建议经党中央批准后，各有关部门通力协作，经过一年零十个月的调查研究，多方听取基层

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又先后五次在全国征求意见。经法制委员会讨论修改，形成新的婚姻法草案。经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获得通过，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起实行。

新婚姻法的施行，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健全了社会主义法制，发扬了社会主义风尚，提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确立了幸福美满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必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

新的《婚姻法》发展和完善了一九五〇年颁布的《婚姻法》，使之更加切合我国当时的实际和需要。它在一开头就把原来的“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婚姻制度”。要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婚姻观点，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建立革命的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关于男女双方结婚的年龄，原定的男二十、女十八，普遍认为应予提高。经过多方衡量，又参照国外的规定，最后从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出发，决定各提高两岁，即男二十二，女二十岁方可结婚。当然，这不是说到了这个年龄就必须结婚，仍要提倡晚婚。还规定了男女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关于离婚的问题，原为“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考虑到我国的一些实际情况，双方当事人往往是在一时感情冲动之下，仓促作出决定，有的自愿只是一种假象。为了慎重和切合实际，

添上“经调解无效，才准离婚”。原规定中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有人提出，这样容易为第三者插足开绿灯，建议改为“如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我觉得这种修改是必要的。

对《婚姻法》的其他条文，经过许多人的反复研究，也都作了切合实际的相应的修改。

在新《婚姻法》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还要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它的基本原则是“婚姻自由”。首先是男女双方恋爱结婚一定要自由，在一夫一妻制的法律规定下，给予法律的保护。反对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反对各种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同时也要求男女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恋爱婚姻观，正确地对待恋爱和婚姻。其次是离婚自由。当夫妇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经多次调解无效，勉强维持共同生活，只会增加双方的痛苦。但离婚不仅是男女双方的事，还影响到老人和子女，必须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还要反对喜新厌旧、轻率离婚的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反对封建的人身依附的思想。

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这是建立和发展民主和睦新家庭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家庭的一个主要特点。

尊老爱幼是我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是社会主义家庭的义务。父母要切实承担起教育子女的义务。

责任，关心他们的进步，培养他们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有用人才。子女要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尊敬体贴老人，使他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

新《婚姻法》的公布，对健全法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睦家庭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又提倡建立“五好家庭”，把这一工作建立在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工作是个长期的工作。随着经济文化逐步发达，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法制观念的不断提高，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日益消除，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对这一点我充满信心。

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约见了新华社记者，就当时婚姻、家庭问题存在的一些不健康现象，发表了谈话。中心意思是，为了充分调动妇女的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当前必须在城乡广大群众中宣传用社会主义思想处理好婚姻家庭关系，反对买卖、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打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歪风邪气，树立无产阶级的婚姻观点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提倡革命的民主和睦的新家庭，以便使广大群众心情舒畅、齐心协力，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和学习。

回顾一九五〇年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从根本上废除了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妇女群众，从包办、买卖婚姻和封建家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自由结

婚、新事新办、夫妻平等、家庭成员和睦相处的新风尚普遍出现。但是，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文革”十年，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社会道德风尚也遭到很大破坏，致使买卖、变相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又重新抬头。广大男女青年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上，一定要自觉地破除旧的习惯势力，抵制追求金钱物质、依赖他人生活的旧思想，争取真正的独立自主权利。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婚姻、家庭有着密切关系。在我国生产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较富裕的农村同较贫困的农村的差别，都直接间接地反映到婚姻、家庭问题上来。越是生产水平低、生活条件差的地方，买卖、变相买卖婚姻就越不容易彻底肃清。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才能为树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奠定经济基础。同时，实践也证明，在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凡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的地方，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就蔚然成风，群众精神面貌就显然不同，劳动情绪高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全国妇联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深入宣传婚姻法的通知》，要求全面宣传婚姻法，以勤俭办婚事、婚姻自主、用社会主义道德观处理婚姻、家

庭问题等为重点，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成为每个公民遵循的自觉行为。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全国妇联召开了四届七次常委扩大会议，黄甘英副主席主持会议，罗琼副主席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对妇联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央书记处强调指出：“今后妇联的方针和任务是坚决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做好培育和保护儿童健康成长的工作，充分发挥妇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一书记郭力文作了《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切实抓好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汇报，并作了会议总结。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妇联“五大”工作报告（讨论稿），全国妇联章程修改草案和妇联“五大”人事安排等问题。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大家决心要认真地贯彻执行。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三句话高度概括了新时期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体现了两手抓的精神——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因为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当然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生产建设上去了，国家经济得以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才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社会局面。可是如果放松了精神文明建设，资产

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封建迷信也会重新抬头，这必然会影响物质文明建设，所以二者不能偏废，这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培育和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历来是我们妇联工作的重点，因为妇女和儿童有着天然的联系。儿童工作是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真正要做好这项工作，当然还要靠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上各有关方面，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把这项头等重要的工作做好。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更是妇联的光荣职责。在这次会上，我就这一问题作了发言。大意是：近几年来，各地不断发生歧视、虐待、残害妇女的案件，有弃、溺女婴、虐待甚至逼死生女孩的母亲；有拐卖妇女儿童，使妇女儿童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招生、招工中，男女不一视同仁，擅自拒收或提高录取女生、女职工分数线等问题。如果任其发展，那后果就会十分严重。现在有些地方已出现男女孩子比例失调的现象。事实说明：宪法、婚姻法中有关男女平等的规定，不等于事实上的男女平等，不等于在实践中毫无阻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中国妇女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自身彻底解放的艰巨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和男子一样，同是国家的主人，国家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可是为什么在妇女儿童权益方面，还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错综复杂。我们必须看到，当旧制度被推翻的时候，它的腐朽思想并

不能一起装进棺材，彻底埋葬，仍在社会上散发着臭气，毒害人民；几千年重男轻女的封建残余思想，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我们国家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十年动乱造成的混乱思想尚未彻底肃清，还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我们有不少基层组织不健全，工作不得力，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我们全国妇联对妇女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抓得不力。凡此种种，都是造成问题的因素。当然各地情况不同，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作为妇女工作者，对自己的姐妹遭受如此残酷、野蛮的迫害，不能不感到内疚和不安。

对于这一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各级妇联采取了积极态度，处理和接待了大量来信来访，尽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还配合有关部门，办了一些重大案件。为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少妇联干部废寝忘食，解救妇女的疾苦。特别是中央办公厅（82）20号文件下达后，更鼓舞了广大妇联干部，工作更有了起色。就全国妇联来说，也在不断抓这项工作。可是，联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运用各种渠道，向社会广泛宣传，造成一种声势，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成为人人关心的社会新风尚，尚需坚持不懈地努力抓下去。

男女平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妇女解放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既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更是为了国

家、民族的安定团结、兴旺发达；也是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基本建设。

我们更要理直气壮地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说话，要勇于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坚决同歧视、残害妇女、儿童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妇联还要为妇女学文化、学科学、学法律等创造条件，加强对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她们正确处理事业、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碰上问题，不自卑、不轻生，要自尊、自强、勇于说理，坚决斗争；要以实际行动，以自身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来赢得社会的尊重，从而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男女平等。

最后，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坚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决议、《关于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和《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组成方案》。一致同意增补郭力文同志为四届常委。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全国妇联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宣部等十三个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决定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冬春之交以一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开展以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月活动。

各地在陆续开展的宣传月活动中，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进行了一次法制教育，提高了全社会对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视。北京市在宣传月中受教育的群众达一百四十多万人，有力地打击了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解救了

受害的妇女儿童。江西省在一个月先后召开一百四十多次公判大会，判处了一千三百余名犯罪分子，到会群众达到一百多万。在宣传月中，各地妇女群众学法、知法、守法，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强，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关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规定，在不少地方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要求。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制观念，妇女自觉捍卫自己的神圣权利，已逐步深入人心。不过，我也提醒妇联干部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改变全国广大妇女的精神面貌，是全国妇女工作的繁重任务，不可能在一个月就能把污泥浊水统统打扫干净，必须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是联合国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十周年。回想起来，一九八〇年七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审评大会上，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这个《公约》，同年九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公约》。

我认为《公约》的通过，是联合国妇女十年的重大成果，也是各国妇女为争取自身的解放，为实现男女平等而取得的重要进展。《公约》的基本原则是与我国人民和广大妇女的愿望和要求相一致的，对我国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有着现实意义。自《公约》生效十年来，我国政府相继修改和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证妇女不受社会歧视和传统势力

阻碍，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的法律和法规。如：一九八〇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强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特别指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两项原则；一九八二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的权益作了充分的规定，特别强调了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一九八五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颁布的《继承法》，明确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妇女享有、拥有财产、管理财产和出售财产的权利；一九八八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阐明凡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单位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男女职工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些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保证了妇女在政治、就业、教育、保健、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推动了妇女地位的全面提高。

《公约》通过的十年，正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稳步发展的十年。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改革，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争取自身的进一步解放，在获得应有权利和地位的奋斗中，显示了力量。

但是不能讳言，由于我国目前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制约，法律上的男女平等与事实上的男女平等尚有很大差距，妇女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如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还没有完全消除，轻视甚至歧视妇女的现象仍然存在，女文盲还占很大的比例，等等。同时，由

于妇女承担着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双重任务，不付出加倍的努力，就很难克服前进中遇到的新的挑战。特别是近几年来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的死灰复燃，严重危害着妇女的身心健康。因此，正在开展的扫“六害”斗争非常必要，深得人心。

在各种会议、不同场合，我总是鼓励全国妇女继续为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作出新贡献。同时呼吁全社会关心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执行有关的法律和法规，为从根本上消除对妇女的歧视而共同奋斗。

关于儿童工作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全国妇联工作时，着重指出：全国妇联应把抚育、培养、教育三亿以上的儿童和少年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和妇联书记处的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了这一指示，并于二月六日向书记处书记宋任穷、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汇报了我们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他们强调指出：“妇联今后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少年儿童工作上，不是说其他工作不做了，而是说其他工作要服从这个重点。”我觉得这个精神很重要，要抓住这个重点不放，其他工作要围绕这个重点来进行。三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全国妇联召开了省、市、自治区

妇联主任会议。会议围绕贯彻中央书记处关于少儿工作是妇联工作重点这一精神进行了讨论，大家很受启迪和鼓舞。关于抓生产和儿童工作的关系问题，我在会上打了个比喻。中央要求我们一手抓棉花，一手抱娃娃，不是说抓了儿童工作，其他工作就不做了，而是说儿童工作为重点，围绕它也要做好其他工作。四月一日至三日我们又召开了四届五次常委扩大会议，罗琼同志作了贯彻执行中央书记处“二·二指示”的发言；会议讨论通过了《贯彻中央书记处对妇联工作的重要指示的决议》和《一九八一年妇联的工作要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指出：“一九八一年妇联的儿童工作要着重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扩大宣传抚育、培养、教育儿童和少年的重大战略意义；二、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并配合学校、社会做好校外教育工作；三、继续配合有关方面抓好托儿所、幼儿园的工作，帮助做好散居儿童的教育工作。这些使我们进一步明确抓好儿童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做法。

我们常常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人类的希望。我国有三亿多儿童，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抚育、培养、教育好这三亿多儿童，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优秀人才，是为共产主义培养接班人的大事。党中央把这一重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尽心尽力地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在北京成立，我被推选为会长，副会长有朱学范、华罗庚、荣

高棠、胡子婴、谢冰心。同年五月九日，又成立了全国儿童和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由工、青、妇等十六个单位组成，又推举我为主任，林默涵、邱纯甫、董纯才、郭子恒、乌兰、周鹏程、胡德华任副主任。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有关儿童工作的方针、政策性问题，协调各有关方面开展儿童工作，制定年度计划，检查执行情况等。

先后成立的这些组织，确实为加强和发展儿童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在托幼工作、儿童食品、开发儿童智力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特别令人振奋的是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成立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这个中心的地址就是北京官园。一九八二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发布了这一消息。由全国妇联、全国总工会、团中央、中国科协、文化部和国家体委等共同负责筹建，荣高棠任筹委会主任。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于同年八月五日正式向全国儿童少年开放。开幕时，邓颖超大姐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她说：“这个中心是建国以来在儿童教育方面创建的一个新事物，它是党中央送给全国小朋友的礼物。”

活动中心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及少年儿童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对广大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成为深受广大孩子喜爱的乐园和各种技能培训的广阔课堂。与此同时，他们努

力创造条件，为发展校外教育事业服务，密切联系全国各地的校外教育机构，团结广大校外教育工作者，被推选为全国校外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单位。

活动中心把育人贯穿在培训、活动、服务、管理之中，努力创造有利于少年儿童积极向上、健康成长的教育环境。园内矗立宋振中烈士铜像，每年有数万名少先队员有组织地前来祭扫；体育馆内陈列我国体育健儿为国争光的奖杯，门前有“冲向世界”的雕塑，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科学宫“伟大祖国厅”，展示了我国历史和当代科学成果等。

为体现孩子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从小学做小主人的精神，活动中心成立了由各校推选优秀少先队干部组成“红领巾理事会”，他们倡导的向三山一地（井冈山、沂蒙山、大别山、延安地区）小朋友捐书活动；亚运会期间，小朋友为亚运会捐款、慰问我国运动健儿。在这些活动中，使孩子们见了世面，增长了才干。

为了扩大教育阵地，丰富活动项目，吸引更多的儿童前来参加活动、受教育，活动中心的建筑面积由建园初的九千多平方米，已扩大到现在的二万二千多平方米。现已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科学宫、艺术宫、体育馆等三大建筑为主的室内活动场地，还有十多个室外游艺活动设施。每年到中心参加活动的人数均在百万人次以上，接待外宾一千三百多批。

在发展少年儿童兴趣爱好和特长方面，活动中心坚持

以普及为主。现中心有计算机、舞蹈、声乐、器乐、武术、游泳、乒乓球等小组培训项目二十多个，每年培训人数达七千五百多人，形成初、中、高三级培训网络，为学校开展活动培养了骨干，提供了经验。活动中心的少儿艺术团和部分红领巾理事会的小朋友，还先后出访美、泰、新加坡、香港、莫斯科等国（地区），受到一致好评。

校外教育是一门科学，为促进我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事业，活动中心牵头成立了“中国少年儿童校外教育研究会”。现已有团体会员二百三十二个。近三年来，他们评选出优秀论文共二百多篇，就校外教育的德育功能、校外培训工作的规律特点等问题开展专题学术研究。会刊《校外教育》已成为全国校外教育战线交流经验、传播信息、探讨理论的园地，成为校外教育工作者的良师益友。

总之，活动中心这几年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每当我去参加活动，或听取汇报时，总感到他们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

另一个为儿童服务的称作儿童发展中心，它成立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是我国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是一个从事儿童发展应用研究的科研事业单位，从事围产保健、儿童保健、儿童营养、儿童心理和教育等研究，目的在于促进中国儿童的全面发展，提高中国人口的素质。近几年来，发展中心面向全国，重点面向边、老、少地区，共开展科研项目一百二十一项，这些项目均已取得不同程度

的社会效益。如与首都儿科研究所共同牵头，由全国十省协作完成的科研项目《中国十省农村七岁以下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研究》，获卫生部一九八九年度部级医药卫生科学进步二等奖；《农村家庭自制婴儿断奶食品》研究课题曾获全国优秀奖。

为宣传科学育儿知识，发展中心在全国各地举办了二百多期培训班，受训人数近万人，大半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印发有关材料时，使用了汉、维、蒙、哈、藏、朝、白、傣、纳西、景颇、佤等民族文字，深受家长、幼教工作者的欢迎，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一九九〇年发展中心被国家民委评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我深感我们国家底子薄，做什么事都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做好儿童工作，也是如此。我国有三亿多儿童，百分之九十在农村，农村是个重头，为儿童服务，必须抓住这个重头。在不同会议上，我经常阐述这一观点。所幸的是发展中心已注意了这一点，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花了较大的力量，这是应该继续发扬的。

我还想回顾一下儿童协调工作。自儿童协调机构的建立，使儿童少年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一九八七年，全国儿童生活用品委员会在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下，会同国家标准局、轻工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儿童配方奶粉、代乳品、铁皮玩具和童车进行税检查，对企业严格质量要求，向

国家经委申请一千万贴息贷款，安排了近二十个儿童生活用品生产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促进了一些重点产品的生产。几年间，通过多次举办儿童用品展销会，大大推动了全国各地儿童生活用品的设计、生产。现在，全国已有玩具企业一千七百多个，年产值达三十亿元，玩具品种一万多种。儿童用品、服装、各种婴幼儿读物等也日益增多和完善。

在协调委员会的推动下，儿童医疗保健事业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十年来，全国新建综合性儿童医院九所，婴儿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三十五，低于发展中国家；一些大、中城市，婴儿死亡率已降至千分之十至十五，接近发达国家。一岁儿童完成卡介苗等“四苗”全程免疫的比重已超过百分之九十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儿童受教育的条件也大有改善，据一九九〇年人口普查，我国七至十四岁儿童在校率为百分之八十五点七。现在经过“希望工程”的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都慷慨解囊，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率，必将大大提高。

协调委员会多次表彰为在儿童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儿童工作者。一九八三年五月，召开了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和集体的表彰大会，并向连续从事儿童教育工作满二十年以上的一百二十万人颁发了“园丁”荣誉纪念章。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对孙敬修等十二位从事儿童工作的老儿童工作者颁发了“热爱儿童”奖章，并对儿童工作开展

得好的三十二个市、县进行了表彰。

协调委员会的大量工作，都是有关部门和广大儿童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我常常说，我是个小工，是沧海中的一粟，只有汇入人民这个大海，才能发挥一点光和热。

家庭教育问题

要做好儿童少年工作，家庭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尽管家庭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旧中国，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广大人民的贫困，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家庭教育思想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完备的科学体系，也难以运用社会力量对广大家长进行系统的指导。新中国成立后，大家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记得五十年代在评选“五好家庭”时，我们就把教育子女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又被忽视了十年。七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加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对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受比较完备教育机会的青年一代，正进入了为人父母的年龄，他们对如何教育好子女有较多的困惑。兼之一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的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往往处于被溺爱的地位，人称“小皇帝”。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成了一个普遍的社会课题。

一九八〇年，中国第一本家庭教育杂志《父母必读》在北京创刊，宋庆龄为杂志题写了刊名，我为创刊号写了《父母亲的神圣责任》，文中谈到：“《父母必读》是八十年代第一春开在家庭教育园地里的一枝报春花，是献给父母的一份礼物，引导人们怎样做好父母，怎样教育好子女。”对于它的出版，我确实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它成为广大家长的良师益友。在一九八三年《父母必读》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说：“家庭教育是个长期性的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用良好的国风和家风教育我们的后代，这是关系我们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大问题。养育后代光凭经验和感情不行，必须依靠文化科学知识。我希望《父母必读》要为几亿农村家长着想、增加图画，做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以便农村家长阅读，帮助他们提高育儿和家庭教育的水平。”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家庭教育的研究和指导，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从城市到农村，在祖国大地上，广泛地展开了。全国建立了中华家庭教育学会，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会，大部分地、县、乡、居委会成立了自己的家庭教育组织。这些组织广泛吸收了教育、心理、卫生、保健、营养等各方面的专家参加，形成了一支综合的力量，为家庭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已开设了家庭教育课程。全国已有二十七种家庭教育的报刊杂志，如北京的《婴幼儿家庭报》、浙江省的《家庭

教育》杂志等。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十年来出书二十一种，累计发行一百六十多万册。当我得知这些消息和材料时，心头无限欣慰。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各地还创办了一大批多种形式的家长学校。不少中、小学、幼儿园根据学生年级不同举办家长学校。有的省、市举办广播父母学校、函授家长学校等。许多地区还举办了新婚夫妇讲座、孕妇讲座、奶奶、姥姥讲座等。有些地区还成立了家庭教育咨询站，请专家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家庭教育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目的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这些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家庭教育的拓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家庭、学校、社会三者的影响同时存在，所以对后代的教育首先是社会的事业，而不仅是家庭的责任。家庭是当今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父母是孩子天然的第一任教师。学龄前儿童大多生活在家庭，这个阶段正是儿童智力发育、性格形成的时期。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到老”。这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小的表现能反映出未来怎样。孩子入学后，课余时间仍主要在家庭，故家庭的影响较为深远。作为家长，他们一般不可能在孩子出生前就具备较丰富的家庭教育知识，更不可能在事前取得实践经验。人的教育事业不应当出废品，但一旦出现废品，无论对家庭，对社会和个人，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广大家长迫切要求社会给予支持和指导，

社会也应该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使之互相配合，协调地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尚有很多工作要做。

家庭教育是通过家长在家庭中实施的。它不可能像学校教育那样按教育计划来实行。在家庭教育中，感情的因素往往起很大作用，而感情因素又因人的认识水平而有差异。许多家长虽然从概念上学习了若干有关家庭教育的知识，但实践中又感到难以掌握，遇到具体问题，往往不知所措。所以家庭教育的研究，必须紧密联系实际，着重解决不同家长在实践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而且要认真地下功夫。因为家庭教育不是通过说教，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父母的日常行为中，潜移默化地起着深刻的影响，故普遍提高父母的素质，是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前提。

这些年家庭教育问题已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各级妇联配合有关部门，认真抓了这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前进的道路上，尚存在着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一些家长对子女过于溺爱，有些家长望子成龙心情过切，对子女成长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有的家长忽视对子女的道德品质的教育等等。如何运用现代传播手段，有效地对家长进行及时的指导，也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五次妇代会前后

一九八三年全国妇联又到了换届的年度，全会同志都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八月二十四日，在京召开了全国妇联四届八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四届五次执委会的日程，选举通过了“五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紧接着，又召开了四届五次执委会，会议由副主席罗琼主持。第一书记郭力文汇报了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经过；副主席黄甘英作关于“五大”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汇报；书记处书记于淑琴汇报了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全国“五好”家庭评选的情况。会议原则通过了“五大”工作报告（讨论稿）、全国妇联章程修改草案、主席团候选人名单（草案）及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会议结束时，全国妇联名誉主席邓颖超、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看望了大家。

一切准备就绪，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九月二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出席了开幕式。全国妇联副主席雷洁琼致开幕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我作了题为《奋发自强，开创妇女运动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五年来我国妇女运动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在农村，妇女劳动

积极性持续高涨，男女农民共同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创造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领域日益宽广，劳动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劳动效率显著提高，劳动报酬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生产中，涌现了一大批男女合作或以妇女为主的专业户、重点户。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五年来，城镇女职工队伍不断壮大。一批批女青年加入职工队伍，大量男女青年组织起来，兴办各种形式的集体企事业，还有不少女青年从事有益于人民的个体劳动。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事业中，据一九八二年统计，女职工的人数占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在轻纺、财贸等系统的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她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在各自岗位上，为提高经济效益和工作效率，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

各条战线的女专业人才正在迅速成长。全国自然科学方面的女技术人员，一九八二年统计，已增加到一百九十八万人。许多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女农艺师、女教育家、女文学家、女艺术家等，忘我工作，刻苦钻研，勇攀高峰，为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创造新的业绩。我国体坛女将，不断创新纪录，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七月，就有五十四人荣获世界冠军，占我国运动员获世界冠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八。

解放军女战士和女民兵，与男同志并肩战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中，舍生忘死，英勇顽强，谱写了一曲曲革命英雄主义的乐章。在国防现代化建设和支援地方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年来，妇女界爱国统一战线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全党、全社会关怀儿童少年健康成长的新气象；社会主义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得到了发展；我国妇女更加广泛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进一步提高了政治地位。五年来，我国妇女高举维护世界和平和妇女儿童权益的旗帜，广泛开展了国际友好活动。我们与各国妇女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友好合作。

报告对今后五年我国妇女的光荣任务提出了五项要求。一、提高素质，为建设两个文明再立新功；二、宣传执行宪法法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三、精心培育后代，做好母亲当好“园丁”；四、正确处理恋爱婚姻问题，争创“五好”家庭；五、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报告对如何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和做好妇女工作，也提出了五点。一、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二、深入调查研究，解决突出问题。三、团结社会各方力量发展妇女儿童服务事业。四、按照干部“四化”要求，提高妇联干部素质。五、健全基层妇代会，活跃基层妇女工作。

大会期间表彰了八千五百六十八名全国“三八”红旗

手、一千三百九十一个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九千八百八十八户全国“五好”家庭，并颁发了奖章、锦旗和奖牌。

五届一次执委会于九月十一日上午召开，会议仍推选我为主席，罗琼、雷洁琼、谭惕吾、李文宜、张帼英、郭力文、黄甘英、林丽韞、阿沛·才旦卓嘎（藏）、玛依努尔·哈斯木（维）、王琇瑛、谭蓓芸为副主席，选出四十二名全国妇联五届常委。五届一次常委会于九月十一日下午召开，会议推选张帼英为书记处第一书记，胡德华、王庆淑、王淑贤、王德意、于淑琴、范崇燕、王立威为书记处书记。

五次妇代大会之后，各条战线、各族妇女代表、各级妇联都认真、及时地把党中央的指示、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广大妇女群情振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争相为四化多作贡献，为开创妇女运动的新局面添砖加瓦。

五次妇代大会调整充实了妇联新的领导班子，增加了年轻力壮的新生力量。新老交替是自然规律，历史的发展总是一代胜过一代，中青年干部思想活跃，富有开拓精神。我相信她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我就安心地退居二线。

在我担任全国妇联四、五两届主席的十年中，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和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时刻关怀着妇女素质的提高。“四大”提出了“四个现代化需要妇女，妇女需要四个现代化”的号召；“五大”提出了“自尊、自重、自爱、自强”的号召。这些号召大大激励了广

大妇女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自觉性。各级妇联为此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应该承认，妇女素质的提高，离实际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我深深体会到，广大妇女要真正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在生活中是个强者，用实际行动赢得社会的尊重，才能争得事实上的男女平等。

在妇女运动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我们虽做了一些工作，在罗琼同志具体主持下，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妇女解放》等书籍。但面临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新时期，妇女工作的实践呼唤着妇女运动理论，迫切需要理论的指导。我感到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尚嫌薄弱，必须长期不懈地多下功夫，才能见到成果。

国际工作二三事

自一九七八年九月全国妇联恢复工作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工作也日益活跃。在我任职全国妇联四、五两届主席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接待、会见来自五大洲的六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二〇三个代表团。其中有政府首脑夫人、政府部长、共产党代表、女作家、著名记者、民间代表、妇女工作者、青年学生、工商业者代表等。通

过座谈交流，彼此增进了友谊与了解。她们有的还是从赛珍珠的作品中了解中国和中国妇女的，听了介绍大为惊讶。有的对红军长征特别有兴趣，甚至低头摸摸我的脚，对这双走了两万五千里路程的脚，很感钦佩。有的对中国的计划生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她们国家的出生率正在下降。她们对中国妇女今天的政治社会地位，都表示羡慕。我总是耐心地回答各种问题，希望她们能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多次会见日中友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先生，他又是日本宋庆龄基金会会长。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中日友好世代相传，他真是不遗余力。他不止一次向我表示：“过去日本在中国犯过许多错误，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日中两国世代友好下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虽年迈，但为了世界和平和中日友好事业，仍然孜孜不倦地奔波。记得一九九〇年他访华时，一下飞机，他就向接待人员询问我的健康情况，并真挚地表示：“康克清先生就是在病榻上，我也要去拜访她。”当我得悉这一情况时，深深地被感动了。尽管我健康欠佳，行动不便，还是坐着轮椅在人大大会堂会见了，彼此握手问候，感到无限欣慰。那次陪同他来访的还有他的儿子和西园寺公一的儿子，他说带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日中友好世代相传。如果他百年了，日中友好事业就会后继有人。我和在座的中国同志听后，无不动容。他还十分关心宋庆

龄儿童科学公园的建设，表示在他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给予帮助。这次带着儿子来华，也是要他为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出力。后来他通过多种渠道，为公园集资四千九百万日元，建成了一个科普乐园，寓教育于游乐之中。这是宇都宫德马先生为中国儿童办的一件好事。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和我们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我第一次会见他时，他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他爷爷过去在旧中国的宁波市办过一个华美医院，当地人民至今很怀念他，并为他立了一座碑；他父亲曾在协和医学院执教；他本人就在协和医院出生，而且是林巧稚大夫亲自接的生。说到这里，他高兴地西服口袋里取出出身证给我看，话语中充满了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八十年代，他的儿子也来中国工作，他的儿媳在协和医院生下一名男孩。这是他又一次来华时向我们报告的好消息，我们都向他祝贺。格兰特一家和中国人民的友谊已延续到第五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讨论援助拨款时，他总是力争为中国说话，无怪人们开玩笑说，格兰特不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而是中国的执行主任。事实上，他确实为世界各国儿童办了许多好事，特别是第三世界儿童，受益不浅。如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就有儿童发展中心、婴幼儿乳品厂、彩色印刷设备等。八十年代，他致力于儿童免疫工作，为亚非拉各国提供大量疫苗，使婴幼儿死亡率大大下降。他要求我们城市儿童的接

种率达百分之九十，农村达百分之八十五。他亲自到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考察项目实施情况，多次强调：“我们不仅要看你们的北京、上海、广州，更重要的要看你们的边远地区。”当他看到我们确实从上到下，认真执行协议，真正把财物用在儿童身上，为后代造福，他满意地笑了。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很重视儿童工作，中国的妇联从中央到最基层，从城市的街道和乡村都有“腿脚”，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他在有关会议上，介绍中国的经验，认为中国的经验值得第三世界借鉴。

这期间，我曾出访朝鲜、日本、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并出席了联合国妇女十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中期会议。

一九七九年十月，应朝鲜劳动党中央的邀请，中联部组织由我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友好访问团，一行十一人，十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访问了朝鲜。在平壤、万景台、咸兴、元山、开城和板门店，我们参观了一些工厂企业、合作农场、大专学校和托儿所、少年宫、地铁等，还游览了金刚山风景区。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金日成接见访问团全体成员。他先讲了几句朝语，接着就讲汉语，亲如家人。他说：“我们两国是鲜血凝成的战友国家，情谊很深。现在两党团结很好，我认为是永恒的。”他还深情地提到一九五五年朱德委

员长来访时，平壤只有一家饭店，就是大同江饭店，朱委员长就下榻在那里。他说：“你们实现四化，就意味着我们后方的巩固和强大，使我们更加有胜利的信心。”

他十分称赞我们粉碎“四人帮”所取得的胜利，不赞成“四人帮”把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看作敌人。他说，南朝鲜有位化学家李升基博士，已七十八岁了，他在国外发表论文，很有影响。但他在汉城得不到重用，来信表示想来平壤，我复信表示欢迎。她把女儿、女婿都带来了，全是搞化学的。不久，战争爆发，他在鸭绿江畔搞起了清水化工厂。停战以后，他继续搞化工厂，从石灰石提炼原料，取之不尽。他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he 现在是议员，参加了劳动党。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能看作敌人呢？

听了他的话，我情不自禁地说：“李承晚把博士当作草，金主席将博士当作宝，您的远大眼光，令人钦佩。”

他还谈到朝鲜刚解放时，打倒地主，人民情绪很高。现在不愁吃穿，儿童、青年都有机会上学；房子虽然不多，但粮价很便宜。要建设好国家，还是要靠人的积极性。他在各种会议上总是要求干部做好人的工作。

访朝期间，我们三次见到了金圣爱。她是朝鲜民主女性同盟委员长、朝鲜妇女的杰出代表。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提到抗美援朝中，我国帮助他们抚养了大批难童、孤儿的事，说：“你为我们的孩子和国家作出了贡献，非常感谢。”我说：“中朝两国是兄弟之邦，唇齿相依，在抗美援朝中，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她还专门给我们送来朝鲜有名的泡菜。泡菜中夹着虾米、火腿、味道很鲜美。

在各地访问期间，处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从中央到地方，他们都强调中朝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都热情赞扬我国粉碎“四人帮”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取得的成就。

朝鲜首都平壤，建筑布局合理，设计美观、大方，面向马路的住房阳台规定不能晾晒衣物、摆放杂物，给人以整洁之感。街道宽敞，马路两旁，绿树成荫，街心花园百花争艳，整个城市除了路面就是草坪。农村住宅大都是新建的，我们参观了几户人家，虽不宽敞，但很紧凑实用。

朝鲜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们非常重视对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称“儿童是国家之王”，并且注意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紧密结合。全国孩子入学前必须上两年幼儿园，不然小学不接收。各合作农场作业班、工厂企业和街道都举办托儿所。各道、市都有少年宫，吸收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根据青少年的兴趣爱好，开展各种活动，进行基础知识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平壤少年宫就有二百个研究室，设有专职教师，还聘请专家、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少年宫的活动分为普通班和研究班，普通班所有学生都能轮流参加，每期一至两个月。每个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一般都轮到三四次，能学会开动一种机器，或弹奏一种乐器，研究班则根据学校

推荐，进行一项专门业务技术培训，时间较长，从半年到一年。这些研究班培养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也发展很快，解放前，朝鲜只有一所大学，还在汉城。现在全国已有一百五十六所大专学校。少数重点大学还设有学士院和博士院。

朝鲜党和政府提倡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向公民号召：全国艺术化，城市无噪音，各尽所能，热爱本职工作。他们不仅培养了大批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材，还养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我们所到之处深觉社会秩序良好，人们自觉遵守纪律，爱劳动，有礼貌，没有随地吐痰现象。人们穿戴整齐，少年学生主动向外宾敬礼打招呼。常常见到孩子们拿着扫帚等工具参加公益劳动。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三日至三十日，“联合国妇女十年”（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五年）中期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三千多人。

会议以“平等、发展、和平”为主题，以“就业、教育、保健”为副主题。主要议题分别为：一、审议“妇女十年”前五年的活动和制定后五年的行动纲领；二、讨论种族隔离对南部非洲境内妇女的影响和对她们的援助措施；三、讨论以色列占领区内外巴勒斯坦妇女的经济社会处境和对她们的援助措施；四、审议世界妇女难民问题。

中央很重视这次会议，由我国政府委托全国妇联组成代表团参加，指定我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和全国妇联主席身份率团参加，黄甘英、秦加林、陆瑾为副团长。动身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给“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发了贺电。邓颖超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的身份接见新华社记者，对联合国妇女十年活动，给予热情赞扬，并阐明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于七月九日下午抵丹麦哥本哈根。七月十五日，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认为十年的《行动纲领》主要之点在于行动。在国家一级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改善，提高妇女的地位；各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应保证《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逐步实行；在执行后五年《行动纲领》时，希望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从政治上、经济上增加对“妇女十年”活动的支持，特别应把重点放在第三世界。妇女的解放同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外国侵略军必须从阿富汗、柬埔寨撤出去。有关巴勒斯坦问题、民柬代表权问题、南部非洲妇女问题、世界妇女难民问题等，在几个委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们代表团都明确地阐述了我们的立场与观点。

会议期间，我出席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签署仪式，代表我国政府签了字。随后出席了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又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夫人、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夫人、民柬代表团团长英蒂丽、埃及总统萨达

特夫人、南斯拉夫妇地会主席、法国妇女地位部部长等。

同穆加贝总统夫人会见时，她由津巴布韦邮电部副部长陪同，我们谈得非常友好。她们感谢中国对津巴布韦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的大力支援。她们说津巴布韦有个习俗，收到对方用盘子送来赠礼时，下次要用同样的盘子回赠。她们在革命年代接受了中国送来的许多盘子，现在她们胜利了，也要学中国的榜样，帮助支持非洲尚未解放的国家。她们说也许我们不能全部报答你们那么多盘子，但我们保证，将把你们送给我们的支援盘子，传给其他待解放的国家，彼此相传下去，直到所有的国家都得到解放。

在和各国妇女代表团领导交谈中，我表示中国政府热烈支持和赞助“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认为这次中期会议是有益的，成功的。我们大家要消除制造难民的根源，反对和消除大小霸权主义者的侵略和扩张；外国军队应当立即全部无条件地撤出占领地区。每次交谈，我都针对各国不同情况和特点，向她们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

哥本哈根是个环境十分优雅、宁静的城市。紧张的会议之余，每到傍晚，我们常漫步街头。马路两旁，绿树成荫，一栋栋小巧玲珑的花园洋房各有特色，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一些珍花异草，从园里爬上墙头，倒挂在墙外，红的、白的、黄的各色花朵，争芳斗艳，在夕阳中更显俏丽。街上很少行人，离使馆不远，有一个玫瑰园，大使夫人带我们去观赏，面积不大，却盛开各色玫瑰，晚风徐徐，香

气扑鼻，令人心旷神怡。

七月十九日，我们应一九七八年丹麦妇女访华团团长库克之邀，到团员本特森家作客。参观了她的家庭农场，奶牛场虽规模不大，但机械化程度很高，一年的收入可观。她招待我们吃午餐，都是她的农场自产的食物，新鲜可口。

七月二十七日参观了安徒生故居。安徒生是世界闻名的童话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近百种文字，在世界各国畅销不衰。故居中陈列着各种译本，其中也有叶君健直接从丹麦文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他的翻译忠实流畅，一九八八年丹麦政府授给他丹麦国旗勋章。

安徒生的故居在奥登斯，有十七万人口，一九八八年将是奥登斯建城一千周年。他的故居已改为安徒生博物馆，展品中有他用过的衣物，他的剪纸和一些照片。我们还看了《丑小鸭》童话故事影片。安徒生故居位于一个简陋的小巷里，碎石路面，大门上画着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脑袋，据说是他自己画的。住房像他的童话一样，朴实无华，房间矮小，卧室只有十平方米。一到那里，我们就感到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安徒生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是童话作家，还写小说、戏剧和诗。他还酷爱剪纸，许多剪纸作品幽默而富于想像力。

安徒生没有结过婚，但他赢得了全世界亿万儿童的心。他是全世界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丹麦

人都为安徒生而自豪。安徒生是丹麦的国宝。他用自己的辛勤笔耕，为世界各国儿童创造了美好的精神食粮。慕名前来参观的各国旅游者，每年不下几十万人。

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会议是成功的，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由于各国实际情况不同，条件各异，对待一些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也是很自然的。困难和阻力依然很多，全世界妇女的解放运动，仍将是任重而道远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应日本各界妇女的邀请，我率领中国妇女代表团，到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当时正值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十周年前夕，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就受到了日本当时的首相铃木善幸和参议院议长德永正利的会见。日方为我们组织了一百五十位各界知名妇女，包括三十多个妇女团体及各政党的妇女组织在内的欢迎委员会。

我们先后到了东京、横滨、大阪、京都、奈良、神户六个城市及千叶县的农村，参观了医院、工厂、电视台、小学校、儿童医疗中心，游览了奈良公园、唐招提寺、东大寺等名胜古迹，还就妇女就业、儿童教育、老人问题等进行了专业座谈。我们广泛接触了各界人士和妇女群众，有总理府女官员、女作家、科学家、教授、医生、名演员、女职工、农妇、家庭主妇和学生等。又应日本朋友要求，由我作了两场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她们又在日本的电

视播放黄金时间，安排我们的正副团长通过电视与日本观众见面。日中友协斋藤纪江女士说：“中国妇女访日代表团的活动，加深了日中友好关系，已大大超过民间妇女团体的影响。”

大友世富女士陪着我从成田机场到新大谷饭店，一路上紧握着我的手。她在欢迎会上说：“我真切地感到，日中两国妇女的血液流在一起了”。藤田多喜先生说：“我非常欣赏‘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我们要以这种精神，为提高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为日中友谊世代相传，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努力奋斗。”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的夫人说：“日本许多战争孤儿留在中国。在中国父母哺育下长大成人。作为一个日本妇女、母亲，我一定要说，感谢中国妇女和母亲。”

东京台东小学和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是姐妹学校，代表团前去访问时受到热烈欢迎。校长在致词中，转达了日本小朋友的请求：希望能帮助大熊猫欢欢找到女婿。回国后，我专门写信向外交部反映此事。不久政府首脑访日时，真的带去了珍贵的礼物——一只雄性的熊猫，帮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敬谒京都岚山周总理诗碑，是我们代表团的热切愿望。京都的建筑是依照中国西安建造的，现在两个文化古都早已结成姐妹城市。那天天气晴朗，我们手捧鲜花，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岚山出发。远处从山岗上飘来“我爱中国”的

歌声，主人说，这是专程前来欢迎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学生、主妇和工人的合唱。发起筹建总理诗碑的九十九岁老人吉村孙三郎，特派他的女儿在诗碑前迎接我们。她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并在诗碑前合影留念。我们缅怀周总理生前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的丰功伟绩，觉得诗碑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丰碑，就是中日友谊的最好象征。

代表团每到一处，当地许多华侨和华侨领袖都出来热情欢迎。他们心向祖国，希望见到来自故乡的亲人。他们说：“只有祖国繁荣昌盛，海外游子才能扬眉吐气。”在东京华侨和代表团欢聚会上，代表团成员和华侨均按籍贯安排在一起，大家一见如故，听到乡音，更是喜出望外。那天，我的讲话也很动情：“你们离开祖国时赤手空拳，一没带土地，二没带房产。你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勤劳的双手，创业起家的。”很多华侨听了，十分激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那天晚上，著名华侨青年歌手李木兰，应大家要求表演唱歌时说：“我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日本人，我本人就是中日友好的结果。我愿为中日友好而歌唱。”她用日语、汉语唱了三支歌。她那动听的歌声，充满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割断的同胞情谊。在代表团的告别招待会将要结束时，李木兰快步跑到我的跟前，叫着康奶奶，含着热泪，一再和我拥抱，难舍难分。这些情景，虽然过去八年多了，但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这次访问中，我们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日本人民办事效率高、守纪律、有礼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参观松下电器公司，每一个工人都在流水作业线上紧张地操作。走到他们身边，他们依然目不斜视，旁若无人。日本人民注意美化环境，住宅前空地很小，也都充分利用，种上鲜花绿草和爬墙虎一类的攀援植物，把楼房点缀得春意盎然。据说全国绿化覆盖面积已达百分之七十。日本政府和人民都重视教育，妇女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应南斯拉夫妇女社会地位问题代表会议（简称妇地会，相当于我全国妇联性质的组织）的多次邀请，我们一行五人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乘飞机到达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妇地会主席拉德米拉·波帕迪奇在机场和我一再拥抱，亲切地说：“终于把你盼来了。在这里，你一定会生活得愉快。”我高兴地回答：“访问南斯拉夫，向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妇女学习，这是我多年的宿愿。非常感谢你们，使我今天能如愿以偿。”

访问期间，双方进行了工作会议，交流了妇女儿童工作情况和经验，并对一九八五年将要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交换意见。我们还敬谒了铁托墓，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农工联合企业、纺织厂等。接触了许多女干部、女职工以及妇女群众，深感南斯拉夫妇女热爱本职工作，对

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情谊。

一天清晨，我在住地附近街心花园散步。雨后初晴，空气清新，花园里郁郁葱葱，高大的苦栗树像是一把把遮阳的大绿伞。近处一尊带翅膀的小天使雕像，笑容可掬地展开双臂，欢迎所有的来客。几只鸽子飞来，旁若无人地低头觅食。这些景象几乎使人忘了地处闹市。一位南斯拉夫老年妇女，牵着一條小狗走来，微笑着用英语问：“你们中国人？”我们说“是的，我们是中国人”。她高兴地比划着说：“中国非常非常大，中国人民勤劳智慧，我十分喜欢中国。”我们欢迎她有机会去中国旅游，她微笑着点点头。

一天，我们正在餐厅用早餐，南斯拉夫第一任驻华大使夫人维拉·波波维奇匆匆赶来看望我，她深情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的丈夫，我的丈夫都已作古，但中南友谊更前进了。我十分怀念在中国的生活，怀念我的中国朋友们。”她一再邀请我们到她家作客。我们离开贝尔格莱德时，她专程来宾馆送行，依依惜别，频频挥手。我驻南大使说：她十分渴望重访中国。那年十月她匆匆来到北京，却没有具体接待单位，幸好我国首任驻南大使伍修权出面接待了她。后来，中国妇女代表团一九八七年出访，路经南斯拉夫时，她又托代表团捎来了一块红色的纯羊毛头巾送给我。在感动之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表示衷心感谢和深情的怀念，祝愿她生活美好，健康长寿。

访问期间，我们先后受到南共联盟主席德拉戈斯拉夫·马尔科维奇、社盟主席约万·戴亚诺维奇、女总理米卡·普拉宁茨等党政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南斯拉夫老战士协会隆重授予我胜利奖章。我在致答词时说：“作为个人，我仅仅是沧海一粟。感谢南斯拉夫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深厚情谊，胜利奖章是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对我的最高礼遇，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南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南斯拉夫联邦有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马其顿共和国和我的故乡江西已结为友好省，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市和南昌市结为姐妹城市。她们为此安排我们专程到马其顿共和国及其首府斯科普里参观访问。

马其顿共和国在南斯拉夫的南部，百分之九十的人是马其顿族，其余是土耳其、阿尔巴尼亚等族。那里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并有许多名胜古迹。所以旅游业很发达。我们下榻的湖滨宾馆，依山傍水，就在著名的奥赫里德湖畔。我们访问了一个工人家庭。男主人在工厂做供销工作，女主人是护士，两人的月工资收入为三万五千第纳尔。老母亲是一九四三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每月领退休金一万三千第纳尔。家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生活美满宽裕。客厅里电视机、录音机、钢琴等一应俱全。他们住的三层楼房是分期付款建成的，总价四百万第纳尔，建成当年付一百五十万，现在每月付一万多，十五年全部付清。小楼底

层是车库，二层是客厅、儿童活动室、厨房等，三楼是卧室。旅游旺季时，他们把二层的房间租给游客，增加一些收入。

主人非常好客，老母亲端出她自己做的点心和蜜饯，请我们品尝；女主人送来了各种饮料。还给我们欣赏了老母亲编织的窗帘、桌布，十分精致。八岁的小女儿伊利娜随着音乐的节奏，给我们表演了优美动人的歌舞。

南斯拉夫妇女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无数南斯拉夫姐妹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铁托说过：“早在一九三六年，反法西斯运动刚开始，南斯拉夫妇女就以无比的英雄气概，站在南斯拉夫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斗争的最前列。”如今，在南共联盟领导下，南斯拉夫妇女继续活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在发展社会主义自治、维护各民族团结、发展经济方面，都做出了新的贡献。女职工已占全国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七，纺织业中，女职工占百分之七十；卫生部门占百分之七十五；旅游业占百分之五十三；教育部门占百分之五十七；在农村妇女劳动力占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

南斯拉夫已实行八年义务教育制。中学毕业后，百分之五十能进入大学，百分之四十四进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接受定向培养。妇女的文化素质也有很大提高，大学生中，女学生占百分之四十五，全国有一万二千名妇女获博士学位，

二万名妇女获硕士学位。

南斯拉夫很重视青年人的革命传统教育，让青年人知道老一辈人怎样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今天的美好生活。这不是要年轻人再去吃过去的苦，而是要使他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明天，更需加倍努力。

访南之后，我们又应罗马尼亚全国妇女理事会和安娜·穆利尚主席的盛情邀请，到罗马尼亚进行友好访问。

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中央书记莉娜·乔巴努接见了我们，亲切交谈。罗共中央候补执委、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苏扎娜·格德亚会见代表团，并共进晚餐。我们共同畅谈中罗两国妇女友好往来的历史。为召开联合国“妇女十年”会议交换意见，准备再度友好合作。

我们参观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博物馆，馆内珍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斗争历程和聪明才智。

我们还参观了儿童福利设施、妇幼保健网、博物馆、工业、农业、学校、住宅区等。还访问了工人、农民家庭。了解到，广大罗马尼亚妇女，已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一大批罗马尼亚妇女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在布拉索夫市，我们参观了一所师范中学，学生中女孩子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又到靠喀尔巴阡山的旅游圣地——林中空地游览，那里风景美好，气候宜人。

罗马尼亚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干部，规定每个县委必须有一名女书记，女同志多的单位，要配备女同志负责领导；要求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为她们参加领导工作创造条件。当时全国四十个县、一个直辖市，即有女县委书记五十八人，女县委书记八十人。我们所接触的女干部都有大学以上文化水平，精明能干，精通业务，有很强的事业心。

罗全国妇女理事会有一百九十五名理事，全为兼职，只设一名专职秘书，负责联系理事，处理日常事务；理事会每半年开一次全会；由三十五人组成的执行局每月开一次会，执行局常委七人，每周碰一次头，经会议决定的各种问题，大家分头贯彻执行。罗马尼亚全国共有二十万名兼职的各级妇女干部，整个对内对外的妇女工作都由她们负责组织和实施。平时，她们以本职工作为主，在各自的单位上班，工资也由工作单位支付。这次出面接待我们的妇女理事会主席是商业部部长。还有两位副主席分别为司法部副部长和副处长，一位书记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工会书记。她们在陪同我们的过程中，常常利用空隙回本单位处理工作。布加勒斯特市妇联的一位副主席是大学教授，她利用星期日陪我们参观，星期一返校上课。全国妇女理事会副主席玛博布（司法部副部长）告诉我们，这些干部之间，团结协作、互相支持的精神非常好，一人有困难，别人立即前来相助，工作中没有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情况。

罗马尼亚的少儿工作十分活跃，规定七至十四岁的少

年儿童均为少先队员。一九七六年建立学前儿童组织“祖国之鹰”，所有三岁至七岁的幼儿均参加。这样，全国三岁以上的儿童都是有组织的，从小就受到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他们还在青少年儿童工作中，提出“通过劳动，为了劳动”这一有特色的口号，从小培养儿童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根据不同年龄分别安排适当的劳动，还为他们开办小小农场，使他们学会简单的种植和饲养技能。

他们还教育少年儿童要爱文化、爱艺术、爱体育、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等。每年暑假都有百分之九十的儿童免费参加夏令营和有组织的旅游活动。每年夏令营都要邀请外国小朋友，一九八四年就邀请我国十名小朋友参加。

她们对妇幼保健工作也十分重视，妇女产假一百二十天，工资照发。产假后，如母亲愿意亲自抚养幼儿，其工作岗位可保留六年。他们三岁以上的幼儿入托问题均已解决。

在罗马尼亚访问历时五天，处处感到中罗友好已深入人心。

结 束 语

退居二线后，我常以周恩来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自勉。我对中青年同志说，现在，我只能当个小工了。年逾七旬的老人，怎能和风华正茂的青年、精力充沛的中年相比呢？从年龄来说，我是服老的。不过在精神上，我仍然不敢服老。每天，我依然坚持学习与工作，并且注意锻炼身体。散步、做操，就是刮风下雨，或隆冬季节，我也不间断，只是改在室内。我深深体会到，生命在于运动，健康是一切之本。

每天清早六时半我听新闻广播，晚上七时看电视新闻，阅读当天的报纸，这些都是我生活中的必修之课。在秘书协助下，我处理每天的来文和信件，秘书关心我的健康，建议我量力而行，不要过于劳累。但我仍保持着今日事今日毕的习惯。参加一些必要的会议，或听有关报告，这是我了解情况和学习的好机会。工余之暇，我爱写写毛笔字，增强腕力；听听音乐，我最爱听的还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百听不厌，给人以欢快与力量。我还喜欢和年轻人聊聊天，了解当代

青年的思想和情趣，和他们相处，我觉得青春常在。我赞美他们的开拓、进取精神。可是谈起消费观来，我就不能苟同了。他们认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向往高消费。我却认为艰苦朴素的风尚永远不能丢。我们的国家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比较低。我们的工作要往高处看，生活要往低处比。在年轻人的眼里，康妈妈不免保守。

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一边散步，一边摘枸杞头。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对自然界的植物非常偏爱。枸杞是落叶灌木，生长在背阴潮湿处。通常在墙角、石缝、大树根下，都可以找到它。摘下它头部的嫩绿部分，用开水烫一烫，加以适量的盐和香油一拌，是顶好的美味凉菜，长期食用，有明目补肾的作用。到了秋天，枸杞开淡紫色的小花，结的果实就是红通通的枸杞子。我们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盛产枸杞。采蘑菇、挖荠菜也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视力虽日益衰退，但凭我的实践经验，我会在排水沟处发现一堆蘑菇，在桃园深处觅得一片荠菜，我那喜欢劲儿，犹如见到故人。年轻人还惊奇老大姐的眼睛真灵呢！有时候，我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先侦察，然后带上篮子和小铲，挖上满满一篮。蘑菇炒豆腐是一道好菜，用荠菜和肉末拌陷包饺子，吃起来鲜美可口。据药书记载，荠菜可入药，有利尿、解热和止血的作用。秋天，荠菜开小白花，结出一串串的籽，成熟后，摘下一串，放在耳边，轻轻摇动，好

似远方传来铃声，给人无限遐想。枸杞头、蘑菇和荠菜年复一年，自生自长，供人食用，取之不尽。我和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老年人口正在逐渐增加，离退休的老同志越来越多。真正要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年人确实要有个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过程。要缩短这个过程，对老同志来说，就要胸怀全局，以实际行动支持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样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主动权，就能心情舒畅地对待一切。有位老同志，她离休已十几年，总结了几句话，即我们应该知足常乐，助人为乐，与人同乐，自得其乐。我想这几句话，不仅概括了她的生活体验，对大家来说也有普遍意义。当然，中青年干部也要发扬敬老尊贤的优良传统，真正认识到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从思想感情上关怀、体贴他们，支持他们为四化建设发挥余热，使他们愉快地安度晚年。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妇女工作正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前进。只有坚持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国家才能富强，妇女才能进一步解放。积极参与改革，是我们每个人的重要职责。只有不断学习，勤于探索，接触实际，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我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每当我思考这些大事时，心头倍感充实。

后 记

在康克清大姐逝世一周年之际，几经易稿的《康克清回忆录》，即将付梓问世了。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对我们撰写组的同志来说，书稿的完成是对康大姐的最好纪念，遗憾的是康大姐未能亲自抚摩它。

我们不会忘记，康大姐第一次接见撰写组的同志时，着重谈了一个“真”字。因此，不能失真是我们撰写组的准则。1987年夏秋之交，康大姐先后用十七个上午，向我们口述了她一生的经历。不久，我们怀着历史的使命感查阅了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并踏上了康大姐当年所走过的道路进行采访。先后到了江西万安、永宁、井冈山、兴国、瑞金、吉安、铅山、福建长汀、陕西延安、保安、山西五台、武乡、沁源、沁县、安泽、长治、洪洞、临汾、阳泉和太行山、河北西柏坡、平山、饶阳、内蒙锡林格勒旗等；还在北京、南昌、石家庄、西安、太原、大连等城市，先后访问了很多老红军、老同志，有康大姐昔日的领导、部下和战友，有红军大学、抗大和中央党校的同学，也有朱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曾与康大姐相处过的驻地房东和

老乡……她们谈起往日和大姐一起生活和战斗的峥嵘岁月，无不动容。我们先后专访、开座谈会和发函调查的共达四百余人次。为了弄清一个情况，我们对有关同志，常多次登门求教，被访者总是热情接待，不厌其烦地回答提问，使我们深受感动。

初稿完成时，康大姐的健康情况已经欠佳，但她仍认真地从头至尾审读了一遍，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她病重住院前夕，又再次审听了三稿的部分章节，仍然强调要实事求是。撰写这本回忆录的过程，实际上是我们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中学习了党史、军史和现代史，学习了康大姐的高尚情操和优良作风，从而更加深了对她光辉一生的认识和敬仰。

《康克清回忆录》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万绍芬和陕西省顾委副主任白文华(已故)，他们从多方面及时地给予了关怀与帮助；还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组和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罗琼、郭力文、黄甘英等老大姐的赐教。在撰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全国妇联档案处，江西、福建、陕西、山西、河北、内蒙等地的党史办、档案部门的全力协助；康大姐各个时期的战友和朱老总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康大姐的女儿朱敏、儿媳赵力平等亲属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珍藏的回忆。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最后，更要由衷地感谢解放军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王长龙，他们从始至终和我们一起

研究提纲，讨论书稿，提出修改意见，直至最后定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由于康大姐谦逊的品格，更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回忆录很难尽如人意，遗漏和差误在所难免。我们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教。

感谢侯波、杨绍敏、郭占英、王景英、沈延太、汪冠民、郭静等同志为本书提供了照片。